

目 录

• 中亚研究专辑 •

阿富汗问题

- 3 赵华胜 / 中国与阿富汗——中国的利益、立场与观点
- 20 A·高希 / 印度与阿富汗关系中的中亚因素
- 37 姚远梅 / 杜兰德线：侵略阿富汗的泥潭——从十九世纪英国人建立“科学边界”说起

中亚与上合组织

- 62 王维然 雷琳 吴唯君 / 自然资源是哈萨克斯坦的赐福还是诅咒？
- 76 宇山智彦 / 吉尔吉斯斯坦二次革命后的政党政治与总理-总统制：乱中有序
- 93 杨 成 / 去俄罗斯化、在地化与国际化：后苏联时期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生成和巩固路径解析
- 160 陈体标 /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产业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冯绍雷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杨 成

刘 军

本期执编：杨 成

封面设计：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021-62233816；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出版日期：2012 年 10 月 28 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12 年第 5 期 (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Чжао Хуашэн

Китай и Афганистан: Интересы, позиции и взгляды Китая..... (3)

Анвеша Гхош

Фактор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между Индией и Афганистаном..... (20)

Яо Юаньмэй

Линия Дюрана: трясина для вторжения в Афганистан---анализ с момента установления британцами в 19 в. «научной границы» (37)

Ван Вэйжань, Лэй Линь, Ву Вэйцзюнь

Природные ресурсы являются благословением или проклятием для Казахстана?..... (62)

Томохико Уяма

Партий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президентская система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порядок в беспорядке (76)

Ян Чэн

Дерусификация, локализация и глобализация: анализ пут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и укрепления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й и коллектив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новых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й период (93)

Чэнь Тибяо

Изменения в структуре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рост государств-членов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160)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12 年第 5 期 (双月刊)

Contents

Zhao Huasheng

China and Afghanistan: China's Interest, Stances, and Perspectives..... (3)

Anwasha Ghosh

The Central Asia factor in India-Afghanistan Relations (20)

Yao Yuanmei

Durand Line: Quagmire for Invasion in Afghanistan---Analysis through the
“Scientific Frontier” Established by the British in 1800s..... (37)

Wang Weiran, Lei Lin, Wu Weijun

Is the Natural Resource a Blessing or a Curse for Kazakhstan? (62)

Tomohiko Uyama

Party Politics and Premier-Presidentialism in Kyrgyzstan after the Second
Revolution: Order in Disorder (76)

Yang Cheng

Derussianization, Loc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n the Path of Central
Asian Newly Independent States' Construction and Consolidation in Their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Identities during the Post-Soviet Era (93)

Chen Tibiao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of the SCO Members (160)

阿富汗问题

中国与阿富汗

—中国的利益、立场与观点*

赵华胜**

【内容提要】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关切及政策。中国将自己定位为积极的参与者，但又保持低调立场。中国积极参与阿富汗经济重建，提供财政支持和各种援助。中国支持国际社会对阿富汗的帮助，但又避免直接军事卷入阿富汗。中国谨慎地对待塔利班问题，避免与其直接发生冲突。中国希望“喀布尔进程”能够顺利进行，以使阿富汗政府发挥更大的自主性、承担更多的责任，并且支持阿富汗实现民族和解。新疆的安全稳定是中国阿富汗政策的出发点，中国将阿富汗看做是构建新疆地区安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中国也在为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做准备。

【关键词】中国 阿富汗 经济重建 安全关切 喀布尔进程

【中图分类号】D822.3(37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2)05-0003-(17)

引言

中国对阿富汗问题持明确、一贯而又相对低调的政策立场。在阿富汗问题上，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主流观点基本一致，但中国又有自己独立的政策，

* 本文是在“China and Afghanistan: China's Interest, Stances, and Perspectives”(CSIS, March 2012)一文的基础上补充修改而成。原文由孟维瞻翻译成中文，作者在此表示感谢。

** 赵华胜，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反映了中国自身特殊的利益、关切，以及优先目标。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有很多关切，但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新疆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中国与阿富汗政府保持着正常、良好的关系，积极参加阿富汗的经济重建，为其提供财政支持和其他援助。中国支持国际社会对阿富汗的帮助，但又避免直接军事卷入阿富汗。中国极少批评美国的阿富汗战争，但对这场战争的有效性存有怀疑，并且拒绝加入美国发起的“北方配送网络”（NDN）。中国反对塔利班，因为塔利班与“东突”组织——维吾尔族分裂势力——关系密切，但中国又谨慎地对待塔利班问题，以避免与其直接发生冲突。中国支持阿富汗人自己治理阿富汗，希望“喀布尔进程”能够顺利进行，使阿富汗政府发挥更大的自主性、承担更多的责任。与此同时，中国也在为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做准备。

一、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低调立场

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2002年，卡尔扎伊领导的过渡政府成立后，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一次阿富汗问题会议上曾指出，“中国是阿富汗战后和平重建的积极支持者、参与者和推动者，并发挥了积极作用。”^①但和其他大国相比，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被认为是相对低姿态的。^②主要表现在中国无意挑战美欧国家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地位，并且谨慎地避免军事介入阿富汗事务，拒绝参加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中国之所以奉行低调政策，是由诸多条件和环境决定的。阿富汗战争爆发后，美欧同盟的军队大批进入阿富汗，成为了阿富汗新政府的政治监督者和安全保证者。美欧国家在阿富汗问题上发挥着主导作用，包括新政府的成立以及军事和经济重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事实上没有发挥重大作用的余地，同时它也不想扮演西方小伙伴的角色。

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在阿富汗的目标相对有限。在重建问题上，中国

① “杨洁篪出席阿富汗问题地区峰会并发表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0年1月26日，<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xgwx/t653877.htm>; <http://english.cri.cn/6909/2010/01/27/1461s545669.htm>

② Christian Le Mière, “Kabul’s New Patron? The Growing Afghan-Chinese Relationship”, *Foreign Affairs*, April 13, 2010,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6194/christian-le-miere/kabuls-new-patron>

坚持其政治原则，但并不想直接政治重建阿富汗。至于阿富汗的国内事务，如政治力量构成、社会模式和意识形态，中国不认为这些是自己的任务。中国关注的主要是阿富汗以及本地区的安全稳定，特别是对新疆安全的影响。

传统上，阿富汗在中国的外交事务中处于边缘位置，中国在阿富汗的影响也比其他大国要小。从 1950 年代到 1980 年代，阿富汗一直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在 1979 年入侵阿富汗，直到 1989 年才撤军，随后阿富汗内战爆发。1996 年塔利班控制了国家权力，但中国并不承认塔利班政权。2001 年，美国对阿富汗发动了新的战争，并领导着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战争持续了 10 年多，美国军队至今依然驻扎在阿富汗，到 2014 年底之前才可能基本撤出。在阿富汗的这些重大事件中，中国都不是主角，当然，这不表明中国不关心阿富汗局势。

然而，中国的低调立场并不意味着中国与阿富汗现政府的低水平的关系。自 2001 年底阿富汗新政府成立后，中国就与其保持着密切和友好的关系。2002 年 1 月，阿富汗过渡政府成立伊始，卡尔扎伊总统就对中国进行了访问。2006 年，卡尔扎伊对中国进行了首次国事访问，2010 年第二次国事访问。中国最高国家和政府领导人迄今尚未访问过阿富汗，两国官方往来主要是次一级别的层次，特别是两国外长之间。除了双边轨道，两国领导人还经常在多边平台见面和交流，特别是在上海合作组织（SCO）框架内。

中国努力巩固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促进经济合作，并向阿富汗提供经济和其他援助。2006 年，中阿签署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是一份重要的文件，为发展双边关系确立了基本的政治原则，并指明了方向。条约签订后，两国在很多领域达成了一系列合作协议。两国合作覆盖的领域广泛，但安全和经济处于首要地位。两国政府宣布，将在反恐、禁毒和打击有组织犯罪方面进行合作。中国政府表示，将支持阿富汗政府维护国内稳定的努力；阿富汗政府承诺，将为中国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跨国犯罪提供支持。两国政府同意强化双边经济关系，重点放在原材料贸易、发电、公路建设、农业和交通发展，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①

^① 这些目标是中国和阿富汗《联合公报》中所规定的。两次《联合公报》分别签署于 2006 年 6 月 20 日、2010 年 3 月 25 日。

二、安全——中国的核心关切

在很大程度上，新疆的安全稳定是中国阿富汗政策的出发点，这也体现了中国阿富汗政策的主要特征。中国在阿富汗也有重大项目和投资，但它们是正常的商业活动，是中国的经济利益，而不是中国的“担心”。

对于新疆来说，“东突”是影响其安全稳定的最大内部威胁，而阿富汗问题则是其最大外部威胁。阿富汗与新疆在安全问题上的关联显而易见。“东突”组织与塔利班及基地组织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不是秘密，它们早在 2001 年“9.11 事件”之前就已经携手。从 1996 年到 2011 年，阿富汗是“东突”的可靠基地，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成了“东突”精神上的鼓动者和物质上的供给者，为其训练战斗人员、提供武器，并给从中国逃亡的“东突”分子提供庇护。尽管在阿富汗接受过训练的“东突”分子的准确人数难以确定，但实际数量一定不会很少。^①

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国曾抓到了数名来自中国新疆的武装人员。在美国的关塔那摩军事基地中，有 22 名被囚人员是维吾尔族人。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后，“东突”武装人员同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一同撤离，并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继续联合活动。出于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很难期望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完全停止支持“东突”，尽管程度上可以有差别。这就意味着，只要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在阿富汗继续存在，它们就很可能继续支持“东突”。

“东突”是中国将长期面临的问题。尽管“东突”没有把新疆从分裂出去的可能，但短期内彻底铲除“东突”也不现实。中国政府拥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应对“东突”的挑战，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也任重道远。因此，在未来的相当长时间里，新疆的安全稳定都将是中国的重大关切。2009 年 7 月 5 日在乌鲁木齐发生的大规模骚乱特别说明了这一点。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疆发生的最大、最严重的暴力骚乱。根据官方报告，共有 197 人死亡，多数是无辜居民；受伤的有 1700 多人；汽车和商店被烧、被毁多达 1600

^① 根据中国的官方资料，在塔利班统治阿富汗时期，曾有数百名“东突”分裂分子在阿富汗接受训练。参见“发言人就美称中国维吾尔族人在阿富汗参与塔利班的部队作战答记者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01 年 11 月 22 日，<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fyrygth/t10622.htm>

余起。^①这起事件突出反映了“东突”问题的复杂性和危险性，它表明“东突”问题不可能轻易和迅速地解决，对此不能抱有任何幻想；这一事件也说明，新疆的经济发展是必须和极其重要的，但它不能自动解决“东突”问题。

从更广泛的视角上看，阿富汗影响着新疆的周边环境。阿富汗的不稳定将不可避免地外溢到周边地区。如果阿富汗问题不能解决，新疆周边地区不会安宁，新疆自身的安全环境也难以保障。基于这种认识，中国将阿富汗看做是构建新疆地区安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地缘政治视角看，阿富汗问题同样使中国关切。阿富汗战争使中国的西北周边成为战场，在阿富汗和中亚出现了美国军事基地，导致大国在这一地区的竞争更为激烈。在地缘政治和地缘安全上，这一变化对中国不利。

阿富汗的毒品问题也困扰着中国。由于地理上的邻近，阿富汗毒品很容易通过中亚与巴基斯坦被偷运到中国。现在，阿富汗仅次于东南亚，已成为中国毒品的最大来源地之一。新疆是阿富汗毒品的首先受害者，近年来新疆的毒品问题有愈加严峻的趋势。

三、中国参加阿富汗战后重建

中国支持国际社会帮助阿富汗应对各种挑战。作为阿富汗邻国，中国是阿富汗问题“6+2”机制的成员之一。^②该机制形成于1999年，是在联合国促进阿富汗政治和解与和平的框架内建立的。2001年美军推翻塔利班政权后，这一机制被束之高阁。阿富汗新政府成立之后，中国成为阿富汗重建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参加了绝大部分与阿富汗有关的重要国际政治活动，例如2006年在伦敦召开的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2008年的巴黎会议、2009年的海牙会议，以及2010年在伦敦、伊斯坦布尔和喀布尔召开的三次会议。

中国支持国际社会为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努力，认识到没有国际社会的帮

① 在死亡的197人中，156人为无辜平民，其中汉族134人，回族11人，维吾尔族10人，满族1人。参见“乌鲁木齐事件致156名无辜者死亡”，http://www.china.com.cn/v/news/china/2009-08/06/content_18284220.htm

② “6+2”机制包括阿富汗的六个邻国——巴基斯坦、中国、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伊朗，再加上俄罗斯和美国。

助，阿富汗无法自己解决问题。中国解决阿富汗问题的立场可概括为五个原则：保证阿富汗的独立和主权国家，由阿富汗人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通过政治和解实现和平；建立一个进步性的社会；使阿富汗成为其邻国的友好国家；促进国际合作，并由联合国发挥主导作用。中国还提出了四点主张：一、确保安全稳定；二、发展经济；三、改善治理，国际社会应让阿富汗人民自主选择一种最适合本国实际情况的治理模式；四、加强国际合作。^①在后来发表的四点主张中，“改善治理”改为了“实现政治和解”。^②

随着“喀布尔进程”启动和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开始从阿富汗撤出，中国提出了“五个支持”的立场：第一，支持“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和平重建进程；第二，支持阿富汗加强能力建设，早日承担起维护国家和平与稳定的重任；第三，支持阿富汗自主推进民族和解，为实现和解创造有利环境；第四，支持阿富汗发展经济，在过渡期及 2014 年后，国际社会应继续提供支持和援助；第五，支持阿富汗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对外关系，特别是加强同地区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增进彼此间的政治互信。^③

中国在阿富汗新政府成立后即参与阿的重建。2002 年 1 月，江泽民主席会见了阿富汗过渡政府总统卡尔扎伊，承诺中国将积极参加重建工作，并承诺提供 1.5 亿美元的援助。根据官方公布的材料，2002 到 2010 年间，中国向阿富汗提供了 10.3 亿元人民币的援助，同时免除了阿方 1950 万美元到期债务。^④2011 年，中国决定向阿再提供 1.5 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⑤中国还以其他形式帮助阿富汗，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如喀布尔国家医院和帕尔旺

① “杨洁篪阐述中国在阿富汗问题 4 点主张”，2010 年 1 月 28 日，<http://news.sina.com.cn/c/2010-01-29/045419570766.shtml>

② “杨洁篪外长在阿富汗问题喀布尔国际会议上的发言（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07 年 7 月 20 日，<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zyjh/t718476.htm>；http://www.bjreview.com.cn/document/txt/2010-09/01/content_295504.htm

③ “杨洁篪外长在阿富汗问题波恩会议上的讲话”，2011 年 12 月 5 日，<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zt/dnzt/yjcwzbfhwtwdwzh/t884414.htm>；<http://www.fmprc.gov.cn/eng/wjdt/zyjh/t884443.htm>

④ “江泽民主席会见阿富汗临时政府主席卡尔扎伊”，2002 年 1 月 24 日，<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xgxw/t5469.htm>

④ “中国真诚无私援助阿富汗浇灌两国友谊之花”，新华社，2010 年 8 月 22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08/22/c_12471641.htm

⑤ “杨洁篪外长在阿富汗问题波恩会议上的讲话”，2011 年 12 月 5 日。

省的水利工程)、人力资源培训(有 800 多名阿富汗政府官员和技术人员在中国接受了培训)以及出口关税优惠(例如,2010 年中国决定逐渐免除 95% 的从阿富汗进口的商品的关税)。

中国企业也积极参加阿富汗的经济重建。中国企业在艾娜克铜矿项目国际招标中中标。中冶集团(metallurgical group)计划在五年间投资 40 亿美元。在合同之外,中方将为阿富汗修建铁路,另外还承诺将开发煤矿、建设一个 40 万千瓦电厂,并将修建一个年产量 100 万吨的钢铁加工厂,综合投资规模预计将超过 100 亿美元。中冶集团将为 30 年开采权支付总计 8.08 亿美元费用,并将每年向阿富汗政府上缴税款约 6000 万美元。^①中国在阿富汗还有另一大型项目,即在阿富汗东北部的萨利普尔省和法利亚布省开采石油和天然气。这是阿富汗政府首次以合同形式允许外国企业开采其油气资源。根据双方于 2011 年 12 月签订的协议,阿富汗政府可以获得 70% 的销售利润。中石油(CNPC)也将支付 15% 的专利税,还要支付公司税和地租。此外,中石油还承诺在未来三年内建立一座冶炼厂,这也将是阿富汗的第一座冶炼厂。据悉,通过这个项目,阿富汗在未来 25 年可有约 70 亿美元收入。^②如果工程能顺利建成,阿富汗就将结束完全依赖于油气资源的历史。

表 1 中阿贸易额(百万美元)

年份	总额	中国出口额	中国进口额
2002	19.99	19.91	0.08
2003	27.06	26.45	0.61
2004	57.92	56.97	0.95
2005	52.77	51.21	1.56
2006	100.66	100.47	0.19
2007	171.00	169.00	2.00
2008	—	—	—
2009	367.99	360.00	7.99
2010	715.70	704.00	11.70

资料来源:“中国同阿富汗双边关系”, <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sbgx/>; 2009 年和 2010 年的数据来源于阿富汗政府公布的数据,分别为从 2009 年 3 月 21 日到 2010 年 3 月 20 日,以及从 2010 年 3 月 21 日到 2011 年 3 月 20 日的统计数据。<http://af.mofcom.gov.cn/aarticle/zxhz/tjsj/201110/20111007773306.html>

① “立足长远的双赢——记中冶收购阿富汗艾娜克铜矿”, 新华社, 2008 年 6 月 4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06/04/content_8311160.htm

② “China, Afghanistan Sign First Oil Contract,” China Network Television (CNTV), 2011 年 12 月 29 日, <http://english.cntv.cn/program/newsupdate/20111229/107468.shtml>

中阿两国贸易正在不断增长。为促进阿富汗对中国的出口，中国政府从2006年开始为阿富汗的278种商品提供了免关税待遇。中国出口到阿富汗的商品主要有机械、电子设备、建筑材料、轻工业产品、家用电器以及绿茶；中国从阿富汗进口的有绵羊皮、地毯、棉花，以及其他产品。但如表1所示，中阿的贸易总额还不是很高。

由于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两国贸易额在2008年大大下降，但到2009年又恢复了增长，并开始迅速增加。中国成为阿富汗的第二大进口国家和第五大出口市场。^①

四、中国拒绝军事介入阿富汗，对塔利班采取谨慎政策

中国为世界反恐行动提供支持，对阿富汗政府给以支持，并为阿富汗政府培训官员和政治家。^②但中国又避免直接军事卷入其中。当时的英国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曾谈到过中国军队参加ISAF的可能性，但中国明确表示拒绝。事实上，中国排除了向阿富汗派驻军队的可能。^③

同样，中国也没有参加“北方配送网络”（NDN）。2009年，为了满足驻阿军队的后勤补给需求，美国开辟了“北方配送网络”。在“北方配送网络”开辟之前，美国主要依赖于通过巴基斯坦的运输线，尽管很方便，但却不安全，因为这条运输线常常遭到塔利班的袭击。“北方配送网络”的路线起自波罗的海港口，经俄罗斯或高加索进入中亚，再主要通过乌兹别克斯坦（少量通过塔吉克斯坦）后抵达阿富汗。“北方配送网络”有三条分支，即北线、南线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线。“北方配送网络”的主要功能是向运送非杀伤性的物资。^④在“北方配送网络”的问题上，俄

① “中国进口阿富汗产品情况”，2011年11月28日，<http://af.mofcom.gov.cn/aarticle/ddfg/waimao/201111/20111107850245.html>

② “阿问题国际会议召开，李肇星出席并作四点承诺”，2006年2月1日，<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xgxw/t233449.htm>

③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就所谓中国派兵参加驻阿富汗国际联军问题答记者问”，2008年11月17日，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fy_rygth/t522460.htm

④ Andrew C. Kuchins, Thomas M. Sanderson, and David A. Gordon, “Afghanistan: Building the Missing Link in the Modern Silk Road”, *Washington Quarterly* 33, no.2, April 2010, http://www.twq.com/10april/docs/10apr_KuchinsSandersonGordon.pdf

罗斯和中亚国家都同美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合作。

中国没有参与“北方配送网络”。但从理论上说，中国的地理位置使它有参与“北方配送网络”的条件。有消息说，美国曾劝说中国开放瓦罕走廊（Wahan Corridor），以允许美国通过该走廊向阿富汗运送物资，但为中国所拒绝。实际上，连接中国新疆与阿富汗的瓦罕走廊山势险峻、一年之中的大部分时间为积雪覆盖，而且在阿富汗一侧没有公路，很难使用卡车来运输。因此，开辟瓦罕走廊主要是象征性的，没有太多的实际用处。但中国的拒绝传递出一个信号，即它无意加入类似项目。事实上，即使瓦罕走廊不具实用性，中国还有从太平洋沿岸通向中亚的铁路，如果中国愿意，它可以承担向阿富汗运送物质的功能。中国的做法说明中国坚持与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活动保持距离，并且不愿看到美国的足迹出现在新疆。不过，这不表明中国拒绝与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其他形式的合作。2011年3月，中美两国就中亚事务在北京举行了第一轮会谈，显示了两国合作的意向。^①中国也同意与美国联合为阿富汗培训外交人员。^②

中国对塔利班不抱好感。“9·11”事件后，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第1373号决议中投了赞成票，使美国向阿富汗派遣军队获得合法性。中国公开表明对美国军事行动的支持，反对阿富汗的基地组织与塔利班政权，并且与国际社会进行合作。^③但是，中国对塔利班的态度谨慎，一般不指名道姓地对塔利班进行谴责。这部分地是受中国传统的中庸外交文化的影响，也是因为中国不想介入阿富汗内部矛盾。中国不仅仅是将塔利班看做是宗教极端主义组织，还认为塔利班将会是在阿富汗长期存在的政治力量。中国并不认为通过军事方式能消灭塔利班，事实也证明了中国的判断。美国提出与塔利班进行谈判，表明美国已经承认塔利班的政治地位。基于对塔利班的判断，中国更倾向于长远的打算，尽可能地减少塔利班可能给中国造成的伤害。塔利班支

① 该对话是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框架下进行的。外交部部长助理程国平、美国南亚及中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布莱克（R. Blake）参加了对话。双方就中亚事务、上合组织和阿富汗问题交换了意见。

② United States-China Cooperation in Afghanistan, May 17, 2012,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2/05/190207.htm>

③ “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答记者问”，2001年10月8日，<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fyrygth/t10604.htm>

持“东突”势力，中国也是塔利班恐怖活动的受害者，对此中国十分清楚^①。尽管如此，中国还是尽量避免与塔利班直接冲突，以免给中国造成更大伤害。

在阿富汗的所有邻国中，中国与阿富汗的国内事务和国内社会的关系相对较少。尽管中国与阿富汗接壤，但边界非常短，只有不到 100 公里，而且地形险峻，通行困难。与其他邻国不同，中国在阿富汗没有自己的族裔。中国从未卷入阿富汗的国内战争，未参与过其国内进程，因此阿富汗对中国没有不好的记忆，没有政治或社会团体敌视中国。这是中国所希望保持的。

同时，由于不可改变的特殊地理位置，也使中国无法置身事外。不论阿富汗局势怎样变化，中国都不可能离开这一地区，而必须承受它的后果。中国对塔利班的谨慎态度也反映了这一点。还在阿富汗战争爆发之时，中国就坚持强调，任何安排或方案都应着眼于维护本地区的长期和平稳定，不能留下隐患。^②言外之意，美国和西方国家不能搞成一团糟，然后一走了之。

五、中国寄希望于“喀布尔进程”的成功

“喀布尔进程”开始于 2012 年 7 月，它的目标是阿富汗政府在 2014 年底前承担起全部国家安全和行政功能。从政治上说，“喀布尔进程”是阿富汗要走的正确道路，但关键在于具体的施行。而且，“正确的”道路并不一定通向所希望的结果，它还取决于策略是否正确，取决于各种条件的变化。由于阿富汗形势复杂，“喀布尔进程”不会一帆风顺，它面临诸多风险，未来前景也不确定，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是，阿富汗政府成功地保持着政权，并维持着国内的相对稳定。人们常常把阿富汗目前的境况与 1989 年作比较。当时苏联军队已在阿富汗作战十年，但却并不成功，被迫撤离。三年后，苏联支持的纳吉布拉政权就被推翻了。现在人们回忆这段历史，是在暗示美国将遭受同样的命运。还有

① “发言人孔泉就《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有关中国支持本·拉登‘基地’组织的报道答记者问”，2002 年 8 月 15 日，<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fyrygth/t7695.htm>

② “中国提出解决阿富汗问题五项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事馆，2011 年 11 月 14 日，www.nyconsulate.prchina.org/chn/xw/t29990.htm

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历史上所有入侵阿富汗的国家最后都失败了，19 世纪的英国和 20 世纪的苏联是最为人所知的例子，因此阿富汗可以说是大国的“坟墓”。这个阴影也笼罩在美国身上。

然而，阿富汗今日的境况与 1980 年代有很大不同，更不用说和 19 世纪相比了。^①最重要的不同是，所有大国都支持阿富汗政府，而没有一个国家支持塔利班。此外，尽管阿富汗政府有很多弱点，但与极端宗教政体相比，相当多的阿富汗人支持世俗政府。还有一点，外国军队的撤出也会有好的效果，它可消除塔利班煽动民众的借口。

阿富汗政府的军事力量也远强于塔利班。到 2011 年底，阿富汗国防军（ANA）人数已增长至 17.16 万人，阿富汗国家警察已有 13.4 万人。^②只要管理有效、训练完善、斗志高昂，如此庞大的力量应该有能力控制其本国的局势。更重要的是，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撤出后，阿富汗政府军和警察将不能再依赖他人，它将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而战。

但是，这一可能性的成功取决于许多条件，包括有能力的政府、成功的民族和解、必要的国际援助、国际社会的团结，以及本国经济的发展等。这些条件都非常关键，任何缺失都会导致喀布尔进程的失败。

一个有能力的政府至关重要。阿富汗政府是喀布尔进程的依托，依托不在，则喀布尔进程将无所适从。关于这一点，有两个问题与之密切相关。第一，阿富汗政府能否证明它是一个有能力的政府？在过去十多年中，阿富汗政府给出的答案并不完美，人们有理由怀疑在未来几年中它能焕然一新。第二，目前的政治模式是否适合阿富汗？阿富汗是一个由部族社会结构组成的国家，深受宗教力量的影响，多数民众为文盲，且非常贫穷。虽然西方认为其民主制度有普适性，但本地区的传统因素依然不能忽视，否则，理论上再完美的政治制度也无法有效地运行。

实现民族和解是阿富汗的必由道路。所谓民族和解，关键是在政府与塔

① 俄罗斯阿富汗问题专家谢连科对苏联与美国从阿富汗的撤军进行了比较分析。他认为，现在美国的境况更加有利，参见Андрей Серенко. После Афганистана: Уроки вывода войск. 02.15.2011, <http://afghanistan.ru/doc/19520.html>

② <http://www.afghanistan-un.org/wp-content/uploads/2010/07/FINAL-Kabul-Conference-Communicative.pdf>

利班之间。谈判是正确的路径，但其成功却无法得以保证，因为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塔利班。双方带着完全不一致的原则和目标走向谈判桌。对于阿富汗政府来说，和解的前提是塔利班必须承认现行的宪法与政治体制，而塔利班则决心建立伊斯兰政体，反对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塔利班也不愿寄人篱下，只在政府中做次要角色，虽然一小部分人可能愿意这样。弥合双方的分歧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塔利班本身也不是垂直的体系，没有人能代表所有塔利班。这也增加了谈判难度。

阿富汗政府内部的团结也是个重要问题。塔吉克斯坦战略研究所副主任萨法罗夫（Sayfullo Safarov）曾指出，种族间关系问题依然是阿富汗的最大问题。^①争权夺利从未停止，或许将来矛盾还会突然爆发。关于未来的国家权力结构问题，各派也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彼此也在进行斗争。塔吉克族和乌兹别克族希望得到更多的权力，他们呼吁削弱中央权力，其理由是阿富汗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强大的中央政府。^②但普什图族则坚持要维持一个强大的国家中心，他们认为权力结构的去中心化会导致国家的分裂，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③

国际援助对阿富汗政府来说必不可少。在阿富汗完全接管国家的管理与安全责任后的最开始几年，这一点尤为重要。阿富汗政府需要经费以维持国家运转，也需要经费来维持 30 万人的军队和警察。目前阿富汗政府的财政预算严重依赖国际援助。但现在看来，未来几年对阿富汗的财政支持没有太大问题。2010 年 1 月伦敦会议的参加国一致承诺，将把由阿富汗政府支配的国际援助比例从过去的 20% 提高到了 50%，2010 年 7 月的喀布尔会议重申了这一点。卡尔扎伊总统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再为阿富汗提供 10 到 15 年的帮助。根据世界银行和阿富汗财政部的分析，在下一个十年中，阿富汗政

① Екатерина Иващенко. Сайфулло Сафаров: «Межэтн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 главная проблема Афганиста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Фергана». 23.06.2011. <http://www.fergananews.com/article.php?id=6999>

② Екатерина Иващенко. Ахмад Вали Масуд: «Между нами и Карзаем - естественная борьба. Мы победи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Фергана». 14.06.2011, <http://www.fergananews.com/article.php?id=6991>

③ Михаил Пак. Федерализация Афганистана может привести к его расчленению: интервью советника Хаида Карзая// ИА REGNUM. 14.07.2011, <http://www.regnum.ru/news/polit/1425365.html>

府还需要 70 亿美元，以覆盖安全部门、健康和教育等基础服务部门以及发展项目方面的开支。^①然而，国际社会长期的财政援助并无完全的保障。假使国际援助大幅减少，甚至停止，阿富汗政府的生存就可能岌岌可危。纳吉布拉政府的历史就是一个类似的教训：由于苏联自己陷入了危机，因此它不得不中断对当时的阿富汗政府的援助，导致了纳吉布拉政权的崩溃。美国希望通过新丝绸之路战略使阿富汗政府在经济上自立，这一思路不能说不对，但即使能奏效，也需较长时间才能见效，在此之前仍有很长的过渡期。

国际社会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尤其是大国之间的一致，将会对喀布尔进程的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如果“大博弈”重新开始，喀布尔进程的未来前景就会变得暗淡。尽管所有大国都宣称它们将进行合作，但合作的基础并不是那样牢靠。过去的历史已经显示了这一点。“9·11”事件之后，大国间形成了反恐联盟，一致支持在阿富汗的反恐行动，但统一战线很快就开始削弱，到伊拉克战争发生破裂。伊拉克战争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不仅使美国分散了其注意力，把资源从阿富汗分散到了伊拉克，还使得俄罗斯和中国加深了对美国的怀疑，导致了国际反恐联盟的瓦解。

此后，“颜色革命”又蔓延到了中亚。上合组织要求美国制定时间表，从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土上撤出其军事基地。这标志着“9·11”事件之后美俄在中亚的“君子协定”结束。尽管双方表面上说要继续合作，但事实上地缘政治上的竞争已占了上风。^②在这个过程中，阿富汗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如某些学者所指出的，阿富汗成了大国竞争中的“小事件”，它削弱了国际社会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的有效性。^③直到 2009 年美俄“重启”双边关系，两国在阿富汗问题的合作才重新开始。

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无需赘述。阿富汗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70% 的人面临食物短缺问题^④，促进经济发展是阿富汗最重要的任务。其他问题，

① Joshua Partlow, “Afghanistan to Need Billions in Aid for Years, World Bank Says”,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afghanistan-to-need-billions-in-aid-for-years-world-bank-says/2011/11/22/gIQA14zOIN_story.html

② Федор Лукьянов. Киргизский полигон//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15.04.2010, <http://www.globalaffairs.ru/redcol/Kirgizskii-poligon-14826.html>

③ Ashley J. Tellis, Aroop Mukharji eds., *Is a Regional Strategy Viable in Afghanistan?*, Washington, D. 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y 2010, p.123.

④ The World Bank, *Afghanistan Country Overview 2009*.

不论是安全问题还是鸦片种植问题，都需要通过经济发展来解决。尽管迅速改变经济面貌并不现实，但阿政府必须重视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希望。

在存在着希望的同时，也存在着形势恶化或逆转的可能。事实上，悲观的预测在舆论中更为多见。一种情况是阿富汗政府只能维持有限的控制，但塔利班也无法夺取国家权力，国家在政治、行政和地理上被分裂，甚至形成成为两个或更多政权。另一种情况是阿富汗政府失去了控制，国家陷于新的内战和混乱。一些专家断定，2014年之后，阿富汗的内战将不可避免。^①还有一种可能是在新的政治结构和权力平衡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国家政权。

不管最后是什么结果，塔利班的回归几乎难以避免，问题只在于以什么形式和什么身份。一种形式是塔利班成为政府的参与者，不破坏现行的政治制度框架，这可以说是一种合法的回归。还有一种可能是塔利班成为与阿富汗政府平等的政治力量重返政治中心，通过所拥有的影响力形成新的权力平衡。这种结果超出了现在的政治框架，但如果能够通过谈判实现的话，也可以被视为合法的回归。前一种可能是阿富汗政府和美国所希求的，后一种结果不符合阿富汗政府和美国的初衷，但在形势的逼迫下也不是没有可能。

阿富汗政府和美国与塔利班进行谈判，实质就是如何使塔利班以合法的形式和身份重归，使塔利班的回归不破坏现行的宪法和政治框架。塔利班近期也作出了一些温和的表示，承诺将与邻国建立和平关系，尊重人权。有学者认为，塔利班也在进行转型，变得更加务实，立场也显得“软化”。^②如果真是这样，这将给谈判成功带来机会。但难以确定的是，这是塔利班真正的政策转变还是权宜之计？

很多学者相信，在美国和国际安全支援部队从阿富汗撤出后，塔利班将卷土重来，夺取国家政权。这种可能不能被排除，但也不是不可避免。塔利

① Екатерина Иващенко. Константин Сыроежкин: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Афганистане неизбежна//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Фергана».14.07.2011.<http://www.fergananews.com/article.php?id=7017>

② 《华尔街日报》最近指出，塔利班试图表现为一种温和的力量，承诺将与邻国建立和平关系，并且尊重人权。参见Robert Dreyfuss, “Talking with the Taliban,” January 31, 2012, <http://www.thenation.com/blog/165954/talking-taliban>; 安德烈·列兹契科夫（Андрей Резчиков）和德米特里·特列宁（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认为，塔利班吸取了教训，所以变得更加实用主义，参见Андрей Резчиков, 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получили урок. 13 января 2012, <http://carnegie.ru/publications/?fa=46980>

班有能力打游击战，善于使用路边炸弹(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s, IEDs)，但这些不足以使其重夺国家政权。局势发展的结果，更多的是取决于阿富汗政府自身，当然也包括阿富汗国防军、国家警察及国际社会的支持。喀布尔冲突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H·卡尔扎伊(Hekmat Karzai)曾指出，问题并不在于叛乱势力的强大，而在于阿富汗政治体制的虚弱。^①

对中国而言，任何导致地区不稳定、破坏双边关系的事态都会损害中国的利益。因此，中国最希望看到的是喀布尔进程的成功，即阿富汗政府保持其政权，并且逐渐稳定局势。至于塔利班重返政坛，只要是以合法的方式进行的，中国也不会反对。

在阿富汗进入重大转折的背景下，中国对阿富汗的关注度明显提高，中国与阿富汗的关系也有加强之势。2012年2月，由中国主持，在北京首次进行了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三方对话。地区安全和阿富汗问题是对话的主题。2012年6月，中国和阿富汗宣布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重申将继续支持阿富汗和平重建进程，继续参与阿富汗的经济建设，继续向阿富汗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并承诺在2012年再向阿富汗提供1.5亿人民币无偿援助。双方强调将加强在安全领域的合作。^②2012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访问阿富汗。这是自阿富汗政府成立以来中国访问阿富汗的最高官员。有舆论将其解读为这是中国欲与美国争夺影响，这是片面的。在当前形势下，中国的核心关切是阿富汗的稳定和中国的安全，而不会是与美国的竞争。不过，它确实反映了中国将在阿富汗承担更多责任和发挥更大作用的趋势。这也是客观形势使然。

中国既寄希望于喀布尔进程的成功，也以现实主义的态度面对可能的挑战，中国对这一挑战的严峻性有清醒认识，如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宋涛所指出的：“阿局势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其发展不仅关系到阿富汗重建进程能否顺利推进，也事关国际反恐斗争的成败。”^③

① Carnegie Moscow Center, “Afghanistan: Ways Out of the Crisis”, May 10, 2011,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http://carnegie.ru/events/?fa=3311>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关于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2012年06月08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6/08/c_112158605.htm

③ “外交部副部长宋涛出席上海合作组织阿富汗问题特别国际会议”，2009年3月27日，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hdqzz/l_hg_59/mx_gxw/t554788.htm

面对新形势的挑战，中国须尽力帮助阿富汗实现和平与稳定，这最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不仅需与阿富汗中央、而且需和地方势力建立密切关系，以给中国的投资和经济利益增加保障。中国需与塔利班保持接触，以在需要时能够沟通。阿富汗政府和美国都希望塔利班进行谈判，中国与塔利班接触在政治上也不应是问题，而且这可是施加建设性影响的重要途径。中国要与周边国家增加协商，充分利用多边机制的作用，特别是上合组织。中国也需与其他大国保持合作性关系，维护阿富汗的平稳过渡。在阿富汗问题上，大国的共同利益居于更高层次。最后，中国还需有应对不测局势的准备。

【Abstract】 Regarding Afghanistan issues, China has its own independent interests, concerns and policies. China has positioned itself as an active participant while keeping a low profile. China has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Afghanistan economy, providing financial support and various assistances. On the one hand, China support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help for Afghanistan but on the other it avoids direct military involvement in Afghanistan. China cautiously deals with the Taliban problem, refraining from direct conflicts. China hopes that the "Kabul process" can go on smoothly, so that the Afghan government could perform greater autonomy, take more responsibilities, and support to achieve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in Afghanistan.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Xinjiang i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China's policies in Afghanistan. China considers Afghanistan as an integral part of building regional security in Xinjiang. Meanwhile, China is also making preparations for various unexpected circumstances.

【Key Words】 China, Afghanistan,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Security Concerns, Kabul Process

【Аннотация】 Китай обладает своими собственными независимыми интересами, заботами и политикой в вопросах Афганистана. Китай позиционирует себя как активного участника, но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с этим

сохраняет достаточно низкую позицию. Китай активно участвует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и Афганистана, оказывать финансовую поддержку и помощь. Китай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в его помощи Афганистану, однако при этом избегает прям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а в Афганистан. Китай осторожно относится к проблеме талибов, избегает прям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с ними. Китай надеется, что «Кабульский процесс» может быть успешно проведён, так что афган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могло бы обладать большей автономией, несло бы большую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а также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достиж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примирения в Афганистане.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и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в Синьцзяне является отправной точкой кита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в Афганистане, Афганистан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в качестве неотъемлемой части развития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Синьцзяне.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Китай также готовится к различным непредсказуемым ситуациям.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Китай, Афганистан,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экономики, заботы 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Кабульский процесс

(责任编辑 姜睿)

印度与阿富汗关系中的中亚因素*

A·高希**

【内容提要】中亚地区作为当前地缘政治博弈的中心之一，吸引了众多国家的目光，印度也不例外。其巨大的能源储备、战略性的地缘位置、有待开发的广阔商机都令印度在1998年后执行了明显倾向于积极的政策。尽管印度将中亚作为“扩展的邻国”，但印度和中亚并不直接接壤，于是，连接印度和中亚的阿富汗就成了印度“西北向”战略中的关键一环。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印度对阿富汗展现出积极姿态，不仅恢复了外交关系，而且还全面参与到阿富汗的重建工作中。随着美国撤出阿富汗的最后日期逐渐临近，阿富汗及中亚地区的前景也随之蒙上了一层阴影。确保阿富汗的稳定，反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成为印度对阿富汗政策的优先战略目标。作为连接印度与中亚的通道，阿富汗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印度能否实现在中亚的战略利益。印度近年来在地区 and 全球的影响力逐步提升，希望能够在中亚地区的“新大博弈”中占有一席之地，以确保本国的国内安全、能源安全并拓展在本地区的经济合作空间。分析和理解哪些因素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促使印度对作为连接印度和中亚的通道阿富汗采取积极主动的政策，以及印度在中亚地区有哪些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是很重要的研究项目。

【关键词】印度 阿富汗 中亚地区 战略目标

【中图分类号】D83/87(351)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2)05-0020-(17)

* 本文是作者于2012年9月4日-5日，在印度阿扎德亚洲研究院（Maulana Abul Kalam Azad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MAKAIAS)）承办的第四届“斯拉夫、东欧研究东亚会议”（The Fourth East Asian Conference on Slavic and Eurasian Studies）上的发言。

** A·高希（Anwesha Ghosh），印度阿扎德亚洲研究院，研究员。

阿富汗可以被视为连接印度和中亚的“连接符”；印度、阿富汗、中亚人民之间有着一个世纪的共同文化和经济遗产，做印度—阿富汗研究时，不能忽视这个历史。从安全角度看，阿富汗对于南亚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过去四十年中，阿富汗见证了多种国家建设与社会政治转型计划。苏联试图在阿富汗建立共产主义，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约 600 万阿富汗人流离失所，多数到了邻国。随后，当巴基斯坦试图在阿富汗推动建立落后的神权统治时，世界便面对着包括“9·11”在内的一些灾难性后果。除失去一半的人口外，这段时间也是阿富汗以粮食不足和社会服务急剧减少为标志的严重阶段。

阿富汗当前的“化身”远不是印度记忆中的样子。那仅仅是我们共同历史中的一个片段而已。如果一个人试图研究阿富汗历史上暴力活动上升与印度内部安全形势恶化的轨迹，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恐怖主义、安全、极端主义问题迫使印度以当代视角看待阿富汗，而不是从我们共同历史的视角。这些因素令印度感到担忧，从而使自己远离阿富汗的发展。美国在“9·11”之后发动的阿富汗战争，促使国际社会一起许诺，在破败的、受到重创的阿富汗的重建过程中给予支持。印度在改变的环境下也采取了一种显著地倾向于积极的阿富汗政策。印度在阿重建和发展中投资超过 200 万美元。对印度驻阿富汗使团的几次袭击，不仅被视为是对印度在阿富汗影响力增长的一种反应，同时也是对印度对阿富汗政策的基本原则的挑战，很多人将印度对阿富汗政策的基本原则视为对印度正在上升的地区和全球重要性的一次测试。问题是，哪些因素正在推动印度对阿富汗采取不同寻常的积极主动的政策？本文旨在理解，阿富汗作为通往中亚共和国通道的地位，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印度采取这种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的姿态？印度在本地区有什么样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本文还旨在理解中亚因素会如何塑造以国际部队撤出阿富汗为标志的 2014 年以后的印度与阿富汗关系。

一、印度、阿富汗和中亚：从后冷战的视角看

印度、阿富汗和中亚之间较强的历史联系，在塑造这些国家间关系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印度对阿富汗和中亚国家的态度是不同的。

苏联解体的震动和世界政治在后冷战时代的变化，影响了印度对中亚国家的政策。印度在接触中亚的过程中展示了低姿态。苏联解体之后，中亚被界定为地缘政治中心和由俄罗斯、中国、美国、欧盟作为主要参与者的“新大博弈”的竞技场。其他的重要参与者是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①尽管印度与中亚存在着文化与文明的联系，但是在较长的时间内，印度对这一区域的态度是困惑和犹豫不决的。^②然而，同全球政治一样，它的邻国也出现了一些发展，迫使印度明确地表达它在中亚优先考虑的事项。这些优先事项反映在印度近来与中亚国家发展外交、经济、贸易和投资、能源合作的努力之中。

鉴于塔利班在阿富汗短暂政权的垮台，印度设法与喀布尔的不同政治派别都保持了紧密的联系。苏联的占领以及 1989 年的最终撤退导致了阿富汗的混乱，对于全球政治及印度的外交政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印度努力与 1973 年推翻查希尔·沙阿国王^③的共产主义政权保持紧密的联系。与普遍的观点相反，印度并没有因苏联干涉和占领阿富汗而感到高兴。^④但是，与巴基斯坦就解决苏联干涉下的地区问题的前景进行交涉失败后，面对美国给予巴基斯坦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6 年 31 亿美元），印度避免对苏联占领进行公开的谴责。^⑤印度反而选择与后继的苏联在阿富汗的傀儡政权进行合作，因为该政权很少关心阿富汗圣战组织所共有的伊斯兰思想倾向，而这些圣战组织是由代表美国的巴基斯坦所支持的。^⑥印度不愿意放弃对巴基斯坦的军事优势，从而依靠苏联向其提供价格低廉的先进武器。^⑦在阿富汗战争期间，

① K.B. Usha, “India’s Foreign Policy Priorities in Central Asia,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Centre Journal*, New Delhi, 2012.

② Ibid.

③ 查希尔·沙阿，阿富汗末代国王，1933 年 11 月 8 日至 1973 年 7 月 17 日在位，属于普什图族的杜兰尼部族。在位期间，查希尔大力推行西方式改革，制定宪法，大力吸收西方文化。他的改革为其招致了各地方部族的反对，军事抗争此起彼伏。1973 年 7 月 17 日，他的堂兄弟，前首相穆罕默德·达乌德·可汗乘其访问意大利时发动政变，将其废黜，成立共和国。——译者注

④ G.S. Bhargava, *South Asian Security After Afghanistan*. 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 1983.

⑤ S. Ganguly, N. Howenstein, “India--Pakistan Rivalry In Afghanist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63, No.1, Fall 2009.

⑥ Steve Coll, *Ghost Wars: The Secret History of CIA, Afghanistan and Bin Laden from the Soviet Invasion To September 10, 2001*, Penguin Press, New York, 2004.

⑦ Nihal Singh, “Why India goes to Moscow for Arms”, *Asian Survey Journal*, Vol.24, No.7, July 1984, pp.707-720.

印度支持北方联盟和塔吉克斯坦的军事指挥官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① (Ahmed Shah Massoud, 此人对巴基斯坦支持的圣战者组织所持有的敌意)。印度与阿富汗保持良好关系的能力, 随着巴基斯坦援助和支持的塔利班在 1996 年获得胜利而逐渐结束。

那段时间, 反对塔利班政权的非普什图集团组成了北方联盟^②, 控制着与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接壤的阿富汗北部地区。印度竭力维持在阿富汗的影响力以及反对巴基斯坦支持的塔利班政权, 保持着与北方联盟的联系。印度调查分析局向北方联盟提供价值 1000 万美元的高空作战装备, 印度防务顾问向其提供技术建议, 加强防御能力。^③印度在阿富汗—塔吉克斯坦边境的法科尔建立了一所医院, 印度医生向北方联盟提供医疗援助。人们还相信, 印度在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支持反塔利班的袭击。^④在塔利班执政时期, 印度努力与伊朗、俄罗斯、中亚国家等持反塔利班态度的国家建立紧密的关系。自从塔利班 2001 年垮台以来, 印度执行了积极主动的阿富汗政策, 两国间进行了基础广泛的互动。这段时间也是印度政治、经济、军事等能力显著提高的时期, 它更加雄心勃勃地确定其外交政策议程。^⑤

二、塔利班倒台后印度与阿富汗的关系

在后“9·11”时期, 印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参与了每一个推进波恩

① 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 塔吉克族, 阿富汗军事领导人, 绰号潘杰希尔之狮。1979 年至 1992 年率领阿富汗游击队展开抵抗苏联入侵的运动。1996 年后, 马苏德将军成为北方联盟军事领导人, 率领塔吉克族和乌兹别克族民兵在北部 10% 的领土上开展反塔利班斗争。——译者注

② 北方联盟, 又称拯救阿富汗全国统一伊斯兰阵线。1996 年塔利班攻陷喀布尔后, 由拉巴尼、马苏德领导的伊斯兰促进会、杜斯塔姆领导的伊斯兰民族运动和哈利利领导的伊斯兰统一党及一些小党派组成了反塔利班联盟。由于拉巴尼和马苏德的势力集中在阿东北部, 杜斯塔姆势力范围在西北部, 哈利利势力范围在中北部, 故从地理概念上称之为“北方联盟”。——译者注

③ Ramesh Trivedi, *India's Relation with her Neighbours*, Isha Books, New Delhi, 2008.

④ Rahul Bedi, “India Joins anti-Taliban Coalition”, *Jane's Intelligence Weekly*, 15 March 2001.

⑤ Harsh V Pant, “India in Afghanistan: A test Case for a Rising Power”, *Contemporary South Asia*, Vol.18, No.2, 2010, pp.133-153.

进程和重建工作的国际会议和国际倡议。印度的援助活动以及与阿富汗发展的伙伴关系几乎涵盖了所有可能的领域，特别是人道主义援助、主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小的以及以社区为基础的发展项目、教育与能力建设项目。^①印度已经成为阿富汗第六大捐助国，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位列第一。印度业已恢复了与阿富汗完全的外交关系，到目前为止，已经向阿富汗的重建和发展提供了大约 20 亿美元的援助，并且与阿富汗政府的许多部门都建立了伙伴关系，如水电、筑路、农业、工业与电信、信息与广播等。今天，印度已经成为积极参与阿富汗重建过程前四位的国家之一。^②

印度与阿富汗 2011 年签订的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不仅被视为深化两国关系的重要步骤，同时也是印度证明其承担风险的能力，使其外交政策成熟的需要。^③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在会见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时明确地对媒体表示：“我们与阿富汗的合作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之间有文明联系，我们生活同一片土地上。”^④战略伙伴协议的正式化对于战略沟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向阿富汗、这一地区以及国际社会都传递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作为第一个签署此协议的国家，印度展示了其独立性以及对阿富汗重建的承诺。^⑤相较于随后美国与阿富汗签署的包含有分歧与约束性条件的战略伙伴关系协议^⑥，印度与阿富汗之间的协议展示了印度对邻国所需进行帮助的意

① Anwesha Ghosh, *Afghanistan from Enduring Freedom to Enduring Chaos? Implications for India*, KW Publishers, New Delhi, 2012, p.45.

② Mondira, Dutta, “Empowering Grassroots through Capacity Building Measures: Indian Initiatives in Afghanistan” in Arpita Basuroy and Binoda K Mishra (ed), *Reconstructing Afghanistan, Prospects and Limitations*, Shipra Publishers, 2011, pp.156-169.

③ Anwesha Ghosh, Op.cit.

④ “Statement to the media by Prime Minister Dr. Manmohan Singh during the visit of President Karzai”, Speeches/Statements,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New Delhi, October 4, 2011, <http://mea.gov.in/mystart.php?id=530118346>(accessed on 21.8.2012)

⑤ 相较于随后美国、英国、欧盟、法国以及其他国家与阿富汗签订伙伴协议，印度是作为引导者的第一个，而不是“管弦乐团”（此处指大国协调——译者注）的一部分，从而避免了卷入与之相联系的类似的想法中——作者 2011 年 10 月在新德里和喀布尔与高级外交官的讨论。

⑥ Shanthie Mariet D’Souza, “The Emerging Fault Lines of the US-Afgh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ISAS Brief*, No.210, August 10, 2011, http://www.isas.nus.edu.sg/Attachments/PublisherAttachment/ISAS_Brief_210_-_Email_-_The_Emerging_Faultlines_15082011115335.pdf. Accessed on October 20, 2011; “US seeks India-Afghan strategic partnership-document like deal”, *The Indian Express*, New Delhi, October 13, 2011.(accessed on 21.8.2012)

愿。由于协议是建立在阿富汗通过一系列咨询会议和磋商所提出的要求和条件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在完成协议的过程中没有遇到任何障碍。

三、印度角色的驱动力

在阿富汗发生的针对印度使团的几次袭击，一些分析家将其解释为印度的“零和博弈”，其他人则认为这是对印度在本地区影响力提升的一种确认。辛格总理在 2008 年阿富汗总统哈密德·卡尔扎伊访问新德里时，对这些恐怖主义活动进行了谴责：“我们都同意不允许恐怖主义阻挡我们前进的道路。我们将团结一致，以最大的决心打击恐怖主义……重申印度对于阿富汗努力建设民主的、多元化的、稳定的政权的永久承诺。”^①此时出现的问题是，是什么因素推动了印度在阿富汗的不同寻常的积极政策？

根据专家所说，通过阿富汗重建，印度不仅希望能够实现更好的地区稳定，同时，也渴望反对巴基斯坦在喀布尔的影响力，并且反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运动。对于印度来说，确保防止巴基斯坦在阿富汗获得立足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印度试图防止巴基斯坦控制阿富汗。^②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巴基斯坦将阿富汗看作平衡印度在南亚优势的一种很好的方式。^③印度的另一项主要利益，是保证邻国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处于监视之下，印度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斗争是与极端主义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崛起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巴基斯坦长期支持以自决名义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活动的分离主义分子，而印度正是克什米尔地区伊斯兰势力激进化的主要受害者。^④艾哈迈德·拉希德认为，通往喀布尔的道路部分通过克什米尔。

阿富汗被视作进入中亚地区的通道，印度意识到这是获得中亚能源的一条潜在的路径。中亚对于印度很重要，不仅因为中亚地区拥有印度所企望的实现能源安全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还因为主要大国如美国、俄罗斯、中国

① Menon Shiv Shankar, “India as a Rising Great Power: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Key note Address at IISS-Citi India Global Forum, New Delhi, 18-20 April 2008.

② Harsh V. Pant, Op.cit.

③ M.G Weinbaum,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the Strategic Relationship”, *Asian Survey*, Vol. 31, No.6, 1991.

④ Harsh V. Pant, Op.cit.

已经开始在这一地区竞争影响力。^①地区行为体将阿富汗视为潜在的不安定根源，即使他们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仍然是阿富汗问题的主要原因。这一地区能够成为一个天然的、历史形成的缓冲区，同时，也会形成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中心。本地区位于亚欧大陆的中间，是最便捷的运输路径。它富含矿产，特别是碳氢化合物。作为消费市场，它还未被开发。所有这些因素，导致各个国家对于中亚国家的兴趣与日俱增。

四、中亚因素

印度的政策制定者和分析家相信，由于文化和文明联系、战略位置、能源资源以及贸易和经济机会，中亚是重要的。尽管印度对“西北向”政策从未像“东向”政策一样予以明确的表达，但一直试图以多维度方式来推动政策。^②这在 1998 年以后印度与中亚关系的加速发展中变得较为明显，这种加速也是印度总体政策姿态更为积极主动的一部分。在那段时间，印度的经济改革加速，其政策参量也不断拓展。^③经历了 1999 年的外交耻辱后，印度被迫增加在中亚的军事存在。1999 年，一架从加德满都起飞的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被巴基斯坦支持的恐怖分子劫持到阿富汗南部的坎大哈。印度不得已与塔利班达成协议，以印度关押的三名强硬派恐怖分子换取释放飞机。印度随后决定在塔吉克斯坦靠近阿富汗边境地区的法科尔建立首个军事基地，用以向北方联盟战士提供援助，其后，向后塔利班的喀布尔政府提供援助。

不管意图和言辞如何，印度从未实际参与过 1990 年代被称为“新大博弈”的初始阶段的任何竞争。由于没有直接的交通通道，加上困难的市场条件，中亚地区对于印度私营公司并没有吸引力。尽管如此，由于中亚的威权主义领导人能够实现稳定，并承诺打击宗教恐怖主义，印度的政策制定者们还是乐于同他们交往。鉴于中亚地缘政治重要性近年来的提升，所有主要大

① Harsh V.Pant, “India in Afghanistan: A Rising Power or A Hesitant Power”,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Studies Working Paper*, 2011.

② Anita Sengupta, “India and Central Asi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Centre Journal*, New Delhi, 2012.

③ Ibid.

国均热衷于在这一地区扩展自己的影响力，印度也不例外。它与其他大国如美国、俄罗斯、中国在中亚分享了很多利益，包括获得中亚的能源资源，控制激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扩散，确保政治稳定，加强地区经济。但是与中国、俄罗斯不同，印度在中亚的利益更趋近于美国。一些人曾建议扩大印度在中亚的存在以对抗中国和俄罗斯在本地区不断增长的参与度，认为这是符合美国利益的。^①中国不断增加在中亚地区的参与，并通过贸易、能源交易、军事协定以及上海合作组织，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庞大的形象。除阿富汗的发展之外，特别是印巴关系困难的背景也为印度与中亚的关系添加了新的视角。阿富汗计划的失败造成了对共同安全的挑战，但是任何积极的结果都将为印度和中亚开启巨大的商机。以上两个因素都会相当大地提高中亚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并可能有助于推动印度仍处于初期的“西北向政策”。

五、印度对于中亚的战略视野

由于战略和政治原因，印度很难忽视它的战略后方（中亚国家）。印度的政策制定者将中亚视为他们“扩展的战略邻国”。显然，中亚国家和印度有着共同的安全关切，如，跨边界恐怖主义、穆斯林极端主义、毒品走私、战略联盟、能源合作以及双边贸易等。需要澄清的是，印度在中亚地区主要战略利益的实现，在于积极地参与到该地区之中（印度在此有着大量的机会）。自从与中亚国家建立关系后，印度就一直试图将其建设成为富有成效的双边关系。经济方面的相互关系一直被印度视为长期战略利益中最为重要的方面。为了将新兴的东西经济走廊连接起来，以保护它的战略和经济目标，印度正在与中亚国家发展更强有力的贸易关系。^②前任外交部长慕克吉把在中亚地区培育合作性能源安全网络作为印度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③印度对

① Stephen Blank, *US Interests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hallenges to Them*,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2007, pp.31-32.

② Asma Shakir Khwaja, “The Geostrategic Dimension of India and Central Asia Bilateral Relations: An Analysis”,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Centre Journal*, New Delhi, 2012.

③ 详细内容参见 Vidya Nadkarni, *Central Asia And South Asia: India And Pakista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San Diego cited by Asma Shakir Khwaja, “The Geostrategic Dimension of India and Central Asia Bilateral Relations: An Analysis”,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Centre Journal*, New Delhi, 2012.

于中亚的战略眼视野为以下因素所指引：（1）印度不希望域外大国在中亚地区造成不正当的影响；（2）印度以加强与中亚的经济联系为目标，印度是中亚能源资源的潜在消费国；（3）印度不能接受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加强或者扩大；（4）打击巴基斯坦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

很自然的，印度欢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扩大观察员国作用的决定，并且表示打算更为积极地参与上海合作组织的活动。基于过去的联系和良好的意愿，印度与中亚国家发展了较强的政治与发展性关系，包括“战略伙伴关系”以及与哈萨克斯坦进行铀贸易的协定。具体成果表现在近期达成的印度持有哈萨克斯坦萨特帕耶夫石油区块 25%股份的协议。TAPI管道计划提上了日程。^①中亚也为印度商人提供了很好的投资机会，如居住在伦敦的印度钢铁巨头拉克希米·米尔塔，他在哈萨克斯坦拥有一家生产能力在 600 万吨、雇佣 40,000 名工人的钢铁厂。^②尽管当前与中亚的贸易额较小，未来短时间内也不会有显著的提升，但是这一地区贸易的重要性，需要在印度大陆贸易快速增长的背景下进行评估。据预测，到 2015 年，印度与欧洲、独联体国家、加上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的贸易额将达到年均 5,000 亿美元。而其中 20%的贸易（约 1,000 亿美元）将在穿越中亚和阿富汗的通道上进行。^③鉴于穿越中亚地区进行贸易的可能性，多边国际组织在中亚和南亚计划的大多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将是可行的。美国希望印度成为它的合作伙伴，一起为具有远见的“新丝绸之路”打下基础。“新丝绸之路”将连接从里海到恒河乃至更远的市场、企业和消费者。印度对于美国政府正在推动的这项战略表现得非常积极。这对于阿富汗似乎是个很好的计划，但不幸的是，这项计划与地区地缘政治以及美国从阿富汗退出的战略混合在了一起。

当前，印度尚未与中亚任何重要的地区组织有明确的联系。由于缺乏能

① “India & Kazakhstan Agree to Expedite Satpayev Block”, Dec 6, 2010, Source: www.gulfoilandgas.com, <http://www.gulfoilandgas.com/webpro1/MAIN/Mainnews.asp?id=13307> (accessed on 22.8.2012)

② Christopher Leake, Will Stewart “Tony Blair, the billionaire donor Laxmi Mittal...and a major deal in Kzakhstan”, *Mail Online News*, October 30, 2011.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2055223/Tony-Blair-billionaire-donor-Lakshmi-Mittal--major-deal-Kazakhstan.html> (accessed on 22.8.2012)

③ Gulshan Sachdeva, “India’s Objective in Central Asia”, Source: http://uschinacenter.as.nyu.edu/docs/IO/23889/Sachdeva_Abs.pdf (accessed on 22.8.2012)

够在中亚和南亚建立联系的其他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可能就变得更为重要了。随着 2014 年国际部队撤出的最后期限的逐渐临近，上海合作组织在 2014 年后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将有很大的可能性。根据这些发展趋势，印度有兴趣加入该组织。

印度在这一地区的另一项主要倡议是，1990 年代与俄罗斯、伊朗一起建设新的贸易走廊——国际南北运输走廊（INSTC）。随后，有其他国家加入这一计划。印度所承担的主要运输工程，是在伊朗的港口城市恰巴哈尔发展新的港口综合设施。恰巴哈尔有一条路直通阿富汗。而且，恰巴哈尔港比已经存在的班达阿巴斯港更靠近印度。印度还计划修建一条长 900 公里、连接恰巴哈尔与阿富汗哈吉加克地区的铁路。印度钢铁管理局领导的七个印度公司组成的财团正在哈吉加克开采三个价值 103 亿美元的铁矿区块。印度已经完成从伊朗—阿富汗边境城市扎兰季至德拉兰的长约 218 公里的铁路，从德拉兰可以到达阿富汗所有主要城市，更远可以到达中亚国家的北部。除了上述计划外，国际南北运输走廊在过去 10 年中并未真正启动。印度政府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内极力推动这一贸易走廊计划。

自 2001 年以来，印度采取的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姿态表明其正在扩展它的“同心圆”，关注点不仅集中在南亚和东南亚，同时也集中在中亚和阿富汗。印度在中亚和阿富汗地区优先关注的事项，是基于某些关键议题、挑战和优势而设定的。印度是一个正在成长的、并且渴望被全球所接纳的大国。在南亚，印度面临着许多阻碍其与中亚发展关系的挑战。极端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恐怖主义，阿富汗的不稳定性，印度与巴基斯坦关系的不确定性，美国与巴基斯坦关系的恶化，中国在中亚地区不断增加的参与度以及新疆地区问题等，都是印度关注的事项。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也迫使印度接近能源丰富的中亚。这些优先关注事项反映在印度努力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外交关系、经济合作、贸易与投资以及能源合作方面。连通性仍然是印度实现在中亚利益的主要障碍。印度与中亚国家没有任何直接相连的边界。她需要依靠巴基斯坦、中国或者伊朗才能进入中亚。^①印度与中亚国家在过去 10 年间

^① K.B. Usha, “India’s Foreign Policy Priorities in Central Asia”,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Centre Journal*, New Delhi, 2012.

曾有过多次高层互访。在互访过程中就许多方面都达成了协议。2012 年是印度已经与中亚国家在后苏联时代建立关系的第 20 个年头。

哈萨克斯坦。印度是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哈萨克斯坦独立后访问的第一个独联体以外的国家。哈萨克斯坦总统曾于 2009 年作为贵宾参加印度的共和国日庆典。印度总理辛格于 2011 年 4 月 15 日至 16 日访问阿斯塔纳，一系列重要的经济倡议随后开始实际执行。它们中重要的有：（1）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与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公司关于萨特帕耶夫勘探区块的协议；（2）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合作协议；（3）深化印度与哈萨克斯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行动计划。

成立于 1992 年的“印度—哈萨克斯坦政府间委员会”有助于发展两国间的贸易、经济、科学、技术、工业以及文化合作。政府间委员会框架下的联合工作组与分委会以及其他组织，在反对恐怖主义、信息与技术、碳氢化合物、交通、科学技术、纺织品等方面，都积极促进了双边合作的发展。两国政府同意增设贸易与经济合作、药品两个方面的联合工作组。^①印度一贯支持“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并且积极参与其中。哈萨克斯坦则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②

塔吉克斯坦。印度总统以客人身份参加了 2009 年塔吉克斯坦国庆日庆典。总统在访问期间还参加了“印度—塔吉克斯坦商务论坛”，并参观了米尔·萨义德·阿里·哈姆达尼圣地，苏菲派圣徒哈姆达尼曾在克什米尔谷地传播伊斯兰教。这两件事的重要性需要被强调。参观圣地象征着共同文化遗产仍然重要，同时，两国也关注彼此间所强调的更好的贸易平衡。^③印度与塔吉克斯坦之间有：（1）印度—塔吉克斯坦联合委员会，（2）反对恐怖主义联合工作组，（3）外交磋商办公室。^④2008 年，印度表示将通过印度巴拉特重型电气有限公司与印度国家水电公司对塔吉克斯坦的瓦尔佐布 1 号水电站进行修复和现代化（耗资约 1700 万美元）。印度还表示，将拨款在

①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India-Kazakhstan Relations”, February 2012, <http://www.mea.gov.in/mystart.php?id=50044485>

② Ibid.

③ Anita Sengupta, Op.cit.

④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India-Tajikistan Relations”, March 2012, <http://www.mea.gov.in/mystart.php?id=50044531> (accessed on 22.8.2012)

杜尚别的塔吉克国立技术大学（TTU）设立“印度—塔吉克斯坦现代工程讲习班”。印度与塔吉克斯坦关于贸易、经济、科技合作方面的联合委员会正在建立。

印度对于中亚地区的兴趣增长，从印度在塔吉克斯坦建立阿伊尼军事基地也可以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是印度在本土之外建立的第一个军事设施。这个基地可以帮助印度监控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地区可能产生的影响印度安全的活动。苏达·拉马钱德兰主张：“阿伊尼基地靠近许多伊斯兰圣战者的营地和反印度的恐怖主义组织基地，也处在巴基斯坦和中国进行大量军事合作的区域的附近。除此之外，塔吉克斯坦位于印度越来越感兴趣的、天然气资源丰富的中亚地区。”^①

乌兹别克斯坦。伊斯拉姆·卡里莫夫总统于 2011 年 5 月 17 日至 18 日进行了他任期内对印度的第四次国事访问，签署了 34 份文件，包括印度与乌兹别克斯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卡里莫夫还签订了一个促使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合作利用天然气和石油的协定。双方同意将双边关系提升到“长期战略伙伴关系”的层次。^②访问期间，双方就乌兹别克斯坦与印度之间扩大合作，以及双方在地区和国际范围的共同利益的议题进行了讨论。许多协定涉及经济方面的私人部门，特别是信息技术与电信、药品、纺织品、皮革制品以及化工产品。^③乌兹别克斯坦也支持印度竞选 2011 至 2012 年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

土库曼斯坦。土库曼斯坦具有丰富的天然气、原油、碘、钾以及岩盐储量。它是世界第四大天然气储藏国。世界第二大的南约洛坦天然气田就在土库曼斯坦。作为中亚天然气储量最大的国家，并且是印度延伸的邻国，土库曼斯坦对于印度的能源安全是重要的。四个国家，也就是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TAPI 国家）正在一起运作一个天然气管道计划，有希望于 2017 年早些时候开始执行。2010 年 11 月 11 日，在土库曼斯坦、阿

① Sudha Ramachandran, “India’s Foray into Central Asia”, *Asia Times Online*, 12 August 2006, 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_Asia/HH12Df01.html (accessed on 22.8.2012)

②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India-Uzbekistan Relations”, January 2012, <http://www.mea.gov.in/mystart.php?id=50044541> (accessed on 24.8.2012)

③ Ibid.

富汗、巴基斯坦三国总统以及印度石油天然气部长德奥拉 (Shri Murli Deora) 先生的见证下, 四国在阿什哈巴德就这一天然气管道计划签订了两份基本文件。印度与土库曼斯坦达成的持外交护照免签证入境协议于 2011 年 4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2010 年 2 月, 印度与土库曼斯坦政府间委员会关于贸易、经济、科学、领事、文化合作的第三次会议在阿什哈巴德举行。^①

吉尔吉斯斯坦。印度与吉尔吉斯斯坦政府间委员会关于贸易、经济、科学与技术合作的第五次会议于 2010 年 3 月 4 日在新德里召开。两国签订了在矿产勘探与开发、食品加工部门、化学与石油产品部门、信息技术、医疗部门、科学技术、旅游、教育、体育文化等领域进行合作与投资的协议。^②印度政府提供援助, 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阿拉套山脉的阿苏山口建立一个山地生物医学研究中心, 耗资 6500 万卢比。印度国防部长安东尼 (A.K.Antony) 2011 年 7 月 5 日为该研究中心揭幕。印度还将通过“技术与经济合作计划”向吉尔吉斯斯坦提供技术援助, 特别是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 这是印度参与吉尔吉斯斯坦经济的基石。“技术与经济合作计划”每年分配给吉尔吉斯斯坦 60 个平民培训名额。1992 年以来, 700 多名来自吉尔吉斯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印度接受培训。印度与吉尔吉斯在 2010-2011 年的贸易额达到 2356 万美元。^③

印度确立自己在中亚的存在最后步骤, 体现在防务、情报分享、培训与援助、教育以及“技术与经济合作计划”等方面合作的水平上。许多中亚学生由印度政府提供奖学金在印度的大学中接受高等教育。^④在阿富汗, 印度工程师完成了将乌兹别克斯坦电力输送到阿富汗内地的输电线路的建设。同样, 印度很可能会超越以往, 在阿富汗实行一种前进政策。出于对阿富汗的和平、稳定对地区稳定的重要性的充分理解, 印度在阿富汗的重建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 并作出了价值 20 亿美元的承诺。在某种程度上, 印度

①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India-Turkmenistan Relations”, March 2012, <http://www.mea.gov.in/mystart.php?id=50044534>(accessed on 24.8.2012)

②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India-Kyrgyzstan Relations”, March 2012, <http://www.mea.gov.in/mystart.php?id=50044488> (accessed on 24.8.2012)

③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India-Kyrgyzstan Relations”.

④ 此信息是作者于 2011 年 7 月在奥利萨邦库塔克市的拉文肖大学对中亚学生进行访谈时得来的。

参与阿富汗的重建也推动了其对中亚的政策。印度现在正试图与吉尔吉斯斯坦建立军事联系，同意训练联合国维和部队，在比什凯克建立联合高原军事研究中心。印度国防部长A.K.安东尼 2011 年 7 月访问比什凯克时提出了以上方案。^①这些方案可以被视为印度愿意在盟军撤离阿富汗后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及愿意与中亚国家加强联系的表示。

六、2014 年后印度中亚视野中的巴基斯坦因素

过去十年中，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干预为印度在阿富汗扩展政治和经济影响力提供了重要的空间。到目前为止，美国与北约在本地区的大规模军事存在允许印度扩展其影响力（且不必承担任何重要的军事义务），令巴基斯坦感到不安。随着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跌入谷底，人们通常相信美国将会支持印度持续巩固其影响力。然而，美国即将在 2014 年撤出阿富汗，这将进一步增加对于阿富汗未来的疑问，注意到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塔利班的迅速复兴，这将令印度和中亚国家感到非常的不安。即使这种情况不会出现，人们也能肯定，激进势力必将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以更大的声势煽动伊斯兰圣战思潮。虽然印度官方表示将不会考虑减少在阿富汗的参与，但近来印度在阿富汗的项目推动上已经由基础设施建设转向人道主义援助和提供服务了。这一转变可以被解释为根据阿富汗的现实基础而做出的决定。在其延伸的邻国中，印度可以要求与大国平衡其利益，但印度是否有资源和影响力能够实现这一目的，还有待观察。巴基斯坦在本地区的作用一直是关键的，未来也将继续如此。

就印度在阿富汗的角色而言，巴基斯坦的地位是复杂的，只是将其解释为“本能地反对印度”，可能会有局限性。巴基斯坦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扩大与印度的经济和贸易关系。近年来，一个深深影响巴基斯坦对阿富汗政策的考量与方式的基本原则是：“一个和平、稳定的阿富汗对于巴基斯坦自身成长、繁荣、安全、稳定的长远核心利益是至关重要的。”^②阿富汗几十年

① Anita Sengupta, Op.cit.

② Simbal Khan, “Afghanistan: Post 2014 Strategy and the Regional Framework”,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Centre Journal*, New Delhi, 2012.

来的战争和不稳定，不仅对巴基斯坦的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也破坏了巴基斯坦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增长，并对其未来的繁荣构成威胁。话虽如此，事实上“反印度”牌仍然在巴基斯坦起到民族黏合剂的作用，不能被忽视。

印度在阿富汗的巨额投资、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平衡巴基斯坦与中国影响力的诉求，以及一个稳定的阿富汗议程，都迫使印度继续保持在本地区的存在。印度的一些战略思想家强调，中亚能够为印度提供它所需要的并一直在寻找的“战略纵深”。^①然而，考虑到地理距离，军方认为这一想法并不可行。在对这一地区作更为细致入微的观察后，人们建议将软实力和军事参与作为寻求战略纵深的一部分，这也将为印度对中亚的“西北向”政策提供机会。如果中亚五国是团结的，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事实上这五个国家之间还有争论的问题，这就增加了寻求解决地区问题方案的难度。

七、结论

从印度的视角看，与阿富汗和中亚的地理距离并不全是坏处，“接近”有其必然的问题和复杂性，而这些印度能够通过与阿富汗及中亚国家保持积极友好的关系予以避免。在过去十年中，印度的能力有了相当程度的提升。对于印度众多的战略群体来说，阿富汗是对印度作为一个正在上升的地区和全球性大国的检验。印度处理自己后院不稳定的能力，将最终决定它是否能崛起为一个重要的全球性大国。所以，印度在阿富汗不能失败。过去十年中，印度对于阿富汗的姿态给了其中亚政策所需的大量推动力。俄罗斯、美国、中国在本地区的利益需要被考虑；破坏它们的影响力不应该出现在中亚与印度关系等式中。对于印度来说，在本地区的优先事项不应该是寻求发挥地区霸权国的作用，而是在当前地区权力结构内实行建立伙伴关系的政策。中亚因素有可能成为决定印度在阿富汗成功还是失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韩冬涛 译）

^① Shalini Sharan, “Central Asia: India’s real strategic depth?”, 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Feb 27, 2012, <http://csis.org/blog/central-asia-indias-real-strategic-depth> (accessed on 28.8.2012)

【Abstract】 As one of the centers of current geopolitical game, Central Asia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various countries and India is no exception as well. Its enormous energy reserves, strategic geographic location and various opportunities to be developed have enabled India to carry on obviously positive policies since 1998. Although India considers Central Asia as “expanding neighbor”, yet they are not directly bordered. As a result, Afghanistan, which links India and Central Asia, becomes a key of India’s “Look North-West Policy”. After the U.S. went into the war in Afghanistan, India has showed a positive gesture towards Afghanistan, not only restoring their diplomatic relations but also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Afghanistan. As the final date of the U.S. to retreat from Afghanistan is approaching, the future of Afghanistan and Central Asia will be overshadowed. It is India’s prior strategic goal to ensure the stability of Afghanistan and to counter terrorism and extremism. As a passage between India and Central Asia, Afghanistan’s stability could decide whether India could achieve its strategic interests in Central Asia or not. As an emerging power, India has gradually raised its regional and global influences, with the hope to play a role in the “New Great Game” in Central Asia so as to ensure its national domestic security, energy security and to develop its economic cooperation space within this region. 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and understand first what are the factors and second to what extent, the factors enable India to take active policies towards Afghanistan, the passage between India and Central Asia, and third what are India’s economic and geopolitical interests in Central Asia.

【Key Words】 India, Afghanistan, Central Asia, Strategic Aim

【Аннотация】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как один из центров нынешней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гры привлекает внимание многих стран, и Индия не является исключением. Огромные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е запасы,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множество бизнес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привело к

тому, что Индия в 1998 г. стала проводить явно предпочтительную активную политику. Несмотря на то, что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стала для Индии «расширенным соседом», однако она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не граничит с ней,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соединяющий Индию и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 Афганистан стал ключевой частью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ой стратегии Индии.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США начали войну в Афганистане, Индия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ла позитивн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к Афганистану, и не только восстановила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 ним, но и в полной мере участвовала в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и Афганистана. С приближением последней даты вывода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войск из Афганистана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Афганистана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также становились непонятными. Обеспечение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в Афганистане, борьба с терроризмом и экстремизмом стали приоритетным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ми целями политики Индии в Афганистане.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в Афганистане, как канале, связывающим Индию и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 напрямую связана с возможностью Индии достижения своих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интересов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ндия, как развивающаяся держава, чьё влияние в регионе и во всем мире в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постепенно повышается, надеется быть в состоянии найти для себя место в «новой большой игре»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 целях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внутренне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траны,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расширения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регионе. Данная статья призвана проанализировать и понять, какие факторы и в какой степени заставляют Индию проводить активную политику в отношении соединяющего Индию и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 канала — Афганистана, а также проанализировать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нтересы Инд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Индия, Афганистан, регио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цели

(责任编辑 封 帅)

杜兰德线：侵略阿富汗的泥潭 ——从十九世纪英国人建立“科学边界”说起*

姚远梅**

【内容提要】1815年拿破仑战败后，为防止俄国人破坏英王王冠上那颗最亮的宝石，英国人拟在印度西北边境建立“科学边界”，即将印度传统西北边界从下印度河抬高至上印度河，利用兴都库什山的地理优势保护印度。起初，英国人展开征服，试图直接推进，结果遭到被称为“大马蜂”的普什图等部落人的顽强抵抗。第二次大规模侵阿失败后，英国人改变政策，决定利用阿富汗缺乏统一的特点，结盟喀布尔拉赫曼政府，智取“马蜂窝”。在帮助拉赫曼划定其他阿富汗边界后，英国人想方设法迫使拉赫曼接受杜兰德线，由此，被称为“马蜂窝”的地方被英国人悄悄地划在印度地图上。此后，英国人又采取措施固定该线为阿印国际边界，但是阿富汗山民一直不接受。这种理论与现实的错位，使得这条“科学边界”千疮百孔。如今，它不但滋生阿巴之间不断的矛盾，而且成为发动阿富汗战争的苏美的泥潭。

【关键词】英国 阿富汗 英属印度 印度西北边境

【中图分类号】D83/87(561)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2)05-0037-(25)

阿富汗地处西亚、中亚、南亚和中国的连接处，地理位置极具战略意义，故此一直是帝国角逐的主要场地。例如，英俄大角逐中，英国三次入侵阿富汗；冷战中，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冷战时期，美国入侵阿富汗。虽然多次遭

* 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咨询课题。

** 姚远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博士后。

受外敌入侵，但是，阿富汗依旧巍然屹立在那里，而且被称为“帝国的坟墓”（因为苏美侵阿失败）。为何如此？是巧合，还是这个群山连绵的国家存在着神秘魔咒？当前，美国宣布将于 2014 年撤军。美国势力果真要从阿富汗撤走？阿富汗问题前景如何？中国该何去何从？

关于阿富汗问题，国内外研究成果很多，可谓汗牛充栋。国际学界的研究比较深入而具体。就英国对阿富汗的入侵而言，大部分作品从英俄大角逐的角度进行探讨。例如，威廉·哈伯顿在其著作《英俄关系与阿富汗（1837-1907）》中指出：1907 年，尽管英俄签订了关于在阿富汗停止争斗的条约，但实际上，两国在阿富汗的竞争还在继续，只是从幕前退到幕后而已。^①阿斯加·比尔格拉米在其著作《阿富汗与英属印度（1793-1907）》中，着重论述英俄帝国角逐之下英属印度如何处理与阿富汗的关系。他这样说：俄国铁蹄踏入中亚拉响英属印度的警钟，为此，英国人不停地在印阿边界制造屏障，阻止俄国人继续南下。^②辛哈尔的《印度与阿富汗（1876-1907）：外交关系研究》，从维护印度安全的角度详细阐释英属印度如何处理与阿富汗的关系。^③威勒的著作《印度与边境国家阿富汗、尼泊尔和缅甸》，则从英国人逐渐将这些印度边境国家纳为附属国或缓冲区的角度，展示英属印度帝国的扩大，以及所带来的边界争端的后果。^④罗伯特·维金森—拉坦的专著《西北边界（1837-1947）》则专门从西北边界战略重要性的角度，论述英俄在阿富汗的激烈角逐。作者这样说：“正如寇松勋爵所评价的，只有熟读印度史的人才会理解西北边境的真谛。”^⑤当然，也有一些学者从俄国视角展开这方面的研究。例如，俄国学者塞吉夫（Evgeny Sergeev）的新著《大角逐，1856-1907：俄英在中亚与东亚的关系》，就是从俄国视角展开分析，

① William Habberton, *Anglo-Russian Relations Concerning Afganistan, 1837-1907*,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37.

② Asghar H. Bilgrami, *Afghanistan and British India, 1793-1907: A Study in Foreign Relations*, Michigan: Sterling Publishers, 2006, p.161.

③ Damodar P. Singhal, *India and Afghanistan, 1876-1907: a Study in Diplomatic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63.

④ James Talboys Wheeler, *India and the Frontier States of Afghanistan, Nipal and Burma*, Peter Fenelon Collier, 1899.

⑤ Robert Wilkinson-Lathan, illustrated by Angus McBride, *North-West Frontier 1837-1947*, Oxford: Osprey Publishing, 1977, p.3.

他利用俄、英、印、中和阿富汗等多方面原始资料阐释俄英如何在中亚和东亚展开角逐，并指出，不是因为俄国势力扩展而导致俄英“大角逐”，而是由于英国人过于夸大俄国的威胁而造成俄英在这些地区的角逐竞争。^①也有学者从冷战背景分析苏联对阿富汗的占领^②，有的从反恐视角论证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战争^③，有的从阿富汗的地理位置解析其缘何多次遭受外敌入侵^④，也有人从阿富汗边境文化多样性入手阐释阿富汗国家的统一性，^⑤等等。

较之国际学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我国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文革”前，我国已出版一些著作，不过，大部分属于概览性介绍阿富汗的历史与文化，如清代的《阿富汗考略》^⑥、《阿富汗斯坦新志》、《阿富汗

① Evgeny Sergeev, *The Great Game, 1856-1907: Russo-British Rela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 Asia*,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② J. Bruce Amstutz, *Afghanistan: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Soviet*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Occupation*,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Press, 1986; Artemy M. Kalinovsky, *A long Goodbye: the Soviet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William Maley, *The Afghansitan War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A. Z. Hilali, *US-Pakistan Relationship: Soviet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5; Olivier Roy, *Afghanistan : from holy war to civil war*, Princeton, N.J : Darwin Press, 1995; Mark Galeotti, *Afghanistan: the Soviet Union's Last War*, London: Frank Cass, 1994; Andre Brigot, *The War in Afghanistan: An Account and Analysis of the Country, Its People, Soviet Intervention and the Resistance*, Brighton: Wheatsheaf, 1988; Mark Urban, *War in Afghanistan*,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8; Edward Girardet, *Afghanistan: The Soviet War*, England: Provident House, 1985.

③ Larry P. Goodson, *Afghanistan's Endless War: State Failure, Regional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the Taliban*,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Steve Coll, *Ghost War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IA, Afghanistan, and Bin Laden, from the Soviet invasion to September 10, 2001*,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4; Seth G. Jones, *In the Graveyard of Empires: America's War in Afghanistan*, W.W.Norton & Company, 2010; David Isby, *Afghanistan, Graveyard of Empires: A New History of the Borderland*, Pegasus Books, 2011; James W. Fiscus, *America's War in Afghanistan*, New York: The Rosen Publishing Group, Inc, 2004; Stephen Bell, *Afghanistan: 10 Reasons Why the Troops Should Come Home*, London: Stop the War Coalition, 2010; Chris Nineham, *Afghanistan: Why We Should Get out*, London: Stop the War Coalition, 2009; Tim Bird, *Afghanistan: How the West Lost Its Wa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④ Stephen Tanner, *Afghanistan: A Military History from Alexander the Great to the War Against the Taliba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a Capo Press, 2003.

⑤ Victoria Schofield, *Afghanistan Frontier: at the Crossroads of Conflict*, New York: Tauris Parke Paperbacks, 2003.

⑥ 龚柴清：《阿富汗考略》，出版地不详，1891年出版。

斯坦志附新志》和《阿富汗土耳其斯坦志》^①，以及解放初期出版的《阿富汗概况》^②和《阿富汗》^③等。“文革”期间，学界研究中断。“文革”后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学者再次展开对阿富汗的研究，如：彭树智先生^④、李泽云先生^⑤和董振邦先生^⑥等，但主要集中在阿富汗通史和苏联侵阿问题上。9·11事件后，我国学界关于阿富汗的研究骤然升温，各种题材的著述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除不计其数的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外，战地记者的作品亦琳琅满目^⑦。不过，众多成果中，可以列为深入而系统研究的作品为数不多。例如，很多学者解析美国的阿巴战略及阿富汗问题的发展前景^⑧，但少有学者深入探讨美国的阿富汗战争是如何逐步陷入当前的烂摊子境地的。鉴于此，我国学界有必要对阿富汗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其实，当前阿富汗问题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而是历经了漫长的演化过程。在此演变过程中，不但帝国角逐的外力起主导作用，而且阿富汗内部各种力量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内外合力之下，缘何英国侵略阿富汗最后取得成功，而苏美却以失败而告终？这个问题值得人们深思。

① 学部编译图书局编：《阿富汗斯坦新志》、《阿富汗斯坦志附新志》和《阿富汗土耳其斯坦志》，学部编译图书局，1907年。

② 军委联络部编：《阿富汗概况》，北京：军委联络部，1953年。

③ [苏]鲍契卡列夫：《阿富汗》，朱毓秀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年。

④ 彭树智：《阿富汗三次抗英战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彭树智：《中东国家通史，阿富汗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⑤ 李泽云编：《阿富汗风云：从查希尔到卡尔迈勒》，北京：时事出版社，1984年。

⑥ 董振邦：《论阿富汗战争》，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7年。

⑦ 参见陈俊峰：《亲历阿富汗前线》，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王毓国：《与枪口对话：阿富汗采访纪实》，北京：知识出版社，2002年；孙浩：《感受战争：采访阿富汗战争的日子》，北京：知识出版社，2002年；刘洪：《穿越炮火的眼睛：新华社记者阿富汗历险记》，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赵鹏：《目击阿富汗》，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李晓国：《聚焦阿富汗》，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曹显钰：《亲历阿富汗》，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3年。

⑧ 参见杜幼康：“美国‘阿富汗-巴基斯坦战略’的调整及未来走向”，《国际展望》，2011年第3期；付小强：“美国阿巴战略进展与阿富汗问题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12期；邵育群：“印度对美国‘阿巴战略’的评估及应对”，《国际展望》，2011年第6期；文丰：“美国的‘阿富汗困境’：问题与前景”，《新疆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张家栋：“美国阿富汗战略的走势”，《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3期；许洁明：“北约介入阿富汗战争的前景浅析”，《西亚非洲》，2011年1月；林利民：“大国角逐与阿富汗前途”，《瞭望新闻周刊》，2002年1月。

现实是历史的继续。在一定程度上，当前阿富汗的烂摊子，追根溯源，是英国殖民者为保护印度而留下的后遗症，即后殖民问题。故此，为探索上述问题的答案，不同于以往学者的视角，本文基于英国原始档案材料，从英帝国视野下的印度切入，就英国人如何为保护印度而积极改变印阿边界及其后续影响展开分析，揭示阿富汗问题发展前景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19 世纪英帝国视野下的印度

失去北美十三州后，英国殖民者将注意力转向亚洲。1815 年，拿破仑战败。借法兰西帝国崩溃之机，英国积极扩展其在南亚的势力，此后，印度以其丰富资源和重要地理位置，逐渐成为英帝国发展的重心，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丰富的兵力资源。英国本土人口不多，资源亦不丰富。以英伦三岛本土自然条件，英国无论如何也无法跻身世界帝国之列。然而，英国贸易公司开拓海外殖民地后，英国打破其岛国局限，并逐步上升为世界帝国。在东印度公司完全占据印度前，英国殖民地主要是白人拓殖地，如北美十三州、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以及少数种植园领地，如巴拿马等加勒比地区。而东印度公司主导印度事务后，英帝国的发展进入第二阶段——积极占领非白人殖民地。出现这样的发展趋势，主要原因是两个方面：其一，为了保护印度这块得天独厚的殖民地。众所周知，英国殖民侵略缅甸、锡兰、马来亚以及南非等地，都是为了保护印度。其二，印度丰富的人力资源为英帝国提供了足够的兵源。印度人口稠密，加上土邦众多，文化多样，其内部矛盾重重。英国人利用印度本土的这些特点“分而治之”，大量招募印度人入伍。十九世纪中叶，印度就被称为英帝国军队的训练基地（Training Ground）。^①正因为如此，中英鸦片战争中，替英国作战的主要兵力是印度人。而英国人侵略缅甸、阿富汗、尼泊尔、我国西藏以及埃及等地区时，也是印度大兵冲锋陷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没有印度丰富人力资源提供的兵力，就没有拿破仑战争后英帝国在世界各地的耀武扬威。这一点，英国精英阶层并不否认。

^①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1875”, cited from *Some Brief Comments on Passing Events made Between February 4th, 1858 and October 5th, 1881*, by The Right Hon' ble Mountstuart E. Grant Duff, Madras: The Government Press, 1884, p.156.

例如，在英王是否应该接替东印度公司管理印度和印度是否对英格兰具有重要性的讨论中，议员们各抒己见，但他们最终的集体共识是：“印度，毫无疑问，给我们国家增添了巨大的力量和财富……如果没有印度，我们的军队会马上不同……”^①二战后，当面临不得不从印度撤退的选择时，英国人依然千方百计要让印度在英联邦内独立，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想继续利用印度的人力资源优势来完成英联邦的防务安排，从而实现其从印度撤退而不至于使英帝国解体的目的。^②

其二，丰富的原材料资源与市场优势。十九世纪，英帝国雄踞世界老大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英国率先开启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财富。长期以来，学界对英国率先进入工业革命的原因争论不休，有人归结为其技术革命优势，有人归结为其农业革命优势，有人认为是光荣革命后稳定的国内环境起了关键作用，也有人强调其国内贵族的消费优势，等等。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值得挖掘，即：英帝国殖民地，尤其是印度，提供的巨大原材料与市场优势。后人津津乐道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英国的纺织革命。事实上，这场纺织业革命的开启，还与当初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进行贸易时其毛制品不受欢迎有关。印度气候炎热，柔软透气的棉制品比较受欢迎，而印度又盛产棉花。这种气候特点导致早期东印度公司商人在印度的贸易是赔钱的，因为英国传统毛制品不适合印度本土的特点。商人共同的爱好是赚取利润，在此驱动下，英国商人借鉴印度的棉纺技术，带回印度的棉花，将棉花和羊毛混纺。由此英国开启了现代混纺的先河，而印度的棉花亦成为英国纺织革命的主要原材料之一。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进一步深化，广袤的印度成为前者的重要原料产地和市场。1875年，英国《当代评论》评价道：“印度对英格兰太有用了，因为它扩大了我们国家的视野，并提供工业品市场和很多有价值的物品……它对我们的好处，正日益引起其他国家的关注。”^③也正因为这一点，十九世纪末，一些印度人学习西方经济与政治知识后，发现自己的祖国成为英国的

①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1875”, cited from *Some Brief...*p.157.

② CAB 131/2, DO (46)47, “Strategic position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reported by COS for Cabinet Defence Committee, 2 April, 1946, in Ronald Hyam, *The Labour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 1945-1951*, Part III, London: HMSO, 1992, p.334.

③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1875”, cited from *Some Brief Comments...*p.155.

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于是提出“印度自治”（Swaraj），从而成为印度民族主义者之父，如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高哈拉（Gopal Krishna Gokhale）和帕尔（Bipin Chandra Pal）等等。

其三，英帝国的基石。印度地处印度次大陆，面朝印度洋，背靠兴都库什山和喜马拉雅山。印度洋一直是西方商人通航东方进行贸易的重要通道，而印度次大陆自古以来就是连接东西方的桥梁。印度这样的地理位置，对富有商业帝国和海洋帝国特性的英帝国来说，无疑具有重要价值。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时以“印度”来命名，已显示出印度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英属印度建立后，英国人以印度为中心，将中东和阿拉伯地区称为“近东”，而将现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称为“远东”，这也说明印度在英帝国中的重要位置。为了保护英属印度，英国人不得不从海、陆两方面防止任何其他大国破坏其印度殖民地。久而久之，甚至整个英帝国都是紧紧围绕保护印度而建的。例如，英国人逐步占据通往印度洋的主要关口，如开普敦、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并控制地中海和红海的要塞之地，旨在将印度洋变成英帝国的内湖，防止其他大国从海上破坏英属印度的安全。同时，在陆上，为保护印度的安全，英国人围绕印度建立层层保护圈，殖民侵占缅甸和锡兰、变尼泊尔和不丹等为附属国，并密谋把阿富汗和中国西藏变成缓冲国。这样，在印度成为英王王冠上最亮的宝石的同时，也成为英国人重点保护的對象，被英国军官们形容为英国防御拱门上的基石（keystone）。^①

至十九世纪中叶，印度成为英帝国发展的重心，英国需要更好地保护印度。1869年英国议会下院这样评价：“如果我们在印度的事业被忽略，那么我们的帝国也就从我们身边溜走，这样的行为是玩忽职守。如果我们的帝国事业想发展得越来越好，唯一可循的成功信号是：珍惜拥有，继续前进。”^②

① C. Dasgupta, *War and Diplomacy in Kashmir 1947-1948*,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2002, p.12.

② “House of Commons, Indian Financial Statement, Aug. 3rd, 1869”, cited from *Some Brief Comments on Passing Events made Between February 4th, 1858 and October 5th, 1881*, by The Right Hon'ble Mountstuart E. Grant Duff, Madras: The Government Press, 1884, p.137.

二、保护印度与建立印阿“科学边界”

印度是英帝国的基石，英国人需要保护印度，防止其他大国染指印度。从海上保护印度，英国可以凭借其先进的皇家海军优势，占据通往印度洋的各个关口，将印度洋变成英帝国的内湖。但是，陆上保护不像海上防御那么容易，因为就在同一时期，沙俄大陆型帝国已经崛起。当时，在英国战略家眼里，沙皇俄国如同章鱼一样，其腕足四处寻找猎物，扩张疆土^①。



图 1 英国战略家眼中的俄罗斯

事实上，当时沙俄势力不但已经扩展至黑海和高加索地区，将土耳其视为自己的猎物，而且开始海上探险和环游世界，并有马上进军地中海之势。地中海是英帝国通往印度的生命线，从战略上来说，英国人需要想方设法挡住俄国的西向行动，由此，爆发了英法联手对阵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战败后，俄国转而向中亚地区进军。这令伦敦和新德里的战略家更为坐卧不宁，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俄国人在探寻通往印度的出路。据英国资料记载：彼得大帝时期，俄国政府已派出由 200 人组成的印度探险代表团，不过，被土耳其人阻止于布哈拉（Bokhara，中亚的一个地名）。“不管怎样，这已显示出俄国

^① http://www.bbc.co.uk/bbcfour/beautyofmaps/historical_maps-map5.shtml, 2012-8-17.

人对印度的胃口”，他们这样说。^①现在，俄国势力往中亚扩张，难免让他们联想到北极熊的下一个目的是印度。因此，他们作出这样的评估：“俄国人明显觊觎印度，因为他们耗费巨资越过里海，占领荒凉而人烟稀少的中亚地区，其背后驱动力肯定是希望最终能够获利丰厚，而这背后的巨大利益驱动便是他们拟占领印度。”^②他们甚至这样分析：“虽然有理由相信，办事效率低下的俄国政府能有效控制中亚地区是个传奇，但是，这显然是在向英国人眼里抛沙子。而且，出于现实考虑，他们也会继续前进。一旦俄国人在中亚地区站住脚，那么，俄国的铁蹄将无止境地继续南下，因为那里没有明确的边界划分。”^③故此，在俄国铁蹄到达高加索之时，被称为印度高加索的兴都库什山区已成为英国人重点关注的对象^④。

据英国战略家估计，印度次大陆背后的兴都库什山和喜马拉雅山是保卫印度的天然屏障，其高耸入云、不易逾越的优势，可以使其成为保卫印度的城墙。印度总督寇松（George Curzon）就直言：“印度就像一个城堡，前方有印度洋做护城河，后方有喜马拉雅山和兴都库什山做护城墙……如果一个指挥官只将印度的保护壁全部署在印度境内，而不放眼护城墙和护城河之外，那么，他绝对是个目光短浅的指挥官。”^⑤不过，那一时期，英属印度与阿富汗之间尚未划界，只存在当地居民的习惯边界，大致是沿兴都库什山脚下的印度河一线。就安全防御而言，这一地区不像喜马拉雅山区，山顶上的中华帝国，虽然国力衰弱，但一定时间内可以充当保护印度的工具，而这里一盘散沙的阿富汗根本无力抵挡沙俄铁蹄南下。所以，伦敦与新德里的决策者均认为印度西北边境防御尤为薄弱。伦敦的观察者估计，俄国人可能会止步于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区。但新德里的战略家普遍认为，北极熊会继续南下印度次大陆，尤其是 1857 年印度爆发抗英起义以后。他们甚至怀疑是俄国人的挑拨导致了这场起义的爆发。他们这样说：“尽管没有确凿证据证明

①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India and Pakistan, Part 1, January to December 1947*, FO 479/1, pp.81-82,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② *Ibid.*, p.82

③ *Ibid.*

④ Sir G. Campbell, M.P., *The Afghan Frontier*, London: Edward Stanford, 55, Charing Cross, S.W., 1879, p.16.

⑤ Neville Maxwell, *India's China War*, London: Jonathan Cape, 1970, p.21.

俄国人那样做了，但是，起义之初，一些印度人确实相信俄国人和波斯人会提供帮助。”^①正是由于这种恐惧心理，英王取代东印度公司掌管印度后，他们认为建立“科学边界”的任务十分紧迫。

何为“科学边界”？那一时期，印阿习惯边界在印度河靠近兴都库什山脚下，被英国人称为下印度河边界（The Lower Indus）。1849年刚占领旁遮普时，一些英国战略家就提出有必要建立印阿“科学边界”。例如，议员凯姆普拜勒（Sir G. Campbell）。^②就认为：处在山脚下的印阿边界对印度不安全，因为阿富汗人或未来可能的俄国人站在印度头顶上，印度无安全可言。为此，应该利用兴都库什山的地理优势，在上印度河（The Upper Indus）建立印阿边界，即：沿兴都库什山脊、开伯尔山口等，见下图。^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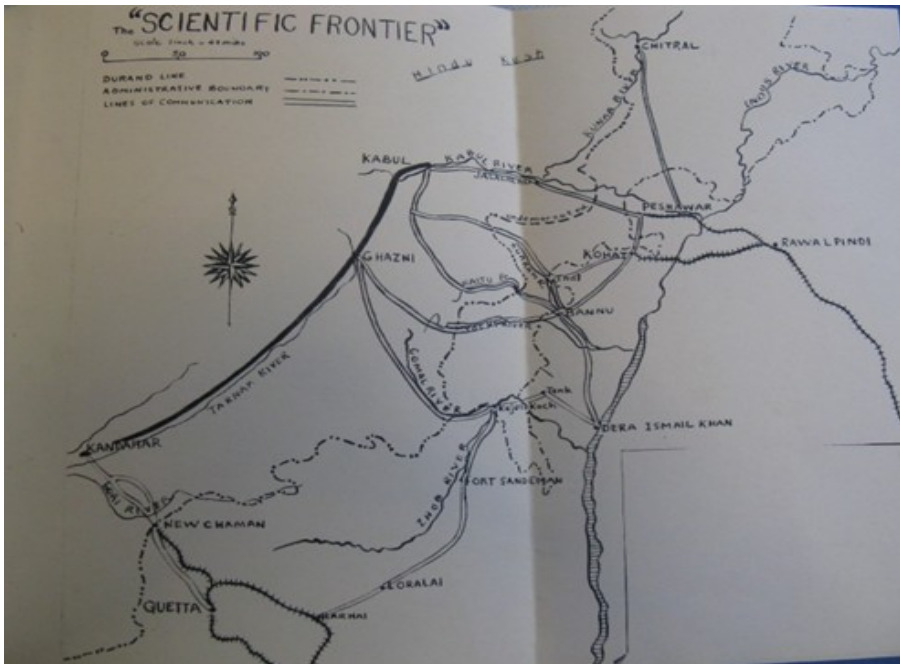


图2 “科学疆界”

他甚至提议，应该将英国人从锡克人手中获得的阿富汗领土，如白沙瓦

①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India and Pakistan, Part I, January to December 1947*, p.82.

② Sir G. Campbell, M.P., *The Afghan Frontier*, p.38.

③ Leslie Harris, *British Policy on the North-West Frontier of India (1889-1901)*, thesis,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60, p.42.

(Peshawur)、科哈特(Kohat)和巴努(Bunnoo)等, 返还给阿富汗, 以换取阿富汗政府接受上述科学边界。^①

习惯边界的形成, 是当地多年历史文化沉淀的结果。在此过程中, 不但地理因素起作用, 如河流、山脉的自然分水岭, 而且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与传统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因为他们世代在这里的生活, 已形成与当地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生活圈(community)。这种生活圈是经年累月形成的, 所以一旦形成, 便不是一时就能更改的了。英国人根据自己的战略需要, 拟将印阿边境从下印度河的传统边界一下子抬高至上印度河的山顶, 全然不顾边界形成中起重要作用的当地居民生活圈这一客观因素的存在, 这明显违反自然规律。因此, 如果英国人强行推进其战略安排, 无疑会造成严重后果。

为了自己帝国利益的需要, 英国殖民者没有愿望去照顾印阿边境阿富汗居民的感受, 决定执行远征政策, 强行夺取这些阿富汗人的“窝”。随后, 英国军官带领其印度士兵, 多次开展远征, 向印度河上方的山区进军。不过, 他们在这些山区的远征进展并不顺利, 因为普什图等部落人的游击作战, 总让他们的占领地出现反弹, 他们不得不艰难地守住一些战略要地, 如奎塔、开伯尔山口等。1879年, 英国殖民者决定大规模入侵阿富汗, 坚决要按照自己的规划建立起印阿“科学边界”。

英国人这次入侵阿富汗, 与1839年的第一次入侵结局类似。英国军官率领印度士兵长驱直入阿富汗首都, 阿富汗国王愿意签约求和, 接受英国人提议的《甘达马克条约》(the Treaty of Gandamak), 答应在喀布尔设英国常驻代表。然而, 在英国人还未来得及庆祝胜利之时, 普什图等部落人爆发反英大起义。他们冲进喀布尔, 烧毁英国驻喀布尔代表官邸, 杀死英国代表, 并与英国人展开游击战。在这种情况下, 英国侵略者在不得不再次失败而归的同时, 与这些阿富汗山民展开长期游击战争, 而印度西北边境更加不安宁。参加过远征行动的凯姆普拜勒议员就曾这样描绘说:

“我们已经对这些山民黔驴技穷了。我们试着从各个路口阻止他们进入我们的领地, 然而, 那只是部分成功。一次又一次地, 我们被迫追

^① Sir G. Campbell, M.P., *The Afghan Frontier*, p.39.

他们至远山处。从纳皮尔爵士（Sir Charles Napier）^①和凯姆普拜勒爵士（Sir Colin Campbell）^②起，直到现在，我们在那里的行动，不是没结果，而是结果雷同。每次，我们总是小题大做，详细部署讨伐安排，要求落实生效，使问题得到永久解决。然而，每次的结果都是我们向山上进军时，几乎没有抵抗。当我们到达他们小而简陋的村舍时，这些山民们卷起铺盖，带着牲畜和粮食消失了，留下破烂不堪的茅屋供我们发泄。如果是收获的季节，我们会破坏些他们的庄稼来发泄，如果他们已经收割完毕，我们只能空手而归。然而，只要我们一转身下山，这些山民就神出鬼没般地出现在我们屁股后面，我们不得不再次爬上山，对他们咆哮或开火（他们对我们也这么做）。然后，多多少少损失一点，我们下山回家，赶紧汇报讨伐过程取得巨大成功，并等着接受授予勋章……”^③

大英帝国当时船坚炮利，所向披靡，然而，在这些简陋而贫穷的山民面前，他们的先进武器和精密作战安排根本派不上用场。这些阿富汗山民，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精通当地地理特点，他们打起游击来，犹如山间幽灵。他们不需与英国人直接对撞，仅抓住时机偶尔偷袭、骚扰一下，就令英国人头疼不已。因此，这些普什图等部落人居住区被英国人称为印度西北边境的“马蜂窝”。平时，他们不会对印度的安全构成政治威胁，但是，一旦英国人或英属印度冒犯了他们，这些“马蜂”便会发起报复性进攻，骚扰印度西北边境的安全。

经历了第二次侵阿失败，英国决策层不得不重新审议对阿富汗的政策。像以往那样强行推进，显然不是有效举措。不直接推进，那么，出路何在？

英国驻喀布尔代表被杀后，英国议会开始积极讨论阿富汗问题。建立印阿“科学边界”的倡议者——凯姆普拜勒议员，再次在议会高呼其“科学边

① 那皮尔爵士（Sir Charles Napier, 1782-1853），英帝国陆军上将，曾担任过英国驻印部队总司令，以征服信德省而闻名。

② 凯姆普拜勒爵士（Sir Colin Campbell, 1792-1863），苏格兰高地人，英国陆军军官，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在印度军官 1857 年反英大起义中任英国陆军指挥官，因战绩显著，被封为第一代克莱德男爵（1st Baron Clyde）。

③ Sir G. Campbell, M.P., *The Afghan Frontier*, pp.43-44.

界”的提议及有效解决办法。他说：“根据我的经验，摘取马蜂窝有两种可行办法：其一，不惊动马蜂或冒犯它们，悄悄摘走其窝；其二，用烟熏法，把他们熏跑了再去摘。把它们惊动，再伸手去摘，并且摘取后还把手放在那里，显然不是智者之举。然而，这正是我们眼下在阿富汗的做法。”他进而分析说：“无论如何，眼前的事实证明：这个困扰我们多年的问题不能再以权宜之计解决。我们必须高瞻远瞩，将目光放远至整个阿富汗，尽力找到一个可以持久的划定边界的办法。”^①

三、智取“马蜂窝”

英国殖民者拟建立印阿“科学边界”，旨在守护印度的安全。他们多次越过传统印阿边界向印度河上方的阿富汗地区进军，志在实现这一目标。然而，他们多年的远征实践证明，其强行摘取“马蜂窝”的做法并非有效之举。现在，他们面临两种选择，要么继续先前的政策，要么更改政策。显然，继续老政策将重蹈覆辙，他们需要采取新政策。而制定新政策无外乎亦有两种选择：其一，放弃建立“科学边界”的计划，恢复遵守印阿传统边界，不再去捅马蜂窝；其二，继续原计划，但需要另辟他径实现目标。英帝国的发展已经绑在英属印度之上，为了继续英帝国的事业，他们需要去保护印度，进而建立“科学边界”。因此，从维护英帝国利益的角度来说，他们需要作出第二种选择。可是，怎样才能巧妙地摘掉这个棘手的“马蜂窝”呢？

如凯姆普拜勒议员所言，如果把视野放宽，放远至整个阿富汗、英帝国、甚至整个世界，那么，答案就在眼前了。

当时印度西北边境的最大安全威胁，不是阿富汗山民，而是沙俄帝国。阿富汗山民敌视英国人，是因为后者侵犯其家园。英国人拟建立“科学边界”，是为了防止未来俄国人到达兴都库什山后将威胁印度的安全。而现在，俄国铁蹄尚未到达兴都库什山区。这种情况下，倘若英国人绕道到阿富汗山民家园的后方去建立防线，那么，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种解决办法，一则不需去惊动普什图人，二则可以挡住沙俄铁蹄南下，可谓一石二鸟。如果这个策

^① Sir G. Campbell, M.P., *The Afghan Frontier*, p.6.

略实现，那么这个被称为“马蜂窝”的地方就悄无声息地被英国人摘给印度了。

这个策略非常好，但是，其实性的前提条件是阿富汗政府愿意配合。否则，英国殖民者将面临一个更大的敌人——阿富汗国家，因为那明显是阴谋侵占阿富汗领土。^①当时缺乏统一的阿富汗局势，恰恰提供了这一历史条件。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

其一，阿富汗内部缺乏统一。

“阿富汗”（Afghanistan）一词，近代很晚才被世人所知。现在人们所熟知的“阿富汗”国家，以前是呼罗珊（Khorassan）帝国的一部分。那时，“阿富汗人”（Afghans），主要是指普什图人（Pushtuns or Pathans）。英国人入主南亚时，正值普什图人的杜兰尼王朝（The Durrani Empire）统治现在的阿富汗地区，故英国人用（Afghanistan）来称呼印度北部的普什图国家或杜兰尼王朝。第一次侵入阿富汗后，英阿签订《甘达马克条约》，阿富汗一词正式写入国际条约。

阿富汗国家长期没有统一的名称，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个地区长期分裂、一直处于帝国边缘有关。几乎每个时代的大帝国都侵略过该地，如：古代波斯帝国、印度贵霜帝国、中国唐朝、帖木儿帝国、莫卧儿帝国，以及波斯萨法维帝国等。1709年，普什图人哈塔克（Mir Wais Hotak）揭竿而起，推翻萨法维王朝的统治，建立了哈塔克王朝。后来，艾哈默德·沙·杜兰尼（Ahmad Shah Durrani）将该地扩大为杜兰尼帝国，最强盛时，疆域覆盖现在巴基斯坦境内的俾路支、信德、旁遮普以及克什米尔北部，形成现代意义上的阿富汗国家。杜兰尼去世后，该国再次陷入分裂状态，虽然仍保有国王，但国王权力所及基本在喀布尔附近，故被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埃尔芬斯通（Mountstuart Elphinstone）^②称为喀布尔王朝。^③到英国人第二次入侵阿富汗

① 例如，在印度的东北边境，英国人试图用该办法攫取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大片中国领土（藏南地区），即拟定麦克马洪线，并试图迫使中国政府接受，结果，中国政府没有接受。因此，他们的企图没能得到有效实现，但由此埋下了中印边界争端的祸根。

② 埃尔芬斯通（Mountstuart Elphinstone, 1779-1859），英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苏格兰人，做过孟买总督，写过很多关于印度和阿富汗的书。

③ Sir G. Campbell, M.P., *The Afghan Frontier*, p.20.

时，该国的内部局势是：喀布尔、坎大哈和赫拉特各有自己的埃米尔（Ameer），俾路支人基本自治，兴都库什山区的普什图人或其他部落人几乎处于独立状态，北部与俄国接壤处亦无疆界划分。这种内部一盘散沙的状态，被英国人描绘为：“除非阿富汗政权落入一个有魄力和有足够金钱在握的英明君主手中，该国国君才能行使大权威，否则，没有足够金钱作保障，即使神仙下凡，也难统治这个国家。”^①

阿富汗内部如此缺乏统一，显然，如果英国人资助扶持建立一个亲英政府，并与其签订密约，购买或租借那块被称为“马蜂窝”的地方，那么，这个“马蜂窝”就能悄悄地被摘走。

其二，阿富汗地理条件允许。

翻开地图不难发现，阿富汗地理状况非常复杂。整个国家内，山脉纵横连绵，少有的低地多为沙漠和丘陵。据当时远征回来的英国人描述：“喀布尔通往西北方向，即巴米扬和土耳其，最容易的出路也海拔 12000 英尺，其余附近山脉海拔都在 20000 英尺以上。西部山区，我们知之甚少，它们看起来不到波斯附近没有出路，不过，前面是比较空阔的低地。东部帕米尔山区一直到印度，多山的阿富汗国家得到充分体现，从北到南，山脊一个接一个……一边是群山环绕，另一边是世界屋脊，这样的地势形成很多内湖……整个国家就是最陡峭和最没出路的山脉的组合，随处可见悬崖绝壁，溪谷偶尔闪现山间。这些河流主要流向印度河，东西走向，这种地理特点，造成这个国家的交通主要是东西走向，南北之间几乎没法交流……”^②

阿富汗靠近印度一侧的山脉主要为东西走向，南北交通困难，这样那个被称为“马蜂窝”的普什图与其他部落人的居住区也将被东西走向的山脉或河流分开，自然，绕道到他们家园后面的山脊处建立“科学边界”是可行的。

其三，阿富汗民族缺乏团结。

上述地理特点，以及阿富汗长期四分五裂和多次遭受外敌入侵，塑造了阿富汗民族多样性和各民族之间彼此独立的特点。阿富汗北部有突厥人、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他们分别与其中亚邻居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

① Sir G. Campbell, M.P., *The Afghan Frontier*, p.14.

② Ibid, pp.15-16.

克斯坦有长期文化上的联系。阿富汗中部的什叶派穆斯林比逊尼派穆斯林在宗教信仰上与波斯人的联系更为紧密；阿富汗南部的俾路支人，基本上处于独立状态，并且已被英国人控制；上印度河的部落人实行酋长制，每个部落的酋长是每个部落的领袖，彼此互不干涉。普什图人是阿富汗的最大民族，约占整个国家人口的一半，但该民族深受兴都库什山区地理特点的影响，内部好斗，缺乏团结。当时，英国人这样描述他们：“常年贫穷和他们精力充沛，养成了他们的贪婪、唯利是图、奸诈和掠夺成性的特点。常年处于他们的那种生存状态，任何人都会变得唯利是图，但是他们这一点尤为突出。他们喜欢独立，可以出卖任何东西，但绝不出卖其家园的独立性。他们作为一个民族最大弱点是：他们都认为对方应该付出，因此他们彼此互不信任。他们奸诈特性的形成，与其常年把控从中亚到印度的通道有关，习惯了被很多竞争对手收买。他们讨价还价时叫价一个比一个高，这种情况下，千万不要感到惊讶……他们自诩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但是他们的信仰与亚伯拉罕没有多大联系，他们是被他们的习惯法统治，而非亚伯拉罕法典。他们的好战性无人能比。简而言之，他们中任何一个人被雇去砍别人脖子时，他（她）都会忘记信仰，毫不心慈手软。”^①

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往往与这个国家人民的民族意识密切相关。阿富汗种族繁多，彼此相同之处不多，每个种族都享有自己的独立性。最大的种族——普什图人，其独立性、好战性与缺乏内部团结，亦不能支撑起阿富汗民族意识的重任。看到这一点，凯姆普拜勒议员这样总结说：“埃米尔的阿富汗，不是大部分阿富汗人（指普什图人）的阿富汗；大部分阿富汗人的阿富汗，总在埃米尔统治之外，尽管他统治人口不是阿富汗人的这个国家已经很久了”。^②这种内部缺乏民族统一性的状况，显然可以帮助英国人实现其目标，因为英国人对秘密外交、贿赂和签订密约等手段驾轻就熟。

从上述阿富汗国家缺乏统一性的特点，可以看出当时阿富汗局势为英国人实现其目标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条件。只要英国人愿意出资扶植成立一个亲英的阿富汗政府，并与其签订密约，那么，绕道那些阿富汗山民背后建立“科

① Sir G. Campbell, M.P., *The Afghan Frontier*, pp.24-25.

② *Ibid*, p.14.

学边界”的目标就可以实现。正因为如此，1879年，凯姆普拜勒议员这样上奏：“试试这最后一招：不再去征服那些独立性强的部落人，要去隔离他们，用他们的土著制度将他们保护起来。放弃没用的喀布尔王国，直接在上面占据战略要点，控制加兹尼（Ghuznee）和喀布尔（Cabul），以及通往印度的开伯尔（The Khyber）和波伦（The Bolan）的通道。然后，我们直接与那些山民建立友好关系，控制他们，让他们守卫我们的边疆安全，并吸纳他们加入我们的帝国军队。如果要这么做，那么，越早越好。”^①

四、签订杜兰德协议

1880年，英国发生政府更迭，保守党帝国主义铁腕人物——迪斯雷利（Disraeli）被赶下台，自由党人格拉斯顿（Gladstone）上台执政。组阁时，格拉斯顿挑选哈丁顿（Hartington）代替克兰伯鲁克（Cranbrook）任印度事务大臣，任命格兰维尔（Granville）代替沙利伯里（Salisbury）担任外交大臣，任命芮鹏勋爵（Lord Ripon）代替莱顿勋爵（Lord Lytton）担任印度总督。新任印度总督芮鹏勋爵认为：军事占领阿富汗，是极为不明智的做法，因为征服那个地方，除了获得岩石和勇士（普什图人），什么也得不到。^②印度事务大臣哈丁顿也主张：“终止占领政策，撤回所有超越印度边界的英国部队，因为除非英国挑衅，否则，英俄不会发生冲突”。^③1880年，英国议会辩论时，下议院基本达成一致意见：“与其耗钱继续占领阿富汗，不如尽快撤出该地，并帮助埃米尔拉赫曼重建与周边国家的关系”。^④本届政府不再继续前政府强行推进印度边境的做法，而是积极与阿富汗埃米尔阿卜杜·拉赫曼（Abdur Rahman）建立友好关系。凯姆普拜勒议员所提倡的智取“马蜂

① Sir G. Campbell, M.P., *The Afghan Frontier*, p.81

② F. D. Progs. October 1880 Sec. No.38—Robert Michell's Russian Abstract No. XXXII, 30th August 1880, cited from Ram Sagar Rastogi, *Indo-Afghan Relations (1880-1900)*, Lucknow: Nav-Jyoti Press, 1965, p.15.

③ F. D. Progs. June 1880 Sec. No.II—Robert Michell's Abstract No. VI, 3rd May 1881, cited from Ram Sagar Rastogi, *Indo-Afghan Relations (1880-1900)*, p.16.

④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CCLIV—Commons—August 1880, From Hartington to Camperdown, 12th August 1880, page 988, cited from Ram Sagar Rastogi, *Indo-Afghan Relations (1880-1900)*, p.16.

窝”的策略有望实现。

1880年4月，印度总督遣使赴喀布尔通知埃米尔拉赫曼：“英国政府承认，任何外国都无权干涉阿富汗内部事务……如果任何外国试图干涉阿富汗事务并威胁喀布尔统治者的统治，那么只要埃米尔愿意接受英国政府对其外交事务的指导，英国政府将援助他，如有必要，并帮助他驱逐外来威胁。”^①

对埃米尔拉赫曼来说，英国使者的这一信息，无疑是件好事。前面提到，阿富汗国王的阿富汗与大部分阿富汗人的阿富汗是两个概念。他虽然身为阿富汗国君，但他对国家的控制力很弱。当时，兴都库什山区普什图等部落人基本上处于独立状态，其他省份，如坎大哈和赫拉德，也有埃米尔，并且俄国与波斯势力一直在阿富汗北部和西部活动，因此，他一直颇为担心自己的统治安全。现在，英国人提出能保护他的统治，并可能扶植他加强中央权力，正是他梦寐以求的。显然，接下来英国与埃米尔拉赫曼政府友好结盟，已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随后几年时间里，一方面，英国人慷慨援助拉赫曼政府，帮助改善阿富汗国内基础设施，如修建公路等，以提高埃米尔的威信。由此，英国人博得埃米尔拉赫曼政府的信任。另一方面，英国人积极指导拉赫曼政府的对外政策，帮助拉赫曼与西部、北部和帕米尔邻国协商疆界问题。在俄阿边界问题解决之后，拉赫曼认为应该解决阿富汗与印度的边界问题。1891年，他写信给印度总督德费伦勋爵（Lord Dufferin）说：为了进一步提高两国的联盟关系，他建议英国政府应该派人赴喀布尔，与阿富汗相关官员解决阿印边界问题。^②他指出这样做的两大好处：一则可以让俄国人看看阿英关系友好，二则可以减轻阿富汗人民对英国人的怀疑心理。^③他甚至还提议，代表团还可以讨论两国政府感兴趣的任何其他问题。十年前，凯姆普拜勒议员极力呼吁智取“马蜂窝”以建立印阿“科学边界”，这些年来，英国人结盟拉赫曼并助其解决北部边界问题，旨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① Afghanistan No.1(1881)-Enclosure 2 in No.18 – Government of India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July 1880, Page 40, cited from Ram Sagar Rastogi, *Indo-Afghan Relations (1880-1900)*, p.17.

② Ram Sagar Rastogi, *Indo-Afghan Relations (1880-1900)*, p.156.

③ F. D. Progs. July 1891 Sec. F.No.202-Amir to Viceroy of India, 24th March 1891, pp.1-2, cited from Ram Sagar Rastogi, *Indo-Afghan Relations (1880-1900)*, p.156.

实际上，在阿富汗国王提出这个要求之前，英国人也认为解决印阿边界问题的时机成熟了，并开始采取行动。在英国谈判代表团赴喀布尔之时，英属印度已派人乔装成阿富汗人上山占据重要战略点。由于埃米尔拉赫曼病重和马赫默德·伊萨克（Mahomed Ishak）的叛乱，这次谈判没能顺利进行。

如此重要的谈判时机，资深外交官出身的总督德费伦勋爵深知其重要价值。他没有被喀布尔政局变化所干扰，直接给拉赫曼去信，指出划定印阿边界重要性，并邀请拉赫曼访问印度与他直接面谈。^① 埃米尔以身体不适和政务缠身为由婉言谢绝。德费伦认识到这里面有文章。为了不错失良机，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英国人尝试多种办法，对这个垂暮之年的阿富汗老国王进行威逼利诱。例如，德费伦以参照他与英国首相通信的方式向埃米尔索债、允诺帮助建设阿富汗铁路，以及给埃米尔一大笔钱，等等。^② 最终，1893年11月12日，重病中的埃米尔与英国代表杜兰德（Sir Mortimer Durand）达成一项协议，即《杜兰德协议》（The Durand Agreement）。

该协议这样规定：“关于靠近印度一侧的阿富汗边境问题，埃米尔陛下与印度政府都希望通过友好协商来解决这些问题和固定各自影响范围。这样，为了将来印阿政府（当时已结盟）在该问题上不产生异议，他们就以下几点达成一致：

第一，从瓦罕到波斯的阿富汗东部与南部边界，应该沿着该协议附图规定边界线。

第二，印度政府无论何时都不会越过该线向阿富汗一侧干涉事务，埃米尔无论何时也不应越过此线向印度一侧干涉事务。

.....

第七，鉴于完全满意埃米尔陛下对英国政府的好意，以及希望看到阿富汗独立与强大，印度政府支持埃米尔陛下所提出的购买和进口武器的请求，并给予他这方面的帮助。为诚挚感谢埃米尔的谈判精神，印度政府履行补贴1,200,000卢比给埃米尔陛下，此外，每年再增加600,000卢比作为补贴。”^③

① F. D. Progs. July 1891 Sec. F. No.208-Viceroy to Amir, 7th July 1891, Page 1, cited from Ram Sagar Rastogi, *Indo-Afghan Relations (1880-1900)*, p.157.

② Ram Sagar Rastogi, *Indo-Afghan Relations (1880-1900)*, p.167.

③ <http://www.khyber.org/pashtohistory/treaties/durandagreement.shtml>, 2012-8-27.

Afghanistan-Pakistan Bord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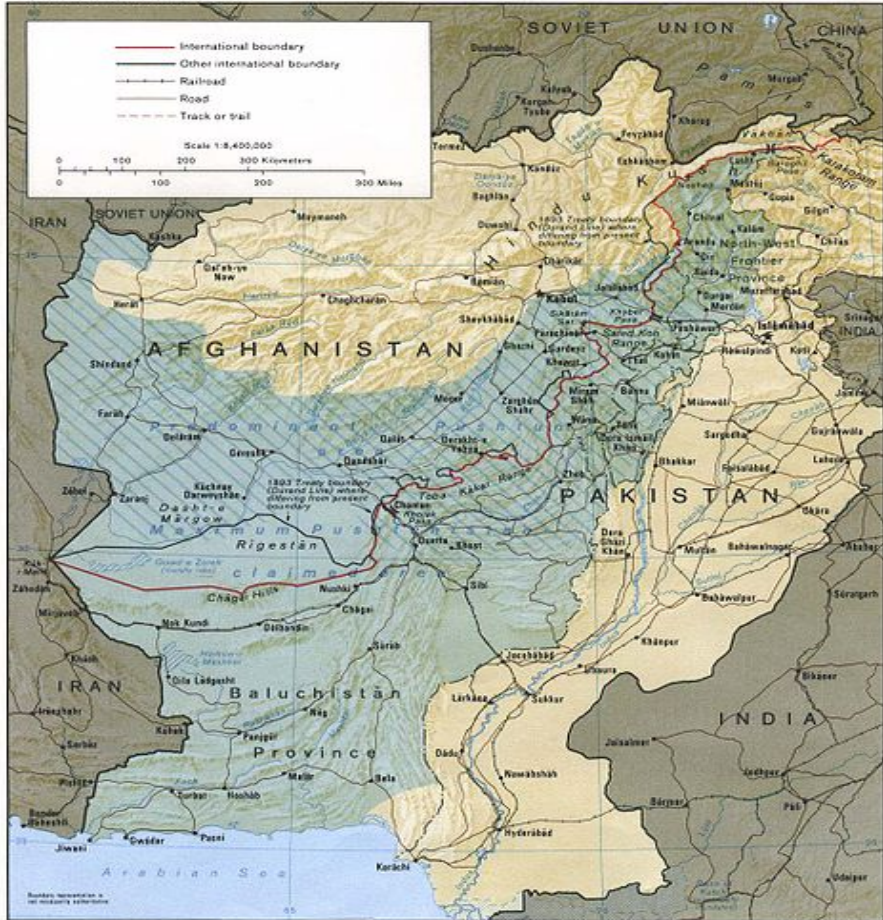


图3 杜兰德线

该协议第一条中所提到的地图线，就是现在举世闻名的杜兰德线，参见上图。^①

根据该协议，这条界线明确规定了埃米尔和英属印度在阿富汗边境各自的影响范围，即彼此不越过该线干涉另一方事务。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不是边界线。但是，由于当时印阿没有正式划界，以如此方式签约，不管它是

^① http://en.wikipedia.org/wiki/Durand_Line, 2012-2-15.

不是边界协议或被划入印度地图内的阿富汗居民是否接受，在地图上，该线都被标注为印阿边界线。藉此，在地图上，凯姆普拜勒议员所提议的智取“马蜂窝”的目标实现了。

五、结果与启示

《杜兰德协议》生效后，英国挑选麦克马洪等人赴阿富汗勘测和划界，试图彻底落实杜兰德线。这样，有勇猛善战的普什图等部落人守护印度西北安全，这个“科学边界”形同捍卫印度安全的坚实堡垒。如凯姆普拜勒议员所评估的那样：“用这种更加结实而庄严的方式紧紧守住印度。如果我们在缅甸那部分有一天需要这么做，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这样做。用这种方法固守住印度，那么我们拟建立非洲帝国、固守地中海的愿望都可以实现了。”^①

然而，在具体实践中，杜兰德线却产生一些意外结果，具体表现如下：其一，当地居民不认可。

《杜兰德协议》是英国人与埃米尔拉赫曼达成的秘密协议，普什图等部落人对此事甚不了解。当麦克马洪等英国代表前去勘测划界时，这些被称为“大黄蜂”的阿富汗山民才知道自己的家园被划到印度地图上了。他们喜欢享受自己国家的穆斯林传统，以及独立和自由，没有愿望臣属于英属印度之下，于是，他们与英国人又展开战争。据英国人反馈，当时，“吉德拉尔（Chitral）、巴焦尔（Bajaur）、马拉坎德（Mala Kand）、瓦济里（Waziri）、阿弗里迪（Afridi）等地，与英国势力范围下的部落人不停地发生战争。”^②为此，虽然英国人花费了近十年的功夫来勘界，但最终还是没能在这些地区完成划界。后来，英国人不得不单独成立西北边境省和联合部落区（2010年3月更名为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专门管理这些地区的边境安全事务。直到今天，这些地方依然没有确定边界。

其二，印阿边界争端由此开始。

由于《杜兰德协议》是秘密协议，没有经过阿富汗国家的认同。前面提

^① Sir G. Campbell, M.P., *The Afghan Frontier*, pp.81-82.

^② Ram Sagar Rastogi, *Indo-Afghan Relations (1880-1900)*, p.181.

到，埃米尔的阿富汗与阿富汗人民的阿富汗不是一致的，故此，尽管埃米尔拉赫曼以国家统治者的身份与英国人签订协议，但阿富汗人民却不认可这份协议，尤其是普什图人。所以，埃米尔拉赫曼刚去世，阿富汗新政府就拟不承认该协议。这样，在英属印度一侧，印度地图标注杜兰德线为其西北边界线，但在阿富汗一侧，阿富汗政府与人民却不认为该线为其边界线，印阿边界争端由此开始。

为了让阿富汗政府认可《杜兰德协议》，1919—1921年，英国人再次入侵阿富汗，迫使阿政府接受杜兰德线为印阿边界线。如：1919年的《拉瓦尔品第条约》明确规定：“阿富汗政府接受埃米尔所接受的印阿边境。”^①1921年的《拉瓦尔品第条约》再次声明：“双方相互接受印阿边界为1919年《拉瓦尔品第条约》第五条所规定的阿富汗政府所接受的印阿边境。”^②尽管如此，阿富汗人民，尤其是那些昔日被英国人称为“大黄蜂”的普什图人和部落人，依然不承认杜兰德线的存在。他们自由穿梭山上山下，杜兰德线俨然只是地图上的边界线。

1947年，英国人基于原殖民地“在英联邦之内独立”的原则从南亚撤退。这样，原英属印度的西北边界遗产被巴基斯坦自治领继承，巴阿边界争端从此开始。1947—1949年间，巴阿关系因为边界问题十分紧张，英国人出面调停。1950年，英国议会专门讨论该问题，并达成一致意见：“英王政府对巴阿两国政府在西北边境领土意见不一致感到遗憾。英王政府的立场是：在国际法上，巴基斯坦合法继承印度旧政府和英王政府在这些领土的权利与义务，故此，杜兰德线是国际边界线。”^③此后，《东南亚条约》和《维也纳公约》都接受杜兰德线为巴阿国际边界。然而，阿富汗政府依然拒绝接受杜兰德线。普什图人掌控阿富汗事务时，阿富汗政府不但拒绝接受杜兰德线，而且还索要现巴基斯坦境内的普什图人领土。塔利班政府如此，现任卡尔扎伊政府也持这一立场。“一条在两兄弟间树立了一道墙的令人憎恶的线”，卡尔扎伊总统这么说。^④

① http://en.wikipedia.org/wiki/Durand_Line, 2012-8-28.

② Ibid.

③ http://en.wikipedia.org/wiki/Durand_Line, 2012-10-7.

④ Ibid.

其三，帝国入侵阿富汗的泥潭。

在巴阿双方为杜兰德线争吵不断时，这条当初被英国人称为“科学边界”的地方，现在变得一点都不“科学”了。在理论上或国际法上，杜兰德线是巴阿国际边界，所以，任何国家都应该遵守该线，否则，将被视为践踏巴基斯坦的主权。然而，现实生活中，在当地普什图人和部落人眼里，根本就没有这条线，尤其是那些尚未正式划界的地段。他们依然生活在自己祖辈留下来的生活圈里，即使有时穿越了地图上的杜兰德线，他们也浑然不知。巴基斯坦虽然坚持杜兰德线为其西北国际边界，但巴政府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在西北边境省和联邦直辖部落地区（FATA）控制力的微弱。这种理论与现实的错位，使得这条边界变成多孔边界（porous border）。

这条边界的多孔性，使它成为保护阿富汗反对派的庇护所，进而成为帝国入侵阿富汗的泥潭。这是因为，在国际法上，它是巴阿国际边界，任何侵略阿富汗的国家进行军事打击时，都应该遵守该线，否则，将被视为践踏巴基斯坦的主权，而在现实生活中，阿富汗人却可以自由穿越该线。这样，当侵略国的军事打击目标越过杜兰德线进入巴基斯坦境内躲藏时，侵略国得不到巴方同意不能进行追剿。例如，苏联入侵阿富汗时，苏军清楚地知道杜兰德线外侧巴境内的西北边境省和联邦直辖部落地区是塔利班的神经中枢和根据地，但他们却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拖进旷日持久的游击战中。即使侵略国得到巴方同意，而巴政府对西北边境省和联邦直辖部落地区控制力的微弱，也使得巴方的支持变成单纯的口头承诺。例如，在阿富汗反恐战争中，美国制定了巴阿战略，倚重巴政府进行反恐，而最终，人间蒸发多年的本·拉登却被发现藏身于巴境内。美国人早就看出了这一点。2009年，华盛顿就指出：“若想赢得阿富汗战争，必须控制住巴基斯坦的部落区（西北边境省与FATA）”。^① 驻阿富汗盟军总司令麦克凯南（Gen. David McKiernan）也建议说：“若想打破这种僵局（恐怖分子自由穿梭杜兰德线），除非巴阿联合行动。”^② 然而，时至今日，美国主导的反恐联军依然无法控制这些地区，只能无奈地输掉这场战争。

① <http://www.cfr.org/pakistan/troubled-afghan-pakistani-border/p14905>, 2012-8-28.

② Ibid.

当年，英国人费尽心机，想方设法制定了这条“科学边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今，这条边界变得如此不“科学”，不但滋生巴阿之间的重重矛盾，而且演变为苏美入侵阿富汗战争的泥潭。这种现象值得玩味！

杜兰德线是当年英国人不惜牺牲当地人民的利益、竭力维护其帝国利益不受损害的产物，是英帝国留下的众多后殖民问题的一个缩影。当前，美国主导阿富汗战后重建，其解决方案能否突破杜兰德线的魔咒，值得人们密切关注。

【Abstract】 Britain and Russia fell into the Great Game soon after the Napoleonic Wars in 1815. To prevent Russians from destroying the brightest gem of the British Crown, British imperialists proposed to build the Scientific Frontier along the Indian north-west frontier, which was to move the traditional Indian border running along the Lower Indus to the Upper Indus where the Hindu Kush ranges could be the backwall to secure India. At the beginning, British tried to forward Indian frontier through invading Afghan hills directly, but they fell into a big setback by the strong resistance of the Pashtu and other tribes. Then British called them “hornets”. After the second Anglo-Afghan war,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ir past experience, the British decided to pick up the hornets’ nest wisely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disunity of Afghanistan and allying with Ameer Rahman in Cabul. As soon as the Russian-Afghan frontier was settled, in which Britis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British took all measures to force the Ameer to accept the Durand Line where the hornets’ nest has already been secretly put on the map of India. After that, British tried to fix the Durand Line as the Afghan-Indian international border, but those Pushtuns and tribesmen refused to accept the change. Hence, the dislocation of the Durand Line between its theory and reality has led the Scientific Frontier to a big mess till the present. The porous border line has troubled the Afghan-Pakistani relations deeply and worked as a quagmire for Russia and America who invaded Afghanistan.

【Key Words】 Britain, Afghanistan, British India, Indian North-West

Frontier

【Аннотация】 После поражения Наполеона в 1815 г.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и Россия всупили в Большую игру. С целью не допустить русских уничтожить самый драгоценный камень Британской Короны британцы предложили на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ой границе Индии создать «научную границу»,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перенося индийскую традиционную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ую границу от нижнего Инда к верхнему Инду, используя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о гор Гиндукуш для защиты Индии. Сначала британцы пытались продвинуть границу путём прямого завоевания Афганских гор, однако столкнулись с упорным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ем племён Пушту и других племён, которых они называли «большими осами». После провала второго крупномасштабного вторжения британцы изменили политику, решили вос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отсутствием в Афганистане единства, создать альянс с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Рахмана в Кабуле, перехитрить «осиное гнездо». Оказав помощь Рахману в очерчении других афганских границ, британцы пытались заставить Рахмана принять линию Дюрана.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нанесённая на карту местность, известная как «осиное гнездо», была британцами отнесена к внутренним границам Индии. После этого британцы вновь принимали меры, чтобы утвердить эту линию в качеств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границы Афганистана и Индии, но афганские горцы этого никогда не принимали. Такие различия в теории и практике привели к тому, что эта «научная граница» изобилует проблемами. По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день она не только порождает постоянные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между Афганистаном и Пакистаном, но и стала трясинной войны в Афганистане, затянувшей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Афганистан, Британская Индия,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ые границы Индии

(责任编辑 封 帅)

中亚与上合组织

自然资源是哈萨克斯坦的赐福还是诅咒？*

王维然 雷琳 吴唯君**

【内容提要】独立以来，哈萨克斯坦经济的强劲增长受益于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得益于自然资源的同时，哈萨克斯坦也面临着“去工业化”、“人力资源”储备减少的难题。尽管哈萨克斯坦政府已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加以应对，但要真正将“资源诅咒”转变为“资源赐福”，哈萨克斯坦仍需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其宏观政策和谨慎使用巨额的资源红利。

【关键词】资源诅咒 荷兰病 去工业化 多元化

【中图分类号】F13/17(361)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2)05-0062-(14)

一、引言

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一国经济增长意味着什么？在古典经济学家们看来，资源、土地和劳动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资源的丰裕就意味着一国在发展经济中具有先天优势，英、德、美以及澳大利亚等国的发展情况也印证

* 本文是教育部规划基金一般项目“俄白哈关税同盟影响下的中国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研究”（项目批准号：12XJJA790003）、新疆哲社基金项目“俄白哈关税同盟对新疆外贸影响的分析”（项目批准号：10BJY017）和新疆师范大学自治区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亚与中国西北边疆政治经济研究中心资助的研究成果。

** 王维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新疆师范大学中亚与中国西北边疆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雷琳，新疆师范大学教授；吴唯君，新疆对外贸易学校高级讲师。

了这一观点。但“普雷维什—辛格假说” (Prebisch-Singer Hypothesis) 指出, 发展中国家在出口初级产品时有可能换来的只是悲惨性增长而非期盼的经济繁荣。二十世纪后半叶, 以日、韩为代表的东亚国家的经济崛起和许多自然资源丰裕国家经济的缓慢增长甚至停滞的对比, 似乎也表明, 自然资源并不是经济发展的“赐福” (blessing) 而是“诅咒” (curse)。

自独立以来, 哈萨克斯坦历经了前苏联解体、1998 年俄罗斯金融危机、2008 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 2000 年后世界能源、资源产品价格上升带来的巨大红利。探寻自然资源的丰裕对其究竟是诅咒还是赐福, 哈萨克斯坦是否会感染“荷兰病”, 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二、文献综述

奥蒂 (Auty) 在研究矿产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时正式提出了“资源诅咒” (resource curse) 这一概念, 即丰裕的自然资源对一些国家来说不是经济发展的赐福, 而会制约其经济增长^①。而对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表明, 在控制初始人均收入、贸易政策、腐败和投资率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多种变量后, 许多国家的自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速度成反比。如 17 世纪时, 资源贫乏的荷兰超过了从殖民地获得大量金银的西班牙;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时, 瑞士和日本领先了资源丰裕的俄罗斯; 而过去三十年里, 东亚的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韩国、新加坡的发展, 则与资源丰富的墨西哥、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②当众多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反而不如那些资源匮乏的国家, 甚至出现社会动荡乃至内战的混乱局面时, 资源在一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日益受到关注。

在研究资源诅咒的文献中, “荷兰病” (Dutch disease) 被认为是造成一国经济增长缓慢的重要传导机制, 即资源丰裕会产生资源转移效应、相对价

① R.M. Auty, *Sustaining Development in Mineral Economics: the Resource Curse Thesis*, London: Routledge, 1993, pp.12-15.

② Jeffrey Sachs, Andrew Warner,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s 5398, Cambridg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95, pp.22-23.

格效应和支出效应而使制造业逐渐衰落。^①但由于制造业部门具有技术外溢和“干中学”的特征，而初级产业部门则缺乏联系效应和外部性，且对人力资本的要求也相当低。因此，这样的产业结构会使人力资本得不到投入而最终导致经济衰退。

在近年来的研究中，经济学家进一步深化了对不同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荷兰病与资源诅咒关系的研究。点源性资源（point-source），如石油、矿山，比分散型（diffuse）资源，如农田、渔业、牧场，对经济增长的限制更大，而制造业的发展和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则起到了最大的促进作用。^②奥蒂指出，资源贫乏国和资源丰裕国分别会形成竞争性工业化模式和大宗产品陷阱模式，前一种模式会使得资源贫乏国更早地开始竞争性的工业化道路，而在较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基础上的改革也会使其趋向于采用更开放的贸易政策，从而促进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制造业的发展不但吸纳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且由于其对劳动力技能要求的不断提升，带动了对教育、科研的投入，为经济的长期发展积累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本，最终使得该国经济走上与社会条件互相促进、持续快速发展的良性循环的轨道。相反，在大宗产品陷阱模式下，一国经济由于对初级产品的依赖，会延误其发展竞争性制造业的时间，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分别是生产和劳动资本的积累的落后。由于采矿业是资本密集型行业，难以吸收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并会导致不同部门间收入差距的拉大，造成分配不均的社会矛盾，并且很容易形成“寻租”行为的盛行。一旦形成从事“寻

① Max Corden, J. Peter Neary, “Booming Sector and De-Industrialization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The Economic Journal*, 1982, Vol.92, No.368, pp.832-836.（资源转移效应是指，假设一国经济在处于充分就业状态时，如果突然出现某种自然资源或资源价格突然上涨，则导致劳动和资本转向资源出口部门，而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不得不花费更大的代价来吸引劳动力，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打击制造业的竞争力。相对价格效应是指，由于出口自然资源带来外汇收入的增加使得本币升值，再次打击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支出效应是指，自然资源出口带来的收入增加会增加对制造业和不可贸易部门产品的需求，由于对不可贸易部门的产品需求无法通过进口来满足，因此一段时间后，服务也会重新繁荣。）

② Mansoob Murshed, “When does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lead to a resource curse? ”,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Programm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March 2004, pp.6-7.（具有会使生产和收入产生集中趋势的自然资源，被称为点源型资源，如石油、矿产；会使收入向经济的其他部门分散的资源，被称为发散性资源，如农业。前者易导致资源诅咒，后者能促进经济发展。）

租”能够比开展生产活动获取更大收益的福利分配机制，就会引发企业家才能资源的错配。因此，以大宗产品模式为基础的矿业经济会制约一国经济的发展。^①

由于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中的许多国家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加上这些国家又处于转型阶段的独特情况，其国家制度、对外开放、经济结构单一等问题，都与资源诅咒和荷兰病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对这些国家的研究也成了这一研究领域内的热点。理查德·庞弗雷特（Richard Pomfret）指出，资源丰富的前苏联国家更易感染荷兰病，因为这些国家缺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定经济政策的经验以及不具备良好的经济制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已具有了“资源诅咒”的部分特点，而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则通过吸引外资和增强国家生产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感染荷兰病的可能性。^②

表 1 哈萨克斯坦不同行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

年份	矿业	制造业	农业	建筑业	房地产业
1999	10.4%	14.1%	9.8%	4.7%	12.0%
2000	13.0%	17.2%	8.0%	5.2%	10.8%
2001	11.4%	16.4%	8.6%	5.5%	12.1%
2002	12.1%	14.5%	7.8%	6.3%	12.6%
2003	12.1%	14.2%	7.8%	6.0%	14.4%
2004	13.6%	13.3%	7.0%	6.1%	15.4%
2005	15.8%	12.0%	6.3%	7.8%	15.1%
2006	16.1%	11.6%	5.4%	9.8%	14.8%
2007	15.2%	11.6%	5.6%	9.5%	14.9%
2008	18.7%	11.8%	5.2%	8.1%	15.0%
2009	17.9%	10.9%	6.1%	7.9%	15.9%
2010	19.5%	11.3%	4.5%	7.7%	8.6%

资料来源：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Казахстана.2000-2011. <http://www.stat.gov.kz/Pages/default.aspx>

布雷斯科威尔（Christa N. Brunnschweiler）在对 1990–2006 年间 27 个中东欧和前苏联转型国家进行分析后发现，石油成为储量丰富的国家渡过转型萧条期的决定性因素，但石油的积极促进作用是不是能够长期保持，则难

① R.M Auty,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25-26.

② Richard Pomfret,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Transition in Central Asia, Azerbaijan, and Mongolia”, Working Paper 11-8, the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1, p.9.

以确定，因为这取决于这些国家是否能实现经济结构多元化以保证经济的长期增长。^①

哈萨克斯坦经济极大地受益于矿业开采。为避免出现“资源诅咒”，哈萨克斯坦建立了能源基金，并将资金投向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以便于引进外部资源和技术，从而促进国内储蓄流向生产型投资。考虑到受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影响，哈萨克斯坦有望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②

三、哈萨克斯坦经济特点分析

1995-2010 年间，哈萨克斯坦的GDP和外贸分别实现了年均 15.7%和 20.9%的增长，2010 年GDP为 1480 亿美元，外贸总额为 906 亿美元，成为中亚国家中经济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人均GDP也由 1993 年的 283.8 美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9070 美元，跨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③不同产业在哈萨克斯坦的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见表 1）。哈萨克斯坦的矿业产值也在 1999-2010 年间实现了年均 35%的增长，其占GDP的比重也由 10%（1999 年）增加到了 19%（2010 年）。同期，制造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分别从 14.1%和 9.8%下降为 11.3%和 4.55%，而建筑业占GDP的比重则从 4.7%增加到了 7.7%。房地产业从 12%增加到 15.9%（2009 年），2010 年房地产业的大幅萎缩是国内经济泡沫破灭的结果。^④根据南卡尼（Nankani）提出的标准，当一国GDP的 10%或出口额的 40%来源于矿产品时，

① Christa N. Brunnschweiler, “Oil and Growth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CER-ETH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09/108, 2009.

② Yelena Kalyuzhnova, Michael Kaser, “Prudential Management of Hydrocarbon Revenues in Resource-rich Economies”, UNECE Discussion Paper No.5, December 2005, pp.6-15.

③ 按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08 年的最新收入分组标准为：低于 975 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在 976 至 3855 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 3856 至 11905 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 11906 美元为高收入国家。

④ 数据根据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计算而来，下文中数据如无说明，来源皆与此相同。由于哈萨克斯坦 1998 年改变了统计方法，为保证数据统计口径的一致，采用的数据从 1999 年开始。这也造成开展本研究所需的哈萨克斯坦不同部门的统计数据时间过短。为保证研究结果真实性，本文仅根据可获得的同口径数据对其经济状况展开分析，而不建立相关数学模型。

该国即为矿业经济。^①哈萨克斯坦矿产品的出口占该国出口总额的比重,1999年为46%,2010年增加到了75%,由此可认为,哈萨克斯坦已成为典型的矿业经济国家。

(一) 经济增长中的“去工业化”

自然资源在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中已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科登和尼瑞(Corden and Neary)将依赖自然资源的国家分为两个可贸易部门和一个不可贸易部门,即能源部门、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并指出能源部门的繁荣会通过资源转移效应和消费效应影响到其他两个部门,从而导致制造业的衰落,使经济患上“荷兰病”,乃至最终导致“资源诅咒”。^②

通过表2可知,尽管独立以来矿业(包括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开采)已占到哈萨克斯坦GDP的19%和出口的75%,成为哈萨克斯坦经济的支柱产业,但其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仍只有2%。而从1999-2010年间,该国农业占GDP的比重下降了54%,但其吸纳的就业人口却从22%上升到了28%。具有“干中学”效应的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和培养具有熟练技能劳动力的制造业的从业人口,也从1999年的10%下降到了2010年的7%,该产业占GDP的比重则从1999年14%下降到了2010年的11%。就业比例上升幅度最大的建筑业增加了133%,而房地产业在2009年增加了67%(2010年回落到2%是金融危机后房地产业泡沫被挤出的结果)。尽管矿业创造了哈萨克斯坦GDP的大部分产值,但由于其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特点,无法吸纳剩余的劳动力。制造业产值和就业人口的双下降,表明了哈萨克斯坦经济“去工业化”的特点。

表2中给出了农业、矿业、制造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平均月工资与哈萨克斯坦全国平均月工资对比的比值。从1999年到2010年,农业工资增幅最大,建筑业的工资小幅上升,而矿业、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的工资与全国工资的比值都下降(房地产业工资仅是在2010年下降了,在2009年其工资

① G Nankani, “Development Problems of Mineral Exporting Countries”, World Bank Staff Working Paper 354,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79, pp.11-14.

② Max Corden, Peter Neary, “Booming Sector and De-Industrialization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pp.839-842.

水平相对于 1999 年还上升了 50%)，但矿业工资水平仍分别为农业、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业的 4、1.9、1.4 和 1.2 倍(房地产业采用 2009 年数据)。由此可见，服务业部门，如建筑业和房地产业，是因矿业经济受益的行业。而矿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高工资，无疑是推动哈萨克斯坦经济“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的重要因素，也是制造业就业人口下降和建筑业、房地产业就业人口上升的直接动力。因为矿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对中间产品(intermediate product)的需求并不大(虽然矿产开采中需要技术密集型的设备，但因哈萨克斯坦装备制造业技术水平落后，无法提供矿业所需的机械设备)，这对制造业的发展产生了强烈的抑制作用。

表 2 哈萨克斯坦不同行业就业人数与月均工资比例

年份	不同行业就业人数占就业人口比重					不同行业月均工资比例				
	农业	矿业	制造	建筑	房地产	农业	矿业	制造	建筑	房地产
1999	22%	2%	10%	3%	3%	39%	208%	116%	134%	104%
2000	31%	2%	9%	4%	4%	39%	223%	123%	146%	116%
2001	35%	2%	8%	4%	3%	40%	212%	115%	155%	128%
2002	35%	2%	8%	4%	3%	40%	197%	109%	160%	144%
2003	35%	3%	7%	5%	3%	41%	197%	107%	149%	158%
2004	33%	3%	7%	5%	3%	42%	192%	107%	136%	143%
2005	32%	3%	7%	6%	4%	44%	193%	104%	141%	149%
2006	31%	3%	7%	6%	4%	46%	186%	107%	136%	148%
2007	31%	3%	7%	7%	5%	47%	171%	104%	135%	149%
2008	30%	3%	7%	7%	5%	52%	181%	108%	134%	154%
2009	29%	3%	7%	7%	5%	51%	183%	103%	133%	155%
2010	28%	2%	7%	7%	2%	47%	191%	101%	135%	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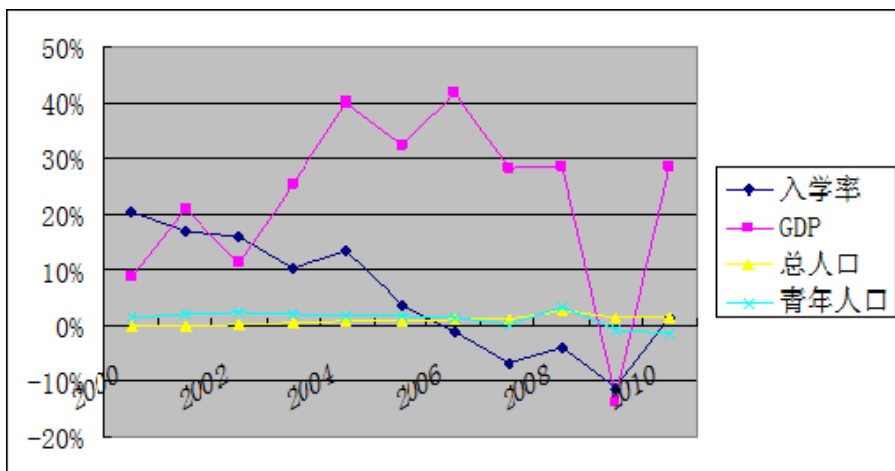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Казахстана.2000-2011. <http://www.stat.gov.kz/Pages/default.aspx>

(二) 人力资本积累的减少

在资源丰裕的经济体中,构成经济活动主体的初级产品生产部门并不需要高技能的劳动力,因此,人们更容易忽视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丰裕的自然资源通过提高非熟练劳力的工资而挤占教育投资,从而导致资源诅咒。^①图 1 是 1999-2010 年哈萨克斯坦 GDP、总人口、青年人口(15-24 岁)和高等院校入学人数的环比增长趋势。从图 1 可发现,哈萨克斯坦人口

^① 谢继文:“‘资源诅咒’国外研究综述”,《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 年第 9 期,第 37 页。

除了 1999 年和 2000 年呈现负增长外，此后一直保持增长。该国 15-24 岁的青年人口则一直保持增长，仅在 2009、2010 两年为负增长。而哈萨克斯坦 GDP 和高等学校入学人数则基本保持了背离的走势（2009 年 GDP 增速大幅下降是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结果），更进一步说明，由于哈萨克斯坦经济日益依赖自然资源的开采，已经对其教育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2000 年以后国际能源价格的持续上涨带动了哈萨克斯坦能源和资源行业的高速发展，而哈萨克斯坦高校入学人数增长率却持续下降，甚至在 2004-2009 年间出现了负增长。制造业的就业人口在 1999-2003 年间下降 19.3%，且矿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等行业的工资也远高于制造业的工资水平，这些行业薪资水平的变化必然影响到青年人的求学和就业选择。2010 年当青年人口增长率为负 1.5% 时，当年高校入学人数却出现了 2006 年以后的首次 2% 的增长。这很可能是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就业形势不乐观，才使得部分年轻人选择了继续读书以暂时躲避就业的困难。



资料来源：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Казахстана.2000-2011. <http://www.stat.gov.kz/Pages/default.aspx>

图 1 哈萨克斯坦 GDP 和高校入学人数增长趋势

矿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其吸纳的劳动力极为有限。而受益于资源开采的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等许多服务行业对劳动力的要求并不高，这直接导致了青年人继续学习知识的动力的下降。而需要具有熟练技能劳动力的制造

业，在行业自身都已不断萎缩时，自然无法吸引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人。当获取高学历未必会给受教育者带来更高的回报来弥补其在求学期间付出的机会成本时，整个社会都会偏好更早地开始工作而不是选择继续学习。读书无用论一旦在社会中被普遍认可，从长期来看必然会造成劳动力素质的下降，而这将会成为制约一国经济结构调整、发展高新技术行业的最根本的制约因素。如果不能培养并储备优质的人力资本，哈萨克斯坦提出的到 2020 年的发展规划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依赖资源开发转型为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战略是无法实现的。而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等资源丰富的国家，正是有效利用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良的人力资本，才通过制造业和自然资源部门间的相互促进实现了工业化，并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①

四、哈萨克斯坦现行政策分析

依赖自然资源的开采，尽管在短期内能使一国经济快速增长、居民福利增加，但不正确地使用从自然资源中所获得的巨额红利，一国很容易形成“寻租”的机制和财富分配不均的情况。为了减少国民对财富分配不均的不满，政府会增加社会整体的福利供给，这固然在一段时间内能够减弱国内的不满情绪，但引发的一个后果就是过于优厚的福利待遇使国民丧失了工作、创新的激励。当一个社会的环境引导其精英竞相成为寻租者（rent seeker）而不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其普通大众满足于优越的生活条件而无意努力工作时，一旦资源耗尽或价格下跌，就会引发其福利体系难以为继，其经济就会陷入萧条状态，正如 20 世纪 70 年代的荷兰。而在制度体系并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就更容易出现社会动荡和经济危机相互作用的恶性循环。

出于对本国经济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开采的担忧，哈萨克斯坦政府也采取了多种措施来加以调整，下面就对哈萨克斯坦政府采取的措施及其发挥的作用进行分析。

^① Claudio Bravo-Ortega, José de Gregorio, “The Relative Richness of the Poor? Natural Resources,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in Daniel Lederman, William F. Maloney, edited, *Natural Resources, Neither Curse nor Destiny*, A co-publication of Stanford Economics and Finance, an imprint o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World Bank, 2007, pp.18-22.

（一）建立哈萨克斯坦国家基金

从世界范围来看，并非所有资源丰富裕的国家都遭受了“资源诅咒”。相反，有的国家得到的是资源的“赐福”，利用本国丰富的资源实现了经济持续的繁荣和增长，如澳大利亚、挪威、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拉森（Larsen）指出，20世纪60年代挪威的经济还远远落后于邻国丹麦和瑞典，但随着石油、天然气资源在挪威被发现，挪威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尽管这种增长早期对能源的依赖很大，但在1993-1998年，挪威石油和天然气生产的增长率为18.9%，而工业的增长率则保持在38.1%，远高于能源部门的增长。而在出口中，尽管1989到1998年间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分别增加了1倍和50%，但能源占挪威出口的比重始终保持为28%。挪威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运用其丰富的资源，原因就在于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宏观政策，有效地避免了感染“荷兰病”。其中之一，就是避免消费效应而将大量的石油收入注入国家设立的石油基金并严格控制其使用。^①

借鉴挪威的成功经验，哈萨克斯坦于2000年设立了哈萨克斯坦国家基金（NFRK）以有效使用能源开采为国家带来的巨额收益。根据纳扎尔巴耶夫总统2005年签署的命令，该基金的来源包括石油行业的税收、矿产部门私有化的收入以及出售农业用地的收入，其使用仅限于造福下一代人的开发和投资项目，且政府鼓励投资非能源部门。同时，也规定了使用该基金的资金不得超过哈萨克斯坦5年GDP平均值的1%。^②理查德·庞弗雷特认为，尽管存在诸多不足，但相较于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等国，哈萨克斯坦在能源基金的使用上更为透明和谨慎。^③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哈萨克斯坦动用了大量的国家基金来扶持银行业和建筑业以稳定国内经济，只是其使用效率究竟如何目前还难以判断。

① Erling Roed Larsen, “Escaping the Natural Resource Curse and Dutch disease? Norway’s Catching up with and Forging ahead of Its Neighbors”, Discussion Papers 377, Research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Norwa, 2004, pp.12-15.

② Zharas Aitmambet, “How can Hydrocarbon Windfalls be Managed to Sustain Growth in A Resource Based Economy? Case Study: Kazakhstan”, 2006, pp.15-17. http://www.dundee.ac.uk/cepmlp/car/html/CAR10_ARTICLE40.PDF.

③ Richard Pomfret,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Transition in Central Asia, Azerbaijan, and Mongolia”, p.20.

（二）促进经济结构的多元化

无论是资源诅咒还是荷兰病，二者的共同表现都是一国经济过度依赖自然资源。而自然资源行业由于其产业链短小、对劳动力吸纳能力低下，无法起到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发动机作用。取得成功的资源丰裕国家的经验是，利用从自然资源开采中所获取的巨额收益，高效地将其配置到不同行业去，形成各部门间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从而拉动各个不同行业的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的多元化。

以挪威为例，尽管能源开采的产业链很短，但由于其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该国通过开展能源开采行业设备和技术的研发，促进了能源装备制造和服务业的发展。而这些技术密集型行业对劳动力的要求又拉动了相关行业人才的培养，强化了国内人力资本的积累。这样一来，形成了能源开采带动制造业发展、制造业增加对高素质劳动力和先进技术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又促进了社会整体对科学技术的研发热情和培养人才的积极性，从而形成了促进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机制，摆脱了对能源资源的依赖。

为避免本国出现“资源诅咒”或“荷兰病”，哈萨克斯坦试图保护本国的非石油部门以促进经济结构的多元化。但由于在前苏联时期哈萨克斯坦的经济结构就存在轻工业落后的结构性问题，而独立后随着经济增长的重心主要依赖自然资源的开采，这一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趋严重。由于制造业整体技术水平的落后，致使石油开采中还普遍使用前苏联时期的装备，造成矿业的发展无法传导到制造业部门。

目前，哈萨克斯坦政府已将发展工业中的能源设备制造、建筑材料、纺织，服务业中的交通和物流、旅游、商业银行和农业产业集群作为实现本国经济结构多元化的优先领域。但从以往众多资源丰裕国家的经验来看，虽然这些国家也努力去实现经济结构的多元化，最后仍然出现了资源诅咒或荷兰病。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政府过多地介入了微观经济事务，而政府主导的投资大多又是低效的甚至仅仅是基于领导人的随意决定，这样就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政府介入过多的另一个弊端在于，很容易引发“寻租”的问题，这又进一步恶化了经济环境。所以，在实现多元化时，尽管需要政府进行扶持，但这种多元化应是以市场配置资源作为基础的。

在多元化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如何避免以上所谈及的资源错配是极为关键的问题。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是，在财政支出中增加对税收而非能源收入的依赖，可有效增强政府发展非能源部门的动力，因为这会促使政府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促进竞争性行业的发展中，通过这些行业的发展来促进政府税收的增加。

（三）加大贸易开放度

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英国等国的经验表明，贸易更为开放的资源丰裕国家，其经济有能力摆脱资源“诅咒”；而实施保护性贸易政策的资源丰裕国家，则更容易患“荷兰病”乃至被“诅咒”。其原因在于，开放的国家更容易通过对外贸易的学习效应来促进本国竞争性产业的发展，同时引进国际先进的经验与制度，从而更高效地使用本国资源，最终将资源转化为“赐福”。^①

2010年哈萨克斯坦的贸易依存度已达到61.2%，其开放程度在中亚各国中是最高的。经过哈萨克斯坦多年倡导，俄白哈关税同盟也已建立，而且各国希望能够将其升级为一体化水平更高的统一经济空间。但从欧亚经济共同体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机制的成熟程度和产业结构来看，他们的一体化很难像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通过竞争性合作来促进共同的发展，主要国家更多的是从政治角度而非经济利益来促进一体化，因此这种一体化很难带来哈萨克斯坦最需要的先进的技术、经验和制度。

不过，随着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预计哈萨克斯坦也将很快加入世贸，这会对俄白哈关税同盟产生很大影响，对进一步提升哈萨克斯坦的开放程度、学习国外的经验和制度及减轻哈萨克斯坦的“荷兰病”无疑是有利的。

^① Rabah Arezki, Frederick van der Ploeg, “Can the Natural Resource Curse Be Turned into a Blessing? The Role of Trade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s”, IMF Working Paper: WP/07/55, March 2007, pp.23-25.

五、结论

（一）哈萨克斯坦经济未被“诅咒”但已“患病”

自独立以来，尽管受到体制转型和两次金融危机对经济的严重影响，但在总体上，哈萨克斯坦经济受益于资源开发，从而实现了大幅增长，其人均GDP已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尽管有大量人口因制造业的萎缩而失业，因哈萨克斯坦具有丰富的分散型资源——耕地，这些失业人口被农业所吸纳，未像其他矿业国家那样因严重的失业问题而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就此而言，哈萨克斯坦得到了自然资源的“赐福”。但哈萨克斯坦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也表明，过于依赖资源开采对其经济发展构成了障碍，而如何治疗“荷兰病”则是哈萨克斯坦政府将长期面对的一个问题。

（二）需在市场化基础上实现经济多元化

从世界范围来看，凡是自然资源丰富又实现了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国家，其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避免了过度依赖自然资源的单一经济模式。这一点，无论在发达国家的挪威、澳大利亚，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都得到了印证。而且这些国家都是将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来实现经济多元化的。因此，哈萨克斯坦需进一步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以及让政府在更为透明、规范的环境中推动其多元化战略的实施，以避免政府的过多干预引发资源错配和寻租。

（三）能源基金使用应更为谨慎、合理

在取得成功的资源丰裕国家的经验里，合理使用巨额的资源收益都是一条重要的经验。尽管哈萨克斯坦政府在宏观政策的制定和财政开支方面总体是谨慎的，但近年来哈萨克斯坦房地产业的高速增长和地产泡沫在金融危机中的破灭，说明福利条件上升在哈萨克斯坦引发的消费效应已对其国民的消费观念 and 经济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因此，如何减少巨额的资源收益对经济、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哈萨克斯坦政府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Abstract】 Since its independence, the robust growth of Kazakhstan economy benefits from its abundant natural resources. Nevertheless, Kazakhstan also suffers from such difficulties as “deindustrialization” and reducing in reserves of “human resources”. Although a series of policies have been implemented by the government, Kazakhstan still needs to further adjust and perfect its macro policies and prudently take advantage of its large sum of resource’ bonus in order to turn the “resource curse” into “resource blessing”.

【Key Words】 Resource Curse, Dutch Disease, Deindustrialization, Diversification

【Аннотация】 С момента обретения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бурный рост эконом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а основывался на его богатых природных ресурсах. Но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имея выгоду от природных ресурсов, Казахстан сталкивается с проблемами «де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и», снижения резервов «человеческих ресурсов». Хотя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Казахстана приняло ряд стратегий для устранения данных проблем, но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превратить «ресурсное проклятие» в «ресурсное благословение», Казахстану по-прежнему необходимо проведение дальнейшей корректировки и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я своей макр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и рациональное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своих огромных природных ресурсов.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есурсное проклятие, голландская болезнь, де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я, диверсификация

(责任编辑 韩冬涛)

吉尔吉斯斯坦二次革命后的政党政治 与总理—总统制：乱中有序*

宇山智彦**

【内容提要】2010年4月吉尔吉斯斯坦发生了“二次革命”，并选择了总理—总统制的国家体制，议会地位上升，总统权力受到限制，但仍有相当的分量和影响。这样的选择，部分原因在于此前几任总统的集权制度，没能实现吉尔吉斯政权的稳固。这一新的体制，显然还不完善，议会内政党之间的对抗、各政党内部的争竞、府院之争等仍然很紧张；特别是议会内的执政联盟还不够稳定，总统与总理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与制衡，也无宪法保障。一个积极的现象是，二次革命之后的态势，明显好于郁金香革命之后的情况，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吉尔吉斯斯坦确立的议会政党制度，使得各方面的竞争开始以制度化的方式公开进行，混乱中可以看到一定的秩序。

【关键词】总理—总统制 制度设计 总统 议会 政党

【中图分类号】D73/77.21(364)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2)05-0076-(17)

关于吉尔吉斯斯坦在二次革命（the second revolution, 2010年4月）期间以及此后的不稳定的政治局势，已经有很多讨论。许多人持批评意见，认为这个国家的政治腐败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然而必须承认，与2005年第一次革命不同的是，二次革命带来了许多重要的制度上的改变。比如，总统

* 本文是第七届欧亚地区主要大国比较研究国际会议(The 7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Major Regional Powers in Eurasia)的会议论文(论文的原文题目是“Party Politics and Premier-Presidentialism in Kyrgyzstan after the Second Revolution: Order in Disorder”)。作者授权本刊独家中文发表。

** 宇山智彦(Uyama Tomohiko), 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 教授。

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议会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力。终于可以第一次用“议会政党制”（parliamentary party system）这一概念，来分析一个中亚国家的政治状况了，尽管这一制度还不成熟。现有的很多关于吉尔吉斯斯坦革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规模动乱（mass mobilization）问题^①。而本文则着重研究政治制度，以期回答如下问题：制度变革的动因是什么？如何从比较政治学和宪政的视角来看待新的体制？阿卡耶夫（Askar Akayev）和巴基耶夫（Kurmanbek Bakiyev）政权之间有什么区别，或是有什么前后的关联？目前，在总统、议会和政府之间所设定的制衡系统，运作的效果如何？在议会政党制这一框架下，吉尔吉斯的政客们如何协商与竞争？该体制有何风险？

一、制度设计（Institutional Design）

（一）总统权力的改变

很多人，尤其是吉尔吉斯的政客们，将 2010 宪法所确认的政治制度称为“议会制”，但是总统仍然保留了相当的职能。如何从比较政治学的视角来阐释这一体制呢？广义而言，所有的独联体国家，除了土库曼斯坦（没有总理）和摩尔多瓦（总统由议会选出）之外，他们的政治体制都可以称为半总统制（semi-presidential），即总统由民选产生，总理要得到议会的赞同。^②但是，这些国家与典型的半总统制国家（如法国和立陶宛）又不相同，不属一类。差别在于，在大部分独联体国家，总理很少向议会负责，或者仅仅是名义上的负责，但高度依赖总统（普京作为总理时的大权，源于他之前曾担任总统）。因此更确切地说，大多数独联体国家的政治体制，应该是“拥有一位总理的总统制”（presidentialism with a prime minister），甚至还可以称之

① Scott Radnitz, *Weapons: Predatory Regimes and Elite-Led Protests in Central A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Azamat Temirkulov, “Kyrgyz’ Revolutions in 2005 and 2010: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ss Mobilization”, *Nationalities Papers* 38, 2010, no.5, pp. 589-600.

② 对于半总统制的定义有多种，参见 Robert Elgie, “The Politics of Semi-Presidentialism”, in Robert Elgie, ed., *Semi-Presidentialism in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21.

为“超级总统制”(superpresidentialism)^①。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巴基耶夫在2007年创立的政治体制，也是超级总统制。

吉尔吉斯2010年的宪法，在多大程度上减弱了总统权力？这里我们将使用舒加特和凯里^②衡量总统权力的方法，并把2007年10月及2010年6月所颁布的两部宪法作比较。由于舒加特和凯里所使用的度量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吉尔吉斯的情况，笔者将用一种更灵活的方式来使用分值。在对宪法和法律进行字面解读的同时，还就实际的政治实践作一些注解。这里不会使用由舒加特和凯里引用的两个概念，即“部分否决/推翻”(partial veto/override)、“排他性的立法提议权”(exclusive introduction of legislation)。这两个衡量标准似乎更适用于拉美的一些案例；如果用来分析吉尔吉斯斯坦2007和2010的宪法，数据则要显示为0了。

表1 总统的立法性权力（注：带星号的表示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

	否决/推翻 (Veto/override)	发布命令权	预算权	全民公决提出权	总计
2007年	2.5	1.5	0.5 *	3	7.5
2010年	2	1	0	0	3

表2 总统的非立法性权力（注：带星号的表示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

	组阁权	解散内阁权	谴责权 (Censure)	解散议会权	总计
2007年	0.5 *	4	2	1	7.5
2010年	0.5	1	1.5	0	3

否决（推翻）权（4=有否决权且不能被推翻；0=没有否决权）。2007年宪法规定，议会推翻总统对一般法律否决的条件是，要有不低于三分之二的票数；推翻总统对于宪法性法律和其他重要法律的否决，则要求有不低于四分之三的票数。在2010年的宪法中，只要有不低于三分之二的投票，议会即可以推翻总统的任何否决。

命令权（4=拥有命令权；0=没有命令权）。舒加特和凯里所说的“命令权”，指的是总统制定正式法律的能力，而不仅仅是颁布一般性规范文件的

① 关于超总统制，参见 John T. Ishiyama, Ryan Kennedy, “Superpresidentialism and Political Party Development in Russia, Ukraine, Armenia and Kyrgyzstan”, *Europe-Asia Studies* 53, 2011, no.8, pp.1177-1191.

② Matthew Soberg Shugart, John M. Carey, *Presidents and Assemblies: Constitutional Design and Electoral Dynam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148-154.

权力。吉尔吉斯斯坦的宪法从来就没有对法律和总统命令（указ）二者之间的差别作出过明确定义。因此，从理论上说，总统发布的命令与正式法律具有同等效力。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实践中，总统令主要用于组织和人事方面。此外，在 2007 年宪法（及以前）框架下颁布的总统令，也有针对政府重组的情况（其他许多国家有关总统令的规定中，都有类似的授权）。二次革命后的临时政府的实践表明，在特殊情况下，总统或政府可以直接参与到法律制定的事务中来，充当议会的职能，并以命令的形式颁布法律。

预算权（4=总统有权制定预算且不允许修改；0=议会拥有最高的制定和修订预算的权力）。在吉尔吉斯斯坦，不是总统，而是政府提出年度预算案。在 2007 年的宪法框架下，总统可以（理论上）否决预算案。同时，在实际操作中，特别是在政府制定预算的过程中，总统可以施加相当大的影响力。2010 年的宪法禁止总统否决预算案。

全民公决提出权（4=不受限制；0=总统无权提出动议）。2007 年宪法授予总统发起全民公决的权力；但是总统要发动修改宪法的全民公决，则需要征得议会的同意。在 2010 年的宪法框架下，全民公决的发动权属于议会。

内阁权（4=总统提名内阁且无需认可；0=如无议会推荐，总统不能提名部长）。从形式上讲，两部宪法在内阁组成的程序上，没有较大差异。即，由议会中的多数党推选出一位总理候选人，该候选人再提名其他政府部长；如果议会中没有一个多数党，那么总统可以选出一个政党，由该党发起组成一个政党联盟，并推出一位总理候选人。总统不能否决由多数党或政党联盟所提出的总理和部长候选人。然而，在实际运作中，巴基耶夫对总理的选拔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宪法实施前夕，他成立了自己的政党“光明道路党”（Ak Jol）。该党在 2007 年 12 月的议会选举中取得了 90 个席位中的 71 席。“光明道路党”提名巴基耶夫的心腹而不是其他政党领袖作为总理候选人（先是伊戈尔·丘季诺夫 Igor Chudinov，然后是达尼亚尔·乌谢诺夫 Daniyar Usenov）。2009 年 10 月，巴基耶夫在没有修改宪法的情况下，独自任命外交及其他部门的领导人，包括国防、安全和投资等部门的部长。尽管临时政府宣告这次重组无效，但是 2010 年宪法仍赋予总统单独任命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局（the national security service）局长的权力。

解散内阁权（4=总统可以任意解除内阁部长的职务；0=议会可以谴责部长以及解除其职务）。2007年宪法赋予总统任意解除总理和政府部长的权力。2010年宪法规定，总统只能解除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局局长的职务。

谴责权（4=议会不能谴责内阁或部长以及解除其职务；0=无限制的责难）。2007年宪法规定，当议会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时，总统可以解散政府，或者反对这一不信任投票。但如果议会在三个月内再次表示对政府的不信任，总统可以解散政府或解散议会。2010年宪法规定，总统可以同意或者否定议会政府对政府的首次不信任投票，但是必须遵从第二次投票的结果。

解散议会权（4=不受限制；0=没有规定）：2007年宪法规定，总统可以在议会第二次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案后解散议会，或者在议会第三次尝试组阁仍遭遇失败时解散议会。2010年宪法只保留了后一种情况，这样，解散议会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2007年宪法框架下，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权力的综合得分（立法权：7.5，非立法权：7.5），与智利在1925年以前（8, 8）、韩国在1987年之后（6, 9）的得分很接近（舒加特和凯里的评估结果）。吉尔吉斯的这一得分可以被认为是中等，在分数上没有特别之处，看不出来什么。然而，如果考虑到，2007年宪法中规定的内阁组成和财政预算权与实际的情况相差甚远，即总统权力在这两项上的实际得分非常高，那么巴基耶夫政权则应该被归于“权力型”，或者说是“问题型”（problematic）（用舒加特和凯里的说法）；这种“问题型”的政权很多到后期都垮台了。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在2010年宪法框架下的综合得分为3, 3，与1982年以后的葡萄牙（1.5, 1.6）、1991年以后的罗马尼亚（2, 2）的得分很接近。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的权力在2007和2010年的总得分有很大不同，主要是因为，在全民公决发动权和解散内阁权这两项上的得分，有很大差异。但这些差异却很微妙，需要细致进行分析。第一，2007年实施宪法，巴基耶夫不得不与反对派妥协，营造出一个政党政治的形象。^①但是他自己的政党

① 在2006年及2007年初，一些政客们因巴基耶夫迟迟不肯推行政治改革、他与犯罪集团之间可疑的联系以及频繁的抗议集会而批评他。议会于2006年11月出台一部宪法，该宪法基本上是基于反对派的要求。在2007年宪法颁布之时，大部分的反对派要么被边缘化，要么被增补进议会。但是巴基耶夫政权不能完全忽略2006年宪法所引入的条款。

通过行政资源和可能的选举造假，获取了议会中的绝大多数席位，将政党政治制转向了一个强权总统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意味着，同样的体制，如果没有一个占主导性地位的总统党，那么政治竞争是可能比较和谐的。第二，随着 2010 年宪法的颁布，总统权力被削弱，但仍然有相当的分量。第三，2010 年宪法带来的一些变化，在舒加特和凯里的方法里面并没有反映出来。如，现任总统不能被重新选举，也不能向议会提交法律草案；在 2007 年宪法框架下，政府向总统和议会负责，现在政府仅对议会负责；此前属于总统的进行国际谈判和签署条约的权力，以及任命地方行长官的权力，现在都移交至总理手中了。

（二）政治体系的定义与制度选择的理由

总的来说，吉尔吉斯斯坦的 2010 年宪法，使得总理和议会更加独立，更有实权。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体制不再是超级总统制，转而成为半总统制中的一种重要的子类别，即总理—总统制（*premier-presidentialism*）。在这样的体制下，总理是首要的，不过总统也有相当的权力。这与总统议会制相反，在总统议会制里，总统拥有首要的权力。法国、立陶宛、波兰、斯洛文尼亚，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属于总理—总统制。^①

为什么吉尔吉斯斯坦会选择总理—总统制呢？根据杰拉尔德·伊斯特尔（Gerald Easter）的观点，在共产主义政权瓦解的时期，在许多东欧及波罗的海国家里，旧制度下的精英们被迫从他们原有的位置上离开，与新的政治参与者按照相同的规则争夺权力，因此他们更愿意选择议会制；而在中亚国家和阿塞拜疆，这些国家的旧有精英们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打击，并在总统制的制度下，依旧垄断着权力资源。^②这一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吉尔吉斯斯坦的旧有精英，在苏联大厦将倾的前夕，不如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旧精英们那样地位牢固。特别是 1990 年 6 月在奥

① 有关总理—总统制，参见 Shugart and Carey, *Presidents and Assemblies*, esp. pp.23-27; Steven D. Roper, "Are All Semipresidential Regimes the Same? A Comparison of Premier-Presidential Regimes", *Comparative Politics* 34, 2002, no.3, pp.253-272.

② Gerald M. Easter, "Preference for Presidentialism: Postcommunist Regime Change in Russia and the NIS", *World Politics* 49, 1997, no.2, pp.184-211.

什发生骚乱之后，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领导人阿布萨马特·马萨利耶夫（Absamat Masaliev）的权威受损。在议会的第一轮投票中，马萨利耶夫的支持者们背叛了他；时任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院长的阿斯卡尔·阿卡耶夫（Askar Akaev，此人并非一名政党领袖），在第三轮投票中当选为总统。

由政党领袖和非政党精英共同组成的吉尔吉斯斯坦的精英阶层，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代表着不同的地区利益，而且彼此仇视。因此，从理论上讲，吉尔吉斯精英们应该乐于接受议会制。议会在 1990 年代的前半期确实很活跃（还曾一度被称为“传奇议会”，the legendary parliament）^①。但阿卡耶夫的打算是将权力集中在他一人手中，以此巩固政治制度。然而阿卡耶夫政权没能维系下去，最终在 2005 年的郁金香革命中终结。许多政客参与了郁金香革命，最终巴基耶夫（Bakiev）将对手们赶出了政治舞台，与阿卡耶夫一样，将权力集中在他自己手里。他的过度贪婪不仅惹怒了政治对手，也激起了普通民众的不满，由此引发了第二次革命（the second revolution）。通过总统强权来巩固政权的几次尝试都接连失败了，很自然，吉尔吉斯希望选择另一种制度，即把不同的政治参与者之间的对抗，转移到议会的政党政治之中，同时保留总统作为仲裁者的地位。

为限制总统权力、加强议会作用而进行的宪法改革的尝试，对于吉尔吉斯而言，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 2005 年 4 月，就在郁金香革命之后，吉尔吉斯成立了一个宪法委员会，并就选择总统制还是议会制进行了讨论，只是巴基耶夫一直拖延着改革。但有一位政客坚持不懈地主张加强议会的作用，此人就是“阿塔—梅肯”（祖国）党的领导人奥穆尔别克·捷克巴耶夫（Omurbek Tekebaev）。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他一直是一个活跃的政治反对派。他作为过渡政府的副总理，领导了 2010 年的宪法改革；他对反对派作用的重视，也反映在 2010 年的宪法中。这部宪法包含了一些独有的条款，如：一个政党在 120 个议会席位中所占席位不能超过 65 个；由议会反对派选出议会副主席、中央选举委员会和审计院（audit chamber）三分之一的成员。

^① Как и зачем был разогнан «легендарный» парламент Киргизии. Вспоминает экс-спикер М.Шеримкулов// ResPublica. №.9.16.02.2005. <http://www.centrasia.ru/newsA.php?st=1108636980>

二、实践中的新政治制度

(一) 选举的结果和联盟的形成

在 2010 年 10 月的选举中，五个政党在议会中所获席位如下：“故乡”党（Ata Jurt）28 席，社会民主党（SDPK, Social Democrats）26 席，“尊严”党（Ar-Namys）25 席，“共和国”党（Respublika）23 席，“阿塔—梅肯”（祖国）党（Ata Meken）18 席。这次选举仍然存在着一些制度上的混乱。此次选举是依据 2007 年通过的选举法典进行的。该法典规定了 5% 的门槛线，但不是实际票数的 5%，而是登记选民数的 5%。由于选民可以在投票站自行登记，这样登记选民的数量比选前预期的数字超出了十五万人之多，门槛随之提高。直接导致了“统一吉尔吉斯斯坦”党（Butun Kyrgyzstan）的得票距 5% 的门槛仅一步之遥，无法进入议会。该党向中央选举委员会提出了抗议。2011 年 6 月，就选举问题的新法律条款出台，进入议会的门槛，改为根据实际投票结果计算的 7%。然而很奇怪的是，如此重大的一项改变，在吉尔吉斯几乎没有任何的公众讨论。

吉尔吉斯斯坦议会政党制的预期功能之一，就是将政治参与者之间的混乱对抗，引向政党之间的有序竞争。因此，这些政党各自代表着什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大部分人认为，吉尔吉斯的政客分为南北两派，政党也分别代表南北利益。大选一结束，一些评论家就“故乡”党出人意料的胜利进行解释，认为是由于南方坚定支持该党，而北方的选票则被另外四个政党分散获得。^①但根据对投票站投票结果的分析^②，会发现一个更为复杂的现象。社会民主党在楚河州和伊塞克湖州占主导；“尊严”党在比什凯克市相对占优；塔拉斯州的统计结果显示，该州坚定支持“阿塔—梅肯”（祖国）党，不过该州下属的每个地区对其他党派的支持也比较明显；“共和国”党在全国各地都获得了比较均衡的选票；在南部，“故乡”党处于主导地位，但

① Победа «Ата Журт»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доверие к власти Киргизии ослаблено: мнения экспертов// ИА REGNUM. 11 октября. <http://www.regnum.ru/news/1334776.html>

② Выборы депутатов Жогорку Кенеша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Сведения о получении итоговых протоколов от избирательных комиссий. <http://cec.shailoo.gov.kg/> (accessed December 28, 2010.)

是“统一吉尔吉斯斯坦”党和“尊严”党也是其重要的竞争对手；“尊严”党在乌兹别克人聚居的地区有很多支持者。显然，地区因素的影响仍在，但是没有明确的划分。

在选举的最终结果宣布之后，社会民主党、“共和国”党和“阿塔—梅肯”（祖国）党，同意在2010年11月30日建立一个政党联盟。这个看似顺理成章的联盟（曾是临时政府的核心基础）迅速夭折。“阿塔—梅肯”（祖国）党的捷克巴耶夫（Tekebaev），被政党联盟提名为议会主席，却因一些议员对联盟的背叛，没有获得足够的选票。^①最后，社会民主党、“共和国”党和“故乡”党，在12月17日成立了执政联盟（第一执政联盟）。阿·阿塔姆巴耶夫（Almazbek Atambaev，社会民主党）当选为总理，奥·巴巴诺夫（Omurbek Babanov，“共和国”党）当选为第一副总理，阿·克尔季别科夫（Akhmatbek Keldibekov，“故乡”党）为议会议长。

尽管这三个政党都承诺，至少在两年内不会退出该联盟^②，但这个执政联盟仍然不稳定，因为其中的两个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共和国”党）曾经领导过临时政府，而另外一个党（“故乡”党）吸收了巴基耶夫政权的前官员。此外，那些不能加入执政联盟的政党，蔓延着不满的情绪。这些因素引发了2011年3月的执政联盟危机，当时“阿塔—梅肯”（祖国）党攻击巴巴诺夫，还有很多“故乡”党籍的议员威胁要退出执政联盟。“尊严”党则试图利用这一境况谋求己利，扩展权限。^③尽管暂时渡过了危机，但在10月30日的总统大选之后，很显然，执政联盟已经无法维系下去了。在这次选举中，阿塔姆巴耶夫击败了来自“故乡”党的卡·塔希耶夫（Kamchybek Tashiev）以及其他候选人。社会民主党、“共和国”党、“尊严”党和“阿塔

① 至少有两位祖国党的议员表示反对。参见 Два депута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сообщили, что голосовали против Текебаева// АКИпресс. 3.12.2010. <http://kg.akipress.org/news:299271>

② О.Бабанов: Члены коалиции договорились не выходить из нее в течение 2-х лет// АКИпресс. 16.12.2010. <http://kg.akipress.org/news:304241>

③ Вице-премьер Бабанов видит в критике Текебаева попытку разрушить коалицию//АКИпресс. 04.03.2011. <http://kg.akipress.org/news:339491>; Депутат К.Ташиев считает, что коалиция в данный момент работает только на «ниточках»// АКИпресс. 09.03.2011. <http://kg.akipress.org/news:340631>; Кулов считает, что должна быть создана широкая коалиция из 4 фракций с привлечением партий, не попавших в парламент//АКИпресс. 11.03.2011. <http://kg.akipress.org/news:341421>

—梅肯”（祖国）党，同意在 2011 年 12 月 16 日组成一个新的执政联盟（第二执政联盟）。一周后，议会选举巴巴诺夫（Babanov）为总理。议会中拥有最多席位的“故乡”党，则成了反对派（该党内有 7 名议员表示愿意同执政联盟合作）。^①

“故乡”党的退出，使得该联盟稍加稳定。社会民主党和“共和国”党，有时被称为“同源政党”^②（Kindred parties）（巴巴诺夫之前属于社会民主党）。两党通常合作紧密，但时而在地区层面上有摩擦。^③但这两个政党与加入执政联盟的前反对党（“阿塔—梅肯”祖国党和“尊严”党）的关系糟糕。2012 年 6 月，“阿塔—梅肯”（祖国）党和“尊严”党的一些议员，发动了一个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由于假期的关系，该动议被推迟到秋天审议。^④

（二）低迷的政党凝聚力

吉尔吉斯斯坦的党派之间和各党派之内，都存在冲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吉尔吉斯斯坦，议会党派之间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上的差别。按照官方的说法，“阿塔—梅肯”（祖国）党是社会主义政党，而社会民主党属于社会民主主义。但只有在具体的议题上，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才隐约体现在党派的政策中。“故乡”党自称为“爱国政党”，比起其他政党来说，更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当然其他政党中也有民族主义者。“共和国”党和“尊严”

① Блок «За реформы» фракции «Ата-Журт» принял решение 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с коалицией// АКИпресс. 16.12.2011. <http://kg.akipress.org/news:458401>. 相反，执政联盟党内的两名议员（一位来自“尊严党”，一位来自“阿塔—梅肯”祖国党）宣布他们不参加执政联盟。这种个人性的决定是否具有合法性，也是有疑问的。参见Депутат от «Ар-Намыса» Бодош Мамырова заявила, что не вошла в коалицию// АКИпресс.16.12. 2011. <http://kg.akipress.org/news:458411>; Депутат от «Ата Мекена» Ш.Айтматова заявила о выходе из коалиции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АКИпресс. 28.12.2011. <http://kg.akipress.org/news: 463061>

② Фракции СДПК и «Республика» составят основу будущей коалиции большинства, считает лидер фракции «Республика» К.Исаев// АКИпресс. 05.12.2011. <http://kg.akipress.org/news: 453231>

③ Парти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обратилась в суд с требованием отменить решение Токмокской ТИК о пересчете голосов// АКИпресс. 10.03.2012. <http://kg.akipress.org/news:490171>

④ В Жогорку Кенеше начался сбор подписей для инициирования вопроса о выражении недоверия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у// АКИпресс. 21.06.2012. <http://kg.akipress.org/news:539741>; Вопрос выражения вотума недоверия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у отложен на осень// АКИпресс. 29.06.2012. <http://kg.akipress.org/news:544031>

党没有意识形态基础。

政党的特点更多地取决于领导人。有些政党成立于阿卡耶夫时期，另一些则是最近几年成立的。但就算是一些相对而言较老的政党，其领导层也在二次革命后发生了相当大的人事变动。首要的原因，是为了吸收小党，以便在选举中跨过门槛线的要求。毫不夸张地说，直到巴基耶夫时代，几乎每一个有野心的政客都有自己的政党，但是现在的主要政党都有几个或更多具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从一方面讲，这是政党发展的一个正常过程，即政党不再那么人格化；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纪律涣散、政党成员任意而行等问题。

这种混乱在“故乡”党和“尊严”党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故乡”党是在2010年大选前夕，由曾在巴基耶夫手下任职的官员和政客们组织起来的。由于没有了一个绝对的领导人，党内有影响力的成员都不愿服从他人。当“故乡”党、社会民主党和“共和国”党首次建立执政联盟的时候，“故乡”党的领导人萨·贾帕罗夫（Sadyr Japarov）和马·苏尔坦诺夫（Marat Sultanov）宣布他们不会加入该联盟，但留在该党的议员团内。^①在那些惯于独断专行的政客之间，针对议案和解决方案的不同意见随时可见。如塔希耶夫（Tashiev）、克尔季别科夫（Keldibekov）、贾帕罗夫（Japarov）以及卓尔多舍娃（Jyldyzkan Joldosheva）等人。2011年3月31日，塔希耶夫这位性情暴躁的人，打伤了他的同党成员和巴·苏雷曼诺夫（Bakhadyr Suleimanov）议员。第二天，塔希耶夫又同一位“共和国”党的议员阿·苏赖曼诺夫（Altynbek Sulaimanov）打了一架。在2011年的总统大选中，“故乡”党竟然有三名成员（塔希耶夫，苏尔坦诺夫和奥什莫诺夫（Kurmanbek Osmonov））参加角逐（苏尔坦诺夫在后期退出）。^②

另外一个问题重重的政党是“尊严”党。该党是由库罗夫（Feliks Kulov）创立的个人色彩浓重的政党。2010年，该党吸收了一些拥有不同背景的政客。在组成第一执政联盟的谈判中，库罗夫试图取得总理职位未果，于是他

① Депутат «Ата-Журга» Садыр Жапаров отказывается от вхождения в коалицию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АКИпресс. 17.12.2010. <http://kg.akipress.org/news: 304451>; Депутат Марат Султанов заявил, что не войдет в коалицию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АКИпресс. 17.12.2010. <http://kg.akipress.org/news: 305121>

② Кандидат в президенты М.Султанов снимает свою кандидатуру// АКИпресс.03.10.2011. <http://kg.akipress.org/news: 425111>

决定留在反对派阵营，但是该党的许多议会党团成员对此持异议。2011年4月14日，25位“尊严”党代表中的10位，在没有退出议会党团的情况下宣布加入执政联盟。^①库罗夫、“尊严”党以及执政联盟代表之间反反复复的谈判，令各方筋疲力尽，无果而终。当“尊严”党的议会党团成员投票解除库罗夫在议会党团的领导职务时，“尊严”党站在了分裂的边缘。^②最终，“尊严”党在参加第二执政联盟的过程中，实现了重新整合。

资历最老的“阿塔—梅肯”（祖国）党（成立于1992年），也有内部冲突。该党的长期领导人捷克巴耶夫，对自己的观点总是很自信，与党内一些成员有冲突。其中两位议员，拉·叶延别科夫（Ravshan Jeenbekov）和阿卜杜拉克曼诺夫（Omurbek Abdrakhmanov），在2012年3月被开除党籍。^③

（三）作为利益集团的各个政党

尽管政党内部存在矛盾，但各个政党仍有资源以保持吸引力。如，有很多职位资源，包括选举委员会、法官遴选委员会，以及监督国家机关和媒体委员会等机构的职位。就在第一执政联盟成立之前，一张列有部长、州长和国有企业负责人在各党之间的分配清单，被泄露在互联网上。^④这份清单的来源尚未搞清，但是此后相当数量的职位任命与之相符。在第二执政联盟建立以后，一位来自“尊严”党的议员批评“共和国”党和社会民主党，因为据说他们已经把大部分地区长官的职位分配给了其追随者。^⑤

① 10 депутатов от фракции «Ар-Намыс» приняли решение о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и к коалиционному большинству Жогорку Кенешай// АКИпресс. 15.04.2011. <http://kg.akipress.org/news:356601>. 此举对社会民主党和“共和国”党有利，帮助二者保住了联盟。参见 День 15 Апреля: У генерала сбежала армия// АКИпресс.15.04.2011. <http://kg.akipress.org/news:357031>

② Лидером фракции «Ар-Намыс» вместо Ф.Кулова стала К.Талиева, - заявляет член фракции// АКИпресс.13.09.2011. <http://kg.akipress.org/news:416571>

③ Депутатов Р.Жээнбекова и О.Абдрахманова исключили из рядов партии «Ата Мекен»// АКИпресс.19.03.2012. <http://kg.akipress.org/news:493341>

④ В интернете появился некий список, в котором дан перечень министерств и ведомств, распределенных между фракциями, образовавших коалицию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АКИпресс.17.12.2010. <http://akipress.org/comments/news:4631>

⑤ Фракции СДПК и «Республика» поделили должности акимов, среди них нет ни одного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 «Ар-Намыса», - депутат А.Калматов// АКИпресс.24.04.2012. <http://kg.akipress.org/news:510981>

政党也有商业利益。“共和国”党和“阿塔—梅肯”（祖国）党之间频繁的冲突，据说是因为原本属于“阿塔—梅肯”（祖国）党的赚钱买卖被“共和国”党所占据。两党为商业利益冲突的结果是，2010年12月他们与社会民主党试图共同建立的执政联盟失败。^①2011年3月，总统奥通巴耶娃（Roza Otunbaeva，社会民主党）在“共和国”党和社会民主党的要求下，解除了前“阿塔—梅肯”（祖国）党领导人之一拜博洛夫（Kubatbek Baibolov）代理总检察官的职务。据称，拜博洛夫是“阿塔—梅肯”（祖国）党的主要经济支持者，其被解职的理由是他与巴基耶夫儿子控制下的一家电信公司有秘密交易。^②拜博洛夫随后对奥通巴耶娃、阿塔姆巴耶夫、巴巴诺夫、克·杜舍巴耶夫（Keneshbek Dushebaev，时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等进行指控，控告他们有数种罪行，但是没有一项有确凿的证据。^③巴巴诺夫在步入政坛之前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反对派批评他滥用政治职权，为其政党谋取经济利益。^④这些事件及指控虽然丑陋，但是却表明了政党作为利益集团的功用。

（四）权力机关之间的竞争

二次革命以后，议会频繁重新审议由政府发起的议案，以及被总统否决的议会法案（奥通巴耶娃任总统时期使用否决很频繁）。从一个方面讲，这是制衡的正常做法；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暗示着不仅政党之间有竞争，权力机构之间也不和谐。

一些议员（包括来自执政联盟内部的议员），经常批评总统奥通巴耶娃，认为她有越权行为。2011年2月初，在大部分议员的支持下，议长克尔季科夫建议总统奥通巴耶娃撤销针对比什凯克市长选举的声明，认为她没有

① Кыргызбай кырчынбеков. За чей счет была профинансирована предвыборная кампания партии «Ата-Мекен»?// Фабула. №14.18.03.2011. <http://www.gezitter.org/economics/1869>

② Обращение двух фракций были учтены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чего К.Байболов был освобожден от должности, - депутат К.Исаев// АКИpress.31.03.2011. <http://kg.aki.press.org/news:349901>

③ Кыргызстан: Бывший Генпрокурор обвинил ГКНБ,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и президента в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х нарушениях//Фергана. 06.04.2011. <http://www.fergananews.com/news.php?id=16584>

④ 如 ОНС при Госалко заявляет о причастност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партии «Республика» к попытке ликвидации ведомства// Tazabek. 02.09.2011. <http://www.tazabek.kg/news:226931>

这个权力，但总统没有听从。^①2011年夏，总统与议会之间在中央选举委员会以及法官遴选委员会等事情上发生冲突，使得二者的关系十分紧张^②。

有些时候，议会议员想要加强议会权力的野心过于膨胀。2011年11月，议会宪法和法律事务委员会，通过了由“故乡”党议员提出的一项修正案，规定议会的决议高于总统的法令。但此修正案未能被提交到全体大会上。^③有意思的是，很多“故乡”党成员是支持总统强权的，但是作为议员，他们则尽力去削减来自社会民主党的总统的权力。

议长克尔季别科夫的特点是野心勃勃，战斗欲强。有时候，他甚至拒绝让政府代表发言。^④克尔季别科夫的任意妄为，以及他对法规的忽视，使得他在议员中口碑不佳。在四个政党（“阿塔—梅肯”（祖国）党，“尊严”党，社会民主党和“共和国”党）的联合压力下，他于2011年12月辞职。^⑤

在克尔季别科夫的继任者阿·叶延别科夫（Asylbek Jeenbekov）任议长期间，议会与总统和总理之间的关系日趋稳定（也有不和谐的地方，即当个

① Парламент рекомендует президенту отменить выборы мэра Бишкека в целях соблюдения Конституции// АКИpress.03.02.2011. <http://kg.akipress.org/news:325111>; Р.Отунбаева: Решение о проведении выборов мэра города Бишкек является целесообразным и полностью соответствует закону о МСУ// АКИpress.04.02.2011. <http://kg.akipress.org/news:325411>

② 萨利耶夫（Akylbek Sariev），前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总统奥通巴耶娃全力支持其连任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一职，不过议会没有通过，但他在一段时间之后才承认其失败。参见 Члены действующего и нового составов ЦИК не могут решить кто из них правомочен работать и проводят два параллельных заседания// АКИpress.04.07.2011. <http://kg.akipress.org/news:391581> 议会宣布解散挑选法官的委员会，然而奥通巴耶娃面试了法官候选人，拒绝了许多人。这些都不符合规定。参见 Президент и парламент в пылу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подвергают угрозе принципы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судов, - Правозащитники// АКИpress.04.07.2011.16.08.2011. <http://kg.akipress.org/news:406721>

③ Комитет ЖК одобрил закон, по которому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арламента будет считаться выше указа президента// АКИpress.22.11.2011. <http://kg.akipress.org/news:447631>; Депутат К.Абдиев снял с повестки заседания закон, по которому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ЖК будет выше указа президента// АКИpress.24.11.2011. <http://kg.akipress.org/news:448951>

④ Полпред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в ЖК Д.Нарымбаев: Спикер парламента сужает сферу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с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АКИpress.21.02.2011. <http://kg.akipress.org/news:334171>

⑤ Фракция СДПК намерена обратиться в Комитет по этике и регламенту по поводу нарушения спикером Регламента Жогорку Кенеша// АКИpress.31.05.2011. <http://kg.Aki.press.org/news:375731>; Спикер Жогорку Кенеша Ахматбек Келдибеков подал в отставку// АКИpress.12.12.2011. <http://kg.akipress.org/news:456271>

别议员被指控犯罪的时候，其他议员会与之站在一起，反对控告)。^①叶延别科夫与阿塔姆巴耶夫总统（他们都来自社会民主党）的关系明显较好。作为议长，叶延别科夫帮助议会通过法案，赋予总统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权力，其宣称的理由是，“政党联盟不是永恒的，其组成部分在不断改变。因此，应该由民选的总统来引导外交政策”。^②

三、结论

二次革命已经过去两年多了，吉尔吉斯斯坦的政局仍然不明晰。但是与郁金香革命结束后的两年比较起来，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那时，政治谋杀时有发生，犯罪集团猖獗，反对派经常组织群众集会，巴基耶夫通过镇压和分化反对派的方式来封锁改革。而二次革命之后，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里（尽管南部地区在2010年6月经历了一场较大范围的族际冲突），政治暴力得以止息，并且政治改革和选举基本是在按时间表进行。

郁金香革命的发生，与当时吉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在南部）持续进行的超过一个月的民众集会抗议直接相关。民众动员需要财源（以及犯罪集团的一些帮助），当时反对派找不到一个比巴基耶夫更合适的总统人选。巴基耶夫是一个来自南部的财力雄厚的政客，但很明显并非民主人士，而且带有苏维埃式的、任人唯亲的领导作风。而二次革命在抗议活动发生后仅两天的时间里就爆发了，那些自发上街的人群也参与了这次革命。与五年前那场革命相比，这一次的领导层不那么富有，与犯罪集团之间也少有瓜葛，而且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基本平等。很明显，他们不希望重蹈郁金香革命的覆辙。

如今，各政党和权力派别之间的政治斗争，是用一种可以称得上制度化的方式公开进行的。反对派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运用群众动员的手段。塔希耶

① Комиссия по уголовному делу депутата Исхака Пирматова: Обвинения Генпрокуратуры ничтожны// АКИpress.26.03.2012. <http://kg.akipress.org/news:496221>

② Спикер А.Жээнбеков: Внешнюю политику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должен вести президент страны// АКИpress.16.03.2012. <http://kg.akipress.org/news:493061>; Жогорку Кенеш принял закон, по которому внешнюю политику будет определять президент// АКИpress.29.06.2012. <http://kg.akipress.org/news:543711> 宪法（第88条）规定，政府落实外交政策，但是并没有明晰谁（政府，总统还是议会）确定外交政策的总方针。

夫和马杜马罗夫 (Madumarov) 尽管对 2011 年 10 月的总统选举结果不满, 但当时还是克制着没有发动群众抗议。他们宣称要在 2012 年春季在全国范围内组织集会, 但实际上他们只能在南部 (3 月 1 日在奥什, 以及 4 月 10 日在贾拉拉巴德州) 把群众召集起来, 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支持者基本上仅限于南部地区。另外, 作为反对派代表的“故乡”党, 在议会里有着相当分量的话语权, 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紧张与对抗。

当然, 2010 宪法所设计的政治体制并不是完美的。截至目前, 总统和总理之间平安无事, 但是吉尔吉斯斯坦没有一个宪法机制能解决他们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执政联盟不够稳定, 议会也由于自身的混乱而日渐失去民心。总统阿塔姆巴耶夫在道义上和制度上巩固了他的权力 (上文曾提到, 他有权领导国防、安全与外交事务), 但还是有很多机制来阻止总统任意滥用职权。到目前为止, 吉尔吉斯斯坦似乎已经避免了激烈的反弹。

(杨茗 译)

【 Abstract 】 In April 2010, the “second revolution” took place in Kyrgyzstan and it selected the Premier-Presidentialism as its political system. The status of parliament rises and the presidential power has been restricted despite considerable weight and influences. Such a choice, in part, lies in the fact that several former presidents have established authoritarian regime, failing to achieve the stability of the Kyrgyz regime. This new system is obviously not perfect.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parties within the parliament, the strife within each party and conflicts between the president and premier are still very tense. Especially the ruling coalition within the parliament is not stable enough. In addition, there is no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 in how to coordinate and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sident and premier. A positive phenomenon is that the trend after the second revolution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after the Tulip Revolution, largely due to the Kyrgyzstan parliamentary party system, which enables the competition in all aspects to start publicly in an institutionalized manner. A certain order could be found in disorder.

【Key Words】 Premier-Presidentialism, Institutional Design, President, Parliament, Party

【Аннотация】 В апреле 2010 г.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произошла «втор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которой была установлен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система в форме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президент, повысился статус парламента, президент стал иметь ограниченные полномочия, но сохранил за собой всё ещё значительный вес и влияние. Данный выбор был отчасти обусловлен тем, что нескольким предыдущим президентским авторитарным режимам не удалось добиться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режима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эта новая система не идеальна, по-прежнему очень напряжена конфронтация между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и партиями в парламенте,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 внутренние раздоры внутри сам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много споров между премьером и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особенно ещё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стабильна правящая коалиция в парламенте, нет никаких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ых гарантий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и равновесия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и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ом.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м моментом является то, что тенденция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значительно лучше, чем ситуация после тюльпан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это во многом благодаря созданию партийной парламент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приведшей к тому, что конкуренция по всем аспектам начала иметь открытый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изированный характер, что позволяет увидеть определенный порядок в беспорядке.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президентская система,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ая конструкция, президент, парламент,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责任编辑 肖辉忠)

去俄罗斯化、在地化与国际化：后苏联时期中亚 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生成和巩固路径解析*

杨成**

【内容提要】苏联解体以来，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构建与巩固往往表现为三位一体的集合式路径——“去宗主国（俄罗斯）化”、“在地化”和“国际化”，其中“去宗主国化”为核心，“在地化”和“国际化”均构成一体两面的关系，而“在地化”与“国际化”则形成了相互补充的关系。三者在同一个政治场域（或在单个国家或在国家集合）内围绕具体议题密切互动，逐步培养出新的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以历史书写为例，中亚各国在后苏联时期的族史/国史重构的主线是加大对于主体民族辉煌历史及其英雄人物的塑造的“在地化”路径；其背后则是更突出的是“去俄罗化”取向，以清除昔日统治者的历史书写的记忆；加大对于世界史和国际史的书写和教学的“国际化”导向同样是为消解“苏联人”的身份认同，进而确立中亚国家身为独立行为体的事实。以政治空间的变迁为例，哈萨克斯坦新首都阿斯塔纳的建设以及中亚其他城市空间的变化都是各国政府有意识地利用其内的符号变迁塑造新的身份认同的手段。新的国家价值等被嫁接到新的空间内，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上海合作组织的中长期前景研究”（项目批准号：11JJDGJW011）、“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项目批准号：05JJDGJW039）和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俄关系的中长期前景研究”（项目批准号：08BGJ003）的阶段性成果。本文的早期版本曾于2012年6月22日提交给清华大学—新疆大学中亚发展研究中心第一届中亚发展论坛“后危机时代的中亚：转型与建构”。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建议。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封帅、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孙超等参与了相关讨论，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意见，笔者在此一并致谢。

** 杨成，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俄罗斯研究》副主编，副教授。

阐明了与旧制度的断裂关系，以保证新的政治性质和新的国家图景得以实现。在教育领域，中亚国家的话语与政策迅速实现了从社会主义教育到趋于新教育体系的转移，国际教育的拓展成为清除旧体制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它们更加注重本土资源的外部依赖所在。伊斯兰复兴和国家重生在中亚国家成为相互交织的同步进程。对它们而言，伊斯兰教在很大程度上担当了“去俄罗斯化”与“国际化”的前驱，意味着一个国家自我识别的手段，一种将自身从莫斯科获取精神解放的工具，一种剥离共产主义体系和作为外国殖民统治标志的斯拉夫文化的门径。整体而言，苏联解体后，中亚在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不再被视为由外部大国或某些集团选定的集体符号，进而被其用来主导地理世界上某些具体的地域，而是一个拥有自我动力、逻辑并在外部冲击下自主反应的、由单个国家组成的集体行为体。目前，中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塑造伴随着三种一体化进程：一是曾经共属一个单一制国家或殖民帝国的新独立国家倡议的、初始阶段即已拥有较高程度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依赖的维系式一体化；二是当下俄罗斯正在推动的捆绑式一体化；三是初显轮廓、前景远不确定的以欧盟为样本的聚合式一体化。在某种意义上，维系式一体化先验地暗含着退化性；捆绑式一体化则容易引发国家/民族构建与一体化本身间的矛盾，从主权让渡的自觉性视角看可能因主导大国的强制力而包含着一定的退步性；聚合式一体化因其照顾到成员国的平等地位和强调一体化演化的自然特征而具有进步性。这三种范式彼此共存，并且频繁地相互影响，直接造就了中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总之，在原有的苏联身份终结之后，新独立的中亚五国通过时间（历史书写）、空间（城市和符号建设）和人（宗教与教育）的三重重构等方式，推动以“去俄罗斯化”和“在地化”及“国际化”互为表里的国家身份再造进程。与此同时，中亚国家也在努力建构自己的地区认同，但民族/国家认同与此构成的张力使得它们形成了碎片化的集体身份。

【关键词】 中亚 国家身份 去俄罗斯化 在地化 国际化 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 D73/77(36)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 (2012) 05-0093-(67)

一、导言

关于国家之命运，尤其是国家构建的各类形式一直为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研究者所关注。^①尽管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已死”的声音不断出现，但对于国家及国家构建的争论从未停止。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催生了一系列新独立国家，更使得以民族/国家构建为核心的研究一时成为国际学界的显学。每一个新独立国家都成了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的典型案例。中亚五国在此意义上尤为重要。

本文所使用的中亚新独立国家的个体身份与集体身份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其中个体身份指的是从苏联晚期开始萌芽并在苏联解体后的多重转型过程中处于演化状态的民族/国家认同，它的首要任务是在意识形态上将中亚各国的主体民族用全新的信念、神话和历史建构成为一个现代民族，以利于国家构建过程中的动员。而本文所指涉的集体身份是指中亚国家对于自身所在地区的认同，即从中亚的“地区性”视角入手，由中亚国家在一个被卡赞斯坦描述为“地区构成的世界”^②（A World of Regions）中对其所属地区的忠诚度与凝聚力构成。这种集体身份塑造着成员国的利益预期、政策取向与共同意识，往往体现为因地区组织建立与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经济、乃至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和文化方面的相互认可和相互依赖的不断递增而造就的日益固化的特殊归属感。

在笔者看来，研究中亚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形成与巩固必须考虑到以下几个时代背景：

第一，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构建与巩固产生于同此而生的国际范围内的权力转移与体系变迁的时空结构的转换过程。1990 年前后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骤然崩毁无疑是中亚国家民族/国

① 参见 Каспэ С.И. Центры и иерархи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ые метафоры власти и западн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форма. М. 2007; Ильин М.В. Формул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Политика. 2008. № 3.

② Peter J. Katzenstein, *A World of Regions: 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中译本参见[美]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秦亚青、魏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

家认同被激发的最重要外部动力之一。^①换言之，两极格局的突发终结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的国际和地区权力格局，共同为中亚国家新的民族/国家/国际身份的转换准备了全新的外部环境。自独立伊始，中亚国家就再也不是完全处于莫斯科庇护之下的微不足道的国际和地区角色。鉴于这些国家所处的至关重要的地缘政治空间，外部力量蜂拥而至并相互竞合的实际状态也决定了中亚新独立国家拥有前所未有的博弈地位。^②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与外部世界隔绝彼此的铁幕和藩篱已被拆除，横亘于过往时代的冷战意识形态疆界即便不是完全不复存在也被高度稀释。中亚五国从此深深嵌入到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议程之中，成为其不可分离的一部分。^③这种新的历史现实对中亚各国民族/国家构建及其个体与集体身份产生了显性/隐性的制约。

第二，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所有在苏联解体后获得主权的国家都面临着重新构建民族与国家的迫切任务。这种双重使命规制下的民族化和现代化的双重任务内在决定了中亚国家身份认同获得的艰巨性。中亚国家一方面需要重新建构起一个名义上古老、实质上崭新，既区别于沙俄、又不同于苏联时期的民族界定的新的民族与国族，另一方面还需要使植根于该民族和国族基础上的新独立国家实现现代化。这种双重性先验地蕴含着一定的内在两难困境，因为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历史和传统资源，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建立起民族/国家的主体性；而现代化则更多地是要摆脱传统，学习先进的现代文明，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找寻到属于自我

① 冯绍雷、邢广程等知名学者在近年来的一批文章中强调了欧亚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转换和全球权力转移对各种国际关系行为体内外政策的强烈影响。参见冯绍雷：“多重三边关系影响下的中亚地区”，《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6期，第7-14页；冯绍雷：“十年巡礼——关于上海合作组织的未来、定位与空间的思考”，《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2期，第3-7页；邢广程：“中亚的利益取向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6期，第3-6页；波波·罗：“俄罗斯、中国及中亚的权力制衡：融合还是竞争？”，2009年第6期，第43-48页；Yang Cheng, “The Shanghai Spirit and SCO Mechanisms: Beyond Geopolitics”, in Michael Fredholm (ed.),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Eurasian Geopolitics: New Directions, Perspectives, and Challenges*, NIAS Press, 2012.

② 参见杨成：“形成中的中亚地区格局：尚存的单极残余、不稳定多极和其他选择”，《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6期，第15-17页。

③ 参见Pauline Jones Luo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Central Asia: States and Societies from Soviet Rule to Independen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的现代性。可以说，这种民族构建与国家构建平行进行的双重进程塑造了中亚新独立国家身份认同养成中的矛盾、困惑、变奏与演化。

第三，中亚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生成和巩固的突出背景在于它们是在一个“后现代”和“全球世界”生成的时代建设现代国家。^①肇始于 1980 年代以来并于 90 年代加速发展的新一波全球化浪潮同样构成了中亚国家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外部要素。一方面，全球化浪潮在相当程度上消解了国家的边界，这对于新近成为国际关系行为体的中亚国家来说无疑是挑战性力量，不利于其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形成与巩固；另一方面，全球化所包含的开放性、国际化、趋同性都不可避免地渗透进中亚国家的国家性格之中，成为中亚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构建的力量源泉之一。整体而言，如何应对全球化的冲击，如何协调民族/国家认同与地区乃至全球认同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都刺激了中亚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培育进程。

第四，中亚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养成与巩固是与这些国家的多重转型相伴相生的，至今仍处于进行之中。^②一方面，外部大国更多关注自身在中亚的存在及本国利益的实现，而较少致力于推动中亚国家的真正转型。^③尤

① Бляхер Л. Е., Казима С. А.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между Тамерланом и Атагюром. Конструирова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в эпоху Постмодерна// Политика. 2009. № 1. С.94-95.

② 转型依然是一个难以回避的核心命题。在此问题上形成了“转型终结论”和“转型进行时”两种范式：前者如 Boris Rumer《结束转型的中亚》（*Central Asia at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一书中认为，中亚各国的系统转型进程（the process of systemic transformation）大部分已经完成，中亚的基本结构从政治到经济已基本建立，在此意义上，转轨阶段（the period of transition）已走向终结。（参见 Boris Z. Rumer, *Central Asia at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NY:M.E.Sharpe, Inc, 2005, pp.3-5.）而“转型进行时”的论点显然有更多的支持者，其基本共识是：中亚各国在转型指标谱系中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吉尔吉斯斯坦相对在民主转型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而其他四国则在制度设计和运行中或多或少掺杂着“威权体制”的要素，国家和当局介入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痕迹较为明显，而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甚至演变为专制体制。作为一个进程，中亚国家远未完成设定的初始任务，今后仍将需要较长时间。笔者认为，中亚国家尽管转型迄今已 20 年有余，但各国当下依然处在一种“不稳定”的发展状态之中，相应地，各国转型进程仍在持续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③ 以美国为例，安集延事件之后的美乌关系已经充分展示出，中亚国家的体制类型尽管是美国长期关注的问题，但美更在意的是获取现实的安全和能源等利益。笔者个人的感觉是，西方在话语上强调民主扩展，但在实际的体制嬗变方面更多是顺其自然，而非一味强力推动。

其是俄罗斯，作为原先欧亚地区的制度提供者，受制于自身实力和本身作为转型国家的身份，以及由此决定的与中亚各国的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处于同一层次现实，并没有足够资源帮助中亚新独立国家实现“转型”，也不足以提供经验样板。^①另一方面，中亚国家囿于苏联制度遗产、部落文化传统等自身的非正式制度等制约因素，缺乏足够的内生转型动力，其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与其他新独立国家相比最为艰难，始终处于各种内外威胁之中。比如塔吉克斯坦持续数年的内战、费尔干纳盆地的流血冲突、吉尔吉斯斯坦的数次政权更迭、引起广泛国际关注的安集延事件……这些具有强大破坏力的突发事件显然影响了中亚各国个体与集体身份的养成。

此外，中亚发展的不稳定状态和转型的不确定性，与其日益成为新的全球边缘地带的现实密切相关。中亚-里海地区能源资源丰富，在国际市场需求不断增加的背景下，为相关国家贡献了较多的经济增长，但也因此进一步固化了原材料依附型经济模式和单一化的贸易结构，寻租及与之相伴相生的腐败问题成为“资源诅咒”的显性调整，牵制甚至是绊住了中亚转型的制度优化进程。^②

第五，中亚各国复杂的地缘文明环境在苏联解体之后得以释放，中亚因成为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四大文明的交汇地带使得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生成和巩固面临着一定意义上的选择困境和整合困境。可以说，处于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东西方文明交融与竞争的结合部状态，在相当程度上是决定中亚新独立国家的民族与国家命运的基本出发点，是规制其历史进程和发展方向，包括国家身份养成的长程要素。从文明变迁的角度来看，中亚新独立国家在苏联解体后的个体与集体身份构建进程中发生的波折、冲突、混乱与转机，与该地区的地缘文明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第六，一般而言，单一国家都是在个体身份已经基本定型的情况下通过参与地区一体化而获得新的集体身份，而中亚遵循的却是另外一种逻辑，即是通过“去一体化——再一体化”的方式重新生成后苏联时期的集体身份。

① Olivier Roy, *The new Central Asia: the creation of nation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p.viii.

② 德国学者对此问题有较为精辟的分析。参见[德]J·库兹涅尔：“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精英及其对能源政策的影响”，《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1期，第125-153页。

诚然，中亚国家在后苏联时期的转型已经深深地嵌入到欧亚地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转型的大格局中，受到外部大国和外部环境的强烈塑造。^①但中亚作为国际和地区事务行为者的主体性已经越鲜明地呈现出来，这一点不容忽视。^②由于中亚国家的转型迄今尚未最终完成，而帝国及其传统在短短二十年的时间内也难以彻底消除，时下的中亚各国无论是在个体还是在集体身份问题上都包含着难以超越和摆脱的多元性，即各种身份认同——前苏维埃主义、苏维埃主义和后苏维埃主义——处于相互交织、彼此杂糅、竞相竞争的混沌状态。前苏维埃主义对中亚国家而言是一种历史记忆，苏维埃主义则是一个历史遗产，而后苏维埃主义则是一种历史综合征，体现为新独立国家对自己的民族/国家身份的孜孜以求。^③

苏联解体以来，国际学术界对中亚新独立国家的民族/国家构建问题的讨论已有较为丰富的文献积累，但其路径基本上都是描述性的，多未能就各国个体身份和集体身份的生成与巩固方式，尤其是这两种身份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深入的研究。而国内研究则更多关注大国博弈议题，较少把中亚国家的个体与集体身份作为研究客体。^④在这种学术语境下，如同一般意义上的地区与国别研究，由于其通常将现代国家作为分析单位，而把本来十分不稳定的国家身份因素视为不变的因素，并将之具体化。^⑤本文试图克服这一缺

① 参见 Yang Cheng, "The Shanghai Spirit and SCO Mechanisms: Beyond Geopolitics", in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Eurasian Geopolitics: New Directions, Perspectives, and Challenges*, Edited by Michael Fredholm, NIAS Press, 2012.

② 参见杨成：“形成中的中亚地区格局：尚存的单极残余、不稳定多极和其他选择”，《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6期，第36-40页；杨成：“小国主体意识增强 地区价值日益凸显 中亚地区复合权力架构正在形成”，《文汇报》，2012年10月16日；杨成：“‘马上吃羊’还是‘姑娘追’？中亚维稳须抛弃‘大博弈’老调”，《文汇报》，2012年10月16日。

③ Farkhod Tolipov, "Pre-Soviet, Soviet and Post-Soviet Central Asia: The Case of Uzbekistan", in Suchandana Chatterjee and Anita Sengupta (eds.), *Communities, Institutions and 'Transition' in Post-1991 Eurasia*, Shipra Publications, 2011, p.106.

④ 以《俄罗斯研究》为例，2001年至2012年第4期共发文662篇，其中部分涉及或专论中亚的文章有65篇；以《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为例，2001年至2012年第4期共发文1240篇，其中有关中亚的文章160篇。上述刊物发表的中亚研究文章主要的议题集中在大国关系、能源政治、上海合作组织，少量论及中亚的宗教、民族等问题。笔者用“中亚”、“身份”，以及“中亚”、“认同”作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收录的CSSCI期刊检索结果为“0”。

⑤ [美]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秦亚青、魏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序言第3页。

陷，尝试以身份认同作为核心概念，就中亚各国的国家（个体）身份和地区（集体）身份的养成问题建立起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在具体案例中做一个较为细化的分析。

长期以来，有关民族/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范式：一是本质主义的，它认为民族/国家认同是某种自然的、原生性的东西，是历史的自然单位和人类经验的整合性要素，能够以客观标准——如人种、血缘、语言、宗教、风俗、文化、聚居地——等指标来衡量。对于个体而言，这些身份是被直接赋予的基因，无法被否认和改变；二是结构主义的，它认为集体认同是因为不公平的社会结构，剥夺了一群人应有的政治权利、经济资源、文化表现或是社会地位，因而将原本松散的他们凝聚为族群，甚或民族。三是建构主义的，它认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并不是人类社会形成时原初的产物，而都是一种历史和社会的建构。其基本假设是：第一，民族/国家是心灵建构出来的，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第二，民族/国家认同是社会认同的一种特殊形式，它经由语言和其他象征符号系统生产、再生产、转型和解构；第三，民族/国家认同永远与差异建构、特殊性建构相关；第四，并不存在单一的或唯一的民族/国家认同。它不是恒定不变的，而往往受具体情势的制约而呈现动态性、脆弱性、不一致性。^①从当前的国际学术潮流看，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特征日益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本文的研究主要也是在这一理论范式的指导下进行的。

本文框架结构如下：第一部分为导论，介绍选题的学术价值和研究目的；第二部分在分析政治身份与身份政治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整合的分析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分析框架，提出“去宗主国（俄罗斯）化”、“在地化”和“国际化”三位一体的国家身份建构路径；第三部分从历史教科书的重新书写入手，第四部分从政治空间的变迁着眼，第五部分从教育改革视角、第六部分以宗教复兴为主线具体论证中亚五国如何通过“时间—空间—人”的再造建立起本国的个体身份；第七部分集中讨论中亚地区国家的集体身份；结论部

^① 此处借鉴了 De Cillia 等人的研究，参见 De Cillia, Reisigl and Wodak, 1999，转引自翁秀琪：“集体记忆与认同构塑——以美丽岛事件为例”，《新闻学研究》（台湾），第 68 期，2012 年 7 月，第 126 页。

分将对中亚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构建中的问题以及前景予以总结和前瞻。

通过这样的分析，笔者希望国内学术界和决策层能进一步意识到中亚国家的主体性在构建中亚各国的个体与集体身份过程中正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更加重视建立起坚实的中亚地方性知识，以期准确把握中亚国家及中亚地区的发展趋势。这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成为我们推进新的中亚研究的前提与基础。

二、中亚国家的个体与集体身份：一个整合的理论分析框架

身份（Identity）原本是一个哲学、心理学概念，是指建立在共同体成员相同特性基础之上的区别于他者的共有形象与归属感。^①这是一系列关于自我的观念，其核心问题在于“我或我们是谁”、“他或他们是谁”，涉及如何在一个以他者为参照的背景下认识自我并进而将自我与他者进行严格区分的知识体系。就其影响因素而言，个体或群体的社会观念、宗教文化、历史记忆、生活习惯等都可以涵盖在内。

国际学术界一般意义上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politics of identity）传统上与社会运动密切相关。^②它最早是指一国内部居于少数和弱势地位的民族、种族、族群、社群等可能受到歧视而致力于赋予自身特定身份并获得社会认可与包容进而拥有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政治实践过程。^③目前这一定义依然有效，但同时其内容更多地转向了寻求对外在于本属群的其他社会群体对自身差异性的接受或承认。^④这是一个国内政治的范畴，加拿大等国推行

① James M. Baldwin,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Vol.1,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98, p.504.转引自王彦智：“地区认同与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论析”，《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4期，第63页。

② 身份/认同政治的概念产生于上个世纪60-70年代，最早为研究社会—政治变迁时建构主义范式的分析范畴，后来逐渐被其他学科所借用。

③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и политика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в 2 т. Т.1: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как категор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науки: Словарь терминов и понятий. Отв. ред. И. С. Семенов. М.: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ОССПЭН), 2011. С.162.

④ Engin Isin, Patricia Wood, *Citizenship and Identity*,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99, p.14.转引自 Roger Coate and Markus Thiel (eds.), *Identity Politic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Boulder: First Forum Press, 2010, p.2.

的多元文化主义就是其典型案例。但过于追求某一群体的认同也可能导致社会撕裂的态势加剧。换言之，身份政治已经成为了新的政治客体在诉求被他人承认其所异以及在不同社会生活领域里新的替代性发展过程中的自组织机制。身份政治中包含的努力是一项集体和公众行为，而不是一种个体与私人作为。应该意识到，身份政治实质上是一场理论和社会政治的，而不仅仅是争取根据利益形成群体性集合的抗争；是一场打破往昔的合法性承认和寻求新的合法性甚或是执政权力，而不仅仅是围绕自我表达和自主管理的可能性的斗争。现代政治学中的身份政治主要与国家其他政治进程的主体相关，它是价值导向、国家/民族构建及巩固以及其他类型的政治实践与手段的集合体。这样的身份认同首先是国家和利益集团的相关行为及其彼此互动的客体，也是民族/国家发展取向的形成和构建的客体。国家是这一层次的政治认同的关键行为体。在民族/国家框架内它拥有教育、军役等社会化机制和相应的公共政策设计，以便养成特定的身份归属感。在地区框架内则表现为通过各种一体化或去一体化的制度设计并经由实际合作的开展形成一种集体的区域意识。

目前，身份这一概念在政治学领域中已被引申为由此而产生的对共同体的忠诚。从这一意义上讲，国家身份则是一种使一个国家区别于其他国家的一组由特定群体，首先是执政精英予以定义的在某一时空范围内形成的本国文化等特征与国家地位的本质属性。

一般认为，国家具有两种基本身份。一种就是国家本质上固有的、使国家成为国家而独立于国际体系的内在身份。国家行为体只有一个这样的身份，这就是国家的个体身份；另一种则是形成于国家间互动之中，也就是内生于国际体系之中的、由国家间合作进程及其衍生的共有观念建构而成的社会身份。一个国家可以具有多种社会身份。^①当国家的社会身份构建的前提在于认定某一特定地区或特定集体的话，这种身份就变成了国家的集体身份。显而易见，无论是国家的个体身份，还是国家的集体身份在本质上都必然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没有“他者”的存在，国家身份的意义就会消失。正如意大利学者安娜·特里安达菲利多指出的：

① 李慧明：“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身份”，《学术论坛》，2007年第12期，第65页。

国家身份还暗指差异性。国家身份的存在预设了“他者”（others）、其他国家和其他个人的存在，他们不属于我们这一集团，我们集团必须与他们区别开来。也就是说，国家意识（national consciousness）既包括共性意识，也包括差异性意识。它既涉及对团体的自我感知，也涉及对国家寻求与其相区别的他者的感知。这意味着，国家身份本身是无意义的，而只有在与其他国家的对比中才有意义。^①

笔者认为，国家的个体身份可以经由政治道路等政治范畴、宗教与语言等社会文化范畴和发达程度等国力范畴予以评估，而国家的集体身份则主要通过地区边界等空间范畴内的相互依赖加以衡量。（参见表1）

表1 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要素构成

本我与他我（国家的个体身份）				
政治范畴				
体制性质	政治道路	意识形态	政治文化	组织形式
社会文化范畴				
文明	宗教	民族	社会习俗	语言
国力范畴				
规模大小	武力强弱	发达程度	创新能力	国际地位
本我与他我（国家的集体身份）				
空间范畴				
领土	地区	地方	超国家	边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那么，国家的个体与集体身份作为一种属性到底是如何生成和巩固的呢？由于国家的个体与集体身份内在地具有双重特性和双重功能，它既要求共同体成员内向地产生一种共同体的自我意识，在相同地理环境、相近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作用下界定谁是共同体的成员；又要求共同体成员外向地识别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区别，界定谁不属于本共同体。这样一来，一个有意义的内在他者和外在他者的存在就成为了必要条件。就经验层面来说，只有

^① Anna Triandafyllidou,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other’”,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998, vol.21, No.4, p.599. 转引自王立新：“在龙的印衬下：对中国的想象与美国国家身份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第157-158页。

当一个国家的绝大部分居民都认同一个民族的主观理念时，不同族群间的冲突才会减少，民族和国家的个体身份才会接近。而且，内在他者和外在他者一般是不同的。在国家/民族构建已经完成的情况下，一个民族国家的作为一个国家的个体身份的构建和经营往往在表现为能否以及如何从一个民族型的国家身份（national identity）转化为公民型的国家身份（civic identity）。著名学者林茨曾经对此作出了明确区分：

所谓民族—国家政策，我们是指这么一种政策，国家领导人追求一种罗格斯·布鲁贝克（Rogers Brubaker）所说的“民族化的国家政策”，以提供文化的同质性。这些领导人有意或者无意地发出这么一种信息，国家应该成为民族的和为了民族的国家（‘of and for’ the nation）。由此，在他们撰写的宪章以及出台的政策之中，主体民族的语言成为唯一的官方语言，有时候甚至成为国家事务和公立学校教育（可能也包括私立学校）唯一通用的语言，主体民族的宗教享有特别的待遇（即使没有必要被确定为官方宗教），而主体民族的文化象征也往往在所有国家象征（如国旗、国歌，甚至包括某些类型的军用符号），以及所有国家控制的社会化方式，如电台、电视和课本之中，都享有特殊地位。相反，在国家构建过程之中，民主政策是指那些强调更为广泛、更不具有排他性的公民资格的政策，这种政策认为所有公民都具有平等的个体权利。^①

显而易见的是，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中亚国家陷入了一场身份危机。对于中亚国家而言，在被迫接受了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文明离婚”后，各国主体民族的政治主导力量是否有足够的政治远见与政治意志去塑造一种新的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从而适应苏联解体后全新的内外形势，特别是本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来凝聚多元分散的社会利益，进而继续保持经济上的整合力和政治上的向心力，是一个关乎民族/国家构建生死存亡的核心命题。相应地，本文语境中的中亚国家个体身份主要是对内层面上的国家对自身特性的一种自我领悟和自我理解，相当于民族/国家认同。它主要是内生的，反映了本国大众在精英的引导下获得、完善、变更或丧失集体认同的过程；

① [美]胡安·J·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孙龙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26页。

而其集体身份等同于地区认同，主要是由中亚五国在彼此的互动交往中，随着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所塑造出来较为稳定的共有观念且被其他成员理解和认同的国家间关系模式。它是中亚各国基于地理范围对本地区多层面共同体的认同，主要体现在将本国作为地区一员，成为其不可分割整体中的一部分的区域连带身份。换言之，个体身份与集体身份在此意义上形成了密切的互动，即中亚五国自我的个体身份在与其他中亚国家交往过程中不断得到反馈和认同，这种个体身份的成长显著地影响着中亚集体身份的塑造，而集体身份定位的强化也促进了中亚五国个体身份的深层领悟。

关键在于，新独立的中亚国家曾经从属于同一个单一制国家——苏联，上个世纪 60 年代以来风起云涌的殖民地独立运动也催生了大规模的新国家。我们可以假定，这些国家和西方学术界侧重探讨的已经完成国家和民族构建并在巩固和深化民主建设的国家在个体和集体身份的塑造方面有着不同的逻辑。在笔者看来，其区别主要在于以下几点：其一，这些新独立国家的民族/国家构建与国家的个体与集体身份再造是同步进行的。无论是整合国内的各项秩序，还是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互动，都可能不得不在一个另起炉灶的个体与集体身份基础上展开；其二，由于殖民帝国的大量人口以及其他物质和非物质因素遗留在殖民地，这种千丝万缕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使得前宗主国同时扮演了新独立国家的个体与集体身份养成中的内在和外在他者的双重角色；第三，相对于那些已经完成国家/民族构建的主权行为体，相对于霸权国、主导国以及其他中等影响的国家，新独立国家往往属于小国，因而为了在心理上弥补军事、经济等国力方面的劣势，往往对于国家威信的自尊心十分敏感，对于外来干涉，特别是侵蚀其“主权”、破坏其“独立”的行为显示出激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尤其是在那些将执政当局和国家命运等同起来的小国，它们对于主权问题的重视与敏感程度更高。从这一意义上讲，新独立小国对于新的国家个体和集体身份的塑造往往是狂风暴雨式的、以抛弃历史上耻辱的身份为优先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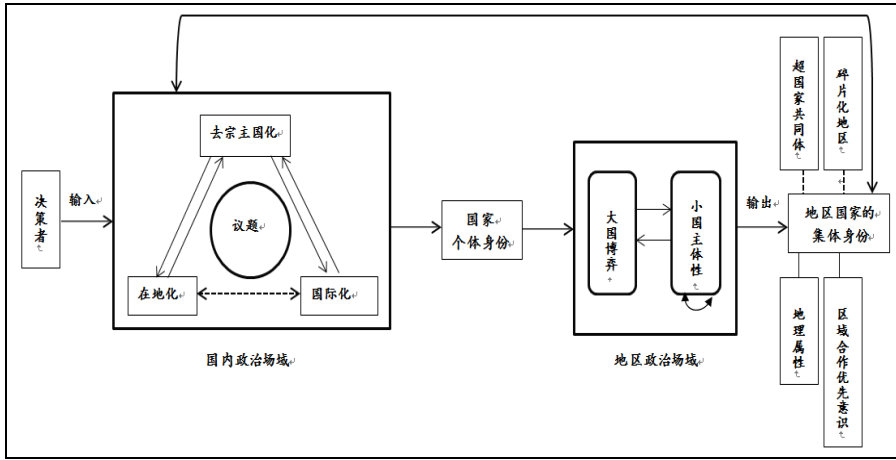


图 1 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生成路径图

因此，这些新独立国家的个体与集体身份构建往往表现为三位一体的集合式路径——“去宗主国化”、“在地化”和“国际化”，其中“去宗主国化”为核心，“在地化”和“国际化”均构成一体两面的关系，而“在地化”与“国际化”则形成了相互补充的关系。三者在同一个政治场域（或在单个国家或在国家集合）内围绕具体议题密切互动，逐步培养出新的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参见图 1）

中亚国家的个体与集体身份的生成与巩固正是经过上述“去俄罗斯化”、“在地化”和“国际化”的三重路径予以实现的。这三重路径都是中亚各国身份形成必经的方向，它们彼此影响、互相塑造、共生共长：各国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甚或经济政治基础都与“俄罗斯（苏联）化”有着密切联系，进而注定要首先通过“去俄罗斯化”摆脱历史包袱，借助于“在地化”与“国际化”的重要支持构建中亚国家的个体身份；而“在地化”与“国际化”的推进在强化了中亚国家新的“本我”之后实际上也必然导致它们与前宗主国俄罗斯的相对疏离，使得“去俄罗斯化”进程在一般意义上越发难以逆转。此外，小国主体性的伸展，大国的纷纷介入与中亚的权力场的特殊文明交汇点构造出两种身份互相影响的环境，集体身份塑造也需要个体身份在外交和国家互动上的配合。正是如此，三重路径作为一种重要工具得以反映个体与集体身份互动的实质。

下文我们将分议题对中亚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生成过程中的上述三种路径隐含的内在关联和复杂互动关系进行剖析。我们试图突出的是，中亚新独立国家正是借由“去俄罗斯化”、“在地化”和“国际化”的交互作用实现了时间（历史书写）、空间（城市空间与符号）和人（教育与宗教）的三重重构，并在此进程中塑造了新的国家身份。

三、族史/国史重构与中亚国家的身份认同

建构主义的民族理论认为，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都是一种近现代现象，是可以制造与再造的；它并没有表达或反映了一种自然的、原始的真实生存；作为现代思想的独特形式，民族主义者的观念不仅鼓动了政治运动而且塑造了个体和族群的文化身份。^①民族主义者制造/再造民族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民族历史的重新书写。而认同政治同样存在于指向当下的历史之中。过往在此意义上被依据当下情势和历史书写者的愿望而构建。^②这样一来，族史/国史的重新书写就化为了新独立国家获取新的国家身份的关键路径。很多情况下，新独立国家族史重构框架下的民族叙事往往突出本民族有一个不朽的过去，对于世界文明进程曾经起到过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并由此衍生出一个不容争议的命题——该民族势将拥有一个辉煌的未来。这意味着，任何一个新的民族/国家认同的形成离开历史的书写与重新书写都无法进行。

中亚新独立国家的族史/国史重构同样未能脱离上述逻辑的窠臼。这首先是因为中亚新独立国家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在于树立“文化自信”，并把这种最初更多是自上而下灌输的“文化自信”内化为一种潜意识的“文化自觉”，在文化传统的脉络中找寻重塑本民族精神家园的新的意识形态体系，从而在巩固主体民族优势地位、弘扬其民族自豪感的同时塑造了新时期的民族/国家身份。

这种族史/国史重构以及其背后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的最大

① 罗伊德·克雷默：“历史叙事和民族主义的意义”，邱文平译，《历史与当下》（第二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19页。

② 参见 Jonathan Friedman, “Myth, History and Political Identity,”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7, No.2, 1992, p.207.

牵引力恰恰在于“去俄罗斯化”的书写取向。它与沙俄和苏联的长期统治及其历史叙述有着明显的因果关系。一般来说，殖民者会采取各种措施清除被殖民民族的历史记忆，以此消解某一特定群体的身份认同，使通常居于帝国边陲地带的他们更易被帝国中心所同化。正如霍米·巴巴（Homi Bhabha）所指出的，为了使自身对殖民地的征服行为及在此建立起行政一指令体系合法化，殖民话语的目标是在种族来源基础上将殖民地解释为一个人口退化类型的单元。^①这样一来，在一种难以言明的非正常逻辑指引下，歪曲、丑化、破坏被殖民者的历史成为殖民政策的重要手段，旨在说服当地民众相信殖民者为之驱走黑暗、带来光明。^②

苏联官方对包括中亚在内的众多边缘带的加盟共和国主体民族历史的重构显然潜藏着这种近似的逻辑。为了利用历史重构来整合新成立的中亚加盟共和国内部居民，苏联统治者引入了全新的历史话语，集中关注这些共和国主体民族的族源、重大事件和英雄人物，以激发起相应的民族自豪感。各种历史读物经过苏联高层的认可后被编纂、生产出来并通过教育体系等渠道派送到中亚，以确保每一个居住在中亚人能够自孩童时期就熟悉、掌握本民族的历史。问题在于，苏联史学编纂对于包括中亚各主体民族在内的非俄罗斯族的塑造包含着以下几个必备要素^③：

——展示“大俄罗斯人”作为天然领袖和“老大哥”的优越性；

——说明俄罗斯族人和非俄罗斯族人之间无论是过去还是当下都没有民族敌对；上述神话将有助于创建新的苏联（俄罗斯）爱国主义；

——强调非俄罗斯人不是被占领土，他们是通过联盟（unions）或再联盟（re-unions）的方式加入沙俄或苏联帝国的；

——指出这种联盟或再联盟只会带来正面利益或至少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换言之，对中亚国家而言与俄的再联盟要比被大英帝国征服好）；

① 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p.70.

② Fran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3, pp.210-211.

③ L. R. Tillet, *The Great Friendship. Soviet Historians on the Non-Russian Nationalitie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9, p.4; Anatole G. Mazour, *Modern Russian Historiography*,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75. 转引自 T. Kuzio, “History, Memory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he Post-Soviet Colonial Space”,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20, No.2, 2002, p.275.

——认为大规模的中央集权是一种正向发展；

——强调非俄罗斯族人针对帝国的民族主义煽动行为与渴望和俄罗斯“老大哥”统一的非俄罗斯族人的愿望相悖；

——强调非俄罗斯族人无创建独立国家之能力；

——强调俄罗斯承担着有益的文明教化使命。

同样，作为一种普遍的反向运动，后苏联国家的精英开始将原统治者长期向自身灌输的难以独立管理本国事务的“金科玉律”抛之脑后，转而试图以“去帝国”的方式重获民族自信，消除沙俄和苏联统治者压制下生成的一以贯之的自卑心理。^①因此，后苏联的执政精英往往要求历史学家在族史/国史重构过程中强调原住民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不如此，则后殖民国家将被动使用前宗主国的历史话语，因而也难以摆脱被殖民者塑造的身份认同。^②从这一意义上讲，历史记忆的复苏和民族史学的回归即意味着作为前帝国“他者”的新的民族/国家身份的新生。^③可以说，中亚国家重构族史/国史的过程中对于“历史民族”曾经辉煌的书写在某种意义上，是以一种特殊的姿态反映曾经在苏联治下的遭耻辱群体的内在尊严。如同安东尼·史密斯所强调的，

……现实的耻辱和压迫是尊严的对立面，并且通过解放才能带来尊严，但是压迫、耻辱本身却并不产生对尊严的热望。尊严必须从内部被“重新发现”。由此出现第二种意思：尊严成为被外部缺陷所掩盖的“真正的价值”。民族主义的目标就是找到内在的价值，实现真实自我的尊严。^④

中亚各国执政当局藉此给予受压迫者和被边缘化者以地位和角色反转的政治承诺和现实体认，通过与自己当下的升级状态和对前统治者角色的矮

① Rupert Emerson, *From Empire to N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381-382.

② Partha Chatterjee,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apolis Press, 1986, p.37.

③ T. Kuzio, “Identity and Nation Building in Ukraine: Defining the ‘Other’”, *Ethnicities*, 2001, Vol.1, No.3, pp.343-365.

④ [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二版），叶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2-33页。

化的比较寻求内在的集体尊严，进而实现并提升了真正的民族自我。此时，昔日的统治者，无论是沙俄还是苏联，都不再是“进步的灯塔”和“文明的传播者”，而曾经被视为“落后土著”的中亚各主体民族摇身一变同样被赋予了“伟大民族”的称号。^①当然，这种对历史的重新解释和重新主张将会被所有后殖民国家的主体民族所欢迎，尽管同时也可能造成一种少数民族的被背叛感。这样一来，中亚各国在后苏联时期的历史重构的主线就变成了与“去俄罗斯化”相伴相生的“在地化”，即着力加大对于主体民族辉煌历史及其英雄人物的塑造。它隐含着新的历史和地缘政治条件下主体民族的主体性问题，等同于寻找民族和国家身份认同的主要源泉。也正因为如此，中亚国家执政当局在独立伊始就投入了无限的精力与激情于族史/国史的重新书写之上。他们乐此不疲地突出本国人民及其成长史过去对于人类发展的贡献，与其他民族，尤其是与当下在物质和精神意义上都足够发达而先进的民族，足以平分秋色、等量齐观^②。他们希望通过承续主体民族的传统象征符号体系来激发国民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在共同的史诗叙事、共同的祖先信仰、共同的英雄的崇拜和表征中寻获本民族安身立命的坚实依据。后苏联时期的中亚各国民族/国家永续存在并可持续发展的合法性、正当性由此产生。事实上，早在苏联晚期，构建一个苏联中亚加盟共和国主体民族的民族身份的诉求与努力就已经开始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后苏联时期中亚各国延续了这一思潮，并更为系统地重新表述了民族史、国别史与地区史，以此作为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内容。

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研究分析表明，在所有中亚国家中，除了哈萨克斯坦情况稍好外，其他各国在国史/族史重构问题上几乎都秉持了民族主义立场，并且多将俄国和俄罗斯人视为不共戴天的外敌。比如，吉尔吉斯斯

① 参见 Shirin Akiner, “Melting Pot, Salad-Bowl or Cauldron? Manipulation and Mobilization of Ethnic, and Religious Identities in Central Asi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20, No.2, 1997, pp.362-398.

② 包括中亚在内，所有后苏联国家都在寻找本国以及主体民族“失去的”前帝国时期的历史，以确定其拥有无可争议的黄金年代，进而可以使新独立国家拥有历史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参见 Edward Shils, “Nation, Nationality, Nationalism and Civil Society”,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1, No.1, 1995, p.100; and Thomas H. Erikse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Pluto Press, 1993), p.69.

坦在历史教科书中直接酣畅淋漓地指责了俄罗斯帝国对吉尔吉斯人实施种族灭绝政策的潜在威胁，强调正是出于对种族灭绝的恐惧，吉尔吉斯人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祖国而逃亡中国并将这一大规模的逃亡以及其间造成的近20万人丧生的历史称为“大慌乱”。^①类似的表述在其他几个中亚国家的历史教科书中俯拾皆是。就内容而言，中亚五国在独立后的头十年的历史重构重点首先集中在对本国本族历史名人的研究，一段段面貌不清的过往经由时髦的各类传记及史学作品而变得鲜活起来。比如，哈萨克斯坦出版了杜拉托夫（Mir Jakub Dulatov）^②、巴依托尔逊诺夫（Ahmed Baitursunov）^③、阿乌佐夫（Mukhtar Aueзов）^④等人的作品，乌兹别克斯坦对别赫布迪（Behbudi）^⑤以及土库曼斯坦对库里（Makhdum Quli）^⑥的研究等等。

新时期的哈萨克斯坦的历史书写的重要内容，体现为在一定程度上对前苏维埃时期（沙俄时期）的游牧民族传统的再造。哈萨克族人被描绘成自由和自豪的牧民，其历史祖国是广袤无边的哈萨克大草原。大量的国家预算被

① Данилов А. А., Филиппов А. В. (Ред.). Освещение 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и народо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х стран в школьных учебниках истории новых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М., 2009. С. 94-96.

② 米尔贾库布·杜拉托夫（哈语：Міржақып Дулатұлы，1885-1935），哈萨克著名诗人、作家和民族解放运动领袖，被公认为现当代哈萨克文学的先驱。1928年被苏共以鼓吹哈萨克民族主义的罪名逮捕，最初被判死刑后处以流放，1935年10月在集中营去世，1988年获得平反。参见 Tomohiko Uyama, “The Geography of Civilizations: A Spatial Analysis of the Kazakh Intelligentsia’s Activities, From the Mid-Nineteenth to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 Kimitaka Matsuzato (ed.), *Regions: A Prism to View the Slavic-Eurasian World*, Sapporo: Slavic Research Center, Hokkaido University, 2000, pp.70-99.

③ 阿赫梅特·巴依托尔逊诺夫（哈语：Ахмет Байтұрсынұлы，1872-1937），哈萨克著名突厥学家、语言学家、文学家和国务活动家，1937年大清洗中被冠以“人民公敌”的称号而遭杀害。

④ 穆赫塔尔·阿乌佐夫（哈语：Мұхтар Омарханұлы Әуезов，1897-1961），哈萨克作家和社会活动家，语言学博士，1946年获得苏联科学院荣誉院士。阿乌佐夫的成长受到了哈萨克民族诗人阿拜的强烈影响并花费15年时间编撰了多卷本《阿拜之路》，获列宁文学奖。

⑤ 别赫布迪系马赫穆德·霍加（Mahmud Khoja, 1875-1919）的笔名。他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宗教领袖穆夫提，是贾迪德运动的精神领袖与理论家，1919年被布哈拉埃米尔阿里姆汗杀害。

⑥ 马赫杜姆·库里（Muhammad Quli Qutub Shah, 1565-1611），土库曼著名诗人。据苏联著名突厥学家巴托尔德（V.V. Barthold）认为，库里是在所有突厥语族只有土库曼人拥有自己的民族诗人，库里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用通俗的语言让所有人都能理解。

用于普及这一历史传统。2005年，一部名为“游牧民”的史诗电影在哈萨克斯坦和世界范围内发布。为此，哈萨克政府划拨了4000万美元的制作费用，使之成为哈独立以来最昂贵的一部影片。影片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18世纪，描述的是一位年轻的牧民如何为统一大玉兹、中玉兹、小玉兹三个互相混战的部落而奋斗的故事。

乌兹别克斯坦在苏联解体后同样采取了回归前苏维埃时期身份认同（pre-Soviet identity）的各项举措。众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正本清源的口号指引下被重新思考、品读、诠释，一系列前苏维埃时期的象征符号被重新启用。首先，苏联官方史学中讳莫如深的帖木儿大帝作为伟大的乌兹别克帝国的开创者被重新发现。新独立国家乌兹别克斯坦的新史学将这位历史人物描述为将欧洲从奥斯曼帝国和将俄国从蒙元帝国的铁蹄中解放出来的大救星。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努力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6年在巴黎召开了帖木儿大帝诞辰660周年的庆祝活动。欧洲知名政治家，包括法国总统希拉克及其他公众人物出席。乌兹别克历史学家多认为这是整个世界朝着消除对帖木儿大帝错误陈见、还原其在世界历史中真实作用的重要步骤。^①其二，历史记忆，尤其是将乌兹别克人的起源上溯至13世纪的沙曼王朝不仅是历史学家的兴趣所在，更是一个乌官方推波助澜的政治工具。其三，20世纪初期曾一度风起云涌的贾迪德运动被视为追求突厥斯坦独立与统一的重要象征。很多贾迪德运动的参与者被重新解读为祖国的伟大儿子。

族史/国史重构也是吉尔吉斯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吉尔吉斯人被描绘成“英勇、强大、尚武、尊崇财富、充满爱的共同体”，被塑造为一个尽管面临外敌威胁依然捍卫民族团结且崇尚自由和独立的民族。^②与此同时，吉尔吉斯人急于找寻到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的承载者，古代口传文学中吉尔吉斯人统一的无畏战士、英雄玛纳斯由此被塑造为民族之父。一时间，玛纳斯几乎处处可见。货币上、图书中、电影里、歌剧内，甚

① «Тимур, его роль в судьбах России и Европе». www.centrasia.ru, 17.01.2012.转引自 Farkhod Tolipov, “Pre-Soviet, Soviet and Post-Soviet Central Asia: The Case of Uzbekistan”, in Suchandana Chatterjee and Anita Sengupta (eds.), *Communities, Institutions and ‘Transition’ in Post-1991 Eurasia*, Shipra Publications, 2011, pp.98-99.

② T. Koichuiev, “Kyrgyzstan: The Road to the Future”, *Eurasian Studies*, 1996, Vol.3, No.2, pp.19-20.

至是饮料瓶上、香烟盒上都有玛纳斯的形象。这显然是吉尔吉斯当局将玛纳斯渗入吉尔吉斯人民族意识的巨大努力。

原生论是塔吉克斯坦塑造民族/国家认同的主要工具。塔执政当局反复强调，塔吉克族不是一个新的民族，而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为此，塔吉克斯坦重新书写了历史，将当代塔吉克人的族源上溯至公元 9-10 世纪的萨曼王朝。伊斯玛伊尔·索莫尼（Ismail Somoni）被认为是萨曼王朝最具权势的领袖。为了强化索莫尼作为塔吉克斯坦关键历史人物的象征意义，塔吉克斯坦官方将国家货币以其命名，将本国的最高峰用他的名字命名并在全国范围内大兴土木建造他的纪念碑。

土库曼斯坦第一本历史教科书为叶卡耶夫（Oraz Polat Ekayev）编写的《土库曼斯坦史（10-16世纪）》，旨在向八年级学生传授新的国史族史。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对土库曼斯坦历史的重新书写，在此过程中这一历史时期的所有突厥人的历史都被视为土库曼族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换言之，无论是喀拉汗王朝（Karakhanids）还是奥斯曼帝国（Ottomans）都变成了土库曼人建设的国家。在导言中，作者强调土库曼人的历史可分为形成、扩张与被占三个阶段来研究。第一阶段主要讲述国家与部族问题，比如伽色尼王朝（Ghaznevids）、乌古斯土库曼部族（Oghuz Turkmen）及其后在塞尔柱王朝（Seljukids）形成中的作用。作者将国际学术界普遍视为松散部落联盟的乌古斯土库曼人描述为伟大的乌古斯土库曼国家，其国民半游牧半定居，而治理方式则为协商。第二阶段讲述了土库曼人向小亚细亚、伊朗、高加索、印度等地扩展的历史，认为土库曼人在发现这些新地区后成立了各种封国并用发现者的名字命名。奥斯曼人即被归为这一类，该书将之称为“奥斯曼土库曼国家”并视之为土库曼人建立的诸多封国之一。第三阶段则陈述了土库曼人因各种原因丧失独立的历史过程。这一部分的主体为外来统治者，土库曼人的相关描述几不可见。行文至16世纪末，作者方又开始将土库曼人重新回到历史重构的中心位置，旨在为陈述以希瓦汗国和布哈拉汗国为标志的新国史做铺垫。^①

^① Isenbike Togan, “Twenty years after: new histories emerging”, in Anita Sengupta, Suchandana Chatterjee and Susmita Bhattacharya (Eds.), *Eurasia Twenty Years After*, Maulana Abul Kalam Azad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Kolkata: Shipra Publications, 2012, pp.56-59.

由此可见，中亚各国在苏联解体后的历史重构彰显出民族主义意识支配下的历史编纂中常见的神话学取向，其典型特征如下：其一，确认本民族在当下领土疆域内即便不是自古以来也非比寻常的悠久性。此为原生性神话；其二，致力于将当下的种族政治边界投射至可以上溯的历史最深处，竭力扩大本族群历史上迁居之领土，旨在争夺历史土地。此为民族发源地神话；其三，将本民族与固有的特定语言联系起来。如果曾从一种语言过渡到另一种语言，则一般认定是其他族群所为而非本族群，以免这一事实降低族群的历史地位。此为语言延续神话；其四，认定本族群的历史领土上除了自己以外，还生活着其他相近或由自己衍生出的子族群，其后他们迁居他处。本族群在此意义上成为了其他族群的“老大哥”，从而获得某些特权并使之自然化、合法化。此为族群家庭神话；其五，将本族群的祖先定位为与某一个历史典籍或口述文学作品中为人熟知、享有盛誉的伟人。此为荣耀祖先的神话；其六、强调历史上本族群超越相邻民族的文化（书面的）或政治（国家性）成就，从而事实上实施了文明输出的功能。此为文化传播者神话；其七，夸大历史上本族群的团结程度并有意识地忽视部族—宗族的功能与作用和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多样性。此为族群均质性神话；其八，经常构建外部敌人的形象，与之斗争进一步固化了该族群，提高了其团结程度。此为不共戴天的仇敌神话。^①

实际上，在历史重构方面，“去俄罗斯化”和“在地化”的重要来源则是“国际化”带来的新思维。其实，中亚各国在苏联解体后的族史/国史/地区史的重新书写从学术源头上受到了苏联著名学者巴托尔德的影响，其作品曾以全集形式在1963年至1979年于莫斯科出版，共9卷10册（第二卷有两分册）。巴托尔德留给后人的最大遗产是其对中亚问题的区域研究及由此形成的译注古地理文本和诠释史学两种学术传统，并拥有了一批追随者，如米诺尔斯基（V. Minorsky）、布列格尔（Yuri Bregel）、托甘（Zeki Velidi Togan）等。后一种学术传统的影响力远播海外，并被发展为一种基于西方

^① Шнирельман В.А. Войны памяти. Мифы,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и политика в Закавказье. М., 2003. 转引自 Данилов А. А., Филиппов А. В. (Ред.). Освещение 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и народо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х стран в школьных учебниках истории новых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М., 2009. С. 15-16.

学术理念的方法论，即对地方知识的追求不仅要利用地方性的资源，更要放在全球视野内进行。苏联解体后，中亚史学的新趋势开始形成。与苏联时期着重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视野考察中亚历史不同，中亚新史学转而强调民族的自我认同。在这种国际化的学术视野的影响下，中亚研究的主流范式被转换为各国对本国主体民族的特定传统的研究。这种新范式将各类传统放在当下的国土疆域内予以重新解读。乌兹别克斯坦在这方面着力最多。而独立后的第二个十年，中亚国家的族史重构开始将重心从国家转向人民。^①换言之，如果说头十年的中亚历史重构中的人民是以某一民族、部族的英雄人物作为代表的，这一新传统在第二个十年依旧在延续，但同时这一时期的中亚史更着重发现普通民众，更在意地方史（Local History），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以国界为历史研究边界的简单做法，比如各国对苏菲主义（Sufism）以及对文化认同背景下的社会和政治组织的研究即为明显例证。^②

四、政治空间的变迁与中亚国家的身份认同

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空间政治的重构同样构成了其国家身份建设的一个关键内容。这首先与空间本身具备的政治性质紧密相关。正如法国学者亨利·勒菲弗所指出的，

空间不是一个被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扭曲了的科学的对象；它一直都是政治性的、战略性的。如果空间的形态相对于内容来说是中立的、公平的，因而也就是“纯粹”形式的、通过一种理性的抽象行为而被抽象化了的，那么，这正是因为这个空间已经被占据了、被管理了，已经是过去的战略的对象了，而人们始终没有发现它的踪迹。以历史性的或者自然性的因素为出发点，人们对空间进行了政治性的加工、塑造。空间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它是一种完全充斥着意识形态的表现。（此处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引者注）空间的意识形态是存在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似乎是均质性的空间，这个在它的客观性中，在它纯粹的形式

① Isenbike Togan, “Twenty Years After: New Histories Emerging”, pp.53-54.

② Ibid, p.55.

中，又显得似乎是由某个政治集团（bloc）造成的空间，就像我们所观察到的那样，是一种社会的产物。^①

正是因为城市等空间所具有的政治含义，使得政治空间成为了各国政府有意识地利用其中的符号变迁塑造新的身份认同。历史上，新政权登上权力舞台之后，往往会大规模建造或重修旧日的政治空间。新的国家价值等被嫁接到新的空间内，阐明了与旧制度的断裂关系，以保证新的政治性质和新的国家图景得以实现。此时此际，城市等空间表述的核心内容正是有关国家身份的想象。在这一意义上，空间不再是一种静态结构，而是一种动态结构，国家的身份认同是在这种看上去变动不居的时空中实现了转型。

政治地理学家阿伦（John Allen）构建了一个新的理论模型，用以解释地点、行为和权力间的复杂关系。他定义了四种基本的权力类型：强制力（coercion）、权威力（authority）、操纵力（manipulation）和诱惑力（seduction）。这几种权力的差异主要在于其达成的方式及跨越实体空间与社会网络的能力强弱。在这四种权力中，强制力最直接，最容易实现在实体空间和社会空间内的穿越；权威力需要客体的顺从，容易在传输过程中逐渐弱化；操纵力，包括故意隐藏动机的行为，可以使人们将特定的安排视为永恒的、自然而然之事实，因而具有较长期的影响力；而诱惑力则往往被用之于研究民族主义问题的最重要权力形式。^②学术界一般倾向于将纪念碑、历史教科书和地图等民族/国家的表征视为诱惑力的一种形式。但另一方面，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更强调运用强制力和即将到来的权威力塑造民族认同。借用阿伦的空间权力的种类细分，笔者认为，正是上述四种权力形式经由空间塑造着新的国家/民族身份认同。其中，前三种权力往往是施动者所外在赋予的，而最后一种则是经由施动者的推动而被受动者最终接受的内生权力。“去俄罗斯化”被中亚政权利用自身的“权威”而强制执行，直接操控着中亚各国国家身份的积淀和成长；“在地化”以较高速度有序进行，反映了各国执政当局的权威力和操纵议题影响他们的能力；“国际化”则给久处于孤立和隔绝状态下

① [法]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第二版）》，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6-47页。

② 转引自 Shonin Anacker, “Geographies of Power in Nazarbayev’s Astana”,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04, Vol.45, No.7, p.516.

的中亚国家巨大的诱惑力。

经由空间的重新改造构建新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在历史上不乏其例。比如，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新政府除了另立国民公会，颁布新法令之外，还建造了崭新的广场、建筑物和纪念碑，宣示有别于传统皇权的新的共和理想。十月革命后，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政权迅速下令拆除沙皇的雕像，并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街道和广场上竖立向马克思、恩格斯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创立者、承载者致敬的纪念碑，创造了与过往坚决断裂的新的政治空间。同样，中国共产党在打败国民党取得政权后，也致力在全国各地建立全新的政治空间。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立、天安门广场的兴建和人民大会堂及革命与历史博物馆等富有政治象征意义的建筑物的建造都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89年柏林墙倒塌、东德政权瓦解并被并入西德，基民盟主导的新柏林参议院急切地对共产党政权留下烙印的城市进行“消毒”，大量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地理空间被改造。种种案例显示，在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以城市为代表的政治空间的重塑是其中的必有之义。

阿斯塔纳作为哈萨克斯坦新都的诞生和发展，是新独立国家凝聚多民族国家国立之理想政治形态，是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致力推动的哈萨克民族/国家身份构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尽管所处地区气候恶劣，但阿斯塔纳还是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内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一跃成为中亚地区最具现代性的城市之一，在各方面都显示出与独立身份相匹配的初生牛犊与虎虎生气之前卫特征。^①这种迅速获得的都城成长固然与其自身独特的政治象征意义相关，更主要的可能还是作为新独立国家的哈萨克斯坦在后苏联时期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

都市空间以及都市中某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空间演变成了具有综合意义的符号系统这一政治意愿乃是阿斯塔纳发展的独特之处，与欧洲历史上诸都城均经过历史性改造方才具备此特点形成了鲜明对照。换言之，阿斯塔纳从成为哈萨克斯坦新首都的时刻就有意识地被赋予了民族-国家空间之表征。

^① Shonin Anacker, “Geographies of Power in Nazarbayev’s Astana”,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04, Vol.45, No.7, pp.515-533. 有关哈萨克斯坦迁都及纳扎尔巴耶夫的战略考虑可参见 Natalie Rochelle Koch, *The City and the Steppe: Territory, Technologies of Government. And Kazakhstan’s New Capital*, Doctor Thesis, University of Colorado, 2012.

正像欧洲诸都城那样，“由一条河流或一条中心轴线穿越的都城往往能够将具有国家历史象征意义之纪念场所集中于其两岸或附近，有利于设计出一条既体现历史纵深感又有市政建设发展恢宏前景的旅游观光必由之路，并由该河流似镜像一般折射出来”^①。阿斯塔纳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来安排地理空间的，这一新的权力中心所在地四周的街区都呈现出专业化倾向。治国所必需的行政管理机构与大众生活居住的建筑群交相呼应。

显然，新都的市政建设与改造具有明显的国内政治功能，尤其是一批政治纪念性建筑和地标型公共建筑，更是凸显了哈萨克的民族/国家身份意识。于是我们可以观察到，中亚新独立国家哈萨克斯坦的都城试图模仿其欧亚前辈，而且这也是苏联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惯常做法，开始广为兴建象征其主体民族文化特性之纪念性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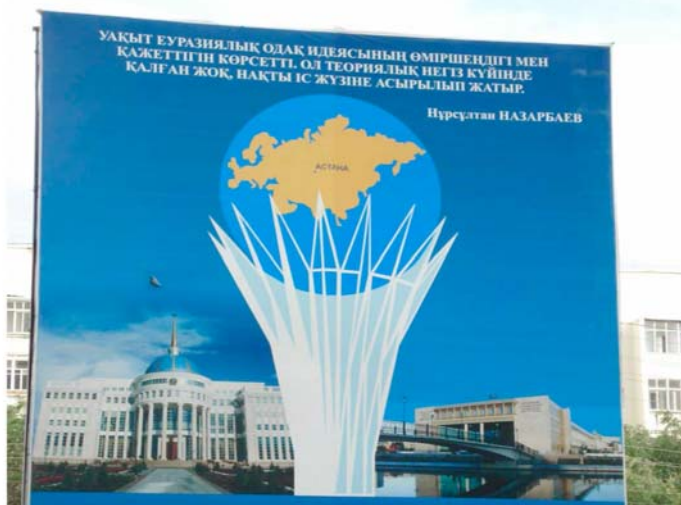


图 2 政治宣传画上的巴伊杰列克观景塔

一个典型的例证是位于阿斯塔纳中心的巴伊杰列克观景塔。（参见图 2）这一新的地标建筑贯穿着强烈的哈萨克主题，蕴含了当地“生命树”的传说，由于这个传说有一个金蛋，于是在这栋建筑的顶部放置了一个金色的圆

^① [法]克里斯托夫·夏尔勒：“19 世纪欧洲国家之都城”，端木美、于格·戴和特主编：《时空契阔：中欧学者论集》（第 2 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49 页。

球。如今，这已经成为哈萨克斯坦的象征符号，被广泛用于各种广告和宣传材料中展示。^①上图所示即为带有巴伊杰列克观景塔符号的巨幅宣传画。通过对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话语的引用，我们可以看出，阿斯塔纳在哈萨克斯坦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体系中昭示的不仅仅是其位于哈萨克斯坦同时也位于整个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地位。

另一个例证是 2010 年在哈萨克斯坦新都阿斯塔纳建成开放的、名为“可汗金帐”（Khan Shatyr）大型购物中心（参见图 3）。它的外形参照了游牧民族的传统帐篷，被认为体现了与哈萨克历史上传统游牧民族建筑形式的伟大共鸣。^②哈萨克政府为这一标志性建筑付出了 3 亿美元的建设费用。同样是为了突出哈萨克民族文化，位于阿斯塔纳的中央音乐厅外形被设计成了哈萨克斯坦传统乐器的样子。（参见图 4）



图 3 “可汗金帐”大型购物中心

① 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研究员 Kim Gelman 2012 年 6 月 15 日在韩国汉阳大学以公共外交与韩国和中亚关系（Public Diplomacy and Korean-Central Asian Relations）为主题的第五届“韩国—中亚”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与笔者的交谈。

② <http://www.khanshatyr.com/pages.php?l=01>



图 4 阿斯塔纳的中央音乐厅

另外，阿斯塔纳的建设充分反映了哈萨克斯坦当局民族/国家构建及城市建设的勃勃雄心，并且由于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瞄准了国际性都市的定位，其开放的形象也正在透过仍在持续的城市规划与发展向国际舞台传输。比如，哈萨克斯坦利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亚信峰会等国际活动的契机不断提高新都的国际知名度。正如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所描述的那样：

今天的阿斯塔纳是一个政治精英会晤的知名场所，许多世界级的文化、政治和体育活动在此举行。这些活动包括欧安组织（OSCE）峰会、哈萨克斯坦担任伊斯兰会议组织（OIC）轮值主席期间召开的第 38 届外长理事会会议，亚洲冬季运动会（Asiada），各类经济论坛等等。它意味着全世界都在通过阿斯塔纳了解哈萨克斯坦……^①

从某种程度上讲，阿斯塔纳所被赋予的哈萨克斯坦国家身份比其他任何一个哈国内城市，包括阿拉木图，都更为出色地实现了全国整合。它不仅担负起政治中心的重任，而且在文化和社会进步等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这也

① “Congratulation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N.A.Nazarbayev on the Day of Capital”, 2011.转引自 Low KCP & Makhabbat Yermekbayeva, “City-Branding of Astana, the Capital of Kazakhstan and the Oasis of Central A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versity*, 2012, No.2, p.186.

是哈萨克斯坦作为中亚现代化程度最高国家的国际化程度的最充分体现。

对阿斯塔纳这一新的地域空间的眷念，以及对哈萨克斯坦国民集体记忆的认同难以一蹴而就。这需要长时间的熏陶、指引和精心培育，才能使民众情绪升华并自发将民族/国家认同凝聚于新的政治地理空间及其上的以象征符号为核心的地标建筑。旅游指南、游记、雕塑及各种绘画作品、小摆设物件等，经由平面和电子媒体的报道、社交网络的传播而将新都的象征意义广而告之。

与阿斯塔纳相比，中亚其他四国的都城在后苏联时期的发展同样是研究这些新独立国家国家身份的绝佳样本。沙俄和苏联的连续统治给这些城市打下了自己深刻的烙印，无论是诸如音乐厅、图书馆、体育馆等大型公共建筑、还是纪念碑、雕塑或道路名称都成为至少持续数十年的“俄罗斯化”的层层积淀的历史遗产。然而，苏联时期的英雄崇拜等行为规范在中亚等新独立国家已经过时，并且与它们的民族/国家身份的构建内容构成直接矛盾与冲突。中亚各国独立后为了尽快塑造新的民族/国家认同，而不得不以最快的速度进行了一系列“告别苏联”的记忆重塑工作。

首先是包括首都都在内众多城市及街道名称的改变。地名虽然只是一种象征符号，但它从来不是客观的、自然的，而是共同体生活价值的载体。不同的个人和群体通过地名的变迁赋予生活环境不同的意义。换言之，地名的变化反映的是民族国家的认同、价值观的重塑、历史的书写与重新书写等更深层次的权力博弈。^①在中亚国家的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出于再造民族/国家身份的迫切需要，各国执政当局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地标更名的政治运动。新的地名反复被本国国民以及外来人口不经意地阅读、记忆和传播，使隐含于其内的强烈的新的民族/国家认同的意识形态以一种不易抗拒的方式被自然化、内在化，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形成中的中亚各国的国家身份。中亚国家正是意识到了地名的更替对国家身份变迁的塑造作用，才不惜成本进行国家地理的重建工作。

^① 有关地名与政治的关联度可参见王炎：“命名政治——以色列地名与话语霸权”，《开放时代》，2011年第2期，第145-153页。



图 5 塔什干街道标识

资料来源：ИА «Фергана.Ру»

显然，70 余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给中亚的城市空间留下了浓厚的历史烙印，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使城市及其各类空间的称谓也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强大影响，政治化的地名学现象十分严重。中亚版图上曾出现了一大批以苏联和中东欧乃至西欧共产党和国务活动家与国际共运领袖以及著名文学家、艺术家、战斗英雄或劳动模范等姓氏命名的地名。如图 5 中展示的塔什干旧街道名就以 1925—1937 年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著名党务和国务活动家伊克拉莫夫命名。

苏联解体后，这种城市叙事开始被逐步清除，无数的地名由此面目全非，或被其历史命名所取代，或被冠以与新生的独立国家身份更相吻合的名字。作为国家首都，无论是塔什干还是比什凯克，无论是最早的阿拉木图还是其后的新都阿斯塔纳，无论是杜尚别还是阿什哈巴德都弃用了充满浓重共产主义色彩的城市符号。新时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多重转型为这些后社会主义都城打下了崭新的意象印记。^①所有的名称改变都是一种旨在清除俄罗斯和苏联影响的“去俄罗斯化”行为。比如，苏联时期的切利诺格勒（Tselinograd）在哈萨克斯坦在独立后先是被改为阿克莫拉（Akmola），然后在建立新都后又被命名为阿斯塔纳（Astana）。吉尔吉斯斯坦的首府从原先的伏龙芝（Frunze）改为前苏维埃时期的比什凯克（Bishkek）。土库曼斯坦的克拉斯

^① Нелли Бекус, Кульшат Медеуова. Смена эпох как смена столиц: Астана как глобальный центр// Неприкосновенный запас. 2011. №.6(80).

诺沃茨克 (Krasnovodsk) 变成了土库曼巴什 (Turkmenbashi)。而哈萨克斯坦几乎所有地方行政中心的城市名字都被更替为更具民族特色的称谓, 如古利耶夫 (Гурьев) 变为阿特劳 (Атырау), 舍甫琴科 (Шевченко) 变成了阿克套 (Ақтау), 江布尔 (Джамбул) 变成了塔拉兹 (Тараз)。大多数城市名字的写法也从俄式变成了哈式, 比如阿克纠宾斯克 (Актюбинск) 变成了阿克托别 (Актобе), 克孜尔—奥尔达 (Кзыл-Орда) 变成了柯泽洛尔都 (Кызылорду) 等等。^①

新的命名政治学显示了两种路径:

一类是“在地化”, 即将旧制度下的与俄罗斯 (苏联) 相关的城市、街道、工厂、公园等公共空间名称, 替换为以主体民族及其英雄叙事相关的名称, 以实现“告别苏联”的心灵再造。问题在于, 尽管国家和城市的新领导人对此积极性十足, 但旧制度的符号和记忆是如此之多, 以至于很难在短时间内彻底消失。国家/民族重建初期的千头万绪, 也使得中亚各国政府最初的更名运动遗留了不少历史问题。这首先表现为初步实现了多数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相关联的街道、学校、工厂和其他建筑实体名称的“去俄罗斯化”, 但“本土化”和“民族化”还不够纯粹。^②因此, 所有的中亚国家都曾经经历过好几波地名更新浪潮。

另一类则是“国际化”, 主要是突出对于新独立国家的新的国际合作伙伴的尊崇和敬意。比如, 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的基洛夫大街就被替换为以土耳其现代国家之父凯末尔命名的凯末尔大街。

除了无形的地名外, 跟苏联有关的雕塑等有形的象征符号也被大量清除。这是一场旨在抹杀前朝遗迹的记忆之战。原本中亚国家对各种形式的旨在突出“俄罗斯化”特征的纪念符号有着特殊偏好, 但苏联解体后, 不少社会主义英雄的大小雕塑或建筑物外墙上的纪念名牌都一并消失了。以乌兹别克斯坦为例, 1992年的夜晚, 塔什干市中心10层楼高的列宁铜像被秘密从中心广场移走, 取代列宁的则是拉西多夫和纳沃依 (Navoi, 中世纪乌

① Игорь Лесев. Исчезнувшие города СНГ. <http://obozrevatel.com/abroad/73806-ischeznuvshie-goroda-sng.htm>

② Алексей Волосевич. Гимн национализму.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семнадцать лет в Ташкенте переименована половина улиц. <http://fergananews.mirror.tengu.ch/article843b.html?id=5574>

兹别克诗人)等人的塑像。^①拆除巨大的列宁雕像所引起的轰动最为剧烈。这一举动显然是试图彻底抹去社会主义时期的地标建筑及其承载的象征意义,并代之以一种全新的、民族化的或国际化的新的象征物。为了突出显示哈萨克斯坦和土耳其与众不同的友好合作关系,双方分别在各自首都建造了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和哈萨克斯坦独立后一直担任总统的纳扎尔巴耶夫的塑像(参见图6)。



图6 阿斯塔纳的凯末尔雕塑与安卡拉的纳扎尔巴耶夫塑像

资料来源: Natalie Koch

历史学家雷吉娜·罗宾(Regina Robin)曾有一段精彩评述论及柏林的记忆改造:

尘埃落定之后回望这一切,最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反差:一方面,一个号称无敌的国家垮台的过程居然那么和平,未费一枪一弹,也没有任何人真正试图挽救它,但另一方面——这两方面或许有内在的因果关系——事过之后,清算东德遗产的过程却又那么歇斯底里,任何和这个消失的国家有着或远或近的牵扯的事物,它的象征物、它的价值观、从道路名称、纪念物、雕像到诞生在那一时期的建筑和机构、从博物馆到文学、从工厂到城市结构,都要赶尽杀绝,1990-1995年间尤其如此,之后虽然不再表现得那么激烈,但实际上至今仍绵延不绝。这仿佛是要把民主德国从历史长河中一刀切除似的,清理纳粹遗产的过程都没有这么

^① 钱克:《中亚的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以乌兹别克斯坦为焦点》,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硕士论文,2007年,第68页。

不留余地。联邦德国代表了战后历史的正轨，而民主德国只是一场注定要被遗忘的历史事故。^①

无疑，我们只要将罗宾口中的“东德”换成“苏联”就可以很好地揭示中亚各国在后苏联时期类似的作为其国家身份构建重要内容的历史记忆的重新塑造工程的实质。当然，相对于德国新政权所操持的“反东德话语暴力”，中亚各国的做法相对要温和得多。今天，拥有历史情怀的游客可以在中亚各国首都的中心地带，驻足瞻仰各种类型的建筑，有的体现了对社会主义光明未来的歌颂，有的则反映出对反抗共产党政权历史事件或人物的怀念，有的追溯了历史上曾被沙皇镇压的悲剧命运，有的则倾诉了对独立国家身份的向往与珍视。这些实际上是中亚国家层层叠加的历史记忆以及由此伴生的国家身份的最好诠释。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中亚国家在独立之后设立的各种新的节日和国家组织的大型纪念活动，实则是把集体记忆与民族/国家认同重新联系在时间和空间上。这些纪念，尤其是具有特别的历史含义的纪念活动和国民/民族的认同结构是互相连贯的。它们具体体现为新的纪念日、纪念碑、纪念馆乃至街道、城市的命名等。共有记忆的时间和空间由此被打通，中亚国家的个体与集体身份的生成和巩固就变成了其中的应有之义。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在苏联解体之后，中亚国家和其他新独立国家一样，纪念物在量和质两个方面都有急剧的变化，并被大量的生产，与带有苏联时期各种象征符号的纪念品共存。一直到当下，中亚国家国家级的纪念/共有记忆仍在扩张，新的神性的加注依旧持续。凡此种种，都是旨在构建起新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

五、教育改革与中亚国家的身份认同

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开始欢呼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期待已久的胜利，学术界到政界多认为被亨廷顿描绘为“第三波”和被阿奇·布

^① [瑞士]阿兰·克拉维安：“柏林，都城及其记忆”，端木美、于格·戴和特主编：《时空契阔：中欧学者论集》（第2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2-83页。

朗等人界定为“第四波”的民主化浪潮势将席卷全世界^①，而包括中亚在内的前苏联国家一定会成为不遗余力地移植“西方道路”的新边疆。^②在教育领域，中亚国家的话语与政策迅速实现了从社会主义教育到趋于西化新教育体系的转移，改革口号中充斥着“民主化”、“分权化”、“自由化”、“多元化”和“学习的人性化”等语汇^③；与此同时，以学生为中心的各项具体改革措施也得以推行，新的课程标准开始建立，教育经费来源的多元化和管理科的去行政化渐次实施，高等教育的私有化，教材出版的自由化等各类举措先后被推出。^④有些教育政策更是直接在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指导下制定的。抛弃落后状态、赶超先进国家的国际化诉求成了中亚新独立国家在教育方面的主流思想。加强与土耳其和欧盟的合作在这一领域成了“去俄罗斯化”和“国际化”的代名词。

中亚国家独立后，“土耳其模式”一度成为西方学术界津津乐道的话题。“土耳其模式”之于中亚的正向意义在于，这是一个世俗化的伊斯兰国家，而且也是在民主和经济发展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就的突厥语国家，与中亚新独立国家在文明、种族、语言等诸方面具有同质性，且地缘上接近，有可能成为中亚各国的发展样板，从而既防止这些国家与伊斯兰保持一定程度的分离，也力求尽快消除苏联继承国俄罗斯的持续影响，巩固冷战胜利成果。^⑤

土耳其高度重视与中亚国家的文化交流，尤其是教育领域的合作，在土耳其看来，密切的教育合作可以达到双重目的：第一，经由培养和教育当下之中亚青年学生可以养成一批将来致力于中亚国家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

① 参见冯绍雷：“俄罗斯体制转型的路径依赖——从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的相关性视角的一项考察”，《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6期，第13-14页；封帅：“观念、体制与领袖——阿奇·布朗视野中的俄罗斯转型”，《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3期，第93-94页。

② N. B. MacFarlane, *Western Engagement in the Caucasus and Central Asia*. London: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9, p.1.

③ I. Silova, “Varieties of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The Post-Socialist States of Central/South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n R. Cowen & A. Kazamias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Springer, 2009, pp.295-320.

④ Globalization on the Margins: Education and Post-Socialist Transformations in Central Asia, p.3.

⑤ 有关讨论可参见 Anita Sengupta, “The ‘Turkish Model’ and the Turkic World”, in Suchandana Chatterjee and Anita Sengupta (eds.), *Communities, Institutions and ‘Transition’ in Post-1991 Eurasia*, New Delhi: Shipra Publications, 2011, pp.122-145.

转型的精英群体；第二，可以形成一批精通土耳其语言文化的社会群体，充当各自所在国家与土耳其之间沟通交流的桥梁。^①换言之，土耳其将与中亚国家的教育合作视为帮助前苏联突厥语国家现有和潜在精英塑造自由主义导向的“伊斯兰—突厥认同”（liberal Islamic-Turkic Identity）强大政策工具^②，以求进一步巩固土耳其与中亚突厥语国家的相互关系。目前，双方的教育合作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土耳其官方向中亚国家的学生，尤其是大学生提供各类奖学金项目，使其能够赴土耳其就读。这已经成为土耳其对中亚政策的最优先方向之一并被贴上了“伟大的学生交流项目”标签。二是由土耳其教育部以及土耳其著名宗教学者法土拉·葛兰（Fethullah Gülen）^③创建的“光明共同体”（Nurcu community）等各种基金会在中亚国家开办的各类教育机构来执行。^④

葛兰学校采用了与中亚各国当局合作的方式，由当地政府提供校舍等基础设施，葛兰共同体提供教师以及校长等行政管理人员，在中亚国家的发展较为顺利（具体数据参见表2）。由于葛兰学校相对于公立学校而言，主要使用英语授课，兼及土耳其语和当地主体民族语言，集中于科学、伦理和自

① Iveta Silova, “Reclaiming the Empire: Turkish Education Initiatives in Central Asia and Azerbaijan”, in Linda Chisholm and Gita Steiner-Khamsi (eds.), *South-South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2009, p.174.

② Iveta Silova, “Reclaiming the Empire: Turkish Education Initiatives in Central Asia and Azerbaijan”, pp.174, 180.

③ 法土拉·葛兰（Fethullah Gülen），1941年出生于土耳其东部的埃尔祖鲁姆（Erzurum），是一位伊斯兰学者、思想家、诗人及高产作家。由于从小受到扎实的宗教传统教育，因此葛兰思想奠基于纯正的独一神信仰；加之深受苏菲主义精神的影响，他怀有广阔的胸襟，其中充满了爱、宽容与慈悯等人文主义精神，而得以包容其他宗教的信仰者，并向需要帮助者伸出援手，关怀弱势。另一方面，葛兰也深谙西方自然、人文科学的原则，因此能够敞开心怀而拥抱现代性，并致力于调适伊斯兰信仰于多元的现代世界中，以帮助穆斯林在其中安身立命。葛兰运动是基于葛兰的思想内涵上的一股由下而上的穆斯林公民社会运动，借由文化教育机构的设立，进而形塑出理想的穆斯林公民特质，正统伊斯兰信仰、人文主义精神与现代性是其主要原则。自上个世纪60年代晚期兴起以来，至今已发展为当代土耳其境内最具有影响力的伊斯兰运动之一，而具备了国际性的规模，涵盖范围多达九十多个国家。

④ 参见 L. K. Yanik,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al Exchange: Turkish Education in Eurasia”, *Europe-Asia Studies*, 2004, No.2, pp.293-307.

我修养的训练，能够提供更好的知识训练和深造机会^①，因而深得中亚国家青少年的青睐。中亚国家独立初期，葛兰学校实行免费教育，不论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只考虑学生本身的素质；但到了本世纪初期已经开始收费，完成了从平民学校到精英学校的华丽转变。^②

表2 中亚的葛兰运动学校一览表（1997/1998-2006/2007学年）

国别	学校数量		学生数量		公司名称
	1997/1998	2006/2007	1997/1998	2006/2007	
哈萨克斯坦	29	23*	5644	5613*	Feza et Şelate
乌兹别克斯坦	18	X	3334	X	Slim
吉尔吉斯斯坦	12	15	3100	4287	Şebat
塔吉克斯坦	5	7	694	1874	Şalola
土库曼斯坦	13	16	3294	X	Başkent

注：表格中*为哈萨克斯坦教育部2005/2006学年的信息；X表示无相关信息。

资料来源：Iveta Silova, “Reclaiming the Empire: Turkish Education Initiatives in Central Asia and Azerbaijan”, in and Gita Steiner-Khamsi (eds.), *South-South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2009, p.178.

对于中亚国家领导人而言，与葛兰学校的合作也是重构新的民族/国家认同的辅助之路。因此，中亚各国几乎都对与土耳其的教育合作保持较高的热情，相信此举有助于降低俄罗斯在这些国家过高的影响并加速新的国家身份构建进程。^③事实上，中亚各国的青年学子在葛兰学校的就读过程中不仅学到了包括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和土库曼的民族认同知识，而且一直受到“突厥主义”理念（the concept of ‘Turkism’）的输入。有学者指出，这些学校因此将土耳其和中亚的突厥语国家连接在一起，推动了共同的突厥身份认同的形成。^④毫无疑问，葛兰共同体、土耳其政府以及中亚国家执政当局的一个共有目标是创造新的民族/国家认同并降低俄罗斯的广泛影响，这也是葛兰学校在中亚地区得以顺利进入并持续发展的核心原因。^⑤

① 据统计，土耳其在中亚兴办的各类学校的学生拥有超过 90% 的大学入学率，远超于各国的公立学校。参见 Iveta Silova, “Reclaiming the Empire: Turkish Education Initiatives in Central Asia and Azerbaijan”, p.184.

② Iveta Silova, “Reclaiming the Empire: Turkish Education Initiatives in Central Asia and Azerbaijan”, pp.178-179.

③ Ibid, p.181.

④ Ibid.

⑤ Iveta Silova, “Reclaiming the Empire: Turkish Education Initiatives in Central Asia and Azerbaijan”, p.181.

土耳其的教育输出在中亚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客观推动力在于，苏联解体大大削弱了过往的统一教育空间的庞大吸纳力，多重转型的种种艰难导致了公共教育体系的堕落、腐败和教育质量的急速降低。在此意义上，以葛兰学校为代表的土耳其教育变成了中亚地区教育的“示范样本”。与此同时，中亚各国受限于自身实力，尤其是在转型初期难以投入足够的教育基金，以非政府组织方式进入中亚教育市场的土耳其学校实际上为中亚领导人纾解了执政困境。此外，这些学校的教学内容包含了民族/国家构建的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也强化了新独立国家执政当局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中亚国家与“博洛尼亚进程”^①的互动可以视为它们在后苏联时期经由国际化的路径重构民族/国家认同的典型示例。中亚五国都没有签署《博洛尼亚宣言》，但已开始在具体领域引进一些“博洛尼亚进程”的规则，如建立三级学位制度、实施学分制等。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博洛尼亚进程都首先是一项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强有力手段。从欧盟方面看，博洛尼亚进程在中亚的引入意味着可以吸纳更多的中亚国家生源进入欧盟教育市场，提高其竞争力。而对中亚国家而言，加入或参与到和博洛尼亚进程的互动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积极成效：一是获得了促进高等教育内部改革的外部推动力，提高本国教育体系的吸引力。中亚各国中，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对成为博洛尼亚进程的成员国尤为积极，塔吉克斯坦某种程度上也较为热切。^②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已然部分按照博洛尼亚进程要求改进了本国的教育体系。2009年4月，两国代表均获邀参加了博洛尼亚政策论坛的部长级会议。二是藉此提升与欧洲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水平，取得实现从苏联边缘地带到欧洲中心辐射地区的身份转换的可能性。欧盟—中亚教育倡议（参见表3）

① 博洛尼亚进程源自1999年欧洲29个国家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签订的博洛尼亚宣言，是欧洲诸国间在高等教育领域实现一体化的一个国际合作项目，其目的在于一方面促进欧洲成为社会政策富有活力的、人力资源增长的强势地区；另一方面，使欧洲的高等教育在智力、资金和声誉上更具竞争力。该体系得对所有愿意参加的欧洲国家开放。这是数个世纪以来欧洲高等教育最根本的结构变革。有关后苏联国家与博洛尼亚进程的互动的讨论可参见杜岩岩、张男星：“博洛尼亚进程与中俄教育交流合作的空间”，《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1期，第117-134页。

② V. Tomusk, “The Geography and Geometry of the Bologna Process”, in *Globalization on the Margins: Education and Post-Socialist Transformations in Central Asia*, Charlotte: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Inc., 2011, p.48.

则成为了新时期中亚国家借助于国际化的力量进一步突出各自国家身份中开放特征的重要工具。

表 3 欧盟-中亚教育倡议

欧盟-中亚教育平台	专项合作	信息和交流项目
高层次会晤	欧盟与周边国家开展现代化高等教育合作的计划 (TEMPUS)	联合活动
技术工作组	伊拉斯莫斯世界计划 (Erasmus Mundus)	联合出版
国家层面的对话	博洛尼亚进程	
	欧盟训练基金 (European Training Foundation)	
	中亚研究与教育网络 (CAREN)	

资料来源: Peter Jones, "The EU- Central Asia Education Initiative", *EUCAM working papers*, No.9. February 2010, p.6.

而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伊斯玛仪派的现任最高精神领袖阿迦汗四世与中亚国家领导人的合作同样可以视为中亚国家在后苏联时期经由在地化的路径重构民族/国家认同的典型案列。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政府与阿迦汗四世合作共建专有高教机制, 以推动高山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①与本地区国家开展的诸项教育改革政策不同, 这一地区性合作背后最主要的驱动力, 乃是构建一个致力于关注高山人口和传播伊斯兰价值观的新的地区学术共同体的尝试。

中亚新独立国家在后苏联时期的教育改革的另一个关键内容正是在于将新的独立的国家身份作为课程体系的重点灌输给各级学校的学生。以乌兹别克斯坦的语言教学为例, 卡里莫夫政权自乌独立以来就强烈支持乌兹别克语的发展, 专门通过立法规定每年十月的“语言日”当天全国的大小学校举行庆典, 朗诵乌兹别克语的诗歌, 介绍乌兹别克语的历史, 号召习惯使用俄语的乌兹别克族人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加强使用母语。这些做法显然是试图经由母语的使用和扩大恢复民族/国家的自我认同。此外, 前文所提及的族史/国史的新书写就是历史教科书反复强调的重中之重。主体民族的文学作品, 特别是《玛纳斯》这样具有代表性的长篇口传史诗都被纳入日常的教育内容。中亚各族的传统游戏在课程中的体现也有所加强。

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应该承认, 在高等教育领域, 俄罗斯的教育体例及其标准仍然为中亚国家所效仿或移植。但俄的绝对优势地位正在不断遭到侵

^① University of Central Asia, 2010.

蚀，其典型标志为就学于俄的中亚学生绝对数量增长下的相对比重的下降。近年来，自中亚赴美国、欧洲、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朗、日本和中国等其他国家留学的人员总数持续增长。笔者在较早前的一项研究中注意到，按照哈萨克斯坦驻美国和加拿大使馆教育与文化处统计数据，美国已经成为哈青年学子海外就学的首选目的国，每年超过 1000 人。而在 2007-2008 学年，“未来”奖学金获得者中 46.6%选择了欧盟国家，29%选择了美国，俄罗斯仅占 9.5%。调查显示，在可选择的留学对象国中，欧盟和美国的地位正在迅速上升。如，哈萨克斯坦想去俄就读的占 18%，欧盟占 17%，美国占 14%；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相应的数据是 32%、17%和 14%以及 37%、12%、14%。这说明，在此消彼长之间，俄在文教领域对中亚的吸引力正在不断下降。^①

六、宗教信仰的复苏与中亚国家的身份认同

在被沙俄并入其版图之前，中亚尚未形成现代国家，只是隶属于各个汗国和部族的松散集合体，中亚人的群体意识当时极少在国家/民族层面上予以体现。正如豪根（Arne Haugen）所指出的，中亚的民众在当时首先将自己视为穆斯林，其次才是某一个特定的地区的居民。对他们而言，属于某一个特定的民族与否根本无足轻重。^②

苏联官方对待伊斯兰教一向奉行软硬兼施的两手政策：一方面动用诸多手段压制其发展；另一方面却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寻求与之合作，以巩固自身执政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十月革命后，中亚地区广大穆斯林居民在接受无神论教育、提高政治思想觉悟的同时，宗教信仰自由并未被完全剥除。随着布尔什维克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角色转变及其无产阶级专政地位的巩固，苏维埃政府在中亚地区的宗教政策也发生了日趋强硬的变化。宗教教育改革、妇女解放、文字改革、关闭伊斯兰教活动场所等一系列措施的推行，标志着

① 参见杨成：“形成中的中亚地区格局：尚存的单极残余、不稳定多极和其他选择”，《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6期，第30-31页。

② Arne Haugen,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Republics in Soviet Central Asia*, New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35.

苏共高层日益加强对中亚伊斯兰教的控制和防范。^①卫国战争时期，由于特殊的国内形势和建立强大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需要，斯大林政权曾一度放松了对伊斯兰教的管制。赫鲁晓夫上台执政后，苏联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反宗教运动，利用各种措施不断强化无神论宣传教育。勃列日涅夫在位期间，伊斯兰教的应有地位也未得到尊重。直到 1985 年 3 月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后，苏联党和政府对宗教和宗教组织几十年来一贯采取的严格管理与监督政策才出现了明显的松动并在不久后趋于失控。中亚各国内部的宗教能量得到巨大释放，长期受压抑的中亚地区伊斯兰教呈现复苏态势。^②整体而言，穆斯林身份是中亚人个体和集体认同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我们无法否认，即便是在苏联时期，尤其是到了苏联晚期，以穆斯林公民为主的中亚地区的苏联空间事实上存在着双层政治文化结构：表面上，它同苏共中央致力推进的“苏联人”建设的社会实验与工程相一致；而隐性上，它又深刻地受传统的宗教和部族网络所影响，具有独特的社会动员渠道。^③到苏联解体前，长时间的无神论宣传和教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亚人对伊斯兰教的态度。尽管中亚人的宗教信仰没有被根除，一些清真寺仍然在秘密活动^④，但多数人直至苏联晚期更多是有名无实地忠诚于伊斯兰，只有极个别的人始终如一坚持积极参加宗教活动。

对于中亚的新独立国家而言，伊斯兰教是民族主义自身的一个要素。苏联解体后，伊斯兰教迅速在中亚国家得以复兴，不仅被视为地方民众的宗教

① 参见 Shoshana Keller, *To Moscow, Not Mecca: The Soviet Campaign Against Islam in Central Asia. 1917-1941*,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2001.

② 有关苏联官方二战后的伊斯兰政策及其在中亚的具体体现可参见 Yaacov Ro'i, *Islam in the Soviet Union: From World War II to Perestroika*, C. Hurst & Co. (Publishers) Ltd., 2000, pp.550-589; Ghonchen Tazmini, "The Islamic Revival in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n Survey*, 2001, Vol.20, No.1, pp.64-67.

③ 1998 年至 2000 年笔者受外交部公派赴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人文大学突厥语言文学系求学期间，我的老师们不止一次地提及他们在苏联时期悄悄举行穆斯林礼拜的仪式等官方无神论禁止的行为。

④ 苏联时期，中亚原有的近 24000 所清真寺一度被改为各种俱乐部和社团活动中心，严禁古兰经的印刷和传播，但依然有少量“非官方”清真寺展开地下活动。以塔吉克斯坦北部为例，该地区就有超过“非正式”200 所清真寺长期私相授受伊斯兰教义。转引自 Abdullahi A. An-Na'im, *Islamic Family Law in A Changing World: A Global Resource Book*, London: Zed Books Ltd, 2002, p.27.

信仰，同时也是各国执政大局促成新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形塑的重要手段，其目的是使伊斯兰教信仰深入中亚五国民众的内心里，将之不仅视为一种信仰，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方面可以填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消散所形成的真空，另一方面也争取降低转型的机会成本，减轻整个社会的心理负担。对于后者，正如一名中亚学者指出的：

当其他价值体系崩溃时，人们只能开始紧紧抓住宗教价值观——它履行了一种社会治疗的功能，使得生活的艰难更易于忍受……伊斯兰还被视为一种提升社会道德健康水平的路径。在大众意识中，道德和伊斯兰被认同为有必然关联，而伊斯兰的教化功能也正在得到确认。与后苏联转型期的衰退伴生的贫困和失业以及可以自食其力者因失业导致的自暴自弃，强化了伊斯兰作为向失去生活意义的受难者提供实际帮助的手段的功能。^①

可以说，伊斯兰复兴和国家重生在中亚国家成为相互交织的同步进程。对它们而言，伊斯兰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一个国家自我识别的手段，一种将自身从莫斯科获取精神解放的工具，一种剥离共产主义体系和作为外国殖民统治标志的斯拉夫文化的门径。^②

以乌兹别克斯坦为例，曾任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一书记的卡里莫夫在1991年第一次总统直选前夕不断以一种虔诚、恭敬的态度谈到伊斯兰及其在乌兹别克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在一次接受用乌兹别克语出版的《人民言论日报》（*Khalq Sozi*）采访时他明确表示，“伊斯兰就是我们许多同胞的良心、本质和生活”。^③苏联解体后出任新独立国家总统的就职典礼上，不仅专门提及伊斯兰信仰，而且一手执新宪法，一手持古兰经，显示了伊斯兰因素在新的乌兹别克国家身份构建中的重要作用。^④而在中亚五国中，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国旗上都使用了象征着伊斯兰的新月符

① Farideh Heyat, “Re-Islamisation in Kyrgyzstan: Gender, New Poverty and the Noral Dimension”, *Central Asian Survey*, 2004, Vol.23, No.3-4, p.281.

② Ahmed Rashid, *The Resurgence of Central Asia: Islam or Nationalism?*, London: Zed Books, 1994, p.224.

③ 这一访谈后来被俄语报纸《东方真理报》刊印。参见 Ислам Каримов. У нас есть свой путь// Правда Востока. 20 Декабря 1991 г. С.2.

④ Ghonchen Tazmini, “The Islamic Revival in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n Survey*, 2001, Vol.20, No.1, p.72.

号（参见图7），其余三国尽管在国旗等重要象征载体上没有直接的伊斯兰标示，但与乌、土一样通过引入纳乌鲁斯节（春节）、肉孜节、古尔邦节等伊斯兰传统节日强化了作为国家宗教的伊斯兰信仰。



图7 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国旗

作为民族/国家认同构建的重要内容，伊斯兰因素越来越多地介入了中亚国家的转型进程，担当了“去俄罗斯化”的前驱。伊斯兰教和中亚各国的民族主义就这样形成了相生相长的组合：伊斯兰意识帮助中亚新独立国家塑造“去俄罗斯化”的国家和地区身份，“在地化”的民族主义在有选择地融入伊斯兰世界的“国际化”进程中进一步强化伊斯兰意识。笔者认为，在宗教领域，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去俄罗斯化”首先体现为对无神论的抛弃，“在地化”的标志则在于宗教在日常生活中的复兴，而“国际化”的重要表征是中亚各国的伊斯兰教徒得以往麦加等穆斯林圣地朝拜等。

中亚国家的“再伊斯兰化”（re-Islamization）经历了相同或相近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伊斯兰文化和伊斯兰认同的复苏。这实际上是一个身份认同导向（identity-oriented）的阶段。这一时期，苏维埃政权历经70余年时间灌输的无神论在思想领域砰然崩塌，政治话语中充斥着宗教表征，与伊斯兰历史相关的古迹被重建，宗教学校得以建立，前往麦加和麦地那朝圣的通道被开辟。第二阶段具有明显的知识导向（knowledge-oriented）特征，即对伊斯兰的深层理解被列入正式议程，古兰经和伊斯兰教规变得至关重要。中亚各国民众不再是仅仅参与宗教祈祷仪式，同时还试图理解这一过程中阿拉伯文诵经的含义。这意味着一个穆斯林从外在到内在皈依伊斯兰的进程得以初步完成。第三阶段可以被视为“行为导向”（action-oriented）的历程。在这一时期，部分虔诚的穆斯林要求中亚各国执政当局按照伊斯兰教规实行国家治理。这并不意味着世俗化的政权模式将受到广泛质疑，但至少使其面临着较大的合法性挑战。

身份认同导向的阶段在中亚是以一种暴风骤雨般的方式迅速完成的，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新思维”和“公开性”为中亚的伊斯兰复兴敞开了大门，中亚五国独立后只是顺应民心民意继续推进这一历史进程而已。为了巩固新的国家身份及执政当局的正当性，各国不约而同地加强了伊斯兰教育。

表 4 中亚国家伊斯兰教育状况表

	伊斯兰宗教学校 (Madrassas)	高级教育机构	合法的替代性学校	私立学校/非法的小型研究室 (Hujras)
吉尔吉斯斯坦	大约 40 所独立和 1 所官办伊斯兰宗教学校	1 所伊斯兰大学, 6 所伊斯兰学院	数个非政府组织	许多
塔吉克斯坦	18-20 所混合性别的伊斯兰宗教学校	1 所伊斯兰学院	清真寺学校	许多
乌兹别克斯坦	8 个男性和 2 个女子伊斯兰宗教学校	1 所伊斯兰学院	无	许多

资料来源: Abramson, “Foreign Religious Education and the Central Asian Islamic Revival”, *Silk Road Paper*, 2010 March, p.47.

这种伊斯兰教育表现为“在地化”和“国际化”的两个平行发展的向度。一方面，中亚国家纷纷创建官方认可的伊斯兰宗教学校，在中学高年级和高等院校中开设了相应的伊斯兰宗教课程，向新一代中亚各国的公民传授有关伊斯兰深层理解的知识体系。（参见表4、表5）。

表 5 中亚世俗伊斯兰教育的正式机制

国别	公立学校课程	大学学位	研究生学位
乌兹别克斯坦	世界宗教课程	伊斯兰大学和东方学学院	伊斯兰大学和东方学学院
吉尔吉斯斯坦	法令草案规定将在中学 9-10 年级开设世界宗教课程	神学和其他学科	神学和其他学科
塔吉克斯坦	中学 8 年级开设伊斯兰知识课程	哲学系	哲学系

资料来源: Abramson, “Foreign Religious Education and the Central Asian Islamic Revival”, *Silk Road Paper*, 2010 March, p.47.

与此同时，由于国家教育体系的构建远未完成以及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包括塔吉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各国对伊斯兰教育的需求正在持续增长，特别是那些经济和政治上均日益边缘化的某些地区。依据官方版本对伊斯兰教义的解读已经难以满足这些新独立国家的现实需要，地下宗教学校的泛滥也

就变得自然而然。①问题在于这种地下的宗教教育在很多时候都为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的滋长提供了富足的社会土壤，成为中亚地区潜在不稳定的重要根源。因此，近年来甚至是被认为中亚发展速度最快、国内局势最稳定的哈萨克斯坦也受到再伊斯兰化“行为导向”历程的影响，恐怖袭击开始频频发生。②

表 6 中亚人在国外学习伊斯兰的人数评估（2009 年）

	埃及	沙特阿拉伯	土耳其	伊朗	巴基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100-200	100-150	100-200	不清楚	20 +
塔吉克斯坦	500-1000	350-700	微不足道	200 +	300
乌兹别克斯坦	100-600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资料来源：Abramson, “Foreign Religious Education and the Central Asian Islamic Revival”, *Silk Road Paper*, 2010 March, p.48.

表 7 2008/2009 学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
(Al Azhar University) 登记注册的中亚学生数量

来源国	学生人数
哈萨克斯坦	93
乌兹别克斯坦	43
吉尔吉斯斯坦	38
塔吉克斯坦	156
土库曼斯坦	33

资料来源：Abramson, “Foreign Religious Education and the Central Asian Islamic Revival”, *Silk Road Paper*, 2010 March, p.48.

另一方面，从表 6 和表 7 可以看出，中亚国家自独立以来在国外学习伊斯兰教义的留学人员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埃及、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国是中亚习得伊斯兰知识的主要来源国。

中亚国家民众的伊斯兰知识的养成和伊斯兰意识的深化还可以从这些国家信徒的朝圣活动从国内化到国际化的转变中窥见一斑。在苏联时期，只有极少数的穆斯林能被获准前往圣地，而且多为官方伊斯兰机构的高官，每

① Рахнамо А.Х. Частное религиозн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проблемы и выводы// Ислам в Содружестве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4 (5)2011. <http://www.idmedina.ru/books/islamic/?4174>

② 有关中亚地区的恐怖活动统计数据，可参见杨成：“上海合作组织政治与安全形势综述——以金融危机以来中亚成员国为案例”，冯绍雷主编：《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201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50-52 页。

年少于 100 人。^①苏联治下的穆斯林逐渐发展出一种信念，即足够数量的对本地圣地的朝拜将等同于一次远赴阿拉伯世界朝觐。布哈拉、撒马尔罕以及奥什附近的圣地最受尊崇。这种被称之为“小朝圣”的现象，在整个中亚地区都很盛行。甚至一些党员都参与其中。戈尔巴乔夫晚期的苏联《文学报》曾专门刊文讨论这一问题。^②1989 年 3 月，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穆斯林大会在塔什干召开，并任命了年仅 37 岁的穆罕穆德·尤素福（Muhammad Yusuf）出任新的穆夫提，取代过于亲苏共中央的波波汉（Shamsutdin Bobokhan）。尤素福上任后很快组织了苏联历史上的第一次穆斯林朝圣，结果是 1990 年整个中亚共有 1400 人得以踏上神圣的宗教之旅。^③中亚穆斯林的这一历史性到访麦加，改变了苏联境内的伊斯兰信徒朝圣活动不得已而为之的国内化常态，书写了苏联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史的新篇章。^④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领导人进一步意识到了利用伊斯兰信仰填补意识形态真空的重要性。为此，他们几乎全部以贵宾身份去过麦加朝觐。^⑤

表 8 中亚国家城市与农村的穆斯林五功遵行状况

	主要城市		农村地区	
	念功	236	73.8%	163
斋戒	150	46.9%	161	57.5%
朝觐	29	9.1%	33	11.8%
不食猪肉	179	55.9%	106	37.9%
不饮酒	109	34.1%	105	37.5%

资料来源：Y. Ro'i and A. Wainer, “Muslim Identity and Islam Practice in Post-Soviet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 Survey*, 2009, Vol. 28, No.3, p.316.

值得注意的是，后苏联时期的中亚，和伊斯兰世界的很多国家爱一样，其伊斯兰实践并不以念功（口诵安拉）、拜功（礼拜）、斋功（斋戒）、朝功（朝觐圣地）和课功（法定施舍）等五功为中心，也并未将此视为与其伊

① Markus Kaiser, “Forms of Transsocioation as Counter-Processes to Nation Building in Central Asia”, note 44, p.330.

② Shahram Akbarzadeh, “Islamic Clerical Establishment in Central Asia”, *South Asia: Journal of South Asian Studies*, 1997, Vol.20, No.2, p.78.

③ Shahram Akbarzadeh, “Islamic Clerical Establishment in Central Asia”, *South Asia: Journal of South Asian Studies*, 1997, Vol.20, No.2, pp.83-84.

④ Markus Kaiser, “Forms of Transsocioation as Counter-Processes to Nation Building in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 Survey*, 2003, Vol. 22, No.2-3, p.325.

⑤ Svante E. Cornell and Regine A. Spector, “Central Asia: More than Islamic extremist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2002, p.195.

伊斯兰认同的矛盾之处。调查显示，97%的受访者至少谨守五功中的一种，如表 8 和图 8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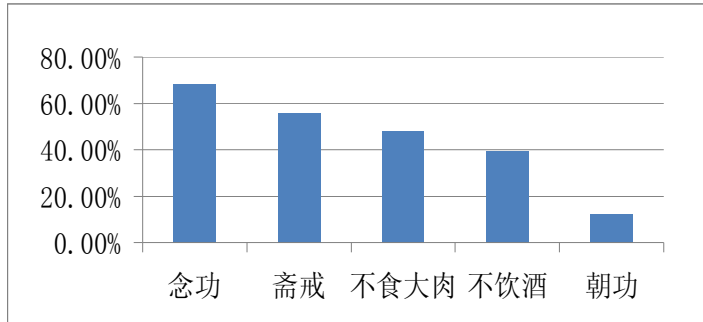


图8 中亚各国穆斯林五功遵行总体状况

资料来源：Y. Ro'i and A. Wainer, "Muslim Identity and Islam Practice in Post-Soviet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 Survey*, 2009, Vol.28, No.3, p.308.

另一方面，自独立以来，中亚国家同时谨守斋戒和朝功的人数在不断增长，即便是乌兹别克斯坦多有限制，但前往圣地朝觐的人数依然在增加。比如，2005年，乌兹别克斯坦宗教事务委员会只批准了总数超过6000名朝圣者中的4200名前往沙特。^①而土库曼斯坦的管制更为严格，2005年和2006年总数只有188人。^②哈萨克斯坦2003年即已达到5000人。^③那些前往麦加圣地朝觐过的穆斯林归国后将备受尊崇，一般都会成为地方上协调社会、政治甚至是经济事务的邻里自治机构“长老会”（aksakal）的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④

同时，上文提及的“小朝圣”现象在后苏联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以拥有诸多中亚圣地的布哈拉为例，“小朝圣”已经成为伊斯兰信徒展示其对真主安拉的虔诚信仰的主要的和常见的手段之一。^⑤一些伊斯兰信徒每年

① www.forum18.org

② Ibid.

③ Казахстанская правда. 25 мая 2004 г.

④ G. A. Bakiyeva, "Islam as a socio-cultural code", in *Collection of Materials UNESCO International Forum 'Culture and Religion in Central Asia'*, Kyrgyzstan: National Commission of the Kyrgyz Republic for UNESCO, 1999. 转引自 Farideh Heyat, "Re-Islamistion in Kyrgyzstan: Gender, New Poverty and the Noral Dimension", *Central Asian Survey*, 2004, Vol.23, No.3-4, p.281.

⑤ 转引自 Y. Ro'i and A. Wainer, "Muslim Identity and Islamic Practice in Post-Soviet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 Survey*, 2009, Vol.28, No.3, p.310.

要到中亚地区的圣地朝觐数次。调查数据显示, 39%的受访者或本人, 或其家庭成员经常进行“小朝圣”活动, 这其中的30%一年一次, 超过40%一年两到三次, 近10%一年四到六次, 大约15%的受访者在七次及七次以上。^①

总之, 经过20余年的发展, 曾经深受苏联“无神论”影响的中亚社会已经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一项调查显示, 46.9%的受访者认为中亚社会变得更具宗教性, 仅有7.3%的人认为并无任何变化, 0.6%的受访者认为中亚各国的社会出现了负面变化, 0.3%认为社会的宗教化程度在降低。就宗教仪式而言, 城市居民中18.1%的受访者每周五去清真寺做礼拜, 3.8%在工作日同样参拜清真寺, 33.8%在主要宗教节日前往清真寺, 一年只去一次的占11.3%; 农村居民中, 6.8%平日会参拜清真寺, 18.2%只在周五主麻日去, 18.6%选择在主要的穆斯林传统节日参拜, 13.2%的受访者一年只去一次。^②这至少意味着, 中亚新独立国家的个体身份中的伊斯兰定位正在不断巩固。

七、中亚国家集体身份的生成与巩固

冷战结束后, 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了地区向度的转向。^③美国著名学者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明确使用了“地区构成的世界”(a world of regions)这一术语来描述地区秩序之于国际格局的重要作用。^④后冷战时期, 各个地区正在通过不同程度的地区治理日益主张自身的行为体和利益攸关者的属性, “地区性”(regionness)、“地域性”(regionhood)、“地区认同/地区身份”(regional identity)等概念与“国家”、“国际社会”等传统概念趋于同等重要甚或过之。各个地区开始煞费苦心地寻求自身的身份认同和本我形象, 试

① Y. Ro'i and A. Wainer, "Muslim Identity and Islamic Practice in Post-Soviet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 Survey*, 2009, Vol.28, No.3, p.310.

② Ibid, p.314.

③ 新的研究范式倾向于认为, 国际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被地区动力所操控, 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冲突与合作主要镶嵌在各地区事务之中。后冷战时代的典型特征就在于地区主权(regional sovereignty)的回归, 而国际政治架构将取决于地区结构, 地区在理解未来的国际秩序问题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参见杨成: “形成中的中亚地区格局: 尚存的单极残余、不稳定多极和其他选择”, 《俄罗斯研究》, 2009年第6期, 第15-16页。

④ [美]彼得·卡赞斯坦: 《地区构成的世界: 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 第14页。

图将自己和其他地区作严格区分。这样一来，地区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已不可避免地成为“地区构成的世界”中的重要内容。

1993年1月，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五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举行会晤并宣布五国作为一个集体应被视为“中亚”(Central Asia)。这意味着苏联时期通常使用的“中亚与哈萨克斯坦”(Middle Asia and Kazakhstan)被新独立中亚国家弃用。国际政治舞台中一个新的地区由此诞生。不久之后，中亚五国领导人试图建立一个类似独联体、包含俄罗斯的中亚地区组织。从某种程度上说，中亚的出现与生成是后苏联时期最根本的变化之一；这一特别重要的现象在国际舞台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就这样，一个围绕“中亚”的话语体系被逐渐构建起来，它包含了旨在建构和解构中亚作为一个独特地区的一组构想、表述和论证，前者强调中亚需要地区一体化和合作架构，后者则质疑中亚地区性的存在与否及地区一体化的可行性。

地区通常有三种定义方式：第一种是物质主义的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定义，其核心是领土问题；第二种是理念主义的批判地缘理论的定义，其中心思想在于地区是由政治因素造就的；第三种是行为主义理论的定义，集中讨论地区是怎样被政治实践活动塑造和再造的。^①一般来说，一个地区的形成及被认可的过程同样体现了权力分配。往往是地区事务的主导者或国际体系中的强权或霸权国家根据自身的利益和意愿来推动。这是一种由外而内的视角。另一方面，虽然在以实力等传统要素为指标的评估体系中，小国的位置明显很低，但当代国际生活中小国的地位和作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上升态势，并有诸多机会去营造本身的优势而影响国际体系和地区秩序。^②这意味着有可能存在自内而外的内生性地区概念。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中亚地区在某种意义上较为典型：一方面，新独立的五国在民族/国家认同构建的过程

① [美]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第6页。

② 笔者首次对作为小国的中亚五国在地区秩序形成中的作用作出了较为粗浅的讨论，参见杨成：“形成中的中亚地区格局：尚存的单极残余、不稳定多极和其他选择”，《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6期，第36-40页。作为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共建项目（第一期）成果，笔者提交了长文“小国行动的逻辑与形成中的中亚地区格局——兼论上海合作组织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合作模式”，从理论上进一步梳理了小国在国际和地区格局中的行为逻辑与作用。

中，也参与到了地区身份的生成；另一方面，外部大国和国际组织始终在参与着新独立国家组成的新的地区身份的塑造进程。

本文希望结合上述三种地区定义以及内生和外向的两个视角，寻求一种“折中主义”。一般来说，单个国家的集体身份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基于地理基础的归属认同，主要是指意识到本国属于自己所在的地理范围。这是最低层次的中亚国家集体身份。第二个层次是在第一个层次的基础上产生一种区域国家优先合作的意识，即中亚国家主动寻求建立、扩大并发展某种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进而在合作的过程中加强成员国的相互信任与相互认同。第三个层次则是超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意识，即主动接受区域内的超国家机构或治理结构对本国国内事务的管辖，把对区域利益的认同置于民族国家利益认同之上，在一个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发展等广泛领域中，从一个相对异质性较多，相对缺乏一致性向相对的趋同，利益上相互交织、嵌入、相互依赖和共同认同的转化过程。^①

就中亚而言，冷战的终结、苏联的解体使得中亚新独立国家可以卸除冷战的压力和阴影，摆脱莫斯科的直接监管，在一种更加多元的国际和地区格局中加强自身的地位。但中亚国家在集体身份生成与巩固的过程中，各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领土特征和社会的相对同质性造成了两种不同向度的冲击：一种力量将各国的政治和经济活动推向更大的地区环境；另一种力量则将其压缩至本国国土疆界甚至更小的地方范围内。这是一个动态的转换过程，往往跟执政当局跟体制安全相关的利益所受保障和威胁程度具有相应的正相关性。^②

中亚国家在苏联解体之后的地区认同构建与地区一体化/去一体化进程具有同步性。中亚作为一个地区往往与中亚地区一体化紧密相连。这似乎已经成为一个人人皆知的不言自明的公理。而其意识形态支柱似乎主要在于中亚各国的历史、种族、文化、地理共性及其民族/国家认同中的穆斯林和突厥成分。一般而言，地区一体化的实质在于所在地区的国家从一个较低向较

^① 本段表述借鉴了张度的论文“比较视角下的东北亚区域意识：共同命运对集体认同的关键影响”（《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第114-115页）。

^② 有关体制安全对中亚国家发展的影响参见杨成：“形成中的中亚地区格局：尚存的单极残余、不稳定多极和其他选择”，《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6期，第18-20页。

高程度的相互依赖发展，从一个霍布斯的无政府状态向有组织的共同体变迁。^①它经常被地区凝聚力（regional cohesion）、地区共同体（regional community）或高度整合的地区市场（a highly integrated regional market）等指标所衡量。这为塑造新的地区认同创造了前提条件。地区一体化程度越高，地区认同的质量和层次就相应越高。由此，中亚国家的集体身份可以定义为由这一特定地理空间内不同国家构建的跨问题领域的高度行为相互依存状态的共同属性，是其区别于其他外部“他者”的根本特征。^②换言之，中亚国家的集体身份或者说中亚的地区身份^③既表现为一种地区内部的趋同性，又表现为一个相对于外部世界的差异性以及在此差异性基础上的求同性。

问题在于中亚的地区一体化与当今世界普遍视为一体化样板的欧盟不同，这是一个与之逻辑迥异、进程不同的另一种类型的集体身份构建。一般而言，一体化的前提条件首先是承认存在独立的主权国家。但除了欧洲之外，全球范围内还有不少曾经共存于一个殖民国家或帝国体系之中的新独立国家，它们之间的一体化进程往往是与主权的获得同步的。中亚五国显然属于此类。俄罗斯学者、独联体一体化研究的佼佼者亚历山大·利布曼（Alexander Libman）注意到了这一差异，并假定后殖民国家所在的地区一体化与欧盟教科书式的一体化逻辑有很大差异。利布曼将欧盟框架内的地区整合命名为聚合式一体化（coming-together integration），而将后苏联空间内的一体化命名为维系式一体化（holding-together integration）。在他看来，维系式一体化是一个由一组曾经共属一个单一政治—经济体（单一制国家或殖民帝国）的国家倡议的、初始阶段即已拥有较高程度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依赖的地区一体化。^④换言之，地区共同体不仅是未来发展的目标，同时也是曾经过往的历史，这就给中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再造提供了不同于欧盟的起点。

① 参见 Либман 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н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й аспект//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2005. №3.С.142-156; A. Libman, E Vinokurov., *Holding-together Regionalism: Twenty Years of Post-Soviet Integration*, New York: Palgrave-Macmillan, 2012, pp.11-12.

② 这一概念借用了卡赞斯坦对于地区的界定。参见[美]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第14页。

③ 本文在同等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

④ A. Libman, E Vinokurov., *Holding-together Regionalism: Twenty Years of Post-Soviet Integration*, pp.11-16.

表 9 维系式一体化和聚合式一体化之区别

	聚合式一体化	维系式一体化
起点	一组已有的主权国家	一组在前政治实体消亡后新产生的独立国家
目标	至少在长期意义上更大程度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整合	在原有联盟框架之外或维持曾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或提高其水平
单个国家间的相互依赖	相对较低	相对较高
一体化工具	新建	新建，但过去的某些机制仍发挥作用
一体化/去一体化成本	一体化成本高于维持现状成本	去一体化成本高于维持现状成本
成员国的国家构建方案	已完成，对地区主义不产生影响	仍在进行中，和地区主义形成强烈互补

资料来源：根据 A. Libman, E Vinokurov., *Holding-together Regionalism: Twenty Years of Post-Soviet Integration*, pp.15-16 表 2.1 制作，略有调整。

如表 9 所示，维系式一体化与聚合式一体化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维系式一体化从推进伊始各成员国间就保持着高度的相互依赖，其程度一般要高于从零起点推动的聚合式一体化。第二，维系式一体化往往和其参与者的国家构建进程同步进行。在极端情况下，成员国不得不在通过建设一个政治体系、公共管理系统、有望发展的经济和相应的国家/民族认同以“创造”自己的同时与其他国家展开互动。第三，二者在一体化和去一体化的成本—收益比方面截然相反。尽管二者都是从打破现状中获益，但维系式一体化进程中去一体化的成本高于维持现状，而在聚合式一体化进程中一体化的成本高于维持现状。第四，维系式一体化因其参与者共属同一政治经济实体的历史而可能使部分机制在前帝国解体后仍然发挥功能，不必在零起点上构建合作进程。在苏联计划经济体系下，各加盟共和国形成了从产业到技术分工精确的经济生产—消费链条，它们彼此之间高度互赖，缺一不可。这样一来，苏联解体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浑然一体、能实现自循环的经济机器从此难以为继，这给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新独立国家带来了巨大震荡。这样一来，中亚地区维系式一体化的初始和首要目标正在于维持这些新独立国家之间一定程度的经济和政治整合，以免苏联解体造成的代价过于巨大。

利布曼认为，维系式一体化的目标应该在于从维持经由去一体化走向再一体化的U型发展。^①也就是说，在这一逻辑的指引下，单一制国家的解体势必在一段时间内使得去一体化在所难免，但曾经拥有的集体身份认同将在

① A. Libman, E Vinokurov., *Holding-together Regionalism: Twenty Years of Post-Soviet Integration*, p.13.

随后推动各国出于种种目的再度形成了种类繁多的政府间合作机制，最终促进再一体化的实现。在笔者看来，作者的本意是在为俄罗斯重新主导中亚地区的一体化提供一种理论解释，这一探索注意到了一体化初始的零起点和非零起点导致的不同逻辑，但有关再一体化的推演可能有着明显的不足，与中亚地区所发生的复杂纷乱的实际发展存在着明显的鸿沟。

应该承认，中亚国家集体身份的生成和巩固所要面临的最大的外部因素就是俄罗斯。这些新独立国家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需要借助于“他者”来构建新的“本我”。而将他者的功能赋予前宗主国通常是最简单、最诱人的战略。如同前文在论证中亚国家个体身份形成的部分所言，包括中亚五国在内的很多新独立国家都致力于塑造一个外来侵略者和民族自我解放的神话。问题的实质就在于，中亚国家尽管已经独立 20 余年，但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深深地镶嵌于俄罗斯的帝权体系之中。^①这种关联度正在变现为相互矛盾的疏离与整合并存的复杂权力结构上。俄对中亚政策的主要目标仍然包括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比如认为在中亚一体化进程中扮演主角并起组织作用的自然当属俄罗斯。于是，我们看到在国际层面，俄罗斯关注建立与保持同其他大国的平等地位。然而俄罗斯对于近邻地区的态度仍然是等级制的、注重权力因素并且是主张干预主义的。^②俄罗斯的帝权既反衬了中亚地区或多或

① 俄罗斯当下的中亚政策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基于昔日的宗主国/边缘依附关系而设计的，在战略上并未放弃“势力范围”的窠臼。相对于其他大国，俄罗斯对中亚的影响仍然保持着优势地位，中亚国家短期内难以也无力完全摆脱俄的影响：中亚国家的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阶层多在莫斯科或圣彼得堡等地获得学位，中亚领导人迄今仍与俄精英网络藕断丝连；相当一部分中亚军事和情报机构人员同属于前苏联的统一体系的统一塑造；经济领域的国家俘获等都源自前苏联的历史遗产；文化领域中亚民众仍然依赖于俄语和俄文节目开眼看世界。参见 Marlène Laruelle, “Russia and Central Asia”, in Emilian Kavalski (Ed.), *The New Central Asia: The Regional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Actors*,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2010, p.150.

② John Gaddis, Andrew Hurrell, *Order and Just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206. 转引自冯绍雷、相蓝欣主编：《转型中的俄罗斯对外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0页。

少的排俄和防俄主义以及与之共生的亲俄主义，又不由自主地使该地区国家在表面上“去俄罗斯化”和实质上可能的“再俄罗斯化”^①之间摇摆不定。

在笔者看来，中亚国家集体身份的生成和巩固伴随着三种一体化进程：一是利布曼定义的维系式一体化；二是当下俄罗斯正在推动的捆绑式一体化（putting-together integration）；三是初显轮廓、前景远不确定的聚合式一体化。在某种意义上，维系式一体化先验地暗含着退化性；捆绑式一体化则容易引发国家/民族构建与一体化本身间的矛盾，从主权让渡的自觉性视角看可能因主导大国的强制力而包含着一定的退步性；聚合式一体化因其照顾到成员国的平等地位和强调一体化演化的自然特征而具有进步性。这三种范式彼此共存，并且频繁地相互影响，直接造就了中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复杂性。

苏联解体后，包括中亚五国在内的成员国曾对独联体抱有幻想，认为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历史上形成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各种联系，能使其迅速演变为“完全意义上的一体化联合体”。直至1994年9月，俄与中亚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尚未被完全切割，彼此采用统一的货币单位——卢布进行经济结算。随后，以卢布区的瓦解为标志，独联体经济“去一体化”达到了第一波高峰。从1995年开始，俄罗斯根据独联体一体化多层次的特点，试图“在自愿基础上，深入地分阶段地吸收独联体国家参与一体化进程”。^②这实际上启动了俄罗斯主导的捆绑式一体化的进程。当年1月，俄罗斯首先与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签署了建立三国海关联盟的联合备忘录，1996年3月，吉尔吉斯加入海关联盟，四国签署了加深经济和人文领域一体化条约，规定四国要实行比独联体其他成员国更为紧密的经济一体化。^③1999年，塔吉克斯

① 后苏联时期中亚各国的“去俄罗斯化”政策并不能掩盖在某些领域“再俄罗斯化”的结果，比如政治体制和国家治理方面中亚国家与苏联时期的区分度相对不大。本来中亚国家民族意识的伸张主要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即亨廷顿所谓民主的第三波浪潮的关键一环中启动的。换言之，中亚国家独立之初的领导人都是将民主构建（democracy-building）作为原始任务的，但这一政治议程很快发生了偏转，并先后经历了从普世民主（universal democracy）过渡到国家特色的民主（national democracy）再到开明专制（enlightened authoritarianism）的发展阶段。相应地，第一阶段的指导意识形态是民主理想主义，第二阶段调整为民主相对论，第三阶段则变成了民主蒙昧主义。

②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3 сентября 2006 г.

③ Договор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Белоруссия,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Казакстан и Кирги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об углублении интеграции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областях от 29 марта 1996 г//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30 марта 1996 г.

坦正式加入该联盟，海关联盟因而扩大为五国。^①但是，1998年金融风暴的突然发生不仅对俄罗斯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也使得新一轮以俄罗斯为主导的独联体一体化进程陷入新的困境，独联体国家与俄“去一体化”的倾向再度抬头。新世纪以来，中亚五国逐渐成为世界主要力量中心在军事战略、地缘政治和经济领域竞争的平台。普京为了适应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的调整和国际权力转移的新态势，于2011年正式推出“欧亚联盟”战略，试图重新整合并主导包括中亚在内的“近邻外国”空间。^②

中亚五国独立之后曾数度致力于推进各种维系式和聚合式地区一体化方案。如同上文所述，1993年，中亚领导人于塔什干宣布其所在地区将使用“中亚”而弃用苏联时期的“中亚与哈萨克斯坦”。1994年1月，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签署了两国建立共同经济空间的协定，吉尔吉斯斯坦随即加入。1994年4月，上述三国总统决定建立旨在推动地区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口自由流动的中亚经济联盟，并建立了国家间委员会和中亚合作开发银行。结束内战不久的塔吉克斯坦于1998年加入了中亚经济联盟。此时它已被改称为中亚经济共同体。2001年，该组织再次被更名为中亚合作组织，其目标也更多是为中亚地区合作提供公共产品而非成立地区经济联盟。但中亚作为一个同质地区且有可能实现区内一体化的理念自本世纪初开始受到了严重制约，其中俄罗斯于2004年加入中亚合作组织和乌兹别克斯坦于2005年加入欧亚经济共同体的负面作用最大。由于中亚合作组织与欧亚经济共同体在各方面都具有雷同性，各成员国领导人最终决定合并两组织。这也意味着，基于中亚各国自身的区内一体化构想最终宣告失败。在中亚本土专家看来，这一结果一方面说明中亚国家无力构建一个成功的地区合作框架，另一方面也展示出各国自愿臣服于与本地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旧宗主国——俄罗斯。乌兹别克学者托利波夫（Farkhad Tolipov）指出：

① Договор о Таможном союзе и Едино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от 26 февраля 1999 г.

② 参见杨成：“西接欧盟东扩之招 东拓邻国合作空间：普京‘欧亚联盟’构想雄心勃勃”，《文汇报》，2011年10月10日；王树春、万青松：“试论欧亚联盟的未来前景”，《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2期，第191-208页。

俄罗斯以全权成员身份加入中亚合作组织及其在塔吉克斯坦军事基地的开启实际上与其说是俄罗斯的进攻行为，不如说是中亚国家的屈服。……不幸的是，地区国家非但既不能展示其完全的独立性也不能表现其期待已久的团结，相反证明了它们在容易产生冲突的地区事务中对于调停者的需求，因而破坏和忽略了只限于中亚国家参与的一体化的自我价值。^①

由此可见，当下的中亚仍属于一个有限的自由流动状态，由于深嵌于俄罗斯帝权体系之中而受其制约。当俄罗斯当局看到中亚重要的安全和经济利益遭遇外来挑战或内在风险时，在其国家实力许可的情况下，它就会支持各种由其主导的地区一体化方案或与中亚地区内个别大国构建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而予以化解。这种情况下，中亚地区表现出高度矛盾的特征，它既可以在适当时候变大^②，也可能缩小^③；它可能表现出封闭性^④，也可以表现出开放性^⑤。无论如何，我们在讨论中亚国家的个体与集体身份时绝不能忽略俄罗斯的特殊角色。当然，我们也不必夸大俄的影响，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尤其是在中亚地区权力范围广泛，但似乎同样缺乏深度和后劲，它非常壮观，但仍不够充盈。俄罗斯如果试图重新主导中亚，重新将自己的秩序观强加于一个权力结构日益复杂、难以独立驾驭的中亚，那么它很可能会以失败告终。相应地，如果新独立国家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寻找到足以替代或补充莫斯科

① 2012年6月25日笔者在韩国汉阳大学参加中亚论坛会议期间与乌兹别克学者的交谈记录。

② 比如，在美国领导的北约部队即将从阿富汗撤军的情况下，阿富汗已经被俄纳入中亚地区事务的议程，上海合作组织已经多次讨论这一问题。

③ 比如，俄白哈海关同盟以及正在紧锣密鼓推进中的统一经济空间和欧亚联盟的建设就没有包含中亚五国全部。

④ 2011年底在上海召开的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俄中分组会第二次会议期间，俄方学者在提交大会讨论的报告中明确对上海合作组织与欧亚联盟可能导致中俄关系的潜在紧张表示担忧。参见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俄罗斯国防与外交政策委员会：“21世纪的中国与俄罗斯：地区挑战与机遇——‘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俄中分组讨论提纲”，《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1期，第25-26页。另据自2006年起即连续参加瓦尔代会议的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透露，俄总统普京在2012年9月召开的瓦尔代辩论俱乐部期间明确表示上合组织和欧亚联盟是两个功能不同的制度设计，暗示中国无权加入后者的一体化进程。

⑤ 如反毒等非传统安全合作，尽管与西方在恐怖主义等概念的认定上并不相同。

的新伙伴，去一体化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在新的复杂地区权力结构下难以实现再一体化。与欧洲、东南亚甚至是至今仍然存在大量冷战残余结构的东北亚相比，中亚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程度似乎相对较低。一方面，这与中亚新独立国家参与到地区和国际事务进程的时间较晚相关。另一方面，中亚国家相互之间的合作意识本就不强，最早属于维系式一体化的一部分，试图构建自己的地区合作方案，以避免在新的后苏联秩序中被进一步边缘化，但受制于种种历史遗留问题和矛盾而停滞不前。^①这直接导致部分国家对进一步的合作，尤其是这种聚合式一体化的前景丧失信心。

应该承认，当下的中亚首先是由苏联解体塑造和被原苏联五个加盟共和国的一体化努力再造的政治空间和政治过程，并受到了国际与地区权力转移的强烈影响。它不是自然给定的物质，而首先是基于国际一国内联动性发生的社会建构。此时，内生性的发展动力尤为重要，中亚在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不再被视为由外部大国或某些集团选定的集体符号，进而被其用来主导地理世界上某些具体的地域，而是一个拥有自我动力、逻辑并在外部冲击下自主反应的、由单个国家组成的集体行为体。问题在于，尽管中亚各国在苏联解体后有一个相似的经济社会变革，但中亚国家由于其民族/国家身份的再造时间较短，对于领土、主权等问题的意识依然非常敏感，没有明确的整合中心点和共同传统，各国具体的差异以及彼此国际合作的结构直接影响到其集体身份的生成与巩固。以“俄罗斯化”为动力的维系式、捆绑式和以“在地化”为动力的聚合式一体化之间的相互博弈前景并不明朗。而作为对“俄罗斯化”的一种反动，中亚各国在对外合作的“国际化”方面不遗余力。从这一意义上讲，中亚作为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分析中的一个概念，实际上仍是一个自我与他者共建的、形成中的、叠加的范畴。（参见表 10）

① 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所长苏尔坦诺夫 (B. Sultanov) 2012 年 10 月 19 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和德国艾伯特基金会联合举办的“中亚：大国的交汇与合作”国际会议上指出，“很遗憾的是，尽管中亚五国领导人都一再重申拥有共同的历史、文化、语言、民族和宗教的共性，但是推出的很多很好的一体化项目，目前还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尽管哈萨克斯坦一直非常努力致力于推动中亚五国之间的集体合作，但问题依然非常复杂，也许在中期内还很难得到解决。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曾提出成立中亚国家联盟的倡议，但没有获得另外四国的支持”。

表 10 后苏联时期的中亚国家的复合集体身份（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作为独立地区	作为后苏联空间的一部分	作为欧亚大陆一体化的一部分（中部欧亚、大中东、大中亚等）	作为意识形态的欧亚主义的承载者	作为碎片化的地区
组成要素来源	苏联解体	苏联遗产	形成中的经济联系	文化、历史和地缘政治共性	语言/文化差异；历史纠纷等
对欧洲的认知	排除在外	排除在外	包含在内	排除在外（作为欧洲中心论的他者）	排除在外
对俄罗斯的认知	前宗主国	天然盟友	排除在外	包含在内	包含/排除双重性
对亚洲的人认知	排除在外	排除在外（可能包含蒙古和中国新疆）	包含在内	部分包含在内	包含/排除双重性
对西方化和现代化的认知	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尽早实现现代化，进而加强独立地区的集体身份	成为西方一部分的有限可能性	学习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战略；较少关注意识形态而更多关注经济合作	拒绝通过西方化实现现代化，寻求特殊道路	赞同/反对/中立
身份性质	地理和政治定义	地理和政治定义	外交或经济外交政策组合	意识形态	X
定义方式	自内而外	自外而内	自外而内	内生/外生	内生/外生

塔吉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中心国内政治分析与预测处哈吉姆（A.R.Khakim）研究员甚至认为，

在各种利益争夺进一步激化、中亚内部问题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今后是不是还会存在一个中亚地区完整的政治概念，我们也还是抱有疑问的……如果看一下中期前景，本地区的地缘图景很可能发生深刻、根本的变化……随着各种各样的内外摩擦进一步升级，我们将很难再把中亚视为一个统一的地区、一个整体。今后中亚作为一个地缘政治概念，或者作为一个政治概念，也许会从国际政治问题中消失。^①

在笔者看来，中亚作为一个地区一直处于流动状态。历史上，中亚曾经被视为丝绸之路上一度繁荣昌盛并深度融入世界体系的地区。后来，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中亚作为陆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的重要性不断降低，使之逐渐自我孤立于外部世界。沙俄及随后的苏联统治时期，中亚的地区属性

^① 哈吉姆 2012 年 10 月 19 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和德国艾伯特基金会联合举办的“中亚：大国的交汇与合作”国际会议上的评论发言。

进一步被弱化，几无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独立联系且因被划分为数个加盟共和国而日益碎片化。苏联骤然解体一度被视为中亚国家重新获得地区统一性并通过发展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打破社会经济孤立的历史机遇。国际学界在中亚五国独立初期基本上都认为这五个新独立的“脆弱”国家因共享很多种族、文化、语言、地理和宗教联系且面临诸多相同或相近的政治独立、经济发展、地区治理、地缘政治转型等挑战而自然而然地成为相互交织、相互关联的国家组合。事实的发展与此似乎相悖：土库曼斯坦从最初阶段就更多地游离于中亚其他四国的集体之外；而哈萨克斯坦在近年来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一种优越感，越发不愿意自列于“不发达”的中亚国家之林，而倾向于使用类似苏联时期的历史称谓“哈萨克斯坦与中亚”界定自身的地区身份。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中亚国家的集体身份首先基于各国国内的民族/国家构建，然后才在全球化、国际化、地区化的三重议程中试图再造一个新的集体身份与地区秩序。这种地区认同并没有取代更为浓重的民族、次民族和地方认同，而只是起到了补充作用。在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内部国家引领构建的情况下，分歧多于共识、竞争多于合作、矛盾多于一致可能会是中亚地区秩序的常态，碎片化的中亚国家集体身份仍将持续相当长时间。但不管如何，“后苏联空间”业已终结，其标志是独联体作为地区性国际组织功能的日益弱化，新独立国家政治发展方向的变迁，外部力量在后苏联空间内的地位和影响不断增长，由本地区国家和其他超出后苏联空间的行为体共同参与的新的地区组织不断涌现。^①随着这些国家自身的民族/国家建设进程的加速，一种新的地区构建需求势将日益迫切。

八、结束语

在沙俄征服中亚并将其并入帝国版图之前，中亚并无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塔吉克、土库曼斯坦民族国家这样的政治实体。布哈拉、希瓦和撒马尔罕汗国以及此前的各类汗国都只是由某一个统治者统领的部落联盟。

^① Россия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в конце XX-начале XXI века. том первый.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я. М.: Наука. 2005 г. С. 306-307.

中亚五国的现有国界源于上个世纪 20-30 年代苏联的民族政策。毫无疑问，中亚五国是当今国际社会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的后来者。

苏联时期，经过联盟中央国家机器的强力推动，辅之以数十年的共同生活、标准化的教育体系以及共有的生活形态，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民众，包括当地的主体民族都养成了“苏联人”的身份认同。^①这种统合苏联境内所有个体、各种民族/种族及宗教的强大意识形态体系促使人们首先认可自己是超级大国苏联的公民，并在相当程度上防范和阻遏着独立民族/国家身份的滋长。

与苏联一朝崩解相伴的是必然是苏联认同的消弭，这意味着所有新生的中亚国家在多年来享受苏联治理的稳定后不得不应对如何建构新的国家身份的重要任务。这正是当政者的合法性、正当性以及统治力的来源。它刺激了中亚国家，尤其是其主体民族对本国的个体与集体身份的新理解。

在此背景下，新生的中亚五国通过时间重构（重新打扮民族历史）、空间重构（城市和符号建设）以及人的重构（宗教与教育）等方式，在“去俄罗斯化”和“在地化”以及“国际化”的三重路径中构建自己的民族/国家身份，推动民族国家凝聚力的形成。各国统治者有意识地对先前存在的价值观、象征物、历史记忆进行了重新选择、重新组合和重新构造，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向本国民众释放出国家应该是主体民族所有和主体民族所享的相关信号。无论是在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章程中的书写，还是在实际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生活中都在践行着上述原则：主体民族的语言变成了国语，并在行政、立法、司法、教育、公共传播等事务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主体民族的文化在国家象征符号（国旗、国歌等）和国家控制的各类社会化工具（如电视、广播、教科书等）中占有特殊地位。依据这些标准，我们可以确认，中亚国家的民族/国家身份作为一个同步进行的过程，前者显然是各国政府

① 尽管斯大林及其后的苏联领导人的中亚政策都旨在加强莫斯科对该地区的控制而非创造完全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但在此进程中伴随着祖国的归属感产生和发展的还有民族自觉意识。这种现象在所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较为普遍，但相较于波罗的海、高加索和俄白乌斯拉夫三国而言，中亚的当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发展相对较为缓慢。可能正因为如此，中亚国家对苏联解体的反应以及宣布国家独立的过程都要晚于上述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参见 Robert Kaiser, *The Geography of Nationalism in Russia and the USS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399.

的绝对优先方向，国家认同从属于民族认同的构建。

这种以主体民族为优先的民族/国家身份构建迅速填补了苏联认同被放弃后的意识形态真空，代之以新的、更实际和更实用的民族/国家身份和地区认同想象，使得中亚国家能快速成为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但正因为如此，一种过于偏向主体民族、忽视其他人口、民族结构的逻辑导致了多数“民族化政策”下必然产生新的身份认同难题。比如，在政治实践方面，民族化的公民资格法律可能导致在政治官员选举之时，主体民族具有过分代表性（over-representation）；在公民社会方面，学校和大众媒介将被强制要求使用官方语言，这无疑侵蚀了其他民族语言的公共空间；在公共产品领域，向单一官方语言的快速转变将在事实上减少其他民族对于国家提供的服务的参与；在经济发展方面，假定为民族国家主人的主体民族一般被赋予特殊的（甚至具有排他性的）权利进行土地分配或者资金分配。这样一来，本应成为统合各国民众的重要手段的民族/国家身份，反而可能导致中亚各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一盘散沙的境地，种族、宗教、语言、社会地位乃至出生地都变成了横亘在民族团结之上的难题。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在特定地区的集体身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地里看起来可能是不可或难以改变的，但问题在于地理和心灵边界总是服从和服务于政治重建。中亚在这一问题上并不例外。在集体身份的生成与巩固方面，中亚五国也面临着种种困难。一方面，地理学意义上的“中亚”直接影响了中亚国家集体身份的生成与巩固。另一方面，苏联解体后的国际和地区进程内在地规定了中亚地区国家集体身份的内涵和外延。后苏联时期的中亚不再是国际体系的旁观者，外部大国，如美国、俄罗斯、欧盟、土耳其、中国以及一些伊斯兰国家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力日益加深。^①加上苏联遗产的持续影响，包括各国之间的矛盾、分歧和冲突，使得这种国家的个体身份与地区集体身份之间的张力日益突出，也导致中亚五国形成了碎片化的集体身份认知。这些构成了当前中亚国家身份认知的基本状况。

在笔者看来，未来中亚的集体身份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政治重建

^① Valery V. Tsepkalo, “The Remaking of Eurasia”, *Foreign Affairs*, 1998, Vol.77, No.2, pp.107-126.

和融入世界与地区一体化进程的进展。我们应该注意到，中亚国家的集体身份并不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中亚身份来替代各国的国家身份。国家的个体身份并没有因民族国家在特定地区或特定领域的集体认同而失去其精髓。多数情况下，民族国家的个体身份能够和新的地区认同和睦相处。实证经验表明，中亚国家集体身份的中亚化在不同的国家中发展程度是不平衡的。哈萨克斯坦的中亚化程度较高，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处于中间，而土库曼斯坦则相对较低，几乎游离于整个中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之外。与此同时，一个新的现象是，哈萨克斯坦开始倾向于在某种程度上恢复苏联传统，将之与中亚并列，从而强调其特殊地位，与“不发达的中亚”实行政治切割。

我们也要看到，同样作为转型国家，俄罗斯的发展与中亚国家都先验地存在“去苏联化”的内容，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俄罗斯与中亚国家都在呼唤国际化，都在理论和实践上“告别苏联”、“走出苏联”。这意味着中亚国家一方面对俄罗斯的“帝国野心”始终抱有警惕，另一方面过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决定了它们难以与俄实现绝对意义上的切割。俄罗斯作为中亚的外部大国始终是影响中亚转型的最大因素。

从某种程度上讲，对于中亚国家而言，俄罗斯不纯粹是一个国家，而首先是一个隐喻。无论是国家的个体还是集体身份的构建，都可以从这个隐喻中找到源泉。在官方干预和扶持下，中亚国家对先前存在的价值观、象征物、历史记忆等进行了重新选择、重新组合和重新构造。旧有的苏联认同被逐步放弃，而新的、更实际和更实用的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想象以一种快速产生和渐渐积聚的方式正在取而代之。

总之，尽管去年中亚国家均以不同方式隆重庆祝本国独立 20 周年，然而它们的民族/国家构建进程迄今尚未终结。可以说，中亚新独立国家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包括新的国家身份生成的过程是一个消除苏联骤然解体的冲击、克服这一历史进程带来中亚人民的彷徨与茫然并孕育着新的发展内在能量的必由之路。尽管转型迄今已 20 年有余，但中亚各国当下依然处在一种“不稳定”的发展状态之中，相应地，各国转型进程仍在持续并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因此，在经过初期的紧张不安后，中亚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生成、巩固和发展之路远未终结。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好比罗马的双面神，

一方面它代表着自由、友爱以及其他积极目标的达成，另一方面它又象征着分裂、暴力和毁灭。^①进一步说，这意味着中亚国家的个体身份与集体身份的生成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过程，作为一个通常是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产品，需要经精巧的设计和精确的决策，否则这可能不仅不能带来整个国族与地区的统一与整合，相反成为撕裂它们的始作俑者。

【Abstract】 Sinc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construction and consolidation of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identities in Central Asian newly independent states reflect a triad collective path of “derussianization”, “loc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for newly independent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in constructing their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identities. Among the triad path, “derussianization” is the core and the latter are the two complementary sides. These three interact closely regarding specific topics within the same political field (either in a single country or in several countries), gradually forming their new identities individually and collectively. Taking the historic writing as an example, the theme of each Central Asian country in reconstructing their ethnic or national history in the Post-Soviet era is through a “localization” path in shaping its main ethnic glorious history and its heroes, behind which is its orientation in “derussianization” in order to clear the memory of former rulers’ historical writing. At the same time, they wrote more in global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history, taught orientated in “internationalization” to dispel the “Soviet” identity and then to establish the fact of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s independent actors. The transition in political space, for another inst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Astana, the new capital of Kazakhstan, as well as spatial changes in other Central Asian cities, are both means for each government to employ consciously inner symbol changes to shape their new identities. New national values are integrated into new space, clarifying a broken relationship with old system, in order to ensure a new political nature and new picture of the

① Tom Nairn, *Faces of Nationalism: Janus Revisited*, New York: Verso, 1997.

country to be achieved.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discourse and policy of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have rapidly achieved their transfer from socialist education to new educational system.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to remove influences of old system, which also explains their more attention to external dependence of local resources. In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Islamic revival and national rebirth have become an intertwined synchronization process. For them, Islamic, to a great extent, serves as precursor of “derussi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represents a means of national self-identification, a tool to obtain spiritual liberation from Moscow and also a method to peel itself off communist system and Slavic culture as a symbol for foreign colonial rule. Overall,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Central Asia,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is no longer regarded as a collective symbol selected by external powers or any alliances, subsequently used to dominate some specific areas in the world, but as a self-motivation, logic collective actor autonomously responding to external shocks. At present, for the shaping of collective identity in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there are altogether three integration processes: first is the holding-together integration, initiated by newly independent countries once belonging to a unitary state or colonial empires, which already had a rather high degree of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dependence; second is the putting-together integration currently promoted by Russia; third is the coming-together integration which is just in shaping with uncertain prospects, referring to the EU as a sample. In a sense, the first integration implies kind of degeneration; the second one tends to cause contradiction between country, nation building and inte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vereignty transfer, it may contain certain regress due to dominant power’s force; the third one is progressive because of caring about member states’ equal status and focusing on natural features of integration process. All these three paradigms coexist and frequently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directly leading to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y in collective identity of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In short, after the end of the original identity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newly independent Central Asian five countries have promoted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derussianization”, “loc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through time(historic writing), space(city and symbolic construction) and human(religion and education). Meanwhil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re also sparing no efforts in constructing their regional identity. However, the tension between ethnic, national identity and regional identity has led to fragmented collective identity.

【 Key Words 】 Central Asia, National Identity, Derussianization, Localiz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Integration

【 Аннотация 】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конструирование и консолидация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й и коллектив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новых независимых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руководится путем тройцы: «десуверинизация (дерусификация)», «локализация» и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где «десуверинизация (дерусификация)» является основой, «локализация» и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предствляют собой отношения двух сторон одной медали, между «локализацией» и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ей» формируются взаимодополняющ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ри этих аспекта, находясь в одн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условиях (в рамках одной страны или в рамках сообщества стран) тесн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уют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конкретных проблем и постепенно развивают новы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ую и коллективную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Например, главная линия в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стории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книгах в стран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й период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повышении роли «локализации» в воспроизведении этн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героев; за этим стоит наиболее явная ориентация на «дерусификацию», с целью очищен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амяти о бывших правителях; усиление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и» в печатных изданиях и преподавании всемирной истории также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о на избавление от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и установлени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 качестве независимых субъектов. На примере изменен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можно увидеть, чт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новой столицы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г. Астаны, а также изменения пространств городов в других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их странах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меры новых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 сознательно использующих сигналы внутренних изменений с целью создания нов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Новое значе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привитое к новому пространству, означает нарушение отношений со старой системой с целью гарантии того, что новы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характер и новое развитие страны смогут быть воплощены в жизнь. На примере политики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можно увидеть, что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воспитание в стран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тремительными темпами передало эстафету новой системе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расшире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стало важным средством для устранения влияния старой системы,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ие страны уделяют большое внимание внешней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своих местных ресурсов. Исламское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в стран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темно переплетаются. Ислам и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в значительной степени служат предшественниками «дерусификации», это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это является средством духовног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самоидентификации от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Москвы и средством избавления от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и насаждения славянских правил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колониаль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целом,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впервые в истории уже не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как коллективный символ, определённый какой-либо великой державой или группой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который впоследствии был использован ими для доминирования в мире в определённых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х, а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как обладающий мотивацией, логикой и реакцией на внешние стрессы, обладающий коллективным поведением едины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организм.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коллектив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в стран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ротекает наряду с тремя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ми процессами: первый связан с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м стран от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колониальных империй, когда на начальном этапе унитарны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 свойственна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высокая степень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 культурн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т.н. взаимозависим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holding-together integration*); второй — проводимая Россией связывающ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putting-together integration*); третий — ещё неопределенный, смешанный тип интеграции (*coming-together integration*), в основе которого лежит модель интеграции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некотором смысле, взаимозависим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подразумевает деградацию; связывающ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легко приводит к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ю противоречий между построение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нации и интеграцией самой по себе,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осознания передачи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в силу доминирования великой державы также может наблюдаться определенный регресс; смешанн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в силу того, что заботится о равном статусе всех государств-членов и подчеркивает естествен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интеграции является прогрессивной.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этих трёх моделей и их част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приводит к сложности и неопределенности коллектив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Одним словом, после исчезновения изначально существовавше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новые независимые стран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времен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книг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создание городов и символов) и людей (религия и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и других способов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и продвигают проект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основанный на «дерусификации», «локализации» и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и».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с этим стран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тараются создать собственную региональную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однако

внутренний конфликт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с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ю привёл к созданию в стран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фрагментарной коллектив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статус, дерусификация, локализация,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интеграция

(责任编辑 陈大维)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产业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

陈体标*

【内容提要】在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融合研究的理论基础上,根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1990-2011年22年的产业数据和GDP的数据,考察产业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事实,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自1990年以来,上合组织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一是技术进步,经济生产能力得到改善,不同部门增长速度不同,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二是人均收入上升,引起需求结构变化,也带动了产业结构的演化。上合组织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要素禀赋各异,与此相匹配的产业结构有较大的差异。从上合组织成员国三个产业的贡献率及其发展趋势可以看出,其产业结构变化也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体现出“结构红利”的动态关系。

【关键词】上海合作组织 产业结构 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D814.1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2)05-0160-(33)

一、引言

在较长的历史跨度上来考察世界经济发展,可以观察到这样一种现象: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其产业结构变化激烈。根据库兹涅茨^①和麦迪森^②的一

* 陈体标,华东师范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

① Simon Kuznets, “Quantitative Aspects of the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 II,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Product and Labour For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5, No.4, Supplement, 1957; S. Kuznets, *Modern Economic Growth: Rate, Structure, and Spread*, New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② Angus Maddison, *Phas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OECD, 2004.

系列资料和数据可以了解到，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的黄金 50 年，日本在战后 20 年，韩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这些国家历史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也是其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变化最为激烈的时期。根据这些经济事实我们可以理解，一方面，产业结构变化是伴随经济发展过程的重要经济现象；另一个方面，产业结构变化也是经济增速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资源和要素禀赋各异，产业结构也差别较大，而且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都不是发达国家，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起飞，其产业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将异于发达国家目前的经济状态。因此，研究产业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及其关系的经济事实，是理解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的重要视角。

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的经济合作是区域合作的重要内容。然而到目前为止，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还未取得大的成就。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各成员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有差别，在市场化道路上的位置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有差异。^①一般来说，宏观层面的经济事实主要体现在其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上面。因此，要向前推进上海合作组织在经济层面的合作，就需要对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形势和产业结构变化有充分的了解。本文的目的，是根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1990 年至 2011 年 22 年的产业数据和 GDP 数据，考察上海合作组织产业结构的变化和经济增长事实，并对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本文结构如下：首先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理论进行论述；接着分析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产业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事实及变化的主要原因；然后对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产业结构的变动值进行计算，并比较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最后得出结论。

二、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理论分析

产业结构变化是经济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现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工业化阶段，大部分的经济现象和内在规律都与产业结构的变化相关。

^① 须同凯：《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

产业结构的变化,通常用各部门产值在国内总产值中的比重的变化和各部门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的变化来表示。按传统,我们把总体经济分为三个产业:农业、工业、服务业。根据典型的国家经济发展过程,可以看出这些国家经历了农业产值份额下降、工业和服务业产值份额上升的过程,同时农业部门的就业比重也下降,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就业比重在上升,这种现象被称为库兹涅茨事实。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在于供给方面的变化和人均收入的增长。同时,产业结构变化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一) 影响产业结构变化主要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解释

一种解释是基于需求,通过假设经济的各部门技术增长率相同,把产业结构变化归结为偏好引致的各种产品需求收入弹性 η 不同。埃切瓦里 (Echevarria)^①, 孔桑姆特 (Kongsamut)、里贝罗 (Rebelo) 和谢^②, 费利尼 (Foellmi) 和 兹维穆勒 (Zweimuller)^③, 运用非位似 (Non-homothetic) 偏好来分析产业结构变化^④。根据这样的偏好,随着经济增长,各种产品的边际效用不成比例地变化,进而产品的边际技术替代率就会发生改变,直接导致各种产品消费量的不平衡变化。市场均衡要求供给和需求相匹配,需求变化最终会影响产品供应量的结构变化,由此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化。另一种解释是各部门生产率不同。最早从供给角度分析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是鲍莫尔 (Baumol)^⑤。他把经济分成进步部门和非进步部门,因为要素是自由流动的,所以非进步部门产品的成本和价格将无限上升。相应地,如果产品需求收入富有弹性而价格无弹性,消费者对非进步部门的产品需求随收入和价格的上升而增加,非进步部门吸收更多的劳动力以满足需求,增长率

① C.Echevarria, "Changes in Sectoral Composition Associated with Economic Grow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97, Vol.38, No.2, pp.431-452.

② P.Kongsamut, S. Rebelo and D. Xie, "Beyond Balanced Growth",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1, Vol.68, pp.869-882.

③ R.Foellmi, J.Zweimuller, "Structural Change and Kaldor's Facts of Economic Growth", Discussion Paper No.472, April 2005, IZA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④ 即恩格尔规律 (Engel's Law)。恩格尔在研究家庭食物支出随收入变化时发现,收入增加,食物支出也增加,但是食物支出占总收入的份额却下降。

⑤ Baumol, William J., "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 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LVII, 1967, pp.415-426.

降低至零；相反，如果产品需求收入弹性小而富有价格弹性，则劳动力向进步部门转移，非进步部门最后消失。

（二）产业结构变化影响经济增长速度

在技术进步和主导产业依次推动产业结构变迁的过程当中，存在着产业生产率水平的巨大差异。投入要素从低生产率或者低生产率增长率的部门向高生产率水平或高生产率增长率的部门流动，可以促进整个社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而总生产率增长率超过各部门生产率增长率加权后的余额就是结构变化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也即“结构红利”。“结构红利”维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①，此即产业结构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原因。根据“结构红利假说”，一个国家如果致力于发展那些技术含量高、技术进步快的产业，那么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就会享有更高的生产率增长率，就可以在同样的投入条件下获得更多的产出；反之，那些偏重发展低技术产业的国家，则只能期望较低的生产率增长率。索尔特（Salter）最早发现英国制造业 28 个行业的结构变动显著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萨克斯（Sachs）通过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研究发现，中国落后的产业结构的迅速转型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核心动力。

（三）结构和增长融合的理论模型

传统发展经济学有大量文献^②对产业结构变化进行考察，但不涉及经济总量演进的研究。新古典增长理论主要是单部门模型，基于总量分析，无法解释产业结构变化的“库茨涅茨事实”。由此，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如何融合，对理解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非常重要。在增长理论的基础上考虑

① M.Peneder, “Structural Change and Aggregate Growth”, WIFO Working Paper, Austrian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2, Vienna.

② C.Clark, *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 London: Macmillan, 1940; Simon Kuznets, “Quantitative Aspects of the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 II,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Product and Labour Force”; Kuznets, S., *Modern Economic Growth: Rate, Structure, and Spread*; Hollis Chenery, “Patterns of Industrial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 1960, pp.624-654.

产业结构变化问题，最近取得了进展^①。通常模型假设经济由三个部门组成，即农业(a)、工业(m)和服务业(s)三部门，不失一般性，假设人口固定不变，劳动供给无弹性，每个代表性个体最大化其一生的总效用为：

$$\max_{c(t)} \int_0^{\infty} e^{-\beta t} \frac{c_t^{1-\sigma} - 1}{1-\sigma} dt$$

其中 $c_t = [w_a c_a^{(\varepsilon-1)/\varepsilon} + w_m c_m^{(\varepsilon-1)/\varepsilon} + w_s c_s^{(\varepsilon-1)/\varepsilon}]^{\varepsilon/(\varepsilon-1)}$ ，而 $\sum w_i = 1$ ， w_i ， $i = a, m, s$ 为各部门消费重要程度的衡量。这里 c_i $i = a, m, s$ 为各部门的消费量， c_t 为总消费算子，由于消费算子^②与各部门消费量关系是一次齐次^③的函数，由此并不影响最终消费的选择。 β 为贴现率，表示跨期消费的偏好，把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联系起来，成为动态关系。 σ 为跨期替代弹性， ε 为替代弹性^④。各部门生产函数采用Cobb-Douglas形式：

$$Y_i = A_i K_i^{1-\alpha} L_i^{\alpha}, \quad \frac{\dot{A}_i}{A_i} = g_i, \quad \forall i = a, m, s$$

① P.Kongsamut, S.Rebelo and D. Xie, “Beyond Balanced Growth”; R.Foellmi and J.Zweimuller, “Structural Change and Kaldor’s Facts of Economic Growth”; Daron Acemoglu, and Veronica Guerrieri, “Capital Deepening and Non-Balance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8, Vol.116, No.3; Ngai Rachel and Christopher Pissarides, *Structural Change in a Multi-Sector Model of Growth*, AER, 2007; 陈晓光、龚六堂：“产业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2期；陈体标：“产业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2007年第4期；陈体标：“技术增长率的部门差异和经济增长率的‘驼峰形’变化”，《经济研究》，2008年第11期；陈体标：《技术进步、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② 总消费算子表示一种效用函数关系，当偏好次序没有变化，函数形式变化不改变消费者行为。具体可见 Ngai Rachel and Christopher Pissarides, *Structural Change in a Multi-Sector Model of Growth*, AER, 2007.

③ 一次齐次关系意味着欧拉定理成立，即每部门消费效用与拉格朗日乘子所反映的影子价格的乘的加权等于总消费算子的效用。

④ 替代弹性 ε 定义为：在其它消费与总支出保持不变的条件下，两种消费 Y_i 和 Y_j 之间的边际替代率变化 1%，引致了消费比例 Y_i/Y_j 的百分比变化。静态最优时，要求边际替代率等于价格比，而各消费品的生产技术在变化的，有差异的，由此造成消费品价格变动。这意味着，消费品之间的边际替代率要随之发生变化，进而消费比例发生变化，即进行替代。一般而言， ε 越趋近于零，消费之间的替代就越困难；相反， ε 越大，替代就越容易。

A_i 为各部门生产力水平, g_i 增长率, K_i 为各部门资本存量, L_i 为各部门劳动力。在给定上述偏好和技术的条件后, 运用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对构建的多部门增长模型进行求解^①。多部门增长理论模型得出的结论是: 经济结构变化一方面受各部门生产水平不同、要素在部门之间转移的影响, 另一方面, 由于各部门消费变化引致各部门产值变动,

$$\text{比重 } X_i = P_i Y_i / \sum_{i=1}^n P_i Y_i ;$$

同时经济总量增长率等于各产业部门增长率的加权平均和, 其中权数为各中间部门的产值份额, 用数学关系表达为 $g = m_a g_a + m_s g_s + m_m g_m$, m_i 的变化表示为产业结构变化,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 结构变化影响经济总量。

(四) 产业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关系理论模型的经济思想

传统发展经济学文献^②通常认为, 技术进步快的部门结构比重将增加, 给出的政策建议倾向于以发展重工业带动工业发展, 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结构和融合增长研究认为, 产业结构变化由两个因素引起, 一是收入的增长, 造成农业品消费比重减少, 服务品比重增长, 由消费结构引致产业结构变化; 另一个因素是技术变化带动产业结构变化。与传统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不同, 本文的理论模型认为, 技术进步快的部门比重不一定增加, 通常农业部门技术进步快于工业部门, 工业部门技术进步快于服务业部门^③。经济事实发展表明, 农业部门逐渐萎缩, 工业部门呈倒U字型演化趋势, 服务业逐渐扩大。

① 具体分析参见 Daron Acemoglu and Veronica Guerrieri, “Capital Deepening and Non-Balanced Economic Growth”; 陈体标: 《技术进步、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

② C.Clark, *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 Hollis Chenery, “Patterns of Industrial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0, No.5, pp.624-654; Simon Kuznets, “Quantitative Aspects of the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 II,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Product and Labour Force”; S.Kuznets, *Modern Economic Growth: Rate, Structure, and Spread*.

③ 盖 (Ngai) 和皮萨里德 (Pissarides) 根据美国历史数据, 指出农业的技术进步率高于工业的技术进步率, 服务业的技术进步率最低, 技术进步率分别为: 0.023, 0.013, 0.003。乔根森 (Jorgenson) 得出1947-1985年间美国的农业FTP年均增长率是制造业FTP增长率的两倍多。具体参见Ngai and Pissarides, “Structural Change in a Multi-Sector Model of Growth”, working paper, 2005; Dale Jorgenson, *Productivity, Volume 1: Postwar U.S. Economic Growth*, MIT Press, Cambridge, MA., 1995.

本文理论模型的经济思想是，经济中各种消费品之间的替代弹性^①对产品需求变化起关键作用。如果替代弹性小于 1，意味着产品之间不容易替代，但是技术进步快的部门生产成本低，更容易生产该部门的产品，当不容易替代技术进步慢的部门的产品时，技术进步快的部门生产更多的产品就成为多余，一个很容易理解的调整就是转移出劳动力和资本；相反，如果替代弹性大于 1，产品之间就比较容易替代，技术进步快的部门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来替代技术进步慢的部门的产品，那么技术进步快的部门的要素就转移到技术进步慢的部门。有不少的经验研究^②表明，替代弹性小于 1，其范围值在 0.3-0.7 之间，这意味着，技术进步慢的部门，特别是服务业部门的比重将不断增加。

由于在产业结构的变化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转移，而各部门的增长速度不同，当要素更多地转移到发展速度慢的部门时，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如鲍莫尔指出，由于要素自由流动导致技术进步率较慢部门的产品成本以及价格会无限上升，此即是“鲍莫尔病”（Baumol's Disease）^③，最终限制经济发展。当要素转移到生产水平高的部门时，经济效率改进，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此即“结构红利假说”^④所讨论的经济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见经济结构变化是影响经济发展速度的一个重要因素。现实经济中，“结构红利效应”和“鲍莫尔效应”是同时存在的，因此，经济结构变化如何影响经济总量增长的速度，要从两种效应的关系来考察。如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正反两种效应应具有此消彼长的关系，结构变化影响增长速度

① 替代弹性从消费结构分析还是从生产投入结构分析没有本质的不同，因为消费算子或生产算子为一次齐次的性质，最终结果并无不同，都能用于分析结构变化，特别是对 CES 形式的效用函数或生产函数来说。当替代弹性大于 1，表示消费品之间替代性更强，更便宜，更容易生产的产品容易替代另外的产品，如果替代弹性小于 1，表示消费品互补性较强，表明消费过程中，消费品相互依赖性较强，意味着各种产品都必不可少。

② David S.Hamermesh, *Labor Deman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1993; M. I.Nadiri, "Some Approaches to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 Surve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70, Vol.8, pp.1117-1177; Mark Nerlove, "Recent Empirical Studies of the CES and Related Production Functions", in M. Brown (editor), *The Theory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Production*, New York, 1967.

③ William J.Baumol, "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 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7, Vol.57, No.3, pp.415-426.

④ M.Peneder, "Structural Change and Aggregate Growth", WIFO Working Paper, Austrian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Vienna, 2002.

的总效应将使得经济增长速度难以保持不变的趋势。如果产业结构变化已经趋于稳定，“结构红利”将减少，经济发展速度将减慢；如果在结构变化过程中，经济陷入“鲍莫尔病”状态，经济发展质量将受到影响。

下文基于最新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理论，分析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产业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事实，探究其变化的主要原因，并对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产业结构变动值进行计算，考察其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关系。

三、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特征

产业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是上海合作组织经济特征的主要方面。探讨和分析经济合作的可能性之前，非常有必要对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以及了解各成员国经济发展趋势和产业结构演进路径。

（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①

（1）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10%左右的发展速度保持了20年，GDP总量从1990年的3569亿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73185亿美元。根据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国在1991年占世界的份额为3.9%，超过英国的3.6%；1995年为5.7%，超过德国的5.6%；2001年为7.7%，超过日本的7.6%。^②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占世界GDP的份额为10.7%，为经济总量排名第二的国家。人均GDP从1990年的314美元上升到2011年5445美元，从低收入发展水平的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发展水平的国家。

经济增长率无论是从总量GDP增长还是人均GDP增长来看，22年来中国年均增长率高于10%。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加快，市场配置资源提高了经济效率，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连续五年经

^① 刘霞辉、张平、张晓晶：《改革年代的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须同凯：《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

^② 本文国家之间汇率的比较全部采用购买力平价(PPP)方式来计算。如果按可比价格计算，中国在2010年GDP以58786亿美元超过日本的54742亿美元。

济增长速度超过 10%。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受通货紧缩影响，增速减缓，增长率在 1999 年降低至 7.6%。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中国加入 WTO 之后，中国经济又得到快速发展，2002 年至 2007 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又提高到两位数。2008 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较大的冲击，出口增长速度下降，甚至负增长，内需不足和产能过剩非常突出，产业结构调整显得更加重要。

表 1 1990-2011 年中国 GDP(单位：当期美元)

年度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GDP(亿)	3569	3795	4227	4405	5592	7280	8561	9527	10195	10833	11985
总量增长率%	3.8	9.2	14.2	14.0	13.1	10.9	10.0	9.3	7.8	7.6	8.4
人均 GDP	314	330	363	374	469	604	703	774	821	865	949
人均 GDP 增长%	2.3	7.7	12.8	12.7	11.8	9.7	8.9	8.2	6.8	6.7	7.5
年度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GDP(亿)	13248	14538	16410	19316	22569	27130	34941	45218	49913	59305	73185
总量增长率%	8.3	9.1	10.0	10.1	11.3	12.7	14.2	9.6	9.2	10.4	9.3
人均 GDP	1042	1135	1274	1490	1731	2069	2651	3414	3749	4433	5445
人均 GDP 增长%	7.5	8.4	9.3	9.4	10.6	12.1	13.6	9.0	8.6	9.9	8.8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整理^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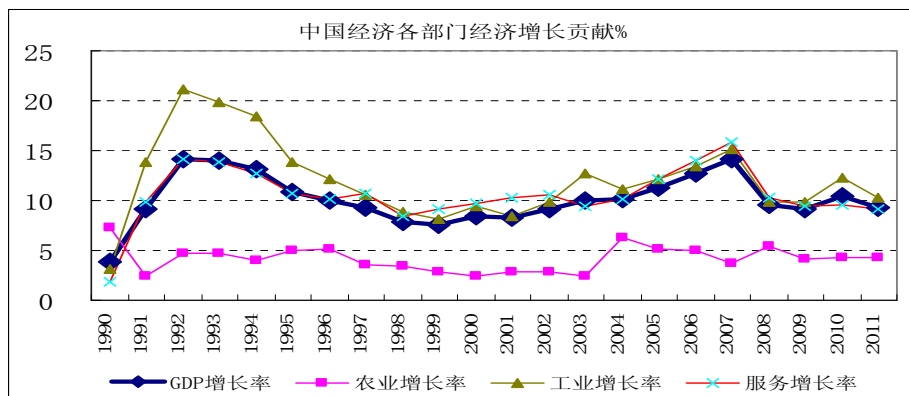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经济各部门经济增长贡献 (%)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整理

① 世界银行网站：www.worldbank.com，后续数据来源相同。

(2) 中国经济增长伴随着剧烈的产业结构变化。其中农业比重下降，工业、服务业比重上升。GDP 总量增长从主要由农业、工业带动，转为主要由工业、服务业带动，工业的增长构成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是，2011 年中国农业比重还有 10%，服务业比重只有 43.3%，处于比较低的发展水平。从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经历了农业产值份额下降、工业和服务业产值上升的过程，符合产业结构变化的规律。

表 2 1992-2011 年中国产值结构 (%)

年度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农业	21.8	19.7	19.9	20.0	19.7	18.3	17.6	16.5	15.1	14.4
工业	43.5	46.6	46.6	47.2	47.5	47.5	46.2	45.8	45.9	45.2
服务业	34.8	33.7	33.6	32.9	32.8	34.2	36.2	37.8	39.0	40.5
年度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农业	13.7	12.8	13.4	12.1	11.1	10.8	10.7	10.3	10.1	10.0
工业	44.8	46.0	46.2	47.4	47.9	47.3	47.4	46.2	46.7	46.6
服务业	41.5	41.2	40.4	40.5	40.9	41.9	41.8	43.4	43.2	4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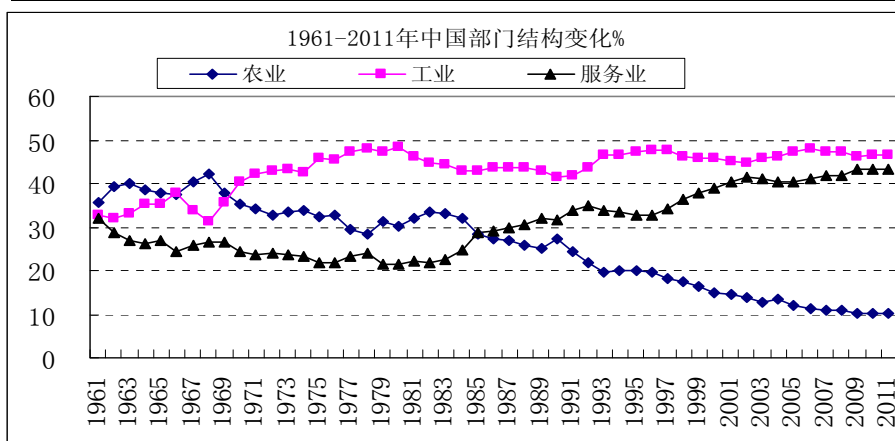


图 2 1961-2011 年中国部门结构变化 (%)

(3) 产业结构的演进是与市场制度的建立相伴随的，中国经济发展显示的工业化特征特别明显。中国是一个从传统的农业国向工业化国家不断演化的国家，是由典型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不断演化的国家。1992 年以前，非农化是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主要特征，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轻

工业得到较快的发展，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到 1992 年，中国经济中工业和服务业的比例已经超过了农业，特别是在 1992 年至 2001 年间，中国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电力、钢铁、机械设备、造船、化工、电子等行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经济增长明显具有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特征。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之后，经济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承接国际分工转移，工业化进一步加强。

从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动力来看，经济体制改革，引进国外直接投资（FDI），生产能力大幅提高，要素不断从效率低的部门转移到效率高的生产部门，农业部门比重逐渐减小，工业比重逐渐增加，反映了供给因素是推动产业结构变化的重要动力。同时，22 年来人均收入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不仅消费的需求总量会扩大，而且消费结构也会发生相应变化，恩格尔系数呈不断下降趋势，旅游、教育、健康等消费支出不断增加，金融、物流、房地产等现代服务业不断扩大。反映在产业结构上，中国的服务业比重从 1992 年的 34.8% 上升至 2011 年的 43.3%。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生产率水平增长和收入水平提高正在不断优化着中国的产业结构。

（二）俄罗斯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①

（1）经过苏联解体初期的经济衰退，21 世纪初期以来，俄罗斯经济快速增长。苏联解体伊始，刚独立的俄罗斯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从表格中可以看出 1990-1996 年的俄罗斯经济为负增长，1997 年呈现回暖态势，然而 1998 年的金融危机使俄罗斯经济再次掉头下滑。不过从 1999 年起，俄罗斯经济出现正增长。大致到 2004 年，俄罗斯经济的基本特征是恢复性增长。进入 21 世纪以来，特别是普京执政以后，俄罗斯经济快速回升，连续 8 年保持增长（年均增幅约 6.7%）。2008 年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经济造成大的冲击，2009 年经济为负增长（-7.8%），但是外贸出口大幅增长，经济开始复苏，2011 年经济增长率达 4.3%。总体上看，俄罗斯经济有较大的发展，

^① 郭晓琼：《俄罗斯产业结构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年；须同凯：《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赵常庆：“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俄罗斯与中亚国家以及中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6 年第 11 期。

人均收入有较大的提高,俄罗斯人均 GDP 从 1990 年的 3485 美元增长至 2011 年的 13089 美元,已达到中上收入发展水平,年均增长率高达 6.2%。

表 3 1990-2011 年俄罗斯 GDP(单位:当期美元)

年度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GDP(亿)	5168	5094	4602	4351	3951	3955	3917	4049	2710	1959	2597
总量增长率%	-3.0	-5.0	-14.5	-8.7	-12.6	-4.1	-3.6	1.4	-5.3	6.4	10.0
人均 GDP	3485	3427	3095	2929	2663	2670	2651	2749	1844	1339	1775
人均 GDP 增长%	-3.4	-5.3	-14.6	-8.6	-12.5	-4.0	-3.3	1.7	-5.0	6.8	10.0
年度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GDP(亿)	3066	3451	4303	5910	7640	9899	12997	16608	12226	14875	18578
总量增长率%	5.1	4.7	7.3	7.2	6.4	8.2	8.5	5.2	-7.8	4.3	4.3
人均 GDP	2101	2375	2976	4109	5337	6947	9146	11700	8616	10481	13089
人均 GDP 增长%	5.3	5.2	7.8	7.7	6.9	8.6	8.8	5.4	-7.8	4.3	4.3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整理

(2) 随着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被动调整。经济转型以来,俄罗斯产业结构出现了第一、二产业占比迅速下降的现象。工业占 GDP 的比重由 1991 年的 47.6% 下降到 2003 年的 32.6%, 2004 年以后呈微弱上升趋势。农业所占的比重由 1991 年的 14.3% 锐减至 2010 年的 4%。与第一、二产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俄罗斯经济转型初期,经济结构调整不是通过部门经济增长来实现的,而是在产值普遍下降的情况下调整的,特别是农业部门较多年份是负增长。在 1991 年至 1998 年期间,俄罗斯国民经济整体下滑,产业结构消极性和被动性调整。进入 21 世纪以后,俄罗斯产业结构基本延续叶利钦时期的特点,但总体上出现了一些优化。服务业发展迅速,其产值占 GDP 的比重增至 58.1% (2004 年); 工业比重下降,降至 36.39% (2004 年) 农业比重的下降最为明显,降至 5.6% (2004 年)。总体来看,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俄罗斯产业结构基本保持稳定。

各部门内部结构单一。农业部门以小麦为主,在农作物中的比重逐渐增大,有向单一作物方向发展的趋势。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的工业。由于前苏联长期片面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严重制约了轻工业的发展,工业内部结构畸形的现象严重。目前俄罗斯以重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演变为以能

源、原材料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俄罗斯能源工业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幅度。服务业得到快速发展，教育、通讯服务、文化服务、医疗服务、体育运动等服务业发展迅速，但是现代服务发展滞后，出现服务业低端化的特点。

表4 1989-2010年俄罗斯产值结构(%)

年度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农业	16.8	16.6	14.3	7.4	8.3	6.6	7.2	7.2	6.4	5.6	7.3
工业	50.2	48.4	47.6	43.0	44.6	44.7	37.0	38.7	38.1	37.4	37.2
服务业	33.0	35.0	38.1	49.6	47.1	48.6	55.9	54.1	55.5	57.0	55.5
年度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农业	6.4	6.6	6.3	6.3	5.6	5.0	4.5	4.4	4.4	4.7	4.0
工业	37.9	35.7	32.8	32.6	36.3	38.1	37.2	36.4	36.1	33.7	36.7
服务业	55.6	57.7	60.9	61.2	58.1	57.0	58.2	59.1	59.5	61.6	59.3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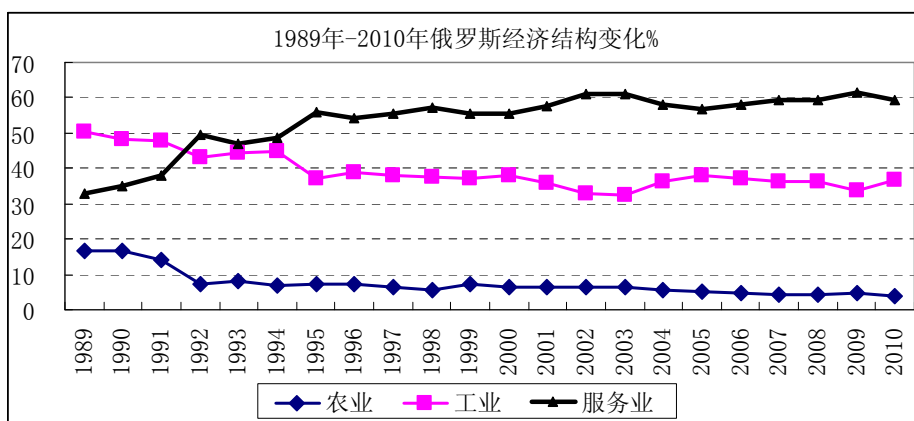


图3 1989-2010年俄罗斯经济结构变化(%)

(3) 俄罗斯产业结构变化受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因素影响。俄罗斯自然资源丰富，人口素质较高、科学技术基础较好，为俄罗斯产业结构调整创造了较好的条件。从需求角度来看，随着能源出口积累的财富不断增加，俄罗斯经济快速发展，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为消费的增长和消费结构升级创造了条件。但是俄罗斯工业轻重畸形，工业内部结构不协调，正步入资源诅咒陷阱，产业结构出现了能源化的低端趋势。以1991年至2011年数据来看，

在俄罗斯各产业部门结构演进中，农业部门增长波动比较大，其增长率偏离经济总量增长较多，工业增长率和服务业增长率变化与总量增长变化接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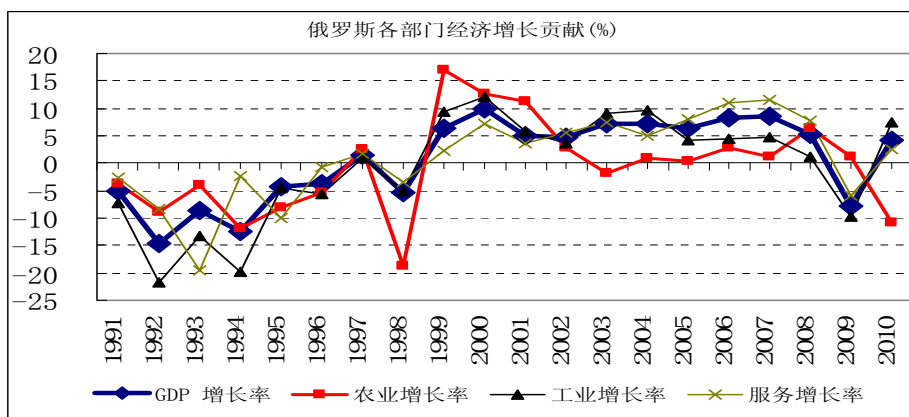


图 4 俄罗斯各部门经济增长贡献 (%)

(三) 哈萨克斯坦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①

(1) 1992 至 1995 年，哈萨克斯坦经历了独立后的经济大衰退，艰难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推行私有化和自由化，发展私营经济，吸收外来投资。1996 年经济开始恢复增长，虽然 1998 年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再次下滑，但是进入 21 世纪以后，随着国际市场石油及其他矿产资源等原材料价格持续大幅增长，资源丰富的哈萨克斯坦借助优越的外部环境步入快速发展阶段。如表所示，从 2000 年至 2007 年，哈萨克斯坦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实现了两位数，并且 GDP 在 2003 年首次超过了独立前 1990 年的水平。人均 GDP 由 1990 年的 1647 美元迅速提高到 2011 年的 11245 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全球资源价格大幅下挫，对哈萨克斯坦经济有较大影响，经过两年的经济调整，目前哈萨克斯坦经济回到平稳发展轨道。

^① 须同凯：《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Statistical yearbook «Kazakhstan in 2010», Agency on Statistics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Astana, 2011, 214p.;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http://kz.mofcom.gov.cn/>

表 5 1990-2011 年哈萨克斯坦 GDP(单位: 当期美元)

年度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GDP(亿)	269	249	249	234	213	204	210	222	221	169	183
总量增长率%		-11.0	-5.3	-9.2	-12.6	-8.2	0.5	1.7	-1.9	2.7	9.8
人均 GDP	1647	1512	1515	1433	1320	1288	1350	1446	1469	1130	1229
人均 GDP 增长%		-11.6	-5.2	-8.6	-11.3	-6.6	2.0	3.3	-0.2	3.7	10.1
年度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GDP(亿)	222	246	308	432	571	810	1049	1334	1153	1480	1862
总量增长率%	13.5	9.8	9.3	9.6	9.7	10.7	8.9	3.3	1.2	7.3	7.5
人均 GDP	1491	1658	2068	2874	3771	5292	6772	8514	7165	9070	11245
人均 GDP 增长%	13.7	9.8	8.9	8.8	8.7	9.5	7.7	2.0	-1.4	5.8	6.0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库整理

表 6 1992-2011 年哈萨克斯坦产值结构 (%)

年度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农业	26.7	17.5	15.5	12.9	12.8	12.0	9.1	10.5	8.7	9.4
工业	44.6	39.4	40.0	31.4	26.9	26.8	31.2	34.9	40.5	38.8
服务业	28.7	43.1	44.5	55.7	60.3	61.2	59.7	54.6	50.8	51.8
年度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农业	8.6	8.4	7.6	6.8	5.9	6.1	5.7	6.4	4.8	5.3
工业	38.6	37.6	37.6	40.1	42.1	40.6	43.3	40.3	42.4	44.3
服务业	52.8	53.9	54.8	53.1	52.0	53.3	51.0	53.3	52.8	50.4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库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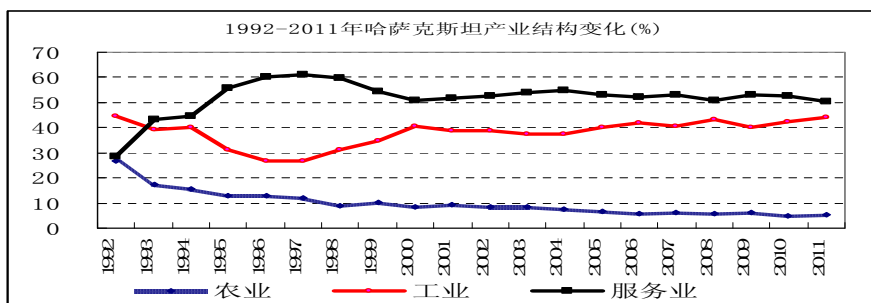


图 5 1992-2011 年哈萨克斯坦产业结构变化 (%)

(2) 哈萨克斯坦工业和服务业经过独立初期的大调整, 进入 21 世纪后产业结构比较稳定。经过二十年的发展, 哈萨克斯坦农业在 GDP 中的比重不断下降; 工业占 GDP 的比重出现一定波动, 看似不满足倒 U 型的工业化和去工业化过程; 服务业比重缓慢上升, 已达 50% 以上。从图中可以看出, 进入 21 世纪以来, 哈萨克斯坦的产业结构发展较为平稳, 具有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特征。

哈萨克斯坦在 2000-2011 年, 工业产值以年均 9.5% 的速度增长。哈萨克斯坦能源开采业占主导地位, 石油天然气工业是哈萨克斯坦经济发展的支柱。哈萨克斯坦制造业主要由冶金工业、石油制品生产、食品工业、机械制造业等构成。随着哈萨克斯坦经济的发展, 哈萨克斯坦人均收入水平已达到中上收入国家标准, 由此促进服务业稳定增长。哈萨克斯坦服务业主要由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和金融业构成。传统行业占服务业的比重逐渐降低, 新兴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哈萨克斯坦具有优越的农牧业发展条件, 粮食生产不仅能自给还能出口, 是前苏联重要的粮食和畜产品供应基地。进入 21 世纪, 哈萨克斯坦确立以技术和工艺革新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战略, 加大对农业的投资, 对所有农作物进行补贴, 大规模更新陈旧农业机械以促进农业发展, 近年来农业产值迅速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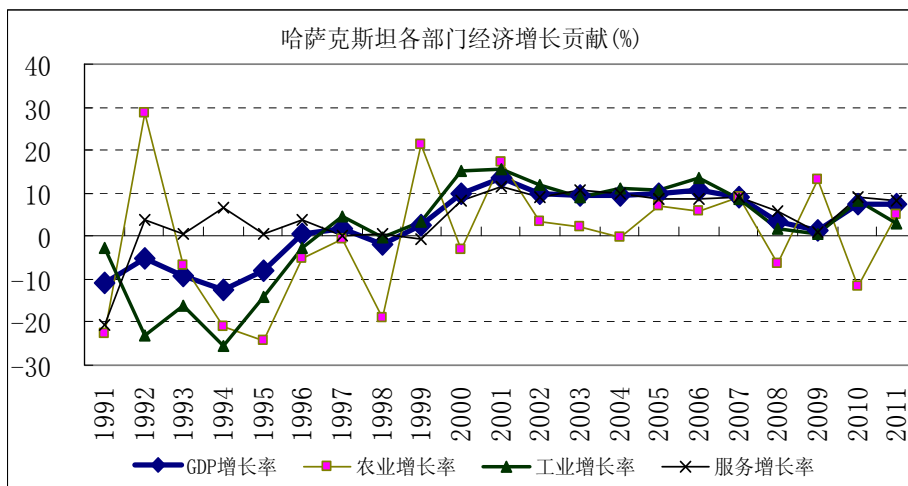


图 6 哈萨克斯坦各部门经济增长贡献 (%)

(3) 哈萨克产业结构变化受其资源禀赋和人均收入制约。在前苏联的分工体系中,哈萨克斯坦在粮食供应和有色金属开采、冶炼方面占主要地位,而能源工业更是其经济的重要基础。从 1992 年至 1997 年的产业结构数据来看,独立之后,工业大幅度下滑,造成工业占 GDP 的比重有大的下降,而服务业比重高企。1998 年以后,哈萨克斯坦工业开始复苏,占比开始上升,变化趋势表现为对称式发展。与俄罗斯相同,哈萨克服务业比重上升,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其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更多表现在需求因素提高服务业结构比重。但是由于侧重于能源工业,哈萨克斯坦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依然滞后,影响哈萨克斯坦的发展后劲。从各部门增长贡献来看,工业增长影响最大,农业增长波动剧烈,所占比例下降,贡献率逐年减少,服务业贡献率不断上升。

(四) 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①

(1) 经济体制渐进式改革,经济波动较小,但长期增长乏力。独立后,乌兹别克斯坦采用渐进的方式向市场经济过渡,经济体制改革强调国家调控,国家对经济体系和经济活动的干预较多。在独立初期,乌经济衰退程度明显小于中亚其他国家。但随着经济形势好转,非国有经济很大程度上还受国家控制,行业垄断不断增强,这种僵化的经济体制抑制了经济自由性,阻碍经济发展。直到 2005 年,乌兹别克斯坦的名义国民生产总值才超过独立前 1990 年水平。同样,乌兹别克斯坦在独立之后经济有长达 6 年的衰退期,1996 年才开始增长。进入 21 世纪,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开始稳定增长。然而,乌兹别克斯坦依旧是落后的农业国家,人均收入在 2011 年达到 1546 美元。

(2) 乌兹别克斯坦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重要地位。前苏联时期,乌兹别克斯坦主要发展棉花种植业,农业是乌兹别克斯坦基础经济部门,1990 年农业人口约占就业人口的一半,农业产值占 GDP 的三分之一。由于乌兹别克斯坦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粮棉供销体系中计划经济的模式,国家对主要产品实行统一收购且价格过低,农民自主出售棉花和小麦等产品的权利有

^① 须同凯:《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http://uz.mofcom.gov.cn/>; 小舟:“乌兹别克斯坦的投资环境和外资投资方向”,《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4 年第 3 期; 秦放鸣:“对乌兹别克斯坦经济改革模式与经济发展的再思考”,《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6 年第 3 期。

限，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乌兹别克斯坦农业发展后劲不足。乌兹别克斯坦的工业体系比较健全，轻工业和食品加工业是乌传统经济部门。独立后乌引进先进生产工艺和设备兴建了一批新企业，生产并出口一些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如汽车、飞机、彩电、录像机、毛毯、布料等。但是乌兹别克斯坦仍然是一个以原料生产为主的国家，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黄金)生产是国民经济支柱。乌兹别克斯坦服务业稳定发展，服务业目前在产业结构中占有重要位置，2011年服务业产值占到GDP的45%。

表7 1990-2011年乌兹别克斯坦GDP(单位:当期美元)

年度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GDP(亿)	134	138	130	131	129	134	139	147	150	171	138
总量增长率%	1.6	-0.5	-11.2	-2.3	-5.2	-0.9	1.7	5.2	4.3	4.3	3.8
人均GDP	651	659	604	597	576	586	601	623	623	702	558
人均GDP增长率%	-0.8	-2.6	-13.3	-4.5	-7.0	-2.7	-0.2	3.2	2.6	3.2	2.4
年度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GDP(亿)	114	97	101	120	143	170	223	279	328	393	454
总量增长率%	4.2	4.0	4.2	7.7	7.0	7.3	9.5	9.0	8.1	8.5	8.3
人均GDP	457	383	396	465	547	643	830	1023	1182	1377	1546
人均GDP增长率%	2.9	2.7	3.0	6.5	5.8	6.0	8.0	7.3	6.3	5.5	5.4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整理

表8 1992-2011年乌兹别克斯坦产值结构(%)

年度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农业	32.8	37.0	34.8	30.4	37.4	32.3	26.1	32.2	31.3	33.5	34.4
工业	33.0	36.6	35.8	34.5	26.4	27.8	30.5	26.1	26.2	24.3	23.1
服务业	34.3	26.5	29.4	35.1	36.1	39.9	43.4	41.7	42.5	42.2	42.5
年度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农业	34.0	34.3	33.1	30.8	28.0	26.1	24.0	21.4	19.5	19.5	18.9
工业	22.6	22.0	23.5	26.0	23.2	27.4	32.0	30.8	33.2	35.4	36.1
服务业	43.4	43.7	43.4	43.3	48.9	46.5	44.0	47.9	47.3	45.1	45.0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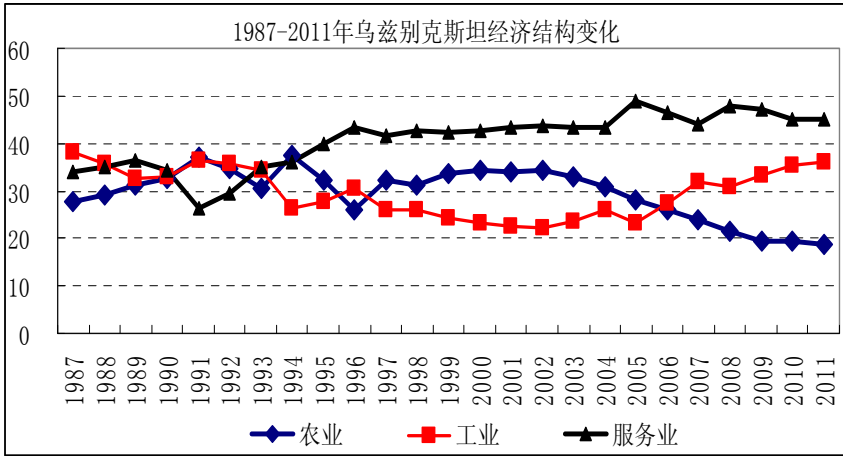


图 7 1987-2011 年乌兹别克斯坦经济结构变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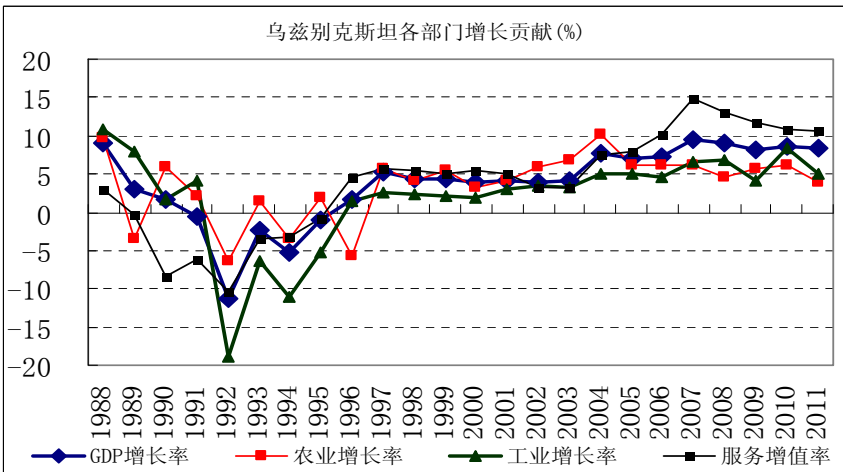


图 8 乌兹别克斯坦各部门增长贡献 (%)

(3) 独立后，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发展比较平稳，三次产业变化比较平缓。从 2006 年开始，工业在 GDP 的占比才超过农业比重，说明乌兹别克斯坦依然是一个农业国，但是农业劳动力开始向非农部门转移。2011 年乌兹别克斯坦产业结构呈现三、二、一格局，其占比分别为 45%，36.1%和 18.9%。

(五) 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①

(1) 政局波动对经济影响较大, 经济增长缓慢。吉尔吉斯斯坦 1991 至 1995 年经济为负增长, 1996 年开始以 7.1% 的速度增长。2005 年政局动荡对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有较大的打击, 经济为负增长, 2010 年受国际经济形势影响, 经济再次衰退。总体上, 吉尔吉斯斯坦发展落后, 人均 GDP 仍然处于 1000 美元左右, 属于低收入国家。

表 9 1990-2011 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增长(单位: 当期美元)

年度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GDP(亿)	27	26	23	20	17	17	18	18	16	12	14
总量增长率%	5.7	-7.9	-13.9	-15.5	-20.1	-5.4	7.1	9.9	2.1	3.7	5.4
人均 GDP	609	576	513	449	372	364	395	376	345	258	280
人均 GDP 增长%	3.7	-9.3	-14.9	-15.5	-20.1	-6.4	5.5	8.3	0.6	2.1	4.2
年度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GDP(亿)	15	16	19	22	25	28	38	51	47	48	59
总量增长率%	5.3	0.0	7.0	7.0	-0.2	3.1	8.5	8.4	2.9	-1.4	7.0
人均 GDP	308	322	381	433	476	543	722	966	871	880	1075
人均 GDP 增长%	4.3	-0.9	5.9	5.7	-1.3	2.0	7.5	7.4	1.7	-2.5	5.9

(2) 吉尔吉斯斯坦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高, 工业化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前苏联的经济分工中, 吉尔吉斯斯坦重点发展棉花种植、水业和畜牧业。总体来说吉尔吉斯斯坦是一个农业国, 农业是其经济的重要支柱, 农业产值占 GDP 的 20% 左右, 农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一半。带动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增长的主要是金属工业、农产品加工业、玻璃工业、化学工业、木材加工业和轻工业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在支持和保护轻工业发展的同时, 对重工业的发展不够重视, 因此第二产业比重最低, 农业比重高于工业。采矿业、有色金属开采业是吉尔吉斯斯坦的支柱产业, 以黄金、煤炭、锡钨等矿石开采业为主。库姆托尔黄金公司产值占工产值的 40% 以上。服务

^① 须同凯:《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 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http://kg.mofcom.gov.cn/>; 刘庚岑、徐晓云:《吉尔吉斯斯坦》,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 姚大学、王泽壮:“中亚五国经济发展模式”,《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 2004 年第 6 期。

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服务业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服务业的需求保持稳步上升趋势，从 1990 年的 31.4% 上升到 2011 年的 51.1%，服务业成为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

表 10 1992-2011 年吉尔吉斯斯坦产值结构 (%)

年度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农业	33.5	37.0	39.0	41.0	40.9	43.9	49.7	44.6	39.5	37.7	36.7
工业	35.0	35.5	37.8	32.0	25.5	19.5	18.3	22.8	22.8	25.0	31.4
服务业	31.4	27.6	23.2	27.0	33.7	36.6	32.0	32.6	37.7	37.3	31.9
年度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农业	37.3	37.7	37.1	33.3	31.9	32.8	31.1	27.0	21.1	20.7	19.8
工业	28.9	23.3	22.3	24.1	22.4	20.1	19.3	23.5	26.6	28.0	28.7
服务业	33.8	39.0	40.6	42.6	45.7	47.2	49.6	49.4	52.4	51.3	51.5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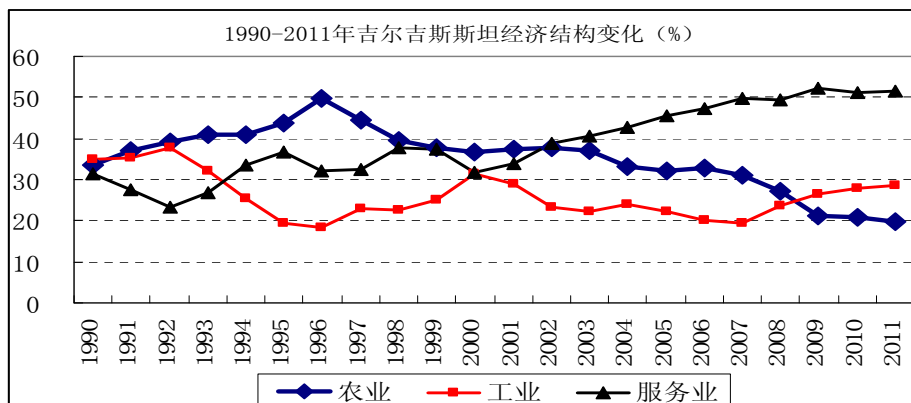


图 9 1990-2011 年吉尔吉斯斯坦经济结构变化 (%)

(3) 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初期，三大产业在 GDP 中占比比较平均。独立后，在经济的波动发展中，三大产业结构发生不同于库兹涅茨规律的变化，农业在波动中趋于平稳，工业则在波动中不断下滑。进入 21 世纪，第三产业比重逐渐提高，2011 年吉尔吉斯斯坦产业结构呈现三、二、一的次序。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发展水平极不稳定，自我积累能力有限，且缺乏能够吸引外资的资源。吉尔吉斯斯坦产业结构在短期内难以发生大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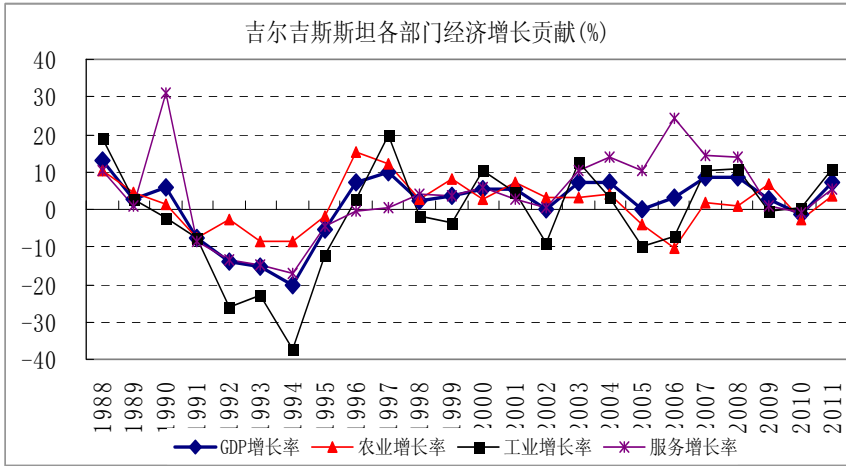


图 10 吉尔吉斯斯坦各部门经济增长贡献 (%)

(六) 塔吉克斯坦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关系^①

(1) 塔吉克斯坦是上海合作组织中最穷的成员国，战乱不断，经济起伏较大。塔吉克斯坦国土面积狭小，经济体量较小。塔吉克斯坦独立后历了七年内战(1992-1998年)，战争期间，经济严重衰退，1992年负增长高达-29%。1996年开始实行经济改革，1997年开始小幅增长。进入21世纪以来，塔吉克斯坦保持着稳定的发展速度，2011年GDP是1990年的2.2倍，人均GDP为935美元。

(2) 塔吉克斯坦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欠发达。2011年农业部门占GDP的比重为20%，农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一半以上。在1992年至2011年的20年间，农业占比在1996年最高，为39%，这与大部分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过程中农业部门比重下降不同。工业是塔吉克斯坦经济的主导部门，但是独立后传统的经济联系被割断，关税大幅提高，贸易受限，使得塔吉克斯坦的工业生产严重下滑。从表格中可以看出，塔吉克斯坦工业部门的产值占国民收入比重，从2002年开始下降。塔吉克斯坦工业以电力、有

^① 须同凯：《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中国驻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http://tg.mofcom.gov.cn/>

色冶金工业、燃料工业、轻工业和食品加工业为主，其中有色冶金工业和食品工业所占比重最大，二者合计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 50%。由于塔吉克斯坦独立后经济复苏缓慢，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由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比重降低而突出。

表 11 1990-2011 年塔吉克斯坦 GDP(单位：当期美元)

年度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GDP(亿)	26	25	19	16	13	12	10	9	13	11	9
总量增长率%	-0.6	-7.1	-29.0	-16.4	-21.3	-12.4	-16.7	1.7	5.3	3.7	8.3
人均 GDP	496	468	346	294	236	213	178	155	219	178	139
人均 GDP 增长%	-3.1	-9.1	-30.3	-17.7	-22.5	-13.7	-17.9	0.2	3.9	2.4	7.1
年度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GDP(亿)	11	12	16	21	23	28	37	52	50	56	65
总量增长率%	10.2	9.1	10.2	10.6	10.5	-15.7	21.7	21.2	3.9	6.5	7.4
人均 GDP	173	194	245	325	358	434	563	771	734	820	935
人均 GDP 增长%	9.1	8.2	9.3	9.7	9.4	-16.6	20.2	19.7	2.5	5.0	5.9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整理

表 12 1992-2011 年塔吉克斯坦产值结构 (%)

年度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农业	27.4	23.3	24.0	38.4	39.0	35.4	27.2	27.4	27.4	26.2
工业	46.1	46.5	41.0	39.3	31.6	28.7	27.0	29.6	38.9	40.1
服务业	26.5	30.2	35.0	22.2	29.5	35.9	45.8	43.0	33.7	33.8
年度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农业	24.7	27.1	21.6	24.0	24.8	22.4	24.7	22.4	21.3	19.9
工业	39.4	37.4	31.8	31.3	27.4	27.2	26.9	23.7	22.0	20.2
服务业	35.9	35.4	46.6	44.7	47.8	50.4	48.4	53.9	56.6	60.0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整理

(3) 塔吉克斯坦三大产业结构演进波动明显。农业和工业占 GDP 的比重均呈下滑趋势，服务业由于农业和工业下滑而显得畸高。2011 年塔吉克斯坦产业结构呈现三、二、一格局，占 GDP 比重分别为 60%、20%和 19.9%。综合塔吉克斯坦产业发展和结构演进情况来看，该国经济尚未进入平稳发展状态，塔吉克斯坦依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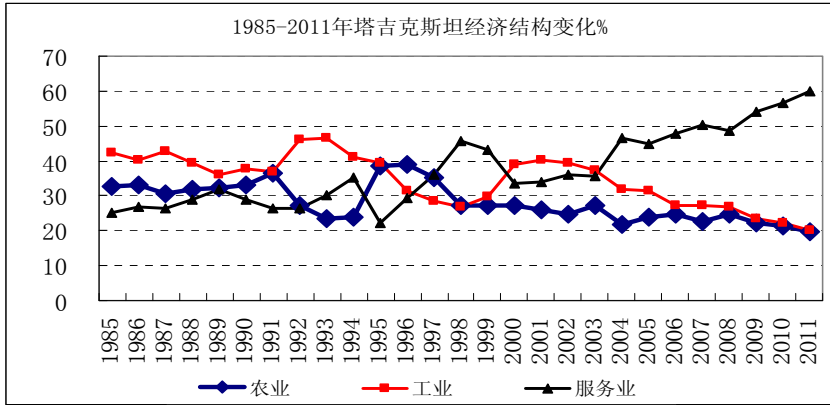


图 11 1985-2011 年塔吉克斯坦经济结构变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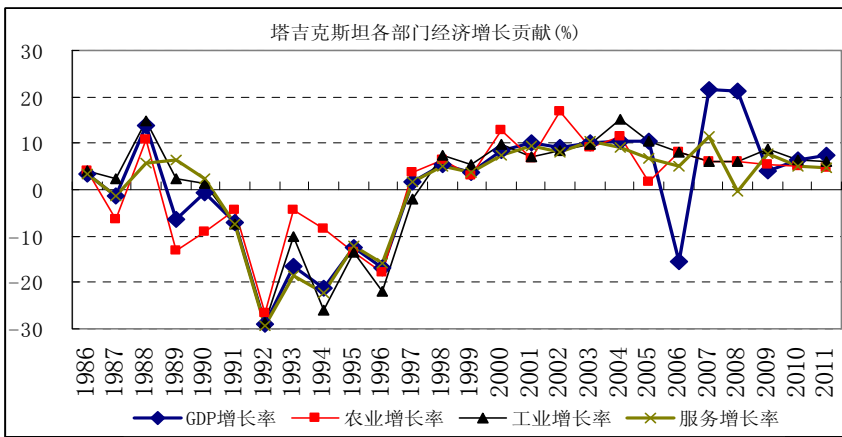


图 12 塔吉克斯坦各部门经济增长贡献 (%)

四、上海合作组织各国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变化比较

上海合作组织各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特征不同，在产业结构方面存在差异。中国具有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外商投资充沛，民营企业发展，国有企业发挥主导作用，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在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经济中，农业还占有重要地位，工业薄弱，能源优势产业发展较为迅速，出口依然以原材料为主。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

两国工业、科技基础雄厚，但产业结构不均衡，对能源和高能耗工业依赖度高，加工业和机械制造业发展投入不足，随着资源财富积累，人均收入水平大幅提高，服务业得到较快发展。

(一) 上海合作组织各国经济发展水平

根据世界银行 2011 年的收入分组标准^①，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俄罗斯已经进入高收入国家，哈萨克斯坦已经接近于高收入国家水平，中国处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处于中等偏下收入水平，塔吉克斯坦仍然是低收入国家。不同的发展水平，相应地，消费结构也会不同。通常随着收入提高，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将下降，而对需求收入弹性^②较大的服务产品消费比重将上升，由此带动产业结构变化。

表 13 上海合作组织各国名义人均 GDP(单位：当期美元)

年度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中国	314	330	363	374	469	604	703	774	821	865	949
俄罗斯	3485	3427	3095	2929	2663	2670	2651	2749	1844	1339	1775
哈萨克斯坦	1647	1512	1515	1433	1320	1288	1350	1446	1469	1130	1229
乌兹别克斯坦	651	659	604	597	576	586	601	623	623	702	558
吉尔吉斯斯坦	609	576	513	449	372	364	395	376	345	258	280
塔吉克斯坦	496	468	346	294	236	213	178	155	219	178	139
年度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中国	1042	1135	1274	1490	1731	2069	2651	3414	3749	4433	5445
俄罗斯	2101	2375	2976	4109	5337	6947	9146	11700	8616	10481	13089
哈萨克斯坦	1491	1658	2068	2874	3771	5292	6772	8514	7165	9070	11245
乌兹别克斯坦	457	383	396	465	547	643	830	1023	1182	1377	1546
吉尔吉斯斯坦	308	322	381	433	476	543	722	966	871	880	1075
塔吉克斯坦	173	194	245	325	358	434	563	771	734	820	935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整理

① 世界银行 2011 年公布的国家收入分组标准为：低收入国家（1005 美元及以下）；中等偏下收入国家（1,006-3,975 美元）；中等偏上收入国家（3,976-12,275 美元），高收入国家（12,276 美元及以上）。

② 表示消费者对某种商品需求量的变动对收入变动的反应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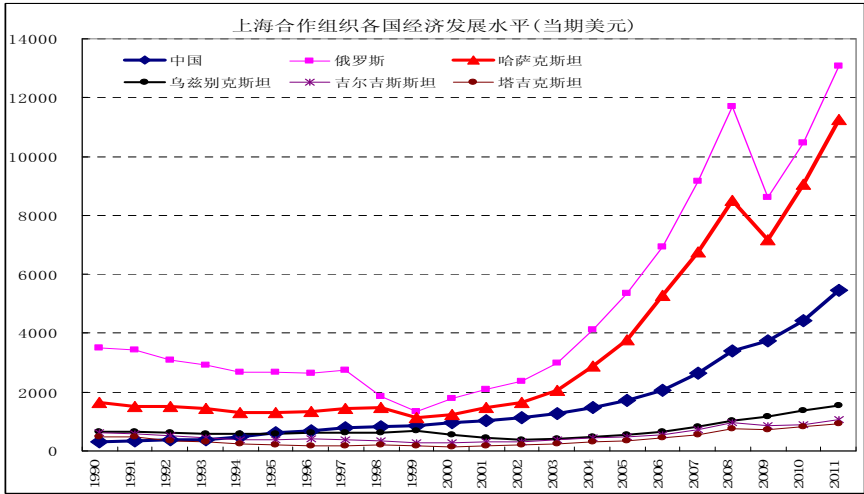


图 13 上海合作组织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当期美元）

（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产业结构变化

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产业结构来看，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还是农业国家，从马尔萨斯经济^①向现代工业国的转变还刚起步；中国正在转型过程中；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在工业方面已有一定的发展。

表 14 上海合作组织各国产业结构变化(单位：%)

	1991 年			2001 年			2011 年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中国	24.53	41.79	33.69	14.39	45.15	40.46	10.04	46.61	43.35
俄罗斯	14.29	47.60	38.10	6.59	35.70	57.71	4.04	36.68	59.28
哈萨克斯坦	26.71	44.59	28.70	9.37	38.82	51.80	5.26	44.33	50.40
乌兹别克斯坦	36.98	36.57	26.46	34.01	22.64	43.36	18.90	36.14	44.96
吉尔吉斯斯坦	36.98	35.46	27.57	37.29	28.93	33.78	19.82	28.69	51.48
塔吉克斯坦	36.62	36.93	26.45	26.16	40.08	33.77	19.89	20.16	59.95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整理

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农业比重占国民经济比重

① 马尔萨斯经济通常指以农业为主、工业化发展落后、人均收入提高缓慢的经济。

约 20—30%，农业集中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劳动力，这三个国家还没有摆脱农业生产国的身份。中亚国家的工业比重在 2000 年之前波动比较大，进入 21 世纪，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工业比重呈稳中上升趋势，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工业呈下降趋势。这些国家工业结构单一，水平落后，原材料工业独大，技术陈旧，投资不足，影响了结构调整。俄罗斯能源工业得到较大发展，农业比重有较大的下降。

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服务业占 GDP 比重普遍高于 1990 年的水平，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提高，由于恩格尔法则作用，服务业需求增加。另一方面，特别是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由于工业不发达，占 GDP 的比重低，从而造成了服务业比重的虚假升高。

从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的产业结构变化可以看出，2005 年以来，这两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保持相对稳定，人均收入已超过 10000 美元，表明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相对较高。

（三）上海合作组织各国产业结构变动值

产业结构变动值，反映了产业结构演进的快慢，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技术进步的快慢和收入水平的增长快慢。不管是自身创新还是通过外商投资引进技术，如果一个国家技术进步，那么产业更替的速度将比较快，而且部门之间的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也比较快。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快慢，反映在恩格尔法则中，即消费结构将有比较大的变化。

表 15 1991—2011 年上海合作组织各国产业结构变动值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变动值
中国	14.48	4.82	9.66	28.97
俄罗斯	10.25	-10.93	21.18	42.36
哈萨克斯坦	21.45	-0.26	21.70	43.41
乌兹别克斯坦	18.08	-0.43	18.50	37.01
吉尔吉斯斯坦	17.16	-6.76	23.92	47.84
塔吉克斯坦	16.73	-16.77	33.50	67.01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整理

产业结构变动值是用来分析产业结构变化程度的指标。每个部门比重变化的表达式为： $M_i = m_{i1} - m_{i0}$ ，产业结构总变动值 $M = \sum |M_i|$ ，其中 M 是产业结构变动， m_{i1} 是现期结构比， m_{i0} 是基期结构比，其中 i 是产业序号。我们用 1991—2011 年的数据，计算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的产业结构变化。同时，我们运用产业部门结构变动指数显示具体产业的变动程度和变动方向，其具体表达式为： $M_i = \sum (m_{i1} - m_{i0}) / m_{i0} * 100$ ， M_i 为第 i 部门的结构变动指数，为负值，表示产业的份额下降；反之，说明产业份额上升。

表 16 1991—2011 年上海合作组织各国产业结构变动指数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中国	-59.06	11.54	28.69
俄罗斯	-71.72	-22.95	55.59
哈萨克斯坦	-80.30	-0.58	75.63
乌兹别克斯坦	-48.89	-1.17	69.95
吉尔吉斯斯坦	-46.39	-19.07	86.77
塔吉克斯坦	-45.69	-45.41	126.67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整理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除中国以外，产业结构变动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即农业和工业的比重下降，服务业的比重上升，但是各产业的变动幅度不同。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发展较快，农业的比重快速下降；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仍然是农业国，农业部门的比重下降缓慢，而且还占较大比重。从工业来看，俄罗斯的工业比重有不小的下降，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工业的变动幅度相对较小。塔吉克斯坦工业比重下降最大，但是这种产业结构变化并不代表该国经济发展，而是该国工业发展滞后的表现，因为塔吉克斯坦工业比重占比较小，并未完成工业化。中国与其他成员国在产业变动上有明显的区别，即中国的工业变动方向是相反的，工业比重上升，这说明中国经济正处在工业化过程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服务业占 GDP 比重均表现为上升。

（四）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产业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关系。

结构和增长融合理论模型的结论是，收入水平提高将引起需求结构变化，带动农业部门比重下降，而服务业比重上升。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中国的数据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中国农业部门的比重从 1991 年的 24.53% 下降至 2011 年的 10.04%；俄罗斯农业部门的比重从 1991 年的 14.29% 下降至 2011 年 4.04%；哈萨克斯坦农业部门比重从 1991 年的 26.71% 下降至 2011 年 5.26%。20 年间，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的农业比重绝对值下降超过 10%，哈萨克斯坦的农业比重绝对值下降超过 20%。中国服务业上升了 9.66%，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分别上升了 21.70% 和 21.18%。这表明，收入提高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巨大的引致效应。

另一方面，由于鲍莫尔病，当工业部门技术进步速度快于服务业部门时，服务业将吸收大量资源，特别是当人均收入没有太多的提高时，这种变化将比较明显。从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三个国家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从表 15 和表 16 的数据中我们看到，这三个国家的收入水平变动不大，人均收入依旧处于 1000 美元左右。但是在 1991 年到 2011 年之间，服务业比重变化剧烈，变动值分别为 18.5%，23.92%，33.50%。这说明，在恩格尔规律作用不是很明显的情况下，这三个国家“鲍莫尔病”严重，同时工业发展以能源重工业为主，需要劳动力少，加剧了“鲍莫尔病”的严重性。

产业结构变化影响经济发展速度。“结构红利”是在经济从马尔萨斯经济向现代经济演化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比如日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期间，产业结构剧烈变化，经济高速增长。但如果经济出现大的波动，引起产业结构大的变动，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就并非是良性互动，此时“结构红利”并不存在。在上海合作组织六个成员国中，非常突出的是塔吉克斯坦。由于政局不稳，经济低迷，而且波动较大，该国产业结构变动更多的是外在的冲击造成相关产业衰退，而非市场原动力驱使产业结构演进，于是难以看到结构变动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局势。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工业化进展缓慢，结构红利也不明显。中国 20 年来的发展，是农业劳动力大转移的时代，工业化快速推进，产业结构变化和要素流动呈良性互动关系，结构变化引致

经济高速发展，具有相当大的贡献。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自上世纪末以后，各产业比重相对稳定，结构变化不再明显，而且服务业比重较高，2011年分别为 59.28%和 50.4%。从横截面角度来看，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基本稳定，经济增长速度较小，“结构红利”减小。可以预见，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服务业带动经济发展将起重要作用。

（五）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服务业比重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非线性

关于经济理论和时序数据或横截面数据，学界的共识是，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服务业比重较大。但是，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数据来看，服务业比重和人均 GDP 之间并不满足这种线性关系。2011 年，收入最低的国家塔吉克斯坦服务业比重最高，其次是俄罗斯，之后为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位列第三，中国排在最末位。

表 17 2011 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人均 GDP 和服务业比重

国家	人均 GDP	服务业比重
俄罗斯	13089	59.28
哈萨克斯坦	11245	50.40
中国	5445	43.35
乌兹别克斯坦	1546	44.96
吉尔吉斯斯坦	1075	51.48
塔吉克斯坦	935	59.95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整理

这种非线性与传统经济理论是不一致的，也与历史经验不相同，主要原因在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服务业的发展层次不同。从功能角度来分，服务业可以分为消费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通常生产性服务有助于工业和农业的技术水平提高，而消费服务产品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能源重工业占产业比重较大，而能源重工业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吸纳能力有限，同时对生产性服务业要求较低。由于生产性服务业不发达，整个国民经济技术进步后劲不足，可见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两国今后发展潜力将受到制约，容易陷入“资源诅咒”陷阱。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不仅生产性服务业落后，技术密集型工业和劳动力

密集型轻工业都发展滞后，而且这三个国家能源工业发展也落后。于是传统消费服务业占总体比重较高。这三个国家在工业化未有效推进之前已陷入“鲍莫尔病”的困境，今后发展比较困难。中国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中服务业占比最小的国家，一方面与中国成功的工业化有关，另外，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生产性服务业不发达，不利于国民技术进步，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中国转型发展需要关注的环节。

六、结 语

本文在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融合研究的理论基础上，考察上海合作组织产业结构的变化事实和经济增长事实。产业结构变化起因在于供给方面的变化和人均收入的增长。同时，产业结构变化也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本文根据上海合作组织六个国家 1990-2011 年 22 年的产业数据和人均 GDP 的数据，得出相关结论。

自 1990 年以来，上海合作组织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主要动因，一是，取决于技术进步，经济生产能力得到改善，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二是，由于人均收入提高，消费变化遵循恩格尔法则，收入引起需求结构变化，也带动了产业结构的演化。上海合作组织六个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要素禀赋各异，与此相适应匹配的产业结构有较大的差异。

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人均 GDP 水平是六个成员国中最高的两个国家，俄罗斯已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哈萨克斯坦属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国家，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2011 年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的服务业占较大比重，分别为 59.3%和 50.4%，农业比重较低，分别为 4%和 5.3%，但是工业发展依然侧重于能源重工业。

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个成员国，人均 GDP 依然较低，农业部门比重较大，2011 年的占比分别为 18.9%、19.8%和 19.9%，工业结构单一且比重较小，比重分别为 36.1%、28.7%和 20.2%，服务业主要是传统服务占主要部分，可见中亚三国发展水平较低，依然是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农业国家。

中国人均 GDP 属于中等收入水平，农业比重为 10%，工业为 46.6%，服务业为 43.4%，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中唯一一个工业比重高于服务业比重的国家，与其他成员国相比，中国工业体系和产业结构协调相对较好。

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变化也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从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三大产业的贡献率及其发展趋势看，结构调整影响着经济增长的速度，体现出“结构红利”的动态关系。中国经济发展以工业化为主要动力，经济增长速度和波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工业部门的变化。上海合作组织其他五个国家，除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局变化对经济发展有较大影响外，产业结构也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两国工业和服务业比重相对稳定，且占国民经济绝大部分，两部门的变化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农业部门增长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不小。通过对上海合作组织各国之间产业结构的变动值计算，发现产业结构变化是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变动的重要因素，这正是对结构红利的一种验证。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and according to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GDP data of the members of the SCO from 1990 to 2011, it i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to explore the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Since 1990, there have been two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six members of the SCO. First, due to advances in technology, improved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different sectors with different growth spee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been adjusted. Second, because of the increase in per capita income and changed structure of deman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evolved. There are different level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different factor endowments of the six members of the SCO, as a result, there are differences amo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ccordingly. On the basis of contribution rate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three industries of the SCO members, we can find tha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al change also has an impact on the economic growth, embodying its dynamic relationship

of “structural bonus”.

【Key Words】 the SCO, Structural Change, Economic Growth

【 Аннотация 】 На основе теории взаимосвязан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структуры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данными по развитию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государств-членов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за 22 года в период 1990-2011 гг, и данными ВВП, изучение структурных изменени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 по сути,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ым перспективны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м. Основными факторам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структуре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шести стран ШОС, начиная с 1990 г., во-первых, является улучшени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отенциала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благодаря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им достижениям, различные темпы роста различных отрасле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способствуют корректировке структуры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во-вторых, увеличение доходов на душу населения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структурным изменениям спроса, что также приводит к эволюции структуры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Наблюдается различный уровень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членов ШОС, существуют различные факторы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с этим связаны большие различия в структуре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Ставка вкладов трёх отрасле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государств-членов ШОС и тенденции их развития демонстрируют, что изменения в структуре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также оказывают влияние н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рост и отражают динам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труктурных бонусов».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Шанхай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труктура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рост

(责任编辑 肖辉忠)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12年第5期

(总第177期)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冯绍雷

出版：《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A403

邮编：200062

电话：021-62233816；021-62238113

传真：021-62232113

电子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

排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电脑室

印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发行：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721X

网络电子版代理：中国知网

网址：www.cnki.net

· 公开发行 ·

定价：20.00元